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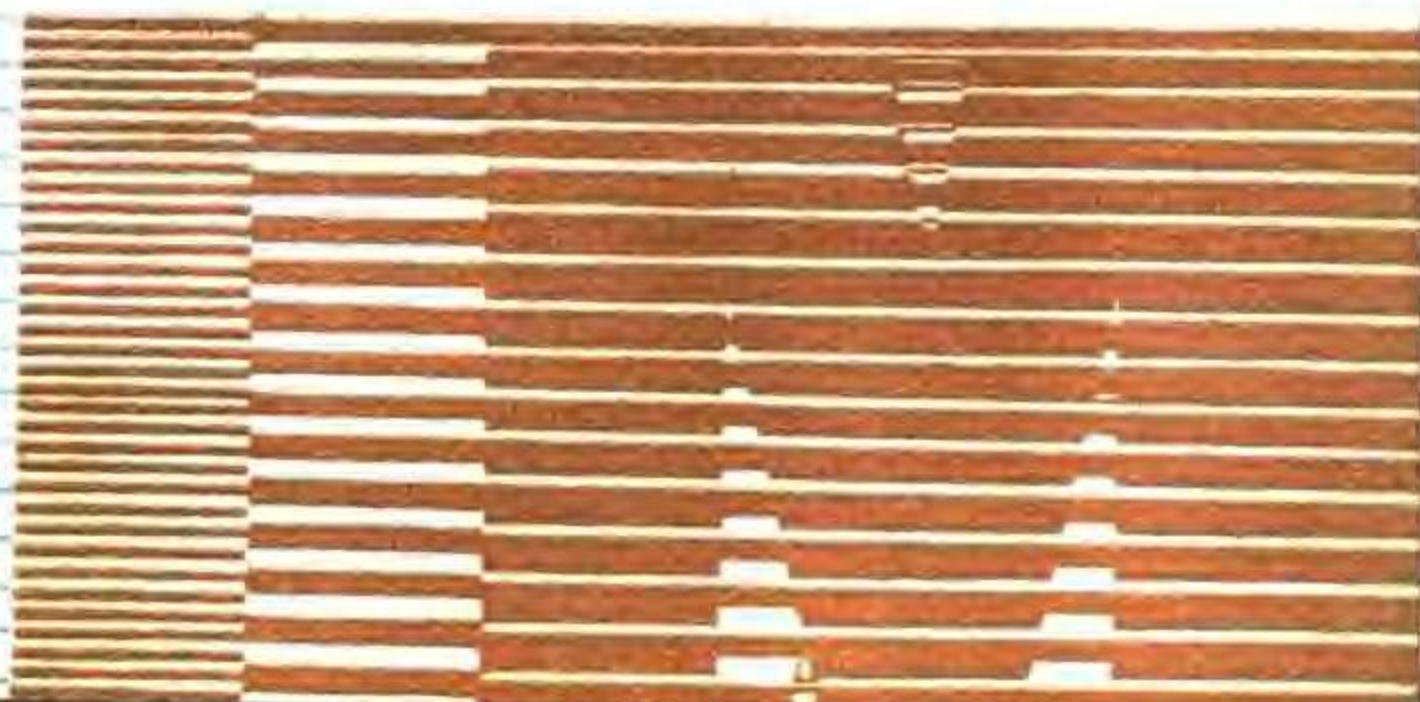
MAKE SI ZHU YI
ZHE XUE SHI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

北京出版社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黄楠森 商英伟

第四卷



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科研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 四 卷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北 京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20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四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 黄楠森，商英伟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ISBN 7-200-02279-9

I. 马… II. ①黄… ②商…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史②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B17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四卷)

MAKESIZHUYI ZHEXUESHI (DISIJUAN)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本卷主编 黄楠森 商英伟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38毫米 32开本 18.625印张 500 000字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 7-200-02279-9

B·38 定 价：12.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卷主要阐明了自19世纪80年代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同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派、马赫主义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之间在哲学上的斗争。本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贡献，特别是对他的某些有争议的哲学观点作了恰当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阐明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贡献，并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当代国内外对它的批判和攻击；较充分地吸取了国内外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成果，系统地揭示了它的丰富内容；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分析和评价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

编 者 的 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纪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从远一点说，是由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经济、政治和理论的发展所准备的；从近一点说，是由19世纪末以来的经济、政治和理论的发展所准备的，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这就是本卷所要阐发的内容。同其他地区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哲学斗争包含革命队伍外部的斗争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领导和具体推动了这些斗争。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主义的主要创立者，他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列宁的哲学思想总结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其中包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把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6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形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列宁主义，包括列宁的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发生了怀疑，向它提出了挑战、质疑，甚至攻击，因此，本卷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地阐明和评价列宁的哲学思想，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挑战和攻击，使列宁的哲学思想的真理的光辉和强大的威力能进一步为人们所理解。

本卷初稿曾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评审。对本卷提出评审和修改意见的有祝大征、张懋泽、王荫庭、李辛生、余少波、何梓昆、夏剑勇等同志，他们对初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阅，对本卷

的基本观点提出了肯定的意见，对本卷的薄弱部分和不妥之处提出了许多深刻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本卷编写人员认真地讨论和吸取了这些宝贵意见，它们对本卷的修改、统稿和定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卷的统稿定稿工作得到了北京《阵地》杂志社的支持。我们在此对评审本卷的专家学者和《阵地》杂志社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卷的作者有黄楠森（第一章）、谢浞波、李清昆（第二章）、曾盛林（第三章）、陈志尚（第四章）、商英伟（第五章）、苏振富（第六章）。本卷各章由原作者作过反复修改，然后由黄楠森、商英伟统稿和定稿，最后由黄楠森、庄福龄、林利审定。

由于本卷内容现实性较强，争议较多，而作者水平有限，研究不够，一定有许多疏漏、不妥、失误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本卷主编

1993年8月

主 编 黄楠森 庄福龄 林 利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克信 孙伯铿 庄福龄 宋一秀

余其铨 余源培 吴仕康 张念丰

苏厚重 林 利 易克信 施德福

徐 琳 高齐云 商英伟 黄楠森

曾盛林 靳辉明

本 卷 主 编 黄楠森 商英伟

参加编写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陈志尚 苏振富 李清昆 商英伟

黄楠森 谢淀波 曾盛林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1)
第一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	(1)
一、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和自然科学革命的出现.....	(2)
二、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6)
三、世界工人运动的和平发展和第二国际内部 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	(8)
第二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运动.....	(10)
一、俄国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的形成.....	(11)
二、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12)
三、俄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	(13)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主义的形成.....	(15)
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早期.....	(15)
二、列宁主义的萌芽.....	(17)
三、列宁主义的形成.....	(19)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2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运用对俄国革命胜利的 重大作用.....	(21)
二、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22)
简短的结论.....	(25)
第二章 普列汉诺夫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贡献	(26)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理论活动.....	(26)
一、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26)
二、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时期.....	(28)

三、从马克思主义到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	(31)
第二节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	(36)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	(36)
二、辩证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42)
三、深入阐释唯物辩证法学说·····	(52)
第三节 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61)
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的深入探讨·····	(61)
二、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理论·····	(70)
三、关于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	(78)
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深入阐发·····	(82)
五、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93)
第四节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贡献·····	(102)
一、论人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	(102)
二、到生产劳动中寻求艺术的起源·····	(107)
三、以社会生活的机制阐明艺术的发展规律·····	(115)
四、论评价艺术创作的科学方法·····	(122)
第五节 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与评论·····	(127)
一、阐明宗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	(127)
二、对“造神说”和“寻神说”的批判·····	(135)
第六节 对哲学史的研究与贡献·····	(143)
一、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144)
二、对人性论的批判·····	(146)
三、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148)
四、关于哲学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152)
简短的结论·····	(155)
第三章 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实行时期的	
哲学思想 ·····	(157)
第一节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157)
一、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	(158)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	(162)
三、早期的哲学研究·····	(170)

第二节 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

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175)

一、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175)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181)

三、贯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185)

四、阐明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189)

第三节 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

捍卫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193)

一、驳斥民粹派，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
哲学意义……………(193)

二、驳斥民粹派，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201)

三、驳斥民粹派，初步阐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207)

第四节 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

阐明和发展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215)

一、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阐明马克思
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215)

二、批判经济派的庸俗经济决定论，阐明经
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222)

三、阐明革命政党的重大历史作用……………(228)

四、革命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能动作用……………(231)

第五节 批判孟什维克，在建党和制定革命策略的

斗争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238)

一、关于党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
来巩固的思想……………(239)

二、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思想……………(242)

三、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246)

四、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249)

简短的结论……………(255)

第四章 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发展……………(257)

第一节 列宁研究哲学问题的背景……………(258)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哲学斗争的特点	(258)
二、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是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代表	(260)
三、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思想战线的形势 把哲学斗争提到首位	(266)
第二节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党性原则	(274)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路线和中间派	(274)
二、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和实践	(282)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者世界观的基石——物质观	(294)
一、对物质范畴的科学规定	(295)
二、对实体、运动等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310)
第四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反映论	(317)
一、对反映论的坚持和发展	(318)
二、对马赫主义经验论(“要素”、“原则同格”) 的批判	(329)
第五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	(337)
一、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释	(338)
二、两种实践观的对立	(341)
三、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坚持和发展	(348)
第六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新发现的 哲学总结	(355)
一、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总结	(356)
二、关于列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的评论	(365)
简短的结论	(372)
第五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	(374)
第一节 列宁系统考察作为哲学科学的 辩证法的动因	(375)
一、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的理论基础	(376)
二、对“经验一元论”的追踪批判	(379)
三、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得到的启迪	(384)
四、撰写《卡尔·马克思》，认识到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内在 逻辑要求	(389)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392)
一、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过程及其特点·····	(393)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399)
第三节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	(405)
一、对辩证法体系的基本原则的探讨和论述·····	(406)
二、辩证法是认识史的精华·····	(410)
三、辩证法体系的论述及其方法·····	(415)
第四节 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实质的论断·····	(420)
一、对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的科学总结·····	(421)
二、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	(426)
三、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	(429)
第五节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的探讨和论述·····	(436)
一、概述辩证法的最初的纲要·····	(437)
二、对辩证法丰富内容的进一步探索和揭示·····	(443)
三、对若干重要范畴的论述·····	(449)
第六节 列宁揭示认识的主体能动性和认识的辩证法·····	(459)
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	(460)
二、认识与实践,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与 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	(463)
三、认识的辩证性,真理的过程性·····	(469)
四、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477)
简短的结论·····	(473)
第六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深入发展·····	(481)
第一节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 研究方法上的斗争·····	(482)
一、直接为帝国主义辩护或作“市侩式”批评的理论·····	(483)
二、第二国际各国党的理论家对“帝国主义”的理论 探索和论辩·····	(489)
三、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及其方法·····	(498)
第二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的	

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507)
一、揭示帝国主义形成的“自决历史过程”	(507)
二、运用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511)
三、揭露时代“本质自身的矛盾”，确定帝国主义的 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	(518)
四、科学评价《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	(523)
第三节 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诡辩论，阐发 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	(528)
一、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辩证法与诡辩论的根本对立	(529)
二、深刻阐明战争与革命的辩证转化	(537)
第四节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与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	(544)
一、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545)
二、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蕴涵着丰富的 革命辩证法思想	(548)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556)
第五节 对国家与革命理论的辩证考察和系统阐发	(559)
一、列宁系统研究国家问题和写作《国家与革命》 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560)
二、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国家消亡与 暴力革命的相互关系	(564)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	(568)
四、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国家消亡”的 经济基础的辩证考察	(575)
简短的结论	(58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这种客观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上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由列宁开辟的，它始于俄国和苏联，而后扩展到全世界。列宁成为新阶段的开辟者不仅仅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影响不仅仅是俄国的，也是世界性的。因此，列宁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高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本卷和下一卷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并以列宁的哲学思想为重点。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来，就开始在欧洲各国传播和发展，其中也包括俄国。尽管它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略晚于西欧各国，但由于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由于俄国革命运动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和所处的地位，它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和思想运动的主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是一致的，列宁同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阶段。

第一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世界经济政治形势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

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近半个世纪内，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制度也从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20世纪上半叶是人类有史以来世界性大动荡时期。

一、工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和自然科学革命的出现

19世纪最后30年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大部分地区工农业生产还非常落后，但西欧和美国的生产却有着巨大的发展，当时在世界经济中已占居着支配的地位，代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这期间，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两倍多，其中增长得最快的是钢铁生产，钢产量猛增55倍，冶金和机器制造业也相应地大大发展起来了，新建立的化学、电力等工业部门发展也很快。在运输业方面，陆地上火车成了主要交通工具，海上轮船代替了帆船。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工业生产从所谓“棉纺织时代”进入所谓“钢铁时代”。世界农业也有相应的发展。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农业机械的使用和美国西部、加拿大、南美、澳大利亚等地大片生荒地的开垦，农产品的数量也有大幅度的增加。

在世界工业发展中，英、法、德、美四国占了大部分。如以187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为100，则四国工业总产值占了78，其中英国占32，美国占23，德国占13，法国占10；到1900年，全世界工业总额都增加了，但四国仍占72，其中美国跃居首位，占31，英国占18，德国占16，法国占7；1910年，四国占73，其中美国占35，德国超过了英国，占16，英国占14，法国占7。几十年来，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始终占主要地位，只是它们各自所占比重有了变化。还应指出，其余20%多的工业的大部分也在这些国家的支配之下。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资本输出、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全世界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的罗网，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自然科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一场自然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暂时虽然还看不出来，对哲学的发展的影响却是非常明显的。在整个19世纪中，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古典物理学占居着统治地位，整个宇宙被认为是由“最小的”物质粒子——原子按照牛顿力学的规律构成的，也是按照牛顿力学的规律运行的。物理学被认为是分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化学被认为是原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尽管在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中都有所突破，尽管恩格斯和个别自然科学家如肖莱马已开始建立辩证的自然观，但19世纪提供的自然图景整个说来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于物质结构学说的突破，即“物理学革命”。早在1861年英国科学家斯托内就使用了“电子”一词，1874年正式提出“电的原子说”，即电子说，但当时这还只是一种推想。1897年英国科学家汤姆生用实验证实了电子的存在，即论证了早已发现的阴极射线就是电子流——一种比原子更小的物质，后来科学家们又进一步证明任何原子都包含着电子。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时意外发现了另一种射线，即X射线或伦琴射线（后来知道是由于原子核外电子能量变化而产生的电磁波）。1896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发现了铀元素的天然放射性。1897年居里夫妇测定了铀的放射性强度。居里夫妇系统研究了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放射性效应，发现了钍、钋、镭等放射性元素，镭的放射性比铀强一百万倍。1899—1900年新西兰科学家卢瑟福用强磁场作用于镭的射线，发现它可以分为三种射线，称之为 α 射线（偏转小，带正电）、 β 射线（偏转大，带负电）、 γ 射线（不偏转，穿透力最强）。1901年德国物理学家考夫曼发现 β 射线的质量随其速度的增大和减少而增减。后来科学家发现 α 射线是氦的正离子流， β 射线是电子流， γ 射线是波长比X射线更短的电磁

波。还发现放射性元素在发出三种射线后会衰变为原子量更小的另一种元素。1911年卢瑟福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和实验，提出了有名的有核原子模型，一个原子好像一个太阳系，中间是原子核，周围有一定数量的电子绕核旋转，三种射线都是从原子核中放射出来的。后来，科学家们对原子核的内部结构又作了更深入的研究。这一系列发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高速的微观世界，19世纪自然观的许多原理都发生了动摇：原子不再是最小的粒子了，元素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一种元素可以蜕变为另一种元素，质量和能量似乎不再守恒了，等等。物质结构学说的突破，可以说是物理学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后来还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

古典物理学不仅在对微观世界的理解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对宏观世界的理解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古典物理学的时空观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物质就在这种时空中运动，不仅时空可以同物质分开，时间与空间也可以分开。古典物理学还认为，除了由原子构成的物质以外，空间中还充满了传播光和力的介质——以太。尽管所谓以太一直没有被证实，这种观点在理论和实验上也遇到许多困难，但除个别人外，人们对这种观点仍然深信不疑。爱因斯坦1905年建立狭义相对论，1916年建立广义相对论，否定了这些观点。狭义相对论提出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得出了同时的相对性、时钟延缓、物体长度缩短、物体的质量与速度相关、质量与能量相关等结论。广义相对论论证了空间的结构和性质离不开物质的分布，欧几里得的平坦的空间限于中等距离，而现实的广大的空间是弯曲的黎曼空间，空间的曲率则取决于引力场的强度。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均多次为实验所证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抛弃了多余的以太、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论证了空间和时间的可变性、空间与时间不可分、时空与物质不可分。相对论的建立可以说是物理学革命的第二次战役。

物理学革命的第三次战役应该说是量子力学的建立。量子力学是在量子论的基础上建立的。光的波动说在19世纪取得了胜利，电磁波的理论得到了证实，能量的连续性成为古典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波动说无法解释的现象，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了能量子的假说加以解释。1905年爱因斯坦进一步提出，不仅能量的辐射和吸收是不连续的，电磁波（包括光波）也是量子流，用光量子流可以完满地说明光电效应。1913年卢瑟福的学生、丹麦物理学家波尔提出把卢瑟福的原子行星模型量子化的理论。1924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依提出不仅电磁波具有粒子性，一切实物粒子都具有波动性，换言之，任何客体都具有波粒二象性。波粒二象性的发现使人们有可能建立一门专门研究微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统一理论——量子力学。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和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是在上述科学家们量子论思想的基础上于1925—26年间奠定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又加上德国物理学家波恩、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等人的努力，量子力学在30年代初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量子力学的创立改变了人们只承认连续性和机械力学决定论的旧观念，论证了自然界中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揭示了物质世界统计规律的意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结合，构成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并为整个20世纪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原子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使科学家们有可能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把物性考察和结构分析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从基本粒子到原子、分子、凝聚态物质、地球、星系乃至整个宇宙的物理学图景。化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物理学与化学互相渗透，形成了原子核化学、结构化学、高分子合成化学新领域。生物学的研究也从细胞水平逐渐向分子水平深入，产生了分子生物学。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在20世纪上半叶也开始了。总之，这个世纪初开始的自然科学革命，在上半叶，已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两次大战干扰了它的发展（从一定意义

上说也推动了它的发展），但上半叶的发展也为下半叶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准备了条件。

二、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拥有巨额资本的大企业和大公司不断涌现，并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垄断组织最初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先是在重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后扩及其他领域。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在居起的美国 and 德国比在英国和法国更早更快。

1870年洛克菲勒开始组织美孚石油公司，十多年来并吞了14个其他石油公司，还控制了另外26个石油公司的多数股票，垄断了美国全部石油工业的90%以上。1873年卡尼基开始投资炼钢业，后来控制了美国的大部分钢铁业。当时的摩根公司则控制了美国许多大银行和保险公司。1901年摩根、洛克菲勒和卡尼基等财团联合建立美国钢铁托拉斯。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20世纪初美国的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额有50%—90%为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所控制。列宁曾指出美国是典型的托拉斯国家，美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

德国工业的迅速增长和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的工业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德国的垄断组织主要采取卡特尔形式，1875年有8个，1887年增加到70个，1896年约有250个，1911年达到500—600个。德国铁业协会几乎独占了生铁的生产。莱因·威斯特法伦煤业辛迪加于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区采煤量的87.6%，到1910年达95.4%。柏林九家大银行集中全德银行资本的83%。列宁曾指出，“德国没有托拉斯，‘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超过三百个资本巨头。”①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69页。

英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资产阶级主要靠向殖民地输出资本的方式来榨取超额利润，这就严重阻碍了国内生产装备的更新和先进技术的采用，使它在40年内从第一工业国降低到第三。但英国工业生产和资本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集中的过程，特别是由于资本输出迅速增加，银行业迅速走向垄断。英国在国外投资，1850年才2亿英镑，1875年就增至14亿，1913年高达40亿。而银行的数目却越来越少，1875年有120家，1900年减至98家，1913年更减至61家。1914年英国五家最大银行控制了全部存款的40%。列宁认为，英国帝国主义的形成有“两大特征：（1）拥有极广大的殖民地；（2）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①。

法国的情况与英国接近。它在19世纪中叶以前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英国，占第二位，后来被美国和德国超过，退居第四位。法国重工业很落后，工业生产以轻工业，特别是奢侈品的生产为主，中小企业占优势，虽然从70年代起也开始了集中过程，但比美、德、英都差。在法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资本输出，但同英国的资本输出比较有其特点，即英国是向殖民地输出生产资本，而法国是向其他欧洲国家输出利息优厚的借贷资本。俄国是它的最大债务国，它借给俄国贷款不下一百亿法郎。这种借贷关系1893年促成了法俄联盟。列宁认为法帝国主义“可以叫作高利贷帝国主义”^②。

其他西欧国家和俄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19世纪末都相继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些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市場，为了划分势力范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把全世界都卷进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中。列宁曾对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作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2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

又说：“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①

生产无政府状态在30年内引起了四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即1873、1882、1890、1900年的四次，每次危机，都给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给工农群众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灾难。同时也促进了资本的集中，推动了帝国主义的形成，因而列宁指出，“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②。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他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和平发展逐渐为经济上政治上的动荡所代替，酝酿着新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高潮，酝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世界工人运动的和平发展和第二国际 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这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只能在和平条件中并利用和平条件来发展自己。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到处都在形成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69年，美国工人党成立于1876年，1877年改为社会主义工党，法国工人党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党成立于1879年，意大利工人党成立于1882年，比利时工人党成立于188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成立社会主义政党。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着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聚积力量，加强团结，以便在革命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52页。

高潮到来时投入新的战斗。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世纪70至90年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罢工斗争方面，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掀起了多次罢工浪潮，罢工有时也发展成流血斗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是美国80年代的工人运动。1886年5月1日全国有35万人罢工，举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游行。芝加哥市罢工人达4万人，遭到警察残酷镇压。5月3日和4日，警察先后枪杀了工人数名，伤200多人。事后法院判处8名工人领袖死刑，经过斗争，仍有4人被处死。多数工人争得了8小时工作日的胜利。1889年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上把5月1日定为“五一国际劳动节”。1886年法国爆发了德卡斯维尔矿工大罢工，1889年英国伦敦先后爆发了煤气工人和码头工人的罢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也掀起了多起罢工斗争。罢工锻炼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增强了工人的团结和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促成了第二国际的建立。第二国际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组织起来的。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成立第二国际作了准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实际就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恩格斯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会场上悬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巴黎大会通过了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国际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世界工人每年庆祝自己的节日，以游行示威来检阅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作准备。1890年5月1日欧美各国工人响应第二国际的号召，走上街头，举行了世界性的游行示威。恩格斯以70高龄亲自参加了伦敦的游行示威，大大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第二国际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结果，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的团结。第二国际在成立的初期对国

际工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两个时代交错之际，它未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阶段，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第二国际就由于内部出现修正主义思潮而陷于分裂，后来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解体。

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是伯恩施坦。他于1899年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空想主义、教条主义，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游行示威实现社会改革，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的观点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倍倍尔、卢森堡等人的批判。这些修正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到各国，形成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思潮，受到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后来的实践证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路线是行不通的，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但是，第二国际内反对修正主义的各派，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之外，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并没有把这些基本观点同本国条件结合起来，找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些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大战爆发后或者惊惶失措，无所作为，或者倒向本国政府，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善于把它们同俄国的实际和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与俄国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终于在俄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第一个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二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俄国革命运动

出乎西欧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意料之外，巴黎公社革命后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不是出现在西欧，而是出现在经济政治文化

十分落后的俄国，但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俄国内外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一节说明了当时世界形势，这一节将说明俄国的形势和革命运动。

一、俄国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的形成

俄国原是一个封建军事国家，沙皇是俄国农奴主的最高代表。由于俄国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沙皇政府被迫于1861年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尽管俄国农奴制度废除得很不彻底，俄国城乡资本主义仍然迅速发展起来了。三四十年中，大机器生产在主要工业部门就取代了手工生产。例如欧俄地区工厂，60年代只有两三千家，而到世纪末就发展到3倍左右。生铁和石油产量从1861到1890年增加了近10倍。出现了巴库、顿巴斯等新兴工业城市。俄国农村资本主义也发展起来了，阶级分化日益加剧，从前的农奴少部份变成了使用新式农具和雇佣农业工人的富农，大部分成为出卖劳力的贫雇农，有的农奴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经营道路。占农户总数15%的富农，占有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但农奴制残余仍然广泛存在，许多农民是世袭地主的佃农，向地主交纳大量地租。

整个说来，俄国经济面貌比西欧和美国还是落后很多，直到20世纪初年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只占41%，俄国仍然是小农占优势的国家，但垄断资本主义也逐渐发展起来了。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是辛迪加。全国在20世纪初已有垄断组织三十多个，1902年成立的金属销售辛迪加拥有的资本达全国冶金工业资本的70%，1904年成立的顿涅茨煤炭销售辛迪加控制南部煤产量的75%。20世纪初俄国形成了八大银行，它们控制了全国银行资本的55.7%，冶金工业投资的50%和煤矿投资的60%在它们的控制之中。俄国一方面从法国大量输入资本，一方面又向巴尔干各国、土耳其、伊朗和中国输出资本。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了俄国的经济命脉。

俄国既具有一般帝国主义国家的特点，又在经济上保存着广

泛的农奴制残余，而沙皇政府则成为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列宁把俄国称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非常恰当的。

二、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

俄国本来就具有民主革命的传统，19世纪最后30年，由于俄国沙皇政府、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革命义愤日益高涨。但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当时的革命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随着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俄国产业工人队伍也日益壮大，并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1865年，俄国大工厂和铁路工人仅70余万人，而到1890年则增加到143万余人。俄国工人阶级经济上遭受无情的剥削和压榨，政治上受到残酷的镇压和迫害，这些情况激发了工人阶级的强烈的革命精神，引起了群众性的罢工斗争。1870年5月，彼得堡涅瓦纱厂爆发了第一次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整个70年代，全国共发生了350次罢工斗争。1885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奥烈霍沃—祖耶沃城莫洛佐夫工厂大罢工。与此同时，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农民革命运动再度开展起来。1902年仅在中国的欧洲部分就发生了340次农民暴动，农民运动逐渐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成为工人运动的同盟军。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要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01年末至1902年初发生了全国性的总罢课，参加的大学生有三万人以上。

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革命组织。最早是19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的第一批民粹主义组织，70年代先后在敖德萨和彼得堡出现了南俄工人协会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明确地提出了推翻现存经济政治制度的任务。80年代，由于工人运动的推动，由于民粹主义的不断失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迅速传播起来，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是普列汉诺夫领导的

劳动解放社（1883年），其次是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这些以及散在全国各地的性质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最后联合起来，形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8年）。在1903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

由于俄国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结合日益密切，俄国革命运动逐渐跑到西欧各国前面，终于在欧洲30年和平发展之后形成革命高潮，爆发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

1905年俄国革命带有较多的自发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本来没有武装起义的计划，而是由于沙皇政府于1月3日血腥屠杀彼得堡工人请愿队伍，工人不得不奋起反抗，才发生武装斗争的。自此以后，各地工人纷纷响应，或者举行政治罢工，或者举行武装暴动。在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参加的斗争的打击下，沙皇统治的根基岌岌可危。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在如何对待武装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孟什维克态度消极，认为不该拿起武器，布尔什维克则积极组织 and 领导革命斗争，主张首先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然后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在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革命于1907年暂时遭到失败。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领导工农革命群众实行必要的正确的退却，主张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以便聚集和扩大革命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革命高潮再度行将到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沙俄政府在战斗中的失败推动了被打断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导致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俄国人民一举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三、俄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化

俄国民主革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和完成的。尽管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反封建任务有待完成，因而

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但俄国已是帝国主义国家，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工人队伍，特别是革命的发动和胜利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使民主革命有可能在胜利后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不可能设想，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会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把革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的胜利在俄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列宁在20世纪初年在同孟什维克的争论中就提出了俄国革命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论证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在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性质的转化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列宁原来设想，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革命胜利后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政权，实现革命性质的和平转化。但实际上二月革命胜利后，孟什维克步步退让，而布尔什维克又力量不足，结果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去。最初成立了以大地主李沃夫公爵为总理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来改组成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总理的联合政府。尽管当时实际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政权，即工兵代表苏维埃，形成两个政权的局面，但整个国家均在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下，这个政府保存旧的国家机器，把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对工人、农民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进行多方限制、阴谋破坏和残酷镇压，革命性质的和平转变根本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准备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11月7日，在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领导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胜利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起义就是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的形成

列宁主义是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它是当时国际和俄国国内历史条件的产物，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前面两节叙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际和俄国国内的历史条件和革命运动，这一节将叙述列宁主义的形成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早期

俄罗斯民族是富于革命精神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传统。19世纪俄国民主革命的理论表现是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这是俄国革命传统中最光辉的一部分。俄国革命传统在俄国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舞蹈中也有着丰富的表现。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和理论本身的缺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指引俄国革命走向胜利。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革命运动中最早有着重要作用和广泛影响的革命思想是民粹主义。在俄国农奴制废除后，一些平民知识分子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彻底消灭农奴制残余，主张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不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在农奴制废除后必然要发展，主张遏止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从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他们认为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主张以农民暴动来推翻沙皇制度。他们跑到农村宣传他们的主张，遭到多次失败后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来推翻沙皇统治。这些人由于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被

称为民粹派。第一批民粹派组织出现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代表人物有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民粹派思想家。民粹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反对封建主义和揭露资本主义都起过积极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来以后，民粹派坚持唯心史观和民粹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阻力。有的民粹主义者甚至堕落为富农的代理人，对沙皇制度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革命的民粹主义者的个人恐怖活动也无损于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死了，代之而来的是亚历山大三世更残暴的统治。民粹主义的失败和变质使一些民粹主义者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民粹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就同俄国作家有联系。例如他在1846年给俄国文学家安年柯夫写过一封信，其中思想成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入俄国，还是在六、七十年代。第一国际在俄国已建立了支部，支部委员是吴亭，马克思在1876年曾亲自送过一本《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文版给他的妻子吴亭娜。《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为巴枯宁所译，出版于1869年，俄文第二版为普列汉诺夫所译，出版于1882年。《资本论》俄文版是它的第一个外文版，出版于1872年。《哲学的贫困》俄文第一版为查苏利奇所译，出版于1886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早期同民粹主义有一定联系，例如马克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就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同一些民粹派思想家交换过意见，提出了俄国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通过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主要的民粹主义者之一特卡乔夫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思想，尽管在根本观点上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总之，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未能同俄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因而也没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是普列汉诺夫及其领导的劳动解放社。

普列汉诺夫本来是一个民粹主义者，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于1881年逃到国外。他在国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民粹派的错误，于1883年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撰写了许多批判民粹主义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论述俄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和著作。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俄国培养了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思想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对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有重要的作用。但普列汉诺夫的作用主要限于传播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至于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应用于分析新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和路线，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推向新阶段的任务，普列汉诺夫未能承担起来，承担这一任务并加以出色完成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

二、列宁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主义新阶段——列宁主义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创立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上半叶国际和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列宁及其战友的革命活动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斗争分不开的。

列宁在少年时代已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他来到当时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首都彼得堡，在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研究俄国革命问题，评论、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到来进行了初步准备。

在当时的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全国其他城市都存在着许多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把这些小组统一成一个政党。1898年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列宁正在流放，未能参加大会。党的成立标志着俄

国工人运动走上了有统一的组织领导的阶段。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在这次大会中不仅制定了党纲党章，而且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它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萌芽。

列宁主义的萌芽与形成是与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一致的，也是与党的建立和发展一致的，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致的。在1903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曾进行过反对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斗争，在争论中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他们对俄国革命问题的观点。列宁这个时期的著作中的主要内容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反驳各种反对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俄国的现实问题，至于如何回答或解决新时代提出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或理论，还看不出来。

1903年出现的布尔什维克派是一种崭新的因素。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分裂是由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的选举而发生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得票多少的区别，但实质上是两条组织路线的分歧。布尔什维克派的出现意味着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一个适应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条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建党学说的提出。列宁后来写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就系统地详细地阐明和论证了这个建党学说。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派、联共(布)或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上的许多共产党都是按照列宁提出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都是列宁式的党。

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分歧还在策略、领导权、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充分论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应采取怎样的策略。这是一个新问题，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条件下出现的问题，列宁提出了一整套理论，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主要之点在于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便

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最有利的前提。后来的实践证明，列宁所指出的策略是正确的，它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成为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列宁主义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俄国革命的进程，推迟了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的爆发，但它也充分暴露了帝国体系的内在矛盾，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胜利的历史条件。就是在大战期间，列宁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活动，研究和分析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作出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答复，使列宁主义基本形成。为什么这样说呢？

列宁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理论，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套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形成的，其中也包含了列宁的战友们所作的贡献。

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论是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含有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对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的考察和论述，这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及其他著作和论文中作出的。列宁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其次是对世界大战的分析，这是列宁在许多反驳社会沙文主义的文章中提出的。列宁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体系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导致了经济政治危机。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本国政府的危机发动革命，把国际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第三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論，这是列宁在一些文章中提出的。列宁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由于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力

量，在帝国主义链条上便会出现一些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冲破这些环节而取得胜利。实践证明，俄国就是这种薄弱环节之一。第四是关于俄国革命的策略问题，这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及其他文章中多次谈到的。在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要力争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便在革命胜利后顺利地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第五是新的建党学说，这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以及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还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在《国家与革命》及其他文章中，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所论述。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有些理论还未能由列宁生前形成，这一工作是由列宁的继承者们完成的。

列宁主义是列宁及其战友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大量实际材料出发，总结了国际国内实际斗争的经验，才创立起来的，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十月革命之后欧洲也爆发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走上法西斯化道路，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列宁的许多论断当然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以今天的情况来否定列宁论断的普遍性，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总起来说，列宁主义不愧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它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从上述可以看出，说列宁主义产生于1903年是太早了，那时还看不见一个成型的列宁主义，而只有列宁主义的一些因素，而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尽管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列宁也开辟了一个新阶段，即列宁的哲学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运用对俄国革命胜利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列宁也是杰出的哲学家，他们十分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在他们的整个著作和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整个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的哲学和他们的其他理论、革命实践活动可以说大体上是同步发展的。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哲学的传播和研究侧重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这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认识俄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对此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是历史观问题，他们侧重历史唯物主义是很自然的。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同民粹派的唯心史观作斗争，用历史辩证法反驳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并分析俄国的经济政治形势，制定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

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侧重在认识论方面，这时普列汉诺夫在政治路线上同列宁已经发生分歧，但在哲学路线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在认识论方面撰写了一些论著，同马赫主义及其俄国变种——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进行论战。普列汉诺夫写了给波格丹诺夫的三封长信——《战斗

唯物主义》，列宁除了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外，还在批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许多文章中涉及认识论问题。列宁的论著不仅在理论上系统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论观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的雏型，而且表明了认识论上的分歧是实际斗争中两条认识路线——主观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反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研究哲学的重点转移到辩证法，这也是由于革命发展进程的需要。大战开始时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认识战争的性质和确定对战争的态度。当时许多矛盾纵横交错，既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也有民族间的矛盾，还有各国内部的多种矛盾，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要认清这种复杂局面，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唯物辩证法。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也多次谈到辩证法的重要意义，但他们未能正确应用辩证法，反而把辩证法变成了为社会沙文主义辩解的诡辩论。列宁研究辩证法，既是为了反驳社会沙文主义的诡辩论，也是为了分析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此外，列宁也把辩证法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建设，阅读了大量哲学著作，写了八个笔记本的笔记，这就是有名的《哲学笔记》的主要内容。辩证法对列宁的革命活动确曾起过明显作用，这从列宁的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分析当时的经济政治问题的大量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列宁主义主要形成于大战期间，在大战期间列宁又研究了大量哲学著作，这两个事实决不是偶然地同时发生的。

很难设想，俄国革命的胜利可以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很难设想，俄国革命的胜利不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列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9世纪创立的。作为系统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就是唯物史观，他们有时称之为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或简称唯物主义，其中包含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世界观和认识论作为相对独立的哲学体

系还没有从中区别开来。19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主要由于恩格斯的努力，辩证唯物主义才作为一个理论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中的进步，而决不是退步。但在辩证唯物主义中，世界观与认识论没有明确区别开来。这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局限性的表现。人类历史发展到了20世纪，比之19世纪，它是一个新的时代，无论科学技术、经济制度或政治形势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新时代的特点，反映新时代的精神，拥有一系列与人类实践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原理或改造过的原理，并形成具有有机结构的完整而严密的科学体系。列宁明确提出了这个任务，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列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从事革命实践活动，他的论著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革命问题而写作的，是他的革命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他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他没有很多时间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在他一生中，除青年时代流放于西伯利亚的几年曾集中研究哲学而外，只有两次集中研读哲学著作，一次是1908年2月至9月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约九个月，一次是1914年至1916年写作八个本子的笔记时，约一年半。此外他只是在革命实践活动中随时思考、研究和论述一些哲学问题。以时间之短和成果之丰来说，列宁堪称天才。我们不能脱离实际地要求列宁完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阶段的任务，这个任务必须几代哲学家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确实是列宁开辟的。为什么呢？

首先，列宁对新时代的革命实践从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概括，当然很难说提出了多少崭新的原理，但许多旧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精确化、深刻化、具体化，如哲学基本问题理论、反映论、矛盾观点等。前面谈到的列

宁主义的那些内容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其次，以物理学革命为起点的20世纪自然科学革命，刚一露头就被列宁觉察到了，他力图从哲学的高度予以概括。他深刻地论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驳斥了唯心主义对自然科学成就的歪曲和利用，还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从物质结构、物质与运动的关系、物质与时空的关系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当然，也应指出，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自然科学革命才开始不久，他的了解限于物质结构和物质新形态方面（即使在这方面也只是一个开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提出，他还不知道，量子力学也还没有产生。因此，新时代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科学革命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当然谈不上对它的充分反映，谈不上根据这场科学革命来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列宁对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也做了大量工作。前已提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完整体系，但他提出的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实践观点、真理观的两个方面、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等思想，在我们面前确实展现了一个认识论体系的雏型。列宁的《哲学笔记》不是一本普通的著作，而是列宁在研读历史上或当时的哲学著作时所做的零碎的笔记、批语、提纲和文章片断，他在研究、分析这些著作时不仅提出了一些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原理，而且十分重视黑格尔关于哲学体系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吸收，并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的纲要，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雏型。显然，列宁并未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但提出了这个任务，明确了建立哲学体系的一些原则，提出了关于体系的一些提纲或雏型。列宁逝世前在《论战斗

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还谈到研究黑格尔体系和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任 务。

从整个情况来看，列宁虽然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阶段，确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简 短 的 结 论

19世纪末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过渡，20世纪初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阶段转化为革命和战争的阶段，革命的中心已转移到俄国。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出现了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的出现，它就是俄国。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道路。这就是20世纪初开始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列宁主义是这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新阶段，它萌芽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的出现，基本形成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它是关于时代性质、帝国主义的战争和革命、俄国阶级关系、俄国革命的性质和战略、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任务的系统理论，它具有俄国的特点，也具有世界意义，成为20世纪俄国以及其他国家革命的指导思想。

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它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及历史上优秀哲学思想，从哲学高度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初步总结了刚开始不久的自然科学革命的新成就，回答了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第二章 普列汉诺夫对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者，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参加过第二国际的创立工作，在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一位著名理论家和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在哲学方面学识渊博，造诣精深，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的生平和理论活动

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生于俄国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一个小地主贵族的家庭。他在一生的政治经历中虽然充满了曲折和矛盾，但在理论上却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些理论遗产在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广泛流传，影响久远。

一、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早年先后在沃罗涅什军事学校及彼得堡康士坦丁诺夫炮兵学校读书，1874年考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在矿业学院学习期间，他开始同革命民粹派建立联系，并成了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成员。1876年12月26日，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面广场举行的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工人参加的政治示威游行，并在集会上发表了谴责沙皇反动专制制度的热情洋溢的演说，因而成了警方追捕的重要目标。为了避免落

入警察之手，他被迫离校辍学，转入地下，从此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的职业革命家。

作为“土地与自由”社的骨干分子，普列汉诺夫于1877年和1878年先后两次参加“到民间去”的活动，积极宣传民粹主义理论，动员农民起来斗争，举行反抗沙皇统治的暴动。而留在城市里的时候，他就到彼得堡的工人当中开展鼓动工作，激起他们对政府的仇恨和培养他们的“造反”精神。同民粹派其他成员相比，他较早地认识到，城市工人是“最为活跃的、最易受感动的、最能接受革命影响的居民阶层”，“是农民在实行社会变革时的宝贵同盟军”^①。他认为，革命者要重视发挥工人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不应当在罢工事件中采取冷眼旁观的立场。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远见卓识，是促使他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因素。

在民粹派中间，普列汉诺夫不仅是一个卓越的组织和领导者，而且还是一个知识丰富、具有创见、长于写作的政论家。他担任过秘密刊物《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编辑，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在自己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争论的是什么？》中，他在维护民粹派关于农民村社的传统观念的同时，论证了工人必然参加革命运动的新见解，在当时的先进思想界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878年底，他又撰写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一文。刊登在1879年1—2月号的《土地与自由》杂志上。这篇文章以充分的论据介绍了欧洲许多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文献，再次在俄国得到了巨大的社会共鸣。该文表明，普列汉诺夫此时虽然尚未摆脱民粹主义思想的窠臼，但已经开始试图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思考俄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1879年7月，“土地与自由”社在沃罗涅什举行代表大会。会议围绕开展恐怖活动问题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多数人把政

^① 转引自约夫楚克等著《普列汉诺夫传》中文版，第34页。

治谋杀看作是使政府解体、并迫使它制定宪法的最佳手段，普列汉诺夫则断言实行这一政策只能使革命脱离人民。大会以后的8—9月间，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分裂成两派：拥护恐怖活动的多数人组成了“民意党”，普列汉诺夫及其相信宣传鼓动策略的同道者建立了“黑土重分社”，两个组织中虽然都有一些杰出的革命者，但分裂以后不久，它们都相继破产了。这时，“普列汉诺夫迫切感觉到要在理论上搞清思想混乱以及俄国革命运动的任务和倾向的矛盾”^①。

为了躲避沙皇军警的迫害，同时也为了给俄国的解放寻找出路，普列汉诺夫于1880年1月逃亡国外。从这时起到1917年为止，他一直住在西欧，主要住在瑞士。在侨民生活的最初几年，他同盖得、考茨基、李卜克内西、伯恩施坦以及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建立了个人接触，通过他们认识了西欧的工人运动。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文献，积极同恩格斯进行通信联系，决心在理论上探索出一条“引路之线”。参照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他重新估计了自己的斗争经历，认真思考了俄国的现实，逐步完成了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882年翻译《共产党宣言》、接受《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是他世界观转变的明显标志，而1883年10月他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发表，则表明他的世界观转变已经完成。

二、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时期

从1883年到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二十年是普列汉诺夫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光辉的时期，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里，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使它同俄国及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方面建树了伟大的功绩。

^① 巴·阿克雪里罗得语，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中文版，第52页。

第一，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同他先前的“黑土重分社”的同志——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维拉·查苏利奇、列甫·捷依奇、华西里·伊格纳托夫一起创立了“劳动解放社”，宣布同民粹主义彻底决裂，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战斗的旗帜。恩格斯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把它看成是“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并为“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而感到无比自豪^①。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继而筹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倡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于1895年初成立，当联合会的多数成员转到经济主义的立场以后，普列汉诺夫断然宣布退出，并同列宁一起在1901年10月另行建立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盟”。从1900年12月开始，普列汉诺夫积极参加了《火星报》的编辑工作。他与列宁合作，虽然发生过一些摩擦，但终究共同制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普列汉诺夫以社会民主党老战士的资格宣布大会开幕，并以主席团主席的身分多次主持会议。由于这些卓有成效的活动，他赢得了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的崇高荣誉。

第二，“劳动解放社”刚一成立，他就和其中的同仁一道，有计划地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集中批判民粹主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1883—1898年，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思想深刻、颇负盛誉的论战性著作，“用明白的、简练的、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笔法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②，为粉碎俄国先进知识界中占统治地位的民粹主义思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著作虽然激起了那些目光短浅而又狂热自负的民粹派分子的愤怒，但却促使许许多多的革命者进行思考和反省，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② 加里宁语，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7页。

助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思想方向，吸引他们加入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阵营。在普列汉诺夫反对民粹主义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唯物主义史论丛》（1893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年）等尤为重要，列宁对它们评价甚高。他把《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誉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①，把《我们的意见分歧》称作俄国“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②，赞赏《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③，“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④。列宁认为，如果普列汉诺夫没有阐明哲学唯物主义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对反对民粹派的意义，俄国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形成的。

第三，在关心俄国解放斗争的同时，普列汉诺夫还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从1889年7月出席第二国际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起，普列汉诺夫几乎参加了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社会党国际局。当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开始泛滥的时候，他率先写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同伯恩斯坦展开尖锐的论战。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之中，普列汉诺夫比其他人更早而且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他严肃地问道：“如果说伯恩斯坦的批判是对的，那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导师的哲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还剩下什么呢？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那就的确的确应当回答说：所剩无几！或者更正确地回答说：毫无所剩！……我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7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5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7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08页。

采取的就是捍卫住我们那些康·施米特之流的‘哲学家’认为过时的和经不起批判的弗·恩格斯的思想。”^①他为此而写的《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1898年)、《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年)、《再论唯物主义》(1899年)等著作,代表着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宝贵成果。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机会主义理论。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替经济唯物主义说几句话》(1896年)、《论“经济因素”》(1897年)、《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3年)等。普列汉诺夫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列宁备加称赞,他在当时致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表示,自己“坚决地站在一元论者(即普列汉诺夫——引者注)这边”^②。事隔九年之后,列宁再次申明:“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③。

三、从马克思主义到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普列汉诺夫一生光辉发展的顶点。从此,他虽然经历过多次反复、动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苦闷、彷徨,但终究一步一步地转向了机会主义,开始了他政治经历中的孟什维主义乃至社会沙文主义的阶段,明显地暴露出他思想中的致命弱点和他理论观点与政治实践的不一致。

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的神经受不住孟什维克的吵闹”^④,宣称应当向他们让步。他一方面声称为了“党内和平”决不向自己人开枪,另一方面却站在孟什维克一边起劲地反对坚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传》,中文版,第1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版第44卷,第31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④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中文版,第68页。

持代表大会决议的列宁。1903年11月7日，他在《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不该这么办》一文，指责列宁固执己见和粗暴生硬，呼吁对孟什维克采取谦让态度。他这样做，其实是在拿原则作交易，在组织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到了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高潮期间，普列汉诺夫由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策略上的机会主义。他的策略思想的特点是，低估工农联盟的重大意义，夸大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主张同资产阶级“分开走，一起打”，这实际上是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责任，把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而当工农群众冲破资产阶级的限制举行武装起义并不幸遭到镇压的时候，他竟然板起面孔教训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但是，面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破坏活动，他又同列宁团结，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生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一步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以固有的狂热态度鼓吹“护国主义”思想，号召工人阶级支持沙皇政府的战争政策。俄国二月革命以后，普列汉诺夫于1917年4月13日回到彼得堡。他对欢迎的人群继续阐述自己的沙文主义信条，呼吁工农群众支持临时政府将战争进行到底。普列汉诺夫在机会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致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认为革命为时尚早。直到逝世为止，他依然根本不理解和不欢迎无产阶级所取得的这个具有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向机会主义的演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曾长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列宁在《论冒险主义》一文中具体地描述了这一情形。他写道：“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起来：（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主张

‘相仇的兄弟’‘统一起来’；(5) 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 从1906年年中开始，时而脱离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的自白）为‘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 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 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①从1903年年底到1914年期间，虽然总的来说普列汉诺夫属于孟什维克阵营，但这一时期他又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有好多次离开了孟什维主义。把握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特点，对于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机会主义的路线和策略，给俄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促使他最终走向政治悲剧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缺少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才华，而是由于长期的侨民生活使他逐渐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俄国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他的巨大的智慧缺乏来自斗争实践的生动印象，因而“没有一个凭着经验构成的尺度”^②帮助他深刻地理解新时代的特点和工人运动的新鲜事物，并批判地对待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提供的经验教训。他在后来明显地落到了历史潮流的后面，当然无法继续担任无产阶级政治顾问的角色。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向机会主义的演变，对他的理论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应当看到，此后他在哲学上仍然做出了一些贡献。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着政治动摇、组织瓦解、思想混乱的严重局面。尤其是马赫主义流行病的迅速蔓延，直接危及到党的理论基础。普列汉诺夫这时更加埋头于写作，一方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挺身而出，反对“最新的”资产阶级哲学和渗入工人运动中的哲学修正主义。其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年）。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295、296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中文版，第46页。

和以《战斗的唯物主义》为题的一组论文（1908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原理作了出色的和通俗的解说，而且揭示了它的理论根源，强调它是唯物主义哲学在当代的最高发展阶段，是完整的世界观。因此，任何“重新论证”马克思主义，即把它同资产阶级哲学，如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唯能论等等结合起来的企图都是不能容许的。在《战斗的唯物主义》一组论文中，普列汉诺夫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马赫主义，指出它是以“科学哲学”伪装起来的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不管波格丹诺夫怎样用时髦的名称打扮它，也掩盖不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唤起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输宗教或用新的方法在人民中间巩固宗教”^①，以便重新给革命群众套上精神枷锁。为了揭露宗教这种“精神鸦片”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普列汉诺夫写了《评安·潘库克的一本书》（1907年）、《评弗·吕根纳的一本书》（1908年）、《论俄国的所谓宗教探寻》（1909年）、《评爱·布特鲁的一本书》（1911年）等，批判了“寻神说”和“造神说”，追溯了宗教发展的历史，论述了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普列汉诺夫在对宗教观念的历史、宗教的组成因素及其产生和得以存在的原因作了详细考察并对20世纪初俄国的宗教探寻作了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宗教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论，宣扬宗教、复活宗教，就是维护和加强对神灵的信仰，使人们把对自由、幸福和理想的追求寄托在万能的上帝身上。卢那察尔斯基扬言要创造所谓社会主义的新宗教，即创造所谓“无神的”宗教，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无神的宗教是没有的，哪里有宗教，那里就一定有神”^②。把社会主义宗教化，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8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0页。

过是借口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倒向神秘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宗教观点上去。

1909年春天，莫斯科世界出版社请求普列汉诺夫写一部《俄国社会思想史》。普列汉诺夫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即拟定了具体的写作计划。为了完成这部鸿篇巨著，他广泛收集资料，倾注了大量心血。从1909年开始，持续达8年之久，到1916年为止，他写完了厚厚的三卷，总计130多万字。他原计划还要写第四卷，不幸未竟而终。普列汉诺夫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描绘了从基辅罗斯时期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宏伟画卷。他在这个领域的精神劳动，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开创的性质，而且对当时思想界的斗争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针对在革命低潮时期地主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自由资产阶级日益反动，针对一切反动势力肆无忌惮地咒骂俄国的革命思想、诋毁唯物主义理论、诬蔑无神论学说，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作品中鲜明地揭示了俄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派别和反动派别之间斗争的历史道路，指出了进步派别同俄国和欧洲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勇敢地捍卫了他们在斗争中取得的优秀理论遗产。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是普列汉诺夫终生喜爱的事业，他在这个领域里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才能和创造精神，写下了多种文学艺术的名篇佳作。除了1899—1900年写的《没有地址的信》之外，在1903年之后，他还写了《从社会学观点看十八世纪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5年）、《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1905年）、《亨利·易卜生》（1906年）、《论工人运动的心理》（1907年）、《艺术和社会生活》（1912—1913年）等。普列汉诺夫在后期写的大量文艺论著，补充并进一步发挥了以前所阐述的观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揭露和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及其错误创作倾向，评述了世界和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思想及作

品……所有这些，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奠基人之一。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现实在思想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其中不可能不渗入思想家在现实斗争中所产生的心理、情绪、愿望以及政治倾向等等。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中也或深或浅地打上了孟什维主义观点的烙印，掺进了不少错误的杂质，对此必须作具体的分析。但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第二节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是较早地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质和特点的哲学家。他认为，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根据恩格斯晚年哲学著作的基本思想，普列汉诺夫以其渊博的文化知识和杰出的理论才能对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和通俗的阐述，为确立这一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牢固地位，并使之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对这个学说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某些独到的见解。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倾向是怎样的？对于这类问题，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家大都表现了惊人的无知，在头脑中存在着极大的思想混乱。

在第二国际时期，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都公开声称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哲学上的论证”，并要求“重新”论证马克思主义。那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完全不了解哲学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历史

理论和经济理论。即使像考茨基这样鼎鼎大名的理论权威，同样认为“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它不依赖于任何哲学，“可以与任何一种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世界观合得拢”^②。在实际生活中，考茨基把社会民主党人信奉什么哲学观点看成是“私人的事情”。他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替所有愿意为反对奴役和剥削而斗争的人们敞开大门，而不管他对这种意愿作出什么样的理论论证——科学唯物主义的或者小市民的、基督教的或者任何其他的，等等。

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据此论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统一性，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提出的紧迫问题。普列汉诺夫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可贵的努力，他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唯物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③。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坚决拥护者，普列汉诺夫根据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把古往今来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划分为两大哲学派别。“所有那些在他们看来物质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营垒；而所有那些认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则是唯心主义者”^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时，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它不仅根据自然科学的材料证明精神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证明意识是人脑这块特殊物质的属性，而且，它还用自己在历史观上的伟大发现说明了自我意识是如何在人们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发展起来

① 转引自普·弗兰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86年中文版，第1卷，第352页。

② 《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一分册，第20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69—570页。

的。

针对当时的理论文献中还缺乏关于唯物主义历史的正确知识，甚至还流行着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误认为是黑格尔左派的残余的糊涂观念，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哲学派别上的系谱上溯到了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斯宾诺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特别是对斯宾诺莎以来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资料，他更是旁征博引、广为收集，并对它们做了深入的分析，勾画出了一幅清晰的历史画卷。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的论述，从细节上看难免有不甚精当之处。但是，他的主要意图，是强调德谟克里特——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哲学学说之间联系的唯物主义基础。他认为，这种联系突出表现在这些思想家对哲学基本问题都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都证明物质的东西先于观念的东西。

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渊源时，普列汉诺夫深入地考察了它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他指出，费尔巴哈关于思维对存在的真实关系的观点，完全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了观察社会生活现象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他们在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用这些观点解释人的周围的现实、尤其是解释人们自己的活动的时候，不但没有背离这些观点的精神，而且正是“在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逻辑所指示的同一方向上”继续前进的^①。对于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等社会思想体系，费尔巴哈把它们看成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而“人的本质”在他看来则是人与人的共同性、统一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满意这种抽象的人性，他们进一步从人为了争取自身生存而积极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生产过程中找到了决定人性特点的根源，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在一定生产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解决上述问题的思想进程令人信服地表明了“马克思的世界观和费尔巴哈哲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6页。

学的密切的发生学上的联系”^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之后，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解释的协调一致。从此，“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②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在解释历史运动时没有像旧唯物主义者那样重新返回到唯心论的窠臼，以致用人们的智慧、意见、道德观念等精神性的因素来说明历史的发展，相反地，它一再强调，“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思想发展的进程归根到底为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所决定”^③。由于这个缘故，不论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间，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有不少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而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在他比较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则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提法。

他认为，第一，用“经济唯物主义”来概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能准确说明它的基本的哲学倾向和它同历史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因为严格说来，仅仅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还不是唯物史观，只有不仅承认这一事实，而且同时把经济关系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函数”，才是真正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是这一点，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区别于基佐·米涅、奥·梯叶里的根本标志。其次，用“经济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就忽略了唯物辩证法在这个世界观中所具有的价值。旧唯物主义者由于不懂得辩证法，所以他们不能解决唯物主义在历史方面的主要任务，即说明本身为环境所造成的人是怎样改变环境的，并且不得不长期地在“人是环境的产物”以及“意见支配世界”这种二律背反的圈子里往返徘徊。马克思和恩格斯远远超越于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使之获得了合理的形式。当他们将这一科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5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6—47页。

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现象上时，“就造成了一个全盘的革命”，不仅“得到了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有规律的过程的看法”^①，而且提供了从必然性的观点来看社会的人之自觉活动的可能性，“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停止说环境是由人改变的，同时它首先使我们能从科学的观点去观察这种改变的过程。”^②普列汉诺夫于是得出结论说，正是对于事物的辩证的观点，才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铺平了道路。

那么，究竟用什么样的科学概念才能准确地表达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本质和特点呢？普列汉诺夫毫不含糊地断言，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唯物主义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他解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但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作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③。普列汉诺夫有时在另外的场合也用其他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这里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相一致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后来为列宁所接受。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点作了更为充分的论述。

在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确定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之后，普列汉诺夫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统一性。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读了《反杜林论》就很容易理会这一点。这个世界观的每一方面，都同其余一切方面极密切地联系着，并且每一方面都在阐明其余的一切方面，从而有助于对其余一切方面的理解。不能从中割裂出某一方面而只承认这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43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8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11页。

一方面，取消或者忽视其余的方面。这样做，就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逐出它的灵魂，而把这一生气勃勃的理论变成了思想僵尸，甚至进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只集中在这具僵尸的某一个器官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正在于此，许多一心想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以如此错误地理解它，其原因也在于此。”^①

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人们相反，普列汉诺夫不断地强调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他遵循恩格斯的意见，把哲学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上概括人类全部经验的综合观念体系，或者说是一定时代的已知的存在的综合，因而是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它所概括的一般理论原则必然要体现到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中去。所以，当安·潘涅库克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两种科学体系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反驳说：

“然而事实决非如此。存在的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解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②他以《资本论》为例说明，这部杰出著作无非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而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其本身的辩证本性必定具有暂时的即历史的性质。

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所以普列汉诺夫激烈地反对离开这一基础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马赫、阿芬那留斯、奥斯特瓦尔德等人及其追随者的理论“结合”起来的一切倾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结合，只能是把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世界观折衷主义地硬拼在一起，它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不了什么积极的结果，而且会诱使工人运动离开正确的道路。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最革命阶级的自觉的代表，他们应该在思想上坚定彻底，在行动上始终如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16页注①。

② 同上书，第106页。

一；用折衷主义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活动，就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危险。鉴于“洋洋得意的反动派也披着哲学的外衣”，他要求社会主义者必须认真地研究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传播到广大革命群众中去。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呼吁，在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界中可以说是空谷足音；在当时修正主义者借口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而公然鄙视唯物主义哲学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呼吁就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二、论辩证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19世纪80年代以后，新康德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界中到处蔓延开来。康德哲学所固有的二元论性质，很适合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胃口。借助于二元论，他们一方面可以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尊重科学，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宗教信仰保留地盘，用宗教幻想麻醉劳动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反抗情绪。与此同时，新康德主义也受到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欢迎。依据不可知论思想，他们公开怀疑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前提，不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能够由科学加以确认的最终目标。为了批判这股哲学修正主义思潮，普列汉诺夫详细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世界的本体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回答这个问题是坚持一元论还是主张二元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根本分歧之一。普列汉诺夫指出，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性质，突出表现在他关于现象世界的学说中。这个学说中存在着两个并列的因素：“（1）主观的唯心主义的因素——我们直观的形式或思维、一般认识的形式；（2）实在论的因素——本体给予我们的并受我们的意识加工的那种尚未确定的材料。”^①康德哲学强调，意识在加工感官所提供的感性素材时，所依靠的是我们悟性的先天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32页。

性。悟性把先天的因果性、必然性等范畴给予自然界，它们是自然界任何秩序的来源。

新康德主义者经常津津乐道的，正是康德“对于现象中的我们的心灵——精神组织的全部行为之天才的探讨”，“对于我们的表象能力的构造之揭露”，他们赞扬康德在这方面表现了“值得惊异的洞察力”^①。同时，他们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康德对“意识的分析”的最大缺陷：“康德是拿现成的意识做出发点；他不从这一意识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它。”^②但是，普列汉诺夫公正地指出，把人类悟性的先天特性看作是从来就有的，并从这种先天特性中引伸出现象世界的规律，这种观点就同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进化理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现代生物学的常识告诉人们，生物有机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必须服从一个伟大的自然规律，即适应自己生存条件的规律。如果说，这个适应规律也是悟性给予的，那就等于说，有机体必待悟性的恩赐之后才做到了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并开始了自身生活的历史。果真如此，那些在人的悟性出现以前的生物又该如何生活呢？

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反，“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排除了精神和物质、神和自然界的二元论；它认为自然就是原始狩猎部族所说的客观灵魂、精灵的活动等现象的基础”^③。对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援引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学说，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根据这个学说，人本身无非是具有思维能力的物质的存在物。具有思维能力的“自我”不是当作与客体绝对对立的主体来感觉、来思想，而是当作主体—客体，当作现实的物质的实体来感觉、来思想的。因此，客体对“自我”来说不仅是那些可以感觉的外界对象，而且也是“自我”本身的感觉的基础。脱离开肉体存在的、无人身的思辨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的思维不管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66页、第467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5页。

看起来多么奇妙，它归根到底只能是物质实体的属性。普列汉诺夫于是得出结论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靠‘自我’与‘非我’即外部世界的对立来解决的。这样的对立只能把我们引到荒唐的死胡同里去。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走出‘自我’的圈子，并且看看‘他’（具有意识的有机体）同周围的外部世界有什么关系。但是，只要这个问题具有这个唯一合理的形式，我们就马上会清楚地看到：一般‘主体’，包括我的‘自我’，不仅不把规律加给客观世界，而且自己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即从思想方面来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像斯宾诺莎所说的从广延方面来看的组成部分。”^①

如何看待自在之物，承认不承认自在之物的真实存在，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一个分歧。康德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难堪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承认现象是由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所引起的，亦即承认了自在之物是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说因果性范畴只在现象世界范围内有意义，对于自在之物完全不适用。这样一来，同一个康德对同一个对象的同一个方面，说出了两个彼此排除的论断，其中每个论断都在毫不客气地否定对方。

康德的追随者力图解决康德体系中的这个逻辑矛盾，但是，只要他们继续坚持因果性范畴不适用于自在之物的论断，从而抛弃关于“现象”由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所引起的思想，那么，他们必然进一步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并把自在之物宣布为哲学上无用的废物。普列汉诺夫指出，新康德主义者正是这样从右的方面“发展”了康德的批判哲学。比如，拉斯维茨博士在这点上就表现得非常露骨。这位博士毫不隐讳地说：“经验是由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发生，而自在之物始终不过是我们的理智关于自己界限的一种模糊的观念；自在之物对于我们的经验的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48页。

质的影响之小，正如在镜中所反映的我对于我的身体的运动的影响之小一样。”^①很明显，如果自在之物仅仅表示认识的界限，那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它在我们之外的真实存在。

在解决康德的上述矛盾时，唯物主义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唯物主义者坚决反对把自在之物说成是理智的产物，他们断然肯定：“一切自在之物都是物质的”^②。那么，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呢？普列汉诺夫提出了明确的定义。他写道：“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③这个定义的优点是，它既没有把物质归结为某种具体实物，又没有把物质的本质归结为某种物理或化学性质，并且也没有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人的智慧已经认识的所有实物的总和，而是特别突出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本体的意义，突出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应该承认，只有用这样的物质定义来说明自在之物，才能够真正地与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划清界限。显然，列宁关于物质的科学定义，曾吸收了普列汉诺夫的上述思想。

既然自在之物是不依赖于意识并在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那么，人能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呢？辩证唯物主义同康德的不可知论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有原则的分歧。“依照康德，自在之物并不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而它们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也不像我们所觉得的那样；如果撇开我们的感觉的主观组织，那末，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一切属性、一切关系，以及空间和时间本身都会消失，因为这一切的存在都只是现象，即是说，只在我们之内存在。我们若单就物体自身看，而撇开我们的知觉本身的这种能力，我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6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49页。

③ 同上书，第260页。

就完全不能知道它的本性……因此，物体是属于不可认识的范畴。”普列汉诺夫声明说，“在这点上，唯物主义者决不同意康德的意见的。”^①

普列汉诺夫在同新康德主义者争辩时，并没有忽略不同的“主体”由于自身的某些特性而在感知外界事物时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别。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承认还是否认这个简单的事实，而在于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仅仅有主观的意义，并不具有客观的内容。普列汉诺夫指出，既然具有意识的“主体”本身是物质的存在物，是伟大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容易理解，从主体方面来看所呈现出来的某些特性，本身就是由客体在其所属的自然环境中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们之有能力反映自在客观的某些真实情况，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此，说物体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一切属性、一切关系，以及空间和时间本身都完全依赖于感觉的主观组织而没有任何客观实在性，那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空间和时间不但为思维而存在。它们也是存在的形式。它们都是我的直观形式。它们所以是这样，只是因为我自己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个实体，我只能作为这样的实体来触摸，来感觉。”做了上述这些解释之后，普列汉诺夫接着写道：“一般说来，存在的规律同时也是思维的规律。”^②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当有机体以不同的感官来感知外部世界时，它们同时又以实在客观的资格参加物质世界的运动。并且，这后一过程势必会严格地制约着有机体感知外部世界时所得的结果。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对于不可知论来说，最有力的驳斥莫过于人的实践活动，即实验和工业。但新康德主义者康拉德·施米特却认为，恩格斯提出这个论据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他只是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8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44—145页。

简单地把论敌的意见“当作空洞的臆想”丢开，回避了对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针对这种情况，普列汉诺夫着重分析了恩格斯的论据的理论价值。第一，康德不承认原因范畴适用于自在之物。但是，人的实践恰恰是人们有意识地引起某些现象而对外部世界采取的一种能动态度。人在进行实验和生产某种产品时，正是用某种自己预定的方法使自在之物影响我们的“自我”。因此，当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时候，自在之物之对我们发生作用，即同我们的“自我”发生因果关系，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上的假设，而是由我们亲身做成的事实了。其次，既然我们在实践活动中至少能够预见自在之物将在我们身上产生的作用，这就表明，我们起码知道使物对我们发生具体作用的那些特点，而在做到这点之后，“我们就没有权利说这些物是不可认识的”，康德为维护不可知论而提出的种种遁词，就“为他自己学说的逻辑所粉碎了”^①。

不可知论者向辩证唯物主义提出的难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区别及相似问题。普列汉诺夫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肯定，人们关于外界客体的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运动不是同一个东西。自然科学表明，人们听到的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引起的；人们看到的颜色，是由光线的反射造成的。人们能够听到声音，但听不出发出声响的物体每秒钟振动几下；人们能够看见五颜六色，但看不出形成颜色的光线本身的曲折复杂的变化。如果把人的感觉与引起感觉的客体的运动简单地等同起来，势必背离了自然科学的真理。在哲学上，或者误入直接从物质的运动引出感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歧途，或者堕入用感觉来代替客观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但是，如果人的感觉与引起感觉的客体的运动迥然有别，那么，感觉怎么能够提供关于客观对象的真实可靠的知识呢？普列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456页。

诺夫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印象由它引起。感觉作为意识活动虽然是主观的,是人类机体的产物,但它的内容、它的根源来自客观的现实之中;不同感觉的差别反映着现实的差别,感觉的内部变化符合着十分确定的客观现实中所发生的变化;不管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同它们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在表现形式上有怎样的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感觉来认识自在之物。

后来,普列汉诺夫用原文和译文的比喻,通俗而又机智地说明了感觉与引起感觉的客体的运动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他解释说,译文与原文相比,当然有明显的不同。因为译文在表达原文时,必须遵守自己语言体系的特殊的语法规则,否则,译文便成了既不能读又弄不懂的胡言乱语。但是,只要翻译得正确,它就能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含义。人的感觉在传达外界客体的刺激时,也有类似的情形:感觉作为“观念的东西”,当然不同于它所翻译的那——“物质的东西”。但只要翻译得正确,它就符合于“物质的东西”的真实属性。人为了适应自己周围的客观环境,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会正确的翻译。如果翻译得不好,“如果存在于我的头脑中的‘观念的东西’不符合于‘物质的东西’（即是存在于我的头脑以外而且不依赖它的物）的真实属性,那末,我在和这些物第一次碰头的时候,就会从它们得到程度不等的教训,由于这一教训,我就可以或迟或早地除掉这一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不符,当然这是假如我还没有因这一不符而死掉的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明确肯定了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有同一性。接着,他又强调说:

“我们关于物的形式和关系的表象不过是像象形文字;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准确标记着这些形式和关系的,而这就足够使我们能研究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我们对它们能起作用。我重复地说,如果在客观的关系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翻译’）之间没有正确的符合,那末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不

可能的。”^①

如上所述，正是在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大肆鼓吹用新康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论证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在哲学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这方面的巨大功绩，是不能抹杀的。

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阐述也有某些不足和错误之处。1892年，他在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的看法时，曾把它喻之为“特种象形文字”。以后在1898年、1899年又不止一次地重复了类似的表述。由于“象形文字论”与恩格斯关于感觉或表象是物的复写、模写、摄影等说法有出入，不仅在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成了后世的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维护普列汉诺夫的人说他的表述同恩格斯的说法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二者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有的还肯定普列汉诺夫的表述具有一定的优点，它能够使“反映论尽力摆脱素朴的实在论”^②；相反地，批评他的人则指责“象形文字论”对不可知论作了不能容许的让步，甚至认为它本身就是“不可知论的变种”。

那么，“象形文字”的表述究竟有什么不对呢？首先，从唯物主义反映论关于认识过程的观点来看，感觉是客体作用于主体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是主体接受客体刺激时形成的最原始的烙印或痕迹，它们最切近地表现着客体作用的特点，体现着客体与主体的直接的联系和当下的统一。显然，用模写、复写、摄影等术语来说明感觉的直接性的特征，比用带有某种比喻意义的“象形文字”更为恰当、贴切。其次，从“象形文字”本身的特点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00、503页。

② 普·弗兰茨茨基：《马克思主义史》，1986年中文版，第1册，第454页。

看,“象形文字”虽然也能代表一定的客观事物,并不只表示某种虚拟的客体。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文字,即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在一定范围内通用流行,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承认,遵从着约定俗成的原则。而且,它的结构和形式也随着人们交往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与模写、摄影等的不同:模写、摄影等必定直接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而“象形文字”则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它的客观原型。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已经感觉到使用“象形文字”这一术语的种种不妥,公开承认他的表述不够准确,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并正式声明放弃“象形文字”这一术语。稍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也指出“象形文字”是一个带有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显然,完全否认普列汉诺夫在表述上有失误的地方,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如果给这种表述方面的失误扣上一顶“不可知论的变种”的大帽子,那就是在枝节之论上小题大作,忽视了问题的实质。就实质来说,普列汉诺夫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阐述,其主要缺陷并不在于“象形文字论”的表述上,而在于:首先他没有把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表现在:(1)普列汉诺夫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中并在其中经过改造的物质的东西”的论点来说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深入地分析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实体和属性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因而就不能透彻底地解释思维使用各种逻辑手段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并在人的头脑中完整地再现具体客体的活动机制和客观依据。(2)普列汉诺夫反驳不可知论时强调,我们通过认识事物的个别特点能够进一步了解事物的本性,这当然也是对的。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人的意识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的过程。(3)普列汉诺夫

在批判不可知论时正确地揭发了它的许多逻辑错误，但他没有充分注意到，不可知论本身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不断生长着的思潮。这个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处泛滥，并不是旧的哲学错误的简单重复，也不单是它的二元论的性质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的需要，同时还表现了自然科学在进步中产生的一种反动意向。因而未能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以有力的批判。可是，不分析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辩证途径，就不能克服各种新生的不可知论的变种。列宁曾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①。

其次，普列汉诺夫没有同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划清界限，这主要表现在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认识论特别是实践观的评价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又说，费尔巴哈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这是对费尔巴哈认识论及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切中要害的深刻批判。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里谈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上述批评时，虽然也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又认为：“不过我们还应承认，马克思的认识论是直接从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发生出来的，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只不过因为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罢了。”^③如果说在这里已初步表现出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认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46—147页。

论同费尔巴哈认识论之间的原则界限的混淆，那么七年以后也就是在1915年完稿的《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中，他就公然反对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了。他写道：“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①

整个来说，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不可知论的斗争中虽然做出了贡献，但他对这场斗争的确缺乏深刻的认识。直到1896年。他在为《唯物主义史论丛》写序言的时候，仍然把当时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简单地称作是“认识论烦琐学派”，并表示他不屑于对这类“全然次要的问题”作详细的研讨。后来在1905年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注释的补充时，他照旧认为，康德主义的整个“认识论”经院哲学，“都是建立在不确切的术语上面”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斗争中比较注重于揭发不可知论的逻辑错误，却较少地思考新的不可知论流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他考虑得比较多的是怎样捍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的基本观点，而针对不可知论的挑战应该怎样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却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普列汉诺夫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的这些缺陷后来被列宁克服了。列宁把辩证法应用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运用于认识的具体过程和发展，运用于思维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了崭新的面貌。

三、深入阐释唯物辩证法学说

在批判新康德主义的时候，由于论战的需要，普列汉诺夫经常用所有唯物主义者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共同立场和自己的论敌相对立。但是，普列汉诺夫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学说。相反地，他态度异常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76页。

义。”^①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灵魂，是这个学说观察自然界、人类历史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那么，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呢？恩格斯曾经把它定义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普列汉诺夫认为，恩格斯的这个定义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又认为，就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分歧的实质来说，把辩证法概括为“关于发展的学说”可能更为合适。普列汉诺夫解释这点时写道：“形而上学是什么？它的对象是什么？所谓无条件的东西（绝对的东西）就是它的对象。无条件的东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不变性。无条件的东西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不以（改变着我们所能认识的有限事物的）时间和地点这些状况（条件）为转移，因此它是不变的。但是，那些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者的人所一直运用的概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这些概念的主要特征是不变性……”^②与此相反，辩证法的整个理论却集中地贯彻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任何事物及其反映于我们头脑中的相应的概念，不管表面看来多么稳固，实际上它们却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处在永不停息的流动和发展中。

辩证法的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是以万事万物的“内在的生命运动”、它们“自身的活的生活”为其依据的。普列汉诺夫简单明确地表达了支配事物的“内在的生命运动”、“自身的活的生活”的根本原则：任何现象都“从它本身中发着那些早晚要结束其自身存在的成份，把它变为它本身的对立物”^③。或者说，“一切有限物不仅受外界的限制，而且还由于它的本性而否定自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91—9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29页。

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①正因为辩证法深刻地揭示出事物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它能够有根据地断言：“一切流转着，一切变动着，没有力量能够阻滞这个经常的流转，停止这个永远的运动；没有力量能够抵抗现象的辩证法”。^②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辩证法这一关于发展的学说，同只承认发展的渐进性的庸俗的“进化论”有原则的区别。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进化理论，本来是一种反对物种不变的、在实质上是辩证的理论。但是，当这个理论广泛流传之后，人们却动不动就用“自然界不作飞跃”的旧话来解释它，从而走向一个片面的极端。于是，人们只看见某个现象的渐进的、量的变化，而这个现象转变为另一个现象的过渡则变成完全不可思议的了。上述对于进化的片面理解也传染给了许多“社会学家”。他们据此宣称“历史同样不作飞跃”，并把革命看成是历史运动中偶然出现的“病态”。普列汉诺夫把这种观点叫做“头脚倒置的形而上学”，并指出它是歪曲发展过程的一种最为常见的“畸型的概念”。

按照辩证法，渐进的变化和渐进性的中断，同样是发展的必然契机。完整的发展观念，必须包括量变和质变这两个环节。事实上，存在的变化，不只包括一个量到另一个量的转化，而且也包括质到量和量到质的转化。正是这后一类的转化，构成了渐进性的中断，并给现象以新的与以前不同的质态。因此，不论在自然界，亦不论在历史上，飞跃都是不可避免的。普列汉诺夫谈到这种情况时写道：“只有当我们把渐进的变化看成是准备和导致一个飞跃（或几个飞跃）的过程的时候，才能理解发展。”^③

辩证法充分估计到飞跃在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像它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它完全忘记了“诸现象类型的改变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2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29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30页。

的渐进性”。在一切变化的契机中。辩证法从来没有忽略过不间断的过程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作为“进步的代数学”，只是努力阐明逐渐的变化必然地过渡到飞跃的各种条件。普列汉诺夫以人类历史的前进运动为例指出，如果笼统地说历史不作飞跃是错误的，那么断言“历史不作没有准备的飞跃”则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没有一个跳跃如果在社会发展的以前过程中不包含有充足的原因就能发生。但是因为这一发展在向前进步的一些社会中是永久不会停止的，那末可以说，历史是在不断地准备跳跃和革命。”^①

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黑格尔对发展问题上的看法非常接近，因而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糊涂观念。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批判态度”的修正主义者，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主义的残余，黑格尔“矛盾逻辑”的一条尾巴。另外有些人倒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可是又有意无意地歪曲它们对立的实质。普列汉诺夫在阐述唯物辩证法学说的时候，详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区别和联系，为澄清上述糊涂观念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在世界观上的对立，并不是什么纯思维的辩证法和历史——经济的辩证法的对立，而是唯物主义体系和唯心主义体系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黑格尔辩证法所进行的根本改造正是在于，他们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即头脚倒置的辩证法完全用脚站立了起来，把辩证法牢牢地放到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它具备了科学的形态，事实上，真正彻底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有可能找到牢固的立足点。普列汉诺夫用极为风趣的语言嘲笑了黑格尔哲学本末倒置的荒唐做法：“有一个人以很可佩的聪明给我们说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28页。

明动物各种运动的机械结构。然后他又以同样可佩的严肃态度补充说,这一切运动最重要的秘密,是存在于运动着的物体所投下的影子里。”^①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坚决反对用对象的幻影来解释对象本身的发展,这样,它就向黑格尔的“机械哲学”说出了“永别”。

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区别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有一段言简意赅的、非常精彩的议论: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和形而上学符合的,而我们的辩证法是以自然学说为依据的。”

“在黑格尔的学说里,现实界的创造主(这里借用了马克思的术语)是绝对观念。我们认为,绝对观念只是运动的抽象,全部物质的结合和物质的状态都是由运动所引起的。”

“在黑格尔的学说里,思维由于概念中的矛盾的揭发和解决而不断前进,按照我们的(唯物主义的)学说,概念中的矛盾只是现象中的矛盾的反映和它们之被译成思维的语言,而现象中的矛盾乃是由于其总基础即运动的矛盾本性而产生的。”

“黑格尔认为,事物的进程是由观念的进程决定的,我们认为,观念的进程是由事物的进程决定的,思想的进程是由生活的进程决定的。”

“唯物主义使辩证法‘脚踏实地’地站起来了,从而揭去黑格尔给它穿上的神秘外衣。这样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就显露出来了。”^②

应当承认,普列汉诺夫在阐释唯物辩证法时,主要论述了自然界,特别是社会生活的辩证运动。他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可作为例子来说明辩证法的本性。”^③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辩证法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51—15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7页。

③ 同上书,第729页。

的阐释并未停留在举例上,他清楚地认识到辩证法的包罗万象的性质。他写道:“一般地说,所有的概念和现象的辩证的……运动,是由于根据内部发展规律而在这些概念或现象中产生的矛盾而实现的。某一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矛盾,某一现象的各种内在力量之间的相互对抗,构成了我们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自然界、在逻辑中或是在历史上所观察到的一切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①。他认为“既然我们的概念是自然界中所进行的过程的‘反映’。那末它们就不能没有辩证法的要素。谁承认自然界中存在着辩证的过程,谁也就不得不承认‘主观辩证法’”^②。

仔细分析一下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逻辑的大量言论可以看出,他不仅没有忽略作为逻辑的辩证法,相反地,他积极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堡垒”,而且,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卓越思想,至今仍然值得人们重视。

首先,普列汉诺夫非常强调辩证思维的客观依据,说明辩证思维的权利是由存在的辩证特性来确定的。他对此写道:“……要充分理解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本性,就必须弄清楚它的力量是在于认识到观念的进程决定于事物的进程,因此思想家的主观逻辑必须遵循他所研究的现象的客观逻辑”^③。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作为逻辑的唯物辩证法只是“进步的代数学”,并不是某种可以随便到处乱套的先验公式和包医百病的万应药方,如果用“思维的辩证法”来观察具体的发展过程,就必须顾及到制约这一过程的确切的“算数数据”。

其次,普列汉诺夫指出,辩证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寻求具体的真理;它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命题中得出抽象的结论,而坚决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放到具体的基地之上。他很欣赏车尔尼雪夫斯基如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7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64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265页。

下的一段话：“‘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考察了某一特定的事实所从而产生的一切情况之后，才能对这一事实做出肯定的判断”^①。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原理并不破坏客观真理，而只引导我们达到客观真理。

再次，普列汉诺夫分析了矛盾逻辑与形式逻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形式逻辑所坚持的原则是“是一是，否一否”，而矛盾逻辑的原则却是“是一否，否一是”。它们所以表现出这样重大的区别，是由于它们论断的对象不同。“对于某一事物是否具有某种特性每一个这样的具体问题，应当回答非是即否。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当事物正在变化时，当他已经丧失或者刚刚获得某种特性时，应当怎样回答呢？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有确定的回答，不过只有遵循着‘是一否，否一是’这一公式，才能得到确定的回答……”^②这就是说，形式逻辑论断的对象是现有，而辩证逻辑论断的对象则是生成。形式逻辑撇开对象及其特性的变化确定它们的存在，而辩证逻辑则在论断中揭示对象和现象的运动、发展及其内在矛盾。

作为论断的规则，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虽然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同样是思维把握对象的完整的进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们之间又有一致性，“像静止是运动的个别情况一样，以形式逻辑的规则（思维的‘基本规律’）为依据的思维也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③。如果把以形式逻辑规则为依据的思维称作是悟性的思维阶段，那么，以辩证逻辑为依据的思维则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思维的阶段。悟性把各种事物和各种现象作为不变的、孤立的、彼此隔绝的事物和现象记录下来，理性则揭示这些彼此区别的事物的自身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及转化。普列汉诺夫由此认为，“……辩证法没有废除形式逻辑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26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3页。

③ 同上书，第84页。

辑，而只是取消了形而上学者所附加给形式逻辑的规律的绝对意义”^①。

综上所述，普列汉诺夫在深入阐释唯物辩证法的时候，把这个理论明确地概括为关于发展的学说，并用完整的发展观念同庸俗的“进化论”区别开来。在他看来，辩证法的发展观的主要特点是，坚持从事物内部发现它的否定自身的因素，找出它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确认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都有其量的和质的方面，而任何一个发展过程的完全的实现，则必须经历从量的变化到质的飞跃；不但把辩证的过程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原则，而且也是科学认识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思想为建立作为科学哲学的完整的辩证法体系做了一定的准备。

当然，普列汉诺夫所做的准备还仅仅是非常初步的，很不充分的，距离作为科学哲学的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还有相当一段路程。他虽然在同形形色色形而上学观点作斗争的过程中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对辩证法理论本身的研究、探讨，却未能取得带有根本性的进展，同时也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普列汉诺夫虽然在实质上承认矛盾规律是事物的“内在的生命运动”的原则，并在个别场合也涉及到矛盾规律同其他辩证法规律，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指出“否定之否定”不是辩证法的基本命题，它是从“向对立面转化”的命题中引申出来的^②。但一般说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比较肤浅的，并且带有偶然的性质。他没有把矛盾规律确定为辩证法的核心，并从这个核心出发来把握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及其整体结构。

第二，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认识到了辩证法的包罗万象的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7页。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85页。

质，明确地论证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并在一般的形式上谈到了辩证的认识论，指出没有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不充实的、片面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①。然而，他的辩证法思想中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挥，他没有进一步运用这些一般原理来分析实在的活生生的认识活动，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以及认识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样，他就不能说明辩证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和结论”。也不能明确地提出和解决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一致的问题。

第三，普列汉诺夫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强有力的地方。他写道：“……辩证唯心主义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总体是‘从它自己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②写到这点时，他甚至带着十分敬佩的心情议论说，“认识这个总体，揭露它的发展过程，乃是哲学家所担当的任务。这是一个多么高贵、多么宏大、多么可羨的任务啊！”^③很明显，唯物辩证法学说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批判地改造黑格尔的逻辑学，吸取它运用概念的高超艺术，借鉴它发展自己概念的诸如从抽象到具体等卓越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普列汉诺夫虽然在具体的科学研究领域里坚持和普及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例如形式和内容、自由和必然、偶然性和必然性、普遍和特殊等等，并且在许多场合谈到了这些范畴的辩证统一，但也没有进一步作出系统的概括和理论的综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批评过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法研究的一些缺陷。他写道：“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大约写了近1000页……其中关于大逻辑，关于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8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47页。

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没有说什么!!”^①又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②列宁的这些批评,虽然也有不很准确之处,但其实质主要在于指出,普列汉诺夫没有把作为科学哲学的辩证法理论本身当作专门研究对象详细地阐述和论证,未能抓住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核心加以说明和发挥。这正是普列汉诺夫辩证法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这样看来,普列汉诺夫虽然提出和表达了建立作为完整的发展学说的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意图,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很有限的。列宁后来在这方面继续前进,取得了有重大意义的突破。他的研究成果大大超出了普列汉诺夫的水平。

第三节 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唯物史观是普列汉诺夫最为擅长的领域,也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中心。对于唯物史观理论的一切重大问题,他几乎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个领域内,他不是限于阐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而是通过创造性的研究得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作出了若干新颖的贡献。

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的深入探讨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突出贡献,是系统而又深入地探讨了这个学说的理论来源。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令人信服地证明唯物史观的全部价值和整个意义,“就必须写一部详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36、306页。

尽的唯物主义史。”^①只有通过历史哲学本身的发展，才能有充分根据地说明唯物史观同以往的历史观念的思想联系及其原则区别，说明这一学说在人类哲学思想上所完成的伟大革命变革。尽管普列汉诺夫在这方面所涉足的基本上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但他不畏艰苦，努力探索，表现了向前开拓的进取精神。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对近代历史哲学，主要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以及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作了详细的考察。他分析了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其发展的客观规律。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分析，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和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中，讨论人同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成了他们注意的重心。他们虽然都“把‘人的天性’看作是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的最高裁判者”^②，看作是决定社会环境的最后的因素，但是，在这个基本论点一致的情况下，他们的历史观点又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观点中包含了更多的合理的成份。这表现在：

第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彻底的感觉论的观点出发，认定人及其一切感觉、表象、概念和观念，都是由周围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周围社会环境对人们的感官发生作用的结果。启蒙学者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的重要命题，不仅仅是他们“许多革新要求的理论基础”，而且也表现出他们在社会历史领域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企图，预示了对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但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社会环境，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国家制度。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则开始“从新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环境了。他们的眼光超出了政治制度的范围，进一步转向了人们的“公民生活”。他们认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90—591页。

为，只有弄清人们的“公民生活”，才能判明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

第二，由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政治制度看成是决定社会环境一切属性的基础，看成是某种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的东西，所以，当他们追踪政治制度的起源时，就只能把它归因于立法者的自觉活动的结果。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越是想鲜明地表示环境全能的观点，就越是转到了“意见支配世界”的思想。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则真正深入地探讨了人们的“公民生活”的实际内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①普列汉诺夫指出：“依他们的意见，只有注意地研究这种公民生活、财产关系才能给予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②

第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方面说人及其一切意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颠倒过来说人们的意见支配着世界。他们痛苦地徘徊于这个毫无出路的二律背反之中，无法发现那既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又决定意见发展的因素。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对于烦恼着18世纪哲学家的问题已经有了不同的答案。他们认为，两者都为第三个更深刻的因素所规定，这个因素即是“人们的公民生活，他们的财产关系”^③。普列汉诺夫满怀喜悦的心情称赞这个进步说：“18世纪哲学家们所纠缠不清的矛盾已经被解决了……在新的历史观点的代表者们身上科学前进了一步”^④。

历史科学往后所面临的任务，应该是进一步说明“公民生活”亦即财产关系的起源。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迷失了方向。为了摆脱困境，他们都这样那样地求助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83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86页。

③④ 同上书，第586页。

于“人的天性”，而回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意见支配世界”的老路上去。

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评价最高的首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上述几个学派相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没有能够弄清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找到它的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对历史过程的辩证的理解，却是建立科学的历史观的先决条件，是合理地说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彼此更替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没有辩证法这把钥匙，人们关于历史的理论就永远不能踏入科学的大门。普列汉诺夫指出，当黑格尔将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时候，他的历史哲学较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哲学，表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第一，法国唯物主义者及其后继者在遇到自然界或历史上的发展这一问题时，每次都表现出恼人的笨拙无能。与此相反，黑格尔的哲学则断言，一切都流转着，一切都变化着，任何现象都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人的天性，也要毫无例外地遭受同样的命运。从这点出发，黑格尔哲学把寻找“完善的立法”看作是徒劳无益的蠢事。他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从根本上排除了任何乌托邦的空想主义。

第二，法国唯物主义者坚信理性终归要胜利，并将理性最终决定社会发展肤浅地了解为“意见支配世界”，似乎人类历史的命运，完全以适合于人的天性的某种美好的意愿为转移。这种朴素的浅陋的历史唯心主义，排除了关于必然性，即规律性的概念，因而不能够为科学地解释社会现象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黑格尔不满意这种朴素的浅陋的唯心主义。他认为，理性支配历史，这是指在规律性的意义上，“为了走出以或多或少的学术术语掩盖着的无知状态，我们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我们应该理解这些关系为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63页。

第三，法国唯物主义者只知道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在他们看来，某种哲学体系，要么是无条件的真理，要么是绝对的错误。“因此，思想史对于他们只是一部分是可悲的，一部分是可笑的错误的混乱的堆积，而这种错误的群魔乱舞一直继续到最后那真理的哲学体系被想出来为止。”^①但何时才能出现真理的曙光，则完全取决于幸运的偶然。黑格尔却完全不同地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智慧的表现，只有对于自己的时代它才是真理。因此，哲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跟着社会的辩证的发展而发展。黑格尔承认“全世界史是在自由意识上的进步”，但他同时强调“这种进步我们应该从必然性上去理解它”^②。这样，黑格尔哲学在承认规律性概念的前提下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通过哲学思辨的形式，黑格尔一方面给了人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创造行为以必然性解释的基础，为它们规定了具体条件，同时又在纯理论的限度内给它们保留了相当广阔的活动天地。

当黑格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并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的时候，他并没有走出多远。按照他的意见，观念的逻辑特性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而历史本身倒成了表现绝对观念在时间中发展的东西；某一民族的全部历史，乃是自己特殊观念的实现，而每个特殊的观念，又是绝对观念逻辑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种见解，正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之所在。

尽管如此，黑格尔毕竟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天才人物，他的思维方式有着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每次叙述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时，都显示出他的知识的全面性和深刻的洞察力。他在解决每个重大的历史问题时，一律使用一套不变的手法，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55页。

② 同上书，第662页。

“开始几句援引绝对理念的属性的模糊的话，以后——更展开的和当然是更令人心服的指明所述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普列汉诺夫认为，“实质上说来，在最后一类的解释中已经没有丝毫唯心主义的东西了”^①。这样的评价未免过分，但也表明，坚持“唯心主义就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这一论点的黑格尔，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默默地承认，实际上，“唯物主义乃是唯心主义的真理”^②。就这样，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形式的暗雾的笼罩下面，不自觉地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他的历史观成了唯物史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指出，尽管以往的思想家在历史观领域中提出了一些合理思想，甚至包含着唯物史观的萌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辈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只能当作搜集材料的一种准备工作，虽然这些材料是很丰富而且宝贵的，但是还不是系统化了的，还没有被一种普遍的思想所阐明”^③。只有马克思才肩负起了创立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历史任务。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哲学作出了科学的评价，普列汉诺夫有可能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唯物史观的创立在哪些方面引起了人类哲学思想的变革。

普列汉诺夫首先指出，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历史科学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重大成果，即发现“公民生活”、“财产关系”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基。这些结论，后来为马克思所首肯，并且作为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组成因素包含于唯物史观里面。但是，伴随着这个结论而在科学面前产生了非解决它便不能前进的新问题：所有权状态本身取决于什么东西呢？——这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65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34页。

又成了使思想家们感到烦恼的“斯芬克斯之谜”。在马克思以前，所有的哲学家在这个问题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马克思则从人类生产活动中找到了理解财产关系起源的谜底。指出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生产关系及其法律表现形式“财产关系”的根源，从而解决了在很长时间内纠缠着思想家们头脑的问题。

其次，普列汉诺夫认为，唯物史观创立之后，人类第一次得到了说明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哲学。从此，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贯的和彻底的世界观，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唯物主义的枯燥的、灰暗的和宿命论的色彩。旧唯物主义虽然竭尽一切努力用物质解释意识，用自然界解释精神，但它完全局限于把人看作是动物世界的一员，看作是“能够感觉的物质”，而没有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人的历史。可以说，它的致命的弱点正是在于，它漠视了人的历史发展，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人的物质的生产活动，从而使人变成了盲目的物质必然性的奴隶。马克思看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甚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而提出了纠正它的任务。“他的‘经济’唯物主义是对于人的‘具体活动’怎样发展起来的，怎样由于它发展了人的自我意识，怎样形成了历史的主观方面这一问题的回答。当这个问题即使部分地解决了的时候，唯物主义就不再是枯燥的、灰暗的、悲惨的了，它不再把解释人类生存的活动方面的首席让位给唯心主义。这时候他脱离了它所固有的宿命论了。”^①

再次，唯物史观的创立，还克服了辩证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秘的性质。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思想是其中最宝贵的精华，但在唯心主义形式下面，它具有神秘的性质。表面看来，黑格尔当作极限的绝对观念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它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展，它的不可遏制的创造活动体现于人类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但在实际上，绝对观念创造历史完全是字面上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47页。

它的创造行为只发生在哲学家的表象、见解和抽象的思辨中。马克思纠正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这个根本错误。他认为，历史辩证运动的基础并不是绝对观念，而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创造活动，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的生产活动，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在每一个一定的时间里，“生成的过程都是一个双重的过程，旧的东西消灭着，同时新东西从旧的废墟上产生出来……如果哲学只能认识旧东西的消灭，这种认识就是片面的，哲学就不能实现自己认识实际的任务……最新的唯物主义没有这种局限性。最新的唯物主义根据什么东西现在存在着以及什么东西已经过时，就能够判定什么东西将要产生。”^①由于唯物史观具有预测实在的历史事变的职能，所以它能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同时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以前，社会科学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成为确切的科学。因为，当学者们以人性为最高审判官的时候，他们必然地以人们的观点、以人们的意识活动来理解社会现象。这样一来，人们的社会关系，其中也包括人们的经济关系，就完全依赖于人们的感情、愿望、观念、理想、意图和动机了，人们的意识活动变成了无条件的东西，而作为科学理论之基础的规律性的概念却被抛到了一边。相反地，当马克思绕过人性的观点而把人类社会思想向前推进的时候，他对社会生活提出了全新的解释，“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如下：（1）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2）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②按照这个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仅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分清了什么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和什么是思想的社会关系，从而确立了物质的社会关系决定思想的社会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进一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91—492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47页。

步揭示了物质的社会关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社会生产力。正像动物的历史归结于它的自然器官变化的历史一样，人的历史则首先归结为他的人为器官即他的劳动工具改造的历史，归结为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从此，历史研究具备了科学性质，它不再是以任意选择的某一“主导”思想为依据的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对以生产力的变化为基础的有其内在发展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严肃探讨了。

从普列汉诺夫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到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止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清醒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看到了它们始终没有能够跨出的原则界限，另一方面又不忽略它们在局部范围内、在某些问题上的合理因素及科学的猜测，并把这些看作是唯物史观的萌芽。他以自己的辩证的分析竭力向人们表明，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萌芽在逐步地发育成长，愈往后来，它们变得愈益丰满和日趋成熟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多次强调，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事实上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观念发展的合法产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比它们在盛行一时的时代所拥有的基础要坚固得多。因此，马克思的理论，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黑格尔的话来说，是最发展的、最丰富的、最具体的。”^①

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变革。唯物史观同以往所有历史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认为任何社会进化，任何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启蒙学者的不变的人的天性，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而是人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改造自然的斗争。这一斗争就是人的劳动。劳动既是社会过程的历史起点，也是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人们在劳动中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把自己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建立一定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2页。

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人们的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都建立在这种结构上。这样，在历史观中便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总之，普列汉诺夫用批判继承和革命变革有机统一观点来说明唯物史观的形成史，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按照这种观点，唯物史观的创立，并不是缺乏理论前提的偶然发现，而是有着深厚思想根源的伟大的科学创造。普列汉诺夫在评价这一创造的意义时写道，“按其对于科学的重要性来说，这个发现可以勇敢地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①

二、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理论

人类从事任何历史活动，都离不开他所居住的地理环境，离不开他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那么，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呢？普列汉诺夫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作用学说，从而反过来丰富并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内容。

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普列汉诺夫以前很早就有人看到并详细地论述过了。但是，地理环境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人类社会，却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得到科学解决的问题。比如，在18世纪的欧洲，就有以孟德斯鸠、巴克勒、拉采尔为代表的地理学派。他们认为，人类同动植物一样是由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的。地理环境决定人的心理、性格、思想、气质，而这些差异又使人们据以创造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以致影响着国家的强弱和经济的盛衰。地理学派的理论弱点是如此明显，以致在当时就遭到伏尔泰的断然反对。伏尔泰提出的论据是，既然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随着时代之不同出现着不同的社会关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06页。

系，那么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历史命运就没有任何影响，全部的事情在于人们的意见中。普列汉诺夫则认为，完全否认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就地理学派力图以地理环境这种物质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这点来说，他们表现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倾向。地理学派的错误，不仅在于他们把地理环境的作用绝对化，把相对不变的地理环境看作是迅速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原因，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没有找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生作用的正确渠道，他们“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者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①。

普列汉诺夫肯定了黑格尔在地理环境作用问题上的贡献。他指出，黑格尔“就不仅在个别方面，而是在问题的整个提法上，都完全避免了这种严重的错误”^②。黑格尔不像地理学派那样，认为地理环境是直接决定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而是把它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地理背景”。他在讨论地理环境的作用时，正确地看出了地理环境对生产力部门的分布的重要意义。按照他的说法，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1）干燥的高地，连同高地上的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巨大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3）处在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在第一种地区里盛行着畜牧业；在第二种地区里盛行着农业；在第三种地区里则盛行着商业和手工业。正是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基本差别，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式，并因此造成了居住在这些地区里的人们之间的不同的社会关系。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用地理环境来特殊地说明种族，说明他们在生理上以及气质上何以有差别，而是用它来一般地说明生产，并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84—485页。

② 同上书，第485页。

分地解释各民族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以及原始社会中社会成员不平等的原因等等。尽管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甚至包括自然界本身都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外化，但就他对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看法上，就他对地理环境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人类社会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他的思想是深刻的，合理的。

当然，作为普列汉诺夫阐明地理环境作用问题之直接理论依据的，并不是黑格尔的思想，而是马克思对该问题的明确肯定的言论。马克思本人注意到，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曾经把生产工具看作是人的自然器官的延长，并将动物的自然器官的形成史和人的“人工器官”的形成史作了类比。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动植物的进化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的自然器官，形成新的物种，那么，人类的进步，则是适应同周围自然的斗争需要而改变他的人工器官，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具体论述过地理环境对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他说：“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①在谈到地理环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时，他又说：“资本的母国，不是草木郁然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地方。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由生活所在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刺激它，使它的需要、能力、劳动手段和劳动方式多样化的，并不是土地的绝对丰度，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自然产物的多样性。”^②此外，马克思还指出，把社会形态有的较为发达、有的相对落后这点撇开不谈，劳动生产率的状态总是离不开各种自然条件，而诸种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又可大体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555页。

为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如肥沃的土地和富有鱼类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汹涌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道，树木、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发展的初期，前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上，后一类自然富源有决定作用。普列汉诺夫根据这些论述认为，必须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环境总是通过对于生产力的影响而曲折地和间接地作用于人类的整个社会关系，并这样那样地、变化不定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在解决生产力发展的最初的、原始的推动力时，非常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他甚至认为，地理环境是直接影响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地理环境对于从猿到人的转变具有决定的意义，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始动力。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手足分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这种环境使得前肢和后肢分工成为有利的”^①。此后，人运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征服自然，扩大对周围自然界的统治，从而结束了他的动物学上的发展，并开始了他的特有的社会生活的行程。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说：“社会的人是动物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只有当人不满足于坐享大自然的赐予，而开始亲自生产他所需要的消费品时，人类的文化史才开始了。这种生产在各个时期的规模和性质，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自然界本身，亦即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②。

第二，地理环境条件对于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工具的制造和改进，要依赖周围自然界提供必需的材料。在没有金属的地方，社会的人的理性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86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27页。

论如何也不会使他走出“石磨时期”的界限；另一方面，人制造和改进工具之后，还需要有适宜的加工对象，否则劳动工具便被闲置不用。而劳动对象也要周围的自然环境供给。普列汉诺夫写道：“因此，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①。

第三，地理环境的特点对于原始社会生产部门的分布具有决定作用，是制约原始人类生产活动性质的前提条件。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人们既要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获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品，又要生产自己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而这些“都是受着地理环境的特性来决定的”^②。地理环境给人们提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决定生产部门的分布，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头一项条件”。

第四，地理环境给予人们发展生产力以较多或较少的可能，是影响原始生产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所遇到的自然条件好些，生产力的发展就快些。自然条件差些，生产力的发展就慢些。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最容易地获得食物，而是在于刺激人的多方面的嗜好、习惯和需要的环境条件。所以，“地理环境的特性愈是复杂，则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愈是有利。”^③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地理环境也通过影响原始部落之间人们的交换关系来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他说：“人类的部落在最低的发展阶段上就相互间发生关系，彼此交换他们一部分产品。这就打破了影响每一个部落生产力发展的地理环境的界限，而加速了这种发展的行程。不过，很明显的，这种关系的产生和保持的难易也是以地理环境的特性为转移的。”^④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8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4页。

③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5页。

从普列汉诺夫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确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普列汉诺夫仅仅是在谈到由类人的祖先转化为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过程时，在谈到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刚刚学会拿起自己的人工器官来改造自然，进行生产，从而开始自己的创造历史的活动的初期阶段时，才承认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的。

对于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之后，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做了具体的分析。他的基本看法是，人类一旦从动物界摆脱出来，一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往后的发展就遵循着自己的内部规律来进行。于是，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就从直接变为间接的了。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变动不定的了。普列汉诺夫谈到这点时指出，“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着自己本身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亦不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属性。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产生了人的隶属性的新种类，他的奴隶状态的新形态，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他对自然的统治愈增长，他的生产力愈发展，这种新的奴隶状况便愈巩固。”^① 总之，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类历史的命运，虽然永远离不开它的自然前提，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它又有着自己特有的、独立于地理环境属性的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为了说明人类迈入历史发展之途以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如何由直接变成间接的，普列汉诺夫区分了这时人类所面临的两种不同的环境，一是周围的自然环境，另一个是作为他的历史活动之结果的人为环境。所谓自然环境，即人的居住地的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动植物区系、矿藏资源、地表特性、河流系统、海岸线等等。所谓人为环境，其中包括历史社会结构，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66—767页。

来交际的语言、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人工造成的各种生活设施等。普列汉诺夫认为，随着历史的前进，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关系呈现出两种相反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人为环境的作用之不断增大，地理环境的作用则相对地不断缩小。最初，人为环境十分简陋，随着人类对自然力的征服，它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发展，并且成了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主要的基础条件。但是，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这种日益缩小的影响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从另一方面看，即从绝对意义上来说，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的发展，自然和人类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远不是变得可有可无，微不足道了。相反地，这种作用比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变得更为重要，更带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了。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的相对作用不断缩小的趋向中看到了它的绝对作用的不断增长，从而使人们有可能避免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忽视地理环境作用的片面性。

在考察地理环境和人为环境的相互关系时，普列汉诺夫不仅指出了它们在历史运动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变化，而且揭示出生产力是制约着这种变化的基础。他指出：“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因此，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①例如，凯撒时代居住在英国的那些民族所遇到的地理环境，和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人所遇到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与克伦威尔同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生产力，要比凯撒时代的那些民族所拥有的生产力强大得不可比拟，因而原有的自然环境就不能再以原来的方式影响他们了。这表明，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常量，而是一个依生产力的发展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70页。

状况为转移的“可变的量”^①。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地增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这样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他们开始以新的装备、新的武器向自然开战，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周围的地理环境展现出新的面貌，以新的姿态反过来影响人类。总之，社会生产力不仅制约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性质、方向和形式，而且制约着这种影响的范围、速度及复杂程度等等。只有抓住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并从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活动去考察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够把握住它们变化的客观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地理环境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正确地回答了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始动力”中是物质因素还是精神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有力地反击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见解。他全面论证了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既反对了否认地理环境的作用的片面观点，也纠正了把地理环境的作用绝对化的错误倾向。他始终坚持把地理环境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指出它参加历史运动所能为力的事情，“只是由助成生产力的发展来促进这个运动”^②。他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变量，人类应该把握它的变化规律以便自己同周围环境处于和谐的状态中。这些都是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作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

应当指出，普列汉诺夫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有很大的贡献，但在他的观点中也包含着某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他在论述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时，有时笼统地不加分析和限制地讲“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③，“地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9页。

③ 同上书，第168页。

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①，“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②等等。显然，这些观点不仅包含着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而且同他大量的正确观点特别是同他关于“社会运动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它自己独立于自然环境的规律”^③的观点相矛盾。这种情形表明，尽管普列汉诺夫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从原则上划清了界限，并且对这一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但他并未能在一切方面都彻底摆脱这一理论的影响。

三、关于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

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早在1892—1893年写作《唯物主义史论丛》时，他就提出了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的雏形：“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生产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④

此后，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唯物主义的 历史观》、《论“经济因素”》、《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等论著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阐明和发挥了上述思想。而到了1908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则对社会结构“五项因素公式”作出了完备的和精确的概括。他写道：

“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现在很有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65—166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9页。

④ 同上书，第186—187页。

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 (一) 生产力的状况；
- (二) 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 (三)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 (四) 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 (五) 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这个公式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它又“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一元论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②

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是他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核心，也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总纲，它贯穿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思想：

一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坚持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唯物主义原则解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二是始终强调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因素构成的活生生的有机体。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那么对历史的了解就必须从研究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状况开始；但是，仅仅停留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枯燥骸骨”是怎样为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生动血肉”包裹的。社会结构的各个层次和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的运动，因此，“到研究者手里的是死的材料，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有完全生命的有机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5、196页。

体。”^①

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是根据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公式提出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精辟概括。他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马克思的这个概括后来被人们誉为唯物史观的经典公式。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公式极为重视，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援引并阐发了这一公式的基本思想，并且指出，不论《序言》多么简短，“还应该称它是，而且将来人们一定会称它是任何未来的社会学的导论，如果它希望成为科学的话。而且这个导论就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③

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是对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的具体化和发挥。马克思的经典公式把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概括为三个方面、三个层次，即生产力、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五项因素公式”则进一步把这三个方面、三个层次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③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3页。

具体化为五个方面、五个层次，即生产力、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思想体系，特别是把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当做整个社会结构相对独立的层次和要素加以考察。这些具体化和发挥，体现着普列汉诺夫对社会结构认识的深入。

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还提出了一些同马克思的经典公式不尽一致但对于进一步研究唯物史观却不无益处的见解。例如，他对经济基础这一范畴就有广义的和狭义两种意见。就广义来说，它既包括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是二者的统一，他自己就说他的“五项因素公式”是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就狭义来说，它专指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又如，他把社会政治制度看作介于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一个基本层次和因素，实质上认为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具有二重性。相对于社会经济关系来说，它是政治上层建筑，其性质和发展变化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相对于社会心理、思想体系来说，它又具有社会存在的性质，因为它和社会经济关系一起决定着社会心理，制约着思想体系。

但也应当指出，同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相比，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马克思的公式是把社会结构诸因素矛盾运动的考察同论证社会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之下，“五项因素公式”则只是着眼于考察社会结构诸因素之间的“等级序列”和“因果关系”，而未能把这种考察同论证社会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起来。

概而言之，同马克思的经典公式相比，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既有前进的一面，也有后退的一面。从它对马克思经典公式的具体化和发挥来看，它确是前进了一步，这一前进凝结着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探索的心血和成果，但从它忽视社会结构诸因素矛盾运动的考察同社会革命的联系来

看，则明显地后退了，而这后退的一面正是普列汉诺夫后来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这一根本弱点的表现。

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的深入阐发

在社会意识理论方面，普列汉诺夫超越于前人的地方在于，他明确地提出了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这个学说的重大科学价值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他将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现象区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社会心理以及社会的思想体系，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第二，普列汉诺夫通过对社会心理的深入研究，使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得到了丰富、充实和进一步具体化。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的研究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具有某种开创的意义。他详细分析了社会心理现象的特征，提出了研究社会心理的一些方法论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社会心理对社会经济的适应性。普列汉诺夫在描述社会心理对经济的适应过程时这样写道：“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的阶段必然地引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结合，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亦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的结构。而既然有了社会的结构，就不难了解，它的性质将一般反映于人们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们的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之上。习惯、道德、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地应该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适应于他们的获得食料的方式（用别舍尔的话来说）。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于它的经济的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①。这种情况，正如动植物的生理器官永远适应于它们自身的生存环境一样。（2）社会心理的阶级性。普列汉诺夫非常强调阶级斗争对社会心理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只有把社会心理看作“处在一定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的一定阶级的心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它，把握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46页。

住它的社会实质。社会成员之间在风俗习尚、审美情趣等等方面无疑有着发生共鸣或互相趋同的现象，但他们共鸣或趋同的限度又受着阶级斗争状况的制约。比如，“当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在英国暂时恢复了旧贵族的统治时，这些贵族不仅没有表现出模仿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代表者清教徒的丝毫倾向，而且显示了对那些与清教徒生活规则恰恰相反的习惯和趣味的极强烈的爱好。清教徒的严格的道德让位给最难以置信的腐化堕落了。喜爱和实行清教徒所禁止的事情，在当时成了很好的风尚。”^①甚至在留头发、蓄胡子、服饰打扮、玩牌做游戏这些生活细节上，复辟的贵族也极力和清教徒对立起来。造成这种心理上尖锐对立的原因，只能用当时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状况来解释。（3）社会心理的时代性。社会心理的时代特征表现在民族精神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要求，或者社会的性质起了某种变化。再或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动荡，人们的心灵就会为新的希望、新的意图所激动，从而形成了新的时代精神，新的社会风气。此外，普列汉诺夫还看到了社会心理的民族特征。尽管他一再强调社会心理的阶级性，但并没有否认民族精神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心理的民族特征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更广泛的公共社会生活的背景。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所作的探讨还是粗线条的，有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他还没有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但这里重要的是，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做出了良好的开端和新的贡献。

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还研究了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想体系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体系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反映社会存在的水平不同。社会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生存条件的直接影响下自发形成的低水平的社会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眼前的切身要求、愿望以及因一定的社会环境而产生或激发出来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21页。

情趣、风俗、习惯、成见、自发的倾向或信念，等等。社会心理之中虽然也渗进了某些理性因素，但由于它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加工，因而具有比较鲜明的感性特征和浓厚的经验色彩。相反地，社会的思想体系则是由职业思想家们依据对现实关系和历史资料的缜密思考和分析，在概括社会心理所包含的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自觉地创造出来的高水平的社会意识，一般都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它集中表达了一定阶级和一定社会集团的经济地位、根本利益、历史使命及其理想和目的。对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来说，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普列汉诺夫把社会心理看作是联系社会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是，从社会意识的总体来看，它根源于经济；但从它的那部分高级表现形态，即从社会的思想体系来看，它的直接来源却是社会心理。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对于考察和研究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结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①“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②

正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普列汉诺夫一再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首先是因为，社会存在是由几种不同的因素组成、其内部充满着活力并能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力量体系。社会意识也分为社会心理，初级的意识形态如政治及法律观念，高级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艺术等诸多层次，而且每个层次内部又分为若干不同的领域或部门。这些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情况，使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不可能是简单刻板、整齐划一的。其次，社会心理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关系的过程，还要受到逐渐演进的传统思想、习惯势力等等的巨大影响，这也是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表现出复杂性的一个原因。再次，人类思想的运动不仅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它本身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这种情形，正如肠胃的消化规律同食物的分配规律的关系相似。人们的胃虽然都是由肉构成的，但富人的胃里经常装着美味佳肴，而穷人的肠胃却只能用粗茶淡饭充饥。这说明，肠胃消化什么食物最终是由食物分配规律决定的。可是，肠胃里有了食物之后究竟怎样进行消化，怎样吸收其中的营养而排除其余的糟粕，却不能用食物分配规律来解释。总之，人的思想运动有其独立于经济生活的特殊规律，这也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对于这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普列汉诺夫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从不一律。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不平衡性，首先表现在每个特定的国家或民族在实现这一过程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即使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大体相同，它们实现具体过程的实在情形也不会一模一样。人类的历史表明，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只能生活于自己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个历史环境也许和其他国家或民族所遇到的历史环境颇为相似，可是永远也不能和它完全等同。这样，就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加上了异常有力的多样性因素。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这点时写道：“在性质上是同样的而在发展程度上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异常不同地配合着，这便使得每个国家有异常独特的‘智慧和道德风俗的状态’，表现于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由于这个原因，同一个问题，可能为法国人所热情地感动，而英国人则淡然置之；同一个论据，可以为德国的先进分子所敬服。”

而法国的先进分子则异常厌恶它。”^①

应当承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经常存在着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彼此经常从对方的意识形态中“输入”或“引进”某些精神营养。然而，这种影响和模仿只能缩小这些国家或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却无法使它们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消灭，随着各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增强，普列汉诺夫甚至预言，“我们好似将有一种为全体文明人类所共有的文学”，但他在做出上述预言时并未忘记补充说：

“正如动物学的种分为亚种一样，这个全世界的文学亦区分为各个民族的文学”^②。总而言之，依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由于思想文化交流的开展，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将日趋接近起来，这是没有疑义的；倘若以为这样做会使它们在“道德和智慧状况”上的个性完全磨灭，从此它们的社会意识将按同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发展，那便大谬不然了。

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时代色彩。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不平衡性，不仅表现于不同国家或民族在“道德和智慧面貌”方面的差异上，而且表现于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并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而是绕着复杂的曲线运行的。如果说，前一种状况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国家或民族具有不同的组合造成的，那么，后一种状况则是由于各种社会存在因素在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配置所导致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存在的不同方面对社会意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候，阶级斗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强烈。有时候，生产力的影响或者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的某个因素并不是始终不变地占据着优势地位。由于这个缘故，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意识在不同的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2页。

② 同上书，第731页。

史条件下便具有不同的时代色彩。

第三，旧的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的崩溃是参差不齐的。

当社会处于大动荡的时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言而喻，这时候的社会意识同样也经历着除旧布新的激烈变更。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究竟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呢？普列汉诺夫对此做了生动具体、饶有趣味的描述。在他的笔下，这场变革是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革新者与保守者在意识生活范围内所进行的极为迂回曲折的斗争，呈现出此起彼落的不平衡局面。它们“永远不是在一一切战线上都进行着的；永远有着某一部分思想为革命者和旧制度的拥护者所同等地承认的。最有力的攻击用来攻击那些特定的时期中是旧制度的最有害方面的表现的思想。对于意识形态的这些方面，革命者有着不可克服的志愿和他们的先辈‘矛盾’。而对于其他的思想，即使也是在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他们也常常是淡然置之，有时则接着传统继续保持这些思想。”^① 比如在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曾经尖锐地和坚决地批判了一切神秘主义，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斗争，而对旧的文学传统则没有怎么触动。

旧的意识形态在崩溃时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局面，这类情形充满了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普列汉诺夫在描绘这一生动图景时写道，“心理的领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村和公社，公社乃是各个人（即各个问题）的联合。当‘矛盾’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它的注意力普通只涉及个别的省——如果不是各别的县的话——，只有反射的作用才涉及于邻近的区域。首先被攻击的是那前一时代的领导权属于它的省份。只是逐渐地‘战争的灾难’才扩张于邻近，扩张到被攻击省份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②。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9页。

② 同上书，第736页。

普列汉诺夫看来，上述现象虽然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通例，但他仍然告诫人们，对这点也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因为，在一个历史时代中领导权属于宗教，在另一个历史时代中属于政治，在第三个历史时代中属于哲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变动不居的。不仅如此，由于每一社会所处的具体情势不同，新的意识形态在取代旧的意识形态时所采取的方式也不会重复雷同，“或者继续在形式上承认旧的领导权而将新的、相反的内容加到统治的概念中去（例子：第一次英国革命），或者完全否认它们，而将领导权转入新的思想的省份（例子：法国的启蒙典籍）”^①。此外，争取各个心理省份的领导权的争论，将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方向影响于其他的地区，使各个地区的情况彼此区别，多种多样。

第四，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并非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经济。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社会制度的变革，无一不是由经济的原因所引起。但在历史舞台上，经济因素并不直接出场。它们总是借助于“精神”的形象和语言来表演自己。这样，随着每次社会变革的到来，必然要在社会的人们中间提出无可怀疑的精神上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正义的问题。旧制度和正义矛盾到什么地步？新要求 and 正义适合到何种程度？为了辨明是非，争论各方或者求助于天理，或者诉诸于民心，有的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有的让历史传统作证人，等等，等等。普列汉诺夫就此指出，“经济斗争引起道德问题，而‘灵魂’在亲近的观察下成了‘肉体’；守旧者的‘正义’常就是剥削者的利益”^②；未来社会的利益虽然尚未在生活中变为直接的现实，但同样可以深藏在社会先进成员的心里，成为随时使他们迸发出理想之光的燧石。正因为如此，社会的改革运动才会显示出两重的特点：一方面它是经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6页。

② 同上书，第715页。

济必然性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能反映于人们的头脑中作为他们自觉活动的内在动机。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即在重大的经济改革到来之前，早就有了充分心理准备和舆论准备。正因为这样，经济革命或改革的实行，才能成为顺乎人情、合乎民意的事情，似乎是实现了人们长久以来的憧憬、理想和愿望。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各种对立的趋向。在任何旧的社会经济的胞胎里，总是或多或少地生长着新的经济关系的幼芽，因素。它们在原有的现实生活中虽然不能合法存在，却势必为依赖这些新经济条件成长的社会成员所向往和追求。这样一来，行将到来的经济变革就有了思想上的先导。普列汉诺夫解释这一点时说：“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命定地建筑着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可是，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上的每一个新步骤把人们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置于新的互相关系中，这个新的关系是和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合的。这个新的从未有过的情况反映于人们的心理上，有力地改变着它。向哪一个方向呢？社会的一些成员坚持旧制度，这是停滞的人们。另一些人——旧制度对他们不利的人们，赞成前进的运动；他们的心理变向那随着时间的到来将会代替旧的、过时的经济关系的生产关系的方面去了。可以看到，心理对于经济的适应继续着，可是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①。这表明，社会意识有着超前反映的现象。新的社会意识的建立，并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经济。

普列汉诺夫从各方面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对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们的后继者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说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方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9页。

面取得了一些成果，在研究人们各种思想观念的起源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也开始受到了庸俗化和歪曲。有些人在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解释人类思想史时，直接将思想体系同经济关系乃至生产技术等同起来，或者将阶级斗争对哲学的影响归结为极端简化的公式。他举例说，俄国文学批评家舒里雅齐柯夫就断言，哲学所用的一切专门术语、公式等，

“都是它用来标明社会上各个阶级、集团、基层单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当我们研究某一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哲学体系时，我们就会看到一幅利用符号所画出来社会阶级结构的图画”^①。依照这种意见，似乎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中研究先验论的美学问题，研究悟性的范畴和理性的二律背反，不过是装腔作势，故弄玄虚，其实他真正关心的是给他所属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以更多的美味佳肴和“很好的奴隶”。持这种看法的人自以为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髓，弄懂了社会生活的真谛，并用他们自己的见解加深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无稽之谈完全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时，对这一过程表现出来的复杂性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一方面反对了历史唯心主义，同时也断然同理解这一原理的机械论倾向划清了界限。

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时，普列汉诺夫还充分注意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对此做了深刻的论述。

他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首先，他发挥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并不是同社会经济发展“成比例的”思想^②，并把这一现象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56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概括为两类形式：一是同一国家的不同时代相比，某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成比例，如18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远远超过17世纪，但在文学艺术的某些方面却大大落后于前一世纪；一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相比，某些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成比例，如19世纪的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落后于英、法，然而却产生出了“巨大的肯定的结果：德国哲学的光辉和繁荣”^①。其次，他强调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前一时代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任何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只有在与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的联系中才能理解。”^②否则，“不管我们怎样好地通晓它的经济，也完全不能理解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的”^③。他把这种联系概括为“肯定”的、“积极意义”的联系和“否定”的、“消极意义”的联系，认为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对社会意识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再次，他还考察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指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和程度，归根到底是由两个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的对比决定的。

“在模仿者和范本之间有着一个距离，这距离正就是产生模仿者的社会和范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间之距离”^④。他还认为，不同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⑤。就文学而言，有三种情形：（1）“当这种类似等于零的时候，影响便完全不存在”；（2）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性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能给别人以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影响是单方面的”；（3）当由于社会关系的类似以及因之文化发展的类似的结果，两个民族都能从对方取得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影响是互相的”^⑥。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有无普遍意义，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它对于我们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影响是有一定启发的。最

①②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32、740、735页。

④ 同上书，第729页。

⑤⑥ 同上书，第730页。

后，普列汉诺夫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予以重视，他强调了一种影响的不平衡性，指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①这种“极不相等程度的影响”，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也对揭示社会意识对于社会经济结构归根到底的依赖关系造成困难。因为它往往会使人们只注意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受别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忽略了其对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关系。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上，普列汉诺夫对此有精采的论述。他指出：只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还不是全部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补充一句：意识一经在存在的基础上产生，就反过来促进存在的进一步发展。”^②他在驳斥那些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只看到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完全忽视了政治、精神因素对社会发展作用的错误观点时，深刻论述了政治、思想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任何时候都不是在一种经济平面上进行的”，“每次都·必须上升到‘上层建筑’并在那里进行一番改造”^③。换言之，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经济几乎永远不会自然而然地取得胜利”，而是“永远·必须通过‘上层建筑’，永远·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可是，任何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人们的一种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它必须以人们的观念变革为先导，“所以，人类如果不先经过自己的概念的一系列变革，就不可能从自己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过渡到另一个转折点。”^④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思想因素的巨大作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48—347页。

③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37页。

普列汉诺夫十分重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早在1883年他在自己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就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①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后来为列宁所肯定并多次引用和阐发，从而成为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所周知的一个重要原理。普列汉诺夫还把革命思想比作世界上任何爆炸物也取代不了的威力无比的“炸药”，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全世界无产者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有力的武器。”^②他指出：“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③由此出发，他在早期的理论活动中曾告诫人们不要把“灯”放在知识分子的狭窄的书房里，而应该让它照进“粗野的群众”的心坎里，在他们中间发展先进的意识和革命的自觉性。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在原则上是无懈可击的。遗憾的是，由于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因而不善于联系工人斗争所处的具体条件和实际觉悟水平，结合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得到的真切感受来向广大工人灌输先进的理论；而当革命风暴到来需要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的时候，他常常表现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普列汉诺夫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的错误当然不能完全抹掉他的正确理论观点，但至少使它们失去了应有的战斗性。

五、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普列汉诺夫在其理论著述活动中经常涉及的题目之一。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等著作中，在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时，都用了相当的笔墨来讨论这个问题。1898年，他又专门写了一本题为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8页。

^{②③} 同上书，第98、99页。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小册子，成了集中阐述这一问题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

普列汉诺夫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单独提出来，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门研讨，这首先是反对民粹派主观社会学以及新康德主义的需要。按照民粹派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是所谓“依靠经济弦线为生”的“经济唯物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则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社会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为了制造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承认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思想同承认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之间的对立，新康德主义者什塔姆列尔还杜撰了所谓“月蚀党”的例证。他所依据的推理是：由于我们知道月蚀是一种依据一定规律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现象，所以，谁也不会产生为了促使月蚀的出现而建立政党的想法；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一面再三宣称资本主义决然地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另一方面又积极地为建立政党来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并为确立社会主义而斗争，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是：坚决地捍卫个人能动活动的思想而抛弃历史决定论的立场。

批驳民粹派和新康德主义的这些谬论，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普列汉诺夫注意到，民粹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的这些观点，在一个时期里颇能博得俄国一班先进青年很大的同情。这些青年极力想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崇高事业，所以自然极为重视个人倡导精神的作用。但是，当主观主义者把个人的能动活动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对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丢掉了将理想同现实联系起来的桥梁，他们的一切努力便落得一事无成。“于是，主观主义者的学说便显得破绽百出”^①了。普列汉诺夫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家如果真要想摆脱其对于本门科学的片面观点，他就确实应该解决关于个人在历史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46页。

上的作用问题；只有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一个最好答案的学派，才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学派。

普列汉诺夫并且用充分的论据表明，马克思主义早已引导历史科学走出了上述二律背反的死胡同，它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找到了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它一方面为人们研究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时又为人们遵循客观规律从事创造历史的自觉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普列汉诺夫在全面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时，引证了一些最重要的理论和大量的具体事实，机智地反驳了新康德主义者齐美尔、什塔姆列尔等人的社会学观点。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而是善于把它提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紧密地结合自由与必然、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概念的辩证关系来加以阐发，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复杂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在上述几对范畴中，自由与必然、必然性与偶然性这两对范畴的充分展开及其辩证的统一，又是普列汉诺夫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指导思想。

正确理解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对于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人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从主观方面来讲就要解决意志自由的问题，如果人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木偶，他就根本不能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讲，他还面临着如何对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问题，如果社会发展真的没有一种必然的趋势，人就不知道向着什么方向努力。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上，主观主义者无条件地夸大意志自由，机械论者则把必然性视为神秘的偶像。他们陷入两个相反的极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才能揭示出必然性是如何使人获得解放的。

普列汉诺夫在根据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时，首先划清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客观必然性的界限。一种是自然界的规律，另一种是社会历史的规律，两类规律具有

相同的客观性质，但表现形式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自然界的规律完全通过自发的形式来实现，社会历史的规律在发生作用时则必须借助人的自觉活动来完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太阳的升落，月亮的受蚀，天体的运行，四季的更替，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它们发生时需要种种必要条件，但人的活动并不包括在这些自然现象之内。人的意向和活动同这些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并没有什么因果联系，谁也不会去干那种建立月蚀党以促进月蚀出现一类的徒劳无益的蠢事。与此相反，社会现象和历史运动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人的意向和活动是造成现实历史运动的一个因素，是历史必然事变链条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没有人的主观努力，任何必然的历史事变都不会自行到来。因此，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对于某种现象的绝对必然性的认识，只能加强同情于此种现象并认为自己是引起此种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个人的毅力。“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既如穆罕默德那样自认是替天行道的使者，或如拿破仑那样自认是不可逃避的天运所选定的人物，或如19世纪的某些社会活动家那样自认是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不可遏止的力量的人物，那他就会表现出几乎是自发式的强大意志力量，把各县的哈姆雷特所筑成的那些当前障碍尽行扫除，好像疾风扫败叶一般。”^①

其次还要看到，人们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志自由，正是经济必然性的产物。只要深入地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自由与必然的一致，其实就存在于客观现实的本性之中。因为，从意志自由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无非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日益觉醒的意识，以及伴随着这种意识而来的保存或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意向。由此可见，意志自由在这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引起的，是作为经济必然性的后果出现的，人们把它同“必然”对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以当时俄国的现实生活为例对这点作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40—341页。

具体解释。他指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走向自身否定，这种情况，恰好就是使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怀抱的理想能够付诸实现的深刻原因。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所造成的理智上和道义上的性质，不能不充当否定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过程的工具。这就是事情的必然性的方面。

“既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具有这种性格而不具有别种性格，于是他们也就不仅充当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还很愿和不能不愿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而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起来的，更正确点说，这是与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①

此外，普列汉诺夫还特别强调，自由作为必然的产物而受到必然性的制约，并不意味着意志自由对于必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相反地，只有根据必然性而自觉活动的人，才有成功的希望，只有建筑在对必然趋势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理想和抱负，才有实现的保证。

如果说，正确理解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正确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则是合理确定个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性质、范围及具体条件等方面的关键。在重大历史事变中，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历史唯心论中的主观主义学派完全抹杀了历史运动的必然性。他们喜欢夸大社会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夸大伟大人物的个性、特殊的机遇一类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并把它们看成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机械论者反对主观学派的主观任意性是对的，但他们在力求强调一般原因和事变的必然性时，竟然从根本上否认了偶然现象的存在，完全忽视了历史人物个人特点的意义，甚至对于刻上伟大人物特点的伟大历史事变，他们也认为不过“像海面的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42页。

浪对于来潮和退潮的深邃经常运动一样，是根本不关重要的，波浪发生，一时光彩灿烂夺目，随后一触着沙岸，就会被击破而不留下任何痕迹”^①。为了克服这两种片面性，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被资产阶级哲学家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当普列汉诺夫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为重大作用的那些智慧和道义上的特性，即人们的才能、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或胆怯等等进行考察的时候，他强调指出，这些特性，不单取决于国民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永远并且大半同可以叫做私人生活中的偶然现象有关。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他的品格和精神面貌的形成，不仅为一般的社会环境条件，即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和普遍需要、社会整个机体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而且也受着自己直接接触的周围环境，或所谓“微观环境”所制约。一般的社会环境条件，规定了他的智慧和道义特点的本质方面，而具体的“微观环境”因素，则使这种特点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千变万化的个人差异。所以，个人在影响历史事变时，既体现了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所决定的社会要求，同时也必定或深或浅地烙上了形形色色偶然性因素所留下的印记。

既然偶然性现象是影响历史事变的因素之一，那么，它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发生作用呢？它作用的后果又是怎样的呢？普列汉诺夫对此作了深入的具体分析。他认为，虽然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都包含着偶然性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获得对于各种现象的科学认识。其理由在于，（1）偶然性发生作用的契机并不是不可捉摸、神秘莫测的，它归根到底是由各种必然过程决定的，因而是有征兆可以预测，有规律可以遵循的。用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话说，“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是在诸必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50页。

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①人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眼光对它作精确的考察。(2)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从实质上说是必然性的必要补充和特殊的表现形式，它只有在必然性所许可的限度内才能发挥出来。把这点应用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就意味着，

“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但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②(3)由于偶然性因素对于必然性的进程具有从属的意义，所以，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只能改变各个事变的单个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而终究无法改变它的一般方向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

在个人作用影响所及的历史事变中，偶然性因素虽然只能改变事件的单个外貌和局部后果，但它并不是可有可无、以致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事实上，一个人真正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固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社会制度使他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给他提供充分施展其才能的活动舞台；另一方面，也需要他在智慧、才能、意志、性格、道德等方面具备较之他人更为优越的特点，这其中就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因素。普列汉诺夫由此认为，在历史运动必然性所限定的条件下，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作用，谁就应当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在主观因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特点更适合客观的要求。

在总结自己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思考时，普列汉诺夫着重讨论了如何用唯物史观来评价杰出人物的问题。他认为，在评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时坚持唯物史观，首先的一点就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359—360页。

是要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看成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的最一般的原因，看到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历次变迁都是由生产力的变革引起的。除了这种一般原因之外，发生作用的当然尚有特殊原因，即某个民族生产力发展进程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此外也还有个别原因，即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及其他偶然现象。但是，只有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个一般的最终的原因，才能弄清各种原因之间的内部联系，也才能对社会活动家的个人特点所起的历史作用作出科学的评价和说明。一个在历史上产生过伟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受人瞩目的杰出人物，“并不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有能力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①基于这点，普列汉诺夫非常赞赏卡莱尔把伟大人物称呼为“发起人”的说法。他接着写道：“伟人确实是发起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理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紧急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引起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种需要的发起责任。”^②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英雄的历史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任意夸大，以致把他摆在历史之上，看成是历史的主宰，那就本末倒置了。

其次，在评价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时，还要摆正杰出人物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不要把他们彼此对立起来，不要像民粹派那样，把千百万生产者看作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芸芸众生，而把自己看作是能够随意摆布众多群氓的神奇的催眠术家。普列汉诺夫早就指出：“当还有这么一种‘英雄’，以为只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就足以随心所欲地引导群氓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氓当作粘土一样，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在这样的时候，理性的统治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9页。

仍然不过是漂亮的空话、善良的梦想。只有当‘群氓’成为历史行动的英雄的时候，只有当在它这个粗野的‘群氓’中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自觉的时候，理性的王国才会大踏步地走近我们。”^①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们在英雄和“群氓”之间划出的那条鸿沟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认为，“伟大”一语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从道义方面来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舍己救人”的人都是伟大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那些‘发起人’，不仅那些‘伟大’人物拥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诚挚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②。任何个人，即使最杰出的个人，也应该把自己看成是群众的组成部分，是群众之一员，应该永远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样才能有所作为，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19世纪90年代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著述，对于批判在西欧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摧毁民粹派个人恐怖策略的理论基础，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即使到现在，它对于同个人迷信的残余作斗争，也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在肯定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作出的上述贡献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他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转向机会主义之后，虽然在阐发唯物史观方面仍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历史理论上，特别是在那些同政治斗争联系较紧的一些领域里，日益暴露出了一些原则性错误。主要表现为庸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调和论倾向以及国家问题上的某些机会主义观点。这些错误的理论倾向，不仅同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错误紧密联系，而且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一方面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错误促使他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日益后退，以至背离了他原来所坚持的正确原则；另一方面其理论的错误倾向又导致他政治上机会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卷》第1卷，第770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5页。

主义错误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其错误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根源。因此，在考察普列汉诺夫的历史理论时，既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发挥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功绩，又要对他的错误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批评。这样做，不仅对于正确评价普列汉诺夫这个重要历史人物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必要的，也有助于我们从正面和反面加深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

第四节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与贡献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生活中，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力量。可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还没有得到自己充分的表现。真正的无产阶级艺术还刚刚萌芽，尚处在襁褓之中，而资产阶级艺术则“片面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它一方面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根本不理解工人阶级的意向。“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超过对于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同情和怜悯向前更进一步”^①。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丰富的美学思想为指导，创立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以促进无产阶级艺术的茁壮成长，争取某些资产阶级艺术家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普列汉诺夫的重要理论功绩之一，是在这个方面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一、论人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

美学理论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对人的审美活动、审美意识作出科学的分析。针对当时在这个问题上颇为流行的片面的生物学观点，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人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524页。

在分析人的审美活动问题上出现的片面的生物学观点，主要是用人的生理本能来解释人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观念，并认为人的生理本能完全是从他们的动物祖先继承下来的。这种解释的根本弊病，是使美学研究远离了人类特有的社会生活而转入了生物学领域。普列汉诺夫在批评上述片面的生物学观点时，用唯物史观深入考察了人的审美活动，阐明了这种活动之所以为社会现象的理论根据。

普列汉诺夫首先指出，人的审美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着原则的区别，它有自己的不同于动物本能活动的特征。这表现在，

第一，自觉的选择性。人的审美活动不像动物那样，由于生理感官结构的缘故而完全受到固定对象的限制，某些外界对象能否引起人的审美兴趣和审美快感，往往不取决于它们本身的特点，而是更多地与人的有意识的选择有关。比如那些以狩猎为生的原始民族，像布西门人、澳洲土人以及其他与他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野蛮人”，尽管居住地周围鲜花遍野，可他们从来不用美丽的花朵来打扮自己，而专门选取动物身上的东西作为得意的装饰。

第二，明显的差异性。对于动物来说，只要生理结构和生活习性大体相同，它们对于美的本能感受和体验就基本一致，人就不是这样。单纯按生理结构来看，很难说人和人有多大的差距，但从审美情趣来讲，他们之间就显得迥然有异。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早注意到，关于什么是美女的标准，不同群体中的人甚至会有绝对相反的认识。在农民那里，美丽的少女必须体格匀称，体态丰满，面色红润，充满朝气。而在上流社会中，女人的病态、柔弱、萎靡、慵倦等，反倒能够表现出更大的魅力。对于上流社会的人来说，病态、苍白、纤细等，有着另外的意义，说明她们出自名门望族，能够享受到没有体力劳动的优裕生活。

第三，巨大的变动性。人对美的感受当然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继承联系，但并不像动物本能那样原封不动地由上一代遗传给

下一代。实际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对同一审美对象看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变化。即使是被屠格涅夫推崇为绝对的美的标准的维纳斯，在不同时代的人的心目中也具有不同的价值。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一些基督教徒只知道一味地崇拜拜占庭的圣像，并把维纳斯看作是极端令人憎恶的“女妖”。他们的思想中容不下这类离经叛道的形象，一有机会就要把它毁坏。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分析，人的审美活动之所以具有上述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显著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许多动物虽然也像人一样，表现出它们能够体验审美的快感，比如，雌鸟一般都能够欣赏雄鸟的鲜艳的色彩，悦耳的鸣叫和优美的“舞蹈”，但动物对一定对象之所以产生审美的趣味，完全是出于生理特点和生理需要，它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美的观念；与此相反，在人类那里，甚至在刚刚脱离动物界的野蛮人那里，“审美的感觉不仅同复杂的观念‘能够联系在一起’，而且有时候正是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①。

普列汉诺夫举例说，动物的皮、爪和牙齿在原始民族的装饰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怎样解释呢？用这些东西的色彩和线条的组合来解释吗？不，这里问题在于，譬如，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有力的人。”^② 这些充分表明，人的审美活动并不单单决定于自身的生理感官，它在更大的程度上受着观念的十分复杂的联想所支配。

既然人的审美活动是在复杂观念的联想的影响下进行的，那么，人们头脑中的复杂观念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它们的多种多样的联想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某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者只知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314页。

道乞灵于生物学规律，单纯用人的本性、人的心智所固有的特质来加以解释。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人的本性是指人人具有的在一定事物或现象的刺激下体验一种特殊快感的天赋能力，人的心智的某些特质是指人在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相对独立的特殊规律，这类情形当然是存在的。但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仅仅使人能够有一定的概念，而给予概念以真实具体内容、并使人的心理活动由潜在的可能状态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过程的，则是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关系。

对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以模仿为例作了说明，人的心理活动中经常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模仿欲望。然而，这种欲望实际上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表现出来。在其他社会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这种欲望就消失不见了。在英国历史上，“当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在英国暂时恢复了旧贵族的统治时，这些贵族不仅没有表现出模仿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代表者清教徒的丝毫倾向，而且显示了对那些与清教徒生活规则恰恰相反的习惯和趣味的极强烈的爱好。”^①这时候，人的心理活动的方向改变了，模仿让位给对立。

关于对立原理在心理活动中的意义，同样可以这样说。借助于对立原理的作用，我们能够揭开许多心理结构和概念联想的秘密。可是，对立原理本身不能回答，为什么一定社会的人正好有这些而非其他的趣味，为什么他喜欢这些而非其他的对象，为什么原始人常常力求使自己和下等动物相象，而文明的人类却总是把自己同它们不相似的地方竭力突出、夸大？等等。这些问题，只有用周围的社会条件才能给予合理的说明：“……由于社会关系不同，进入人的头脑里的材料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毫不足怪，它的加工的结果也就完全不同了”^②。

至于其他的心理规律，如对称原理，对节奏的特殊的敏感性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21页。

② 同上书，第333页。

等，情况亦大体如此。欣赏对称的能力，对节奏的敏感，都是自然赋予人的，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却是由于受到了原始人的生活方式的巩固和培养。因此，我们必须联系人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才能阐明这些规律在他们心理活动中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

普列汉诺夫据此认为，解释人的审美心理活动，不能停留在生物学的范围，而必须转向社会学的观点。在这一方面，法国复辟时代的美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和泰恩等人曾经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泰恩等人主张把美学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来加以考察，竭力探寻美学现象的社会原因。他们天才地看到了文学艺术与一定社会制度的关系，并正确地指出，表现人们审美观念的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社会心理决定的，而社会心理本身则是由它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泰恩等人的致命弱点，是看不到经济关系是制约社会环境属性的根本因素。所以，当需要进一步回答是什么决定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时，他们竟又回到了人的社会心理，犯了古老的循环论证的错误：“陆在鲸上，鲸在水上，水在陆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他们只是轻率地把动物的本能提高到人的心理活动的高度。他们这样做，不仅对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帮助，反而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妨碍了科学认识的深化。其实，摆脱纠缠法国复辟时代美学理论家的矛盾的出路，唯物史观已经明确地指示出来了。唯物史观完全同意泰恩等人关于“一个民族的艺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而它的心理又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意见，不过在回答什么因素决定着境况本身的变化时，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我深深地确信，从今以后，批评（更确切些说，美学的科学理论）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①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44页。

坚持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美学的理论基础，把人的审美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普列汉诺夫研究和解决所有美学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他在美学理论的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同坚持这个根本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不仅如此，由他所详细阐明的这个理论原则，对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有益的影响。

当然，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也有不甚确切之处，比如，他对生物学条件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作用的看法就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他只断定生物学条件仅仅为人能够发生心理活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但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却把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社会或某一社会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思想，部分地归因于人种发展的生物学条件，这就同他原来的言论有了某种程度的出入，同时使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出现了失误之处。

二、到生产劳动中寻求艺术的起源

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不仅阐明了人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揭示了人在周围现实的影响下得到的审美感受如何促成了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艺术起源于劳动。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艺术属于最高的层次之一，初看起来，高雅的艺术创作似乎同粗糙的物质生产领域不会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在原始社会中，这种联系曾经表现得比较明显，“所以，一个部落离划分为阶级的社会愈远，它就给我的研究提供愈加合适的材料。”^①从这个思想出发，普列汉诺夫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专著和材料，对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作了详尽而又全面的阐发。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00页。

普列汉诺夫首先指出，劳动促成了艺术创作的社会需要。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也和其他一切形式的社会意识一样，完全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

对于原始人的生活情况，许多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真实的报导和生动细致的描述。根据这些宝贵的资料，普列汉诺夫断言，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以集体的方式进行的。原始人劳动所固有的这种社会性质，使他们有必要交流彼此思想和感情，把自己在劳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体验过的感受传达给自己的同伴。形形色色的原始艺术就萌发于这些交往手段之中。普列汉诺夫完全赞同封·登·斯坦恩先生的精辟见解，即原始人最初之所以采用“绘画文学”，主要目的在于向同伴传达信息。

正因为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生产劳动和生存斗争服务的，所以普列汉诺夫主张以功利的观点去看待审美活动的目的和艺术的本质，不同意康德把美定义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而喜爱的东西”^①。当然，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任何艺术都会给它的创作者立即带来直接的好处，也不表明人们在欣赏每件艺术作品时都念念不忘从中捞到什么私人利益。实际上，当人们倾心关注于艺术创作或艺术欣赏时，他们可以完全陶醉于审美的快乐之中而撇开任何有意识的利益考虑。但这种情形丝毫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外界事物最初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满足人们审美快乐的艺术品，恰恰是因为它们具有实实在在的实用价值。普列汉诺夫谈到这点时写道：“但是必须记住，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②例如，原始人用油脂、某些植物的汁液或彩色粘土抹在身上，首先是保护皮肤免受昆虫的侵害，后来才注意到身体涂抹之后可以变得美丽，于是才开始为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09页。

② 同上书，第410页。

审美的快感而涂抹身体。这样看来，在人们的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中，“……功利毕竟是存在的，它毕竟是审美的享受的基础（我们要提醒一下，这里所说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它，对象看起来就不会是美的。”①

其次，劳动不仅促成了艺术创作的社会需要，而且驱使个人引发了进行艺术创作的内心欲望，作为原始艺术萌芽的娱乐游戏，就发端于原始人想把他在劳动中因成功地使用力量而得到的快乐再重新体验一番的冲动之中。

为了说明处于萌芽状况的原始艺术起源于劳动之中，普列汉诺夫分析了游戏与功利活动的关系。他援引斯宾塞的见解说明游戏与功利活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功利活动是满足动物生存需要的直接手段，而游戏本身却并不追求明显的实用目的。但许多事实，特别是凶猛动物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动物的游戏就是假装的捕猎，假装的格斗，它们的全部游戏，无非是追逐猎取物的戏剧性的表演，即是说，即便在动物那里，游戏本身也是由它们借以维持生存的活动决定的。

如果说，动物的游戏起源于追求实用目的的功利活动，那么由此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说，人的游戏完全是劳动的产儿。因为在人类那儿，特别是在刚刚脱离了动物界的原始人那里，追求实用目的的功利活动，基本上和主要地就是维持单个人和整个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生产劳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人和动物在从事功利活动之余还喜欢游戏呢？这对人和动物来说是有所不同的。动物做游戏是出于生理本能，是它们在功利活动中没有耗尽的过剩力量的自然渲泄。人做游戏则出于自觉的意识，是为了通过游戏把在劳动中感到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正因为如此，原始狩猎者往往在自己的舞蹈中表演动物的各种动作，这些动作原本是他在实际的狩猎活动中多次使用过的。狩猎的成功，使他充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6卷，第497页。

分地享受到因巧妙地使用力量而达到预期目的所带来的喜悦。这样，“……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舞。”^①总之，在这里先是在追求实用目的的功利活动中，即在狩猎劳动中产生了快感，然后才有了在模拟功利活动的游戏中把它重新体验一番的心理动机。

第三，由于劳动是人类维持其生存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而它为原始人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各种形式的原始艺术，大都取材于那些从功利观点来看对维持人类生存有实际价值的事物。

在原始狩猎民族的艺术中，舞蹈占有很大的比重。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分析，这些舞蹈，大部分是对生产过程的简单描写，或是对动物动作的生动模仿。还有一部分舞蹈并不直接表现生产劳动，而是描写战争场面。但战争本身是原始民族在狩猎生活中的经常伴侣，战争的目的在于保卫或夺取某一地域的狩猎权利，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就是狩猎者打猎时的工具。因此，表现战争的舞蹈，对于猎人们的生产劳动也没有独立自主的性质。再有一类舞蹈如念咒舞和埋葬舞，同原始人的宗教观念有关。非洲人在杀死大象时往往围着它跳舞，这是表示对鬼神的敬仰，竭力讨好鬼神的欢心。这类舞蹈虽然表现的是对超自然力的崇拜，但它们同样也有非常现实的功利目的。跳舞者如此讨好鬼神，其用意在于想办法使鬼神为自己谋福利，保佑自己在生存斗争中交上好运。

至于原始民族的装饰艺术以及他们的诗歌和音乐，其内容同样来源于劳动实践。在原始民族的装饰品中，经常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和形形色色的几何形状。这些图形看上去颇为抽象，但它们表现的原型却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是对狩猎对象的简单描绘，也有不少是对某些劳动工具的结构原理及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77页。

作方法的特殊图解。普列汉诺夫同时引证很多材料说明，原始民族的诗歌和音乐最初原本就是劳动活动的组成部分，在许多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都有自己的歌：划桨人配合着桨的运动唱歌，主妇一面舂米一面唱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这种劳动所特有的节奏。如果说，诗歌与劳动有着不解之缘，那么，音乐最初就是由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接触时发出的声音演变来的。后来，人们为了使这些声音更加适合于表现自己的感情，就改进原有工具以加强这些声音，增加节奏的花样使声音富于变化。这样，劳动工具就逐渐发展成简单的乐器。

第四，劳动一方面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内容，同时还培养和锻炼了原始人的美感和艺术素质。原始人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劳动中学到的智慧和技巧，为发展他们的艺术创造才能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普列汉诺夫提醒人们注意，由于原始人所从事的劳动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他们表现出的美感和艺术素质就有明显的区别。决定着这种情况的，当然不是原始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某种劳动对劳动者所提出的特殊要求。对于发展人类的才能来说，需要始终是最好的教师。正是狩猎活动的需要，教会了原始猎人的绘画和雕刻，使他们成了“几乎总是具有独特风格的、聪明的、有时是热情的画家和雕刻家”^①。不仅如此，原始狩猎民族在装饰艺术中特别讲究对称，而且重视横的对称甚于直的对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不论猎人本身和捕猎对象，其形状所体现出来的对称正好是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而且，狩猎者的武器，也必须具有横的对称的形式才最便于在狩猎活动中使用。由此可见，原始猎人观察对象的敏感和表现对称的能力，同样是适应劳动实践的要求，经过多次反复的练习而得到的。

但是“当生存斗争的条件随着向畜牧和农业的过渡而改变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34页。

时候，原始人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在他们狩猎时期成为他们的特色的对绘画的爱好和能力。”^①这是因为，不论农耕者还是游牧者，都不需要颇为发达的观察能力和手的灵巧；因此，这些能力在他们那里就降到次要的地位。

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的主要内容，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决定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原理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学说出发，普列汉诺夫批判了以毕歇尔和格鲁斯为代表的游戏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原始人那里，劳动本身的发展起点是游戏。原始人最初饲养家畜，并非从有用的动物开始，而是从仅仅为了自己的娱乐而饲养的动物开始；原始人的劳动，不过是他原先在游戏中得到的技能应用于后来的功利活动罢了。毕歇尔等人于是得出结论认为，“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先于有用物品的生产。”

普列汉诺夫认为，毕歇尔等人的主要错误，是对原始人的生活做了不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原始人的生活不过是简单地个人寻找食物；而由于周围到处都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现成食物，原始人甚至可以在极其长久的时期内不从事劳动而轻松自在地生活；即使狩猎和战争，与其说是劳动，勿宁说是娱乐，即游戏。普列汉诺夫反驳说，把劳动和游戏的界限混淆起来，完全是为了狡辩而玩弄词句。“在低级狩猎部落所处的发展阶段上，狩猎和战争是狩猎者维持生存和进行自卫所必需的活动。两者都追求十分明确的功利目的，……野蛮人决不会仅仅为了娱乐而从事狩猎的。”^②至于说到原始人的真实的生活状况，也决不像毕歇尔所描绘的那样富有诗意。对于维持生存的重要性来说，功利活动即劳动，始终是第一位的。而游戏本身作为功利活动的再现，正是从功利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41页。

② 同上书，第377—378页。

毕歇尔等人之所以夸大游戏在原始人生活中的意义，是因为他们孤立地看待游戏先于劳动的个别场合，认为游戏的职能在于训练幼龄个体以适应未来的生产活动，所以它自然先于这个活动，结论是，游戏不是劳动的产儿，而劳动倒是游戏的产儿。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只有在专指儿童的游戏的场合才是正确的。在许多原始部落中，确实存在着儿童玩战争游戏以适应将来作战行动的情形，也存在着女孩模仿母亲跳舞以再现成人从地里挖掘可食植物根动作的事例。若单就个人方面来讲，的确是战争的游戏先于对战争的实际参加。挖掘植物根的游戏先于对植物根的实际挖掘。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讲，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先是真正的战争和战争所造成的对优秀战士的需要，然后才是为满足这个需要而进行的战争的游戏”，“实际挖掘植物根当然先于模仿这个过程的成年人的舞蹈和儿童的游戏。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劳动先于游戏。”^①

当然，对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不应该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普列汉诺夫本人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也竭力避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他注意到，社会生活和艺术本身都是不断发展和生长着的活生生的东西，是由许多因素和方面组成的复杂现象，因而劳动和艺术的关系就不能不呈现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在原始社会里，劳动也不是促使艺术产生的唯一因素，而且它对艺术的作用亦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律是直接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坚持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决不是要排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影响，而是要对劳动和其他促成因素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表明物质的生产劳动对艺术的孕育和生长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

在原始社会里，除物质的生产劳动之外，促使艺术得以产生的其他因素尚有原始战争、性爱、原始宗教——图腾崇拜以及其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81、382页。

他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因素和观念因素。比如，战争舞是描写战争场面的。但战争本身正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而原始民族之所以那样倾心地歌颂勇敢无畏的战士，则是由于战争是原始人维持其狩猎生活的必要条件，甚至是狩猎生活的组成部分。原始民族的恋爱舞有许多是原始人类生理需要的毫不掩饰的表现，不用说，这类舞蹈同任何经济活动都没有直接联系。能否由此认为艺术最终起源于性爱呢？普列汉诺夫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性感不是由经济造成的，而两性关系的形式却是受经济制约的，在人类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这些关系随着家庭的发展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而家庭的发展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①关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等因素对原始艺术产生的影响，普列汉诺夫也一一作了分析，正是通过这些分析，他阐明了在艺术产生的过程中劳动以及其他促成因素的相互关系，论证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

普列汉诺夫在总结艺术起源于劳动的思想时，明确地承认在其中发生作用的还有着相当多的各种各样的中间因素。他写道：

“可是，甚至一个间接的因果联系也依然是因果联系。如果在一个场合下A直接产生C，在另一个场合下A通过它先前产生的B而产生C，那末难道可以因此而说C不是来自A的吗？如果一定的习俗，比方说，是来自迷信，或是来自虚荣心，或是来自想恐吓敌人的愿望，那末这也没有给习俗的起源问题提供最终的答案。我们仍然要问：产生习俗的迷信是不是一定的生活方式——例如，狩猎方式——所特有的，人用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恐吓敌人的方法是不是决定于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经济？

“但是，我们只要提出这个问题，事实的不可辩驳的逻辑就会迫使我们作出肯定的回答。”^②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06页。

② 同上书，第430页。

说，到劳动中寻找艺术的起源无疑是正确的。

三、以社会生活的机制阐明艺术的发展规律

在探讨艺术起源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依据唯物史观考察了原始人的生活，提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那么，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上，艺术的命运又取决于哪些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在进入文明时期以后的社会生活机制，阐明了艺术发展的规律。

普列汉诺夫认为，同原始社会一样，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上，社会生产力依然是推动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根本因素。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一定时期内文艺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艺术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对于人类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普列汉诺夫同时强调指出，“为了理解艺术是怎样地反映生活的，就必须了解生活的机制。”^①就这方面而言，人类社会的较高发展阶段与原始社会又有若干不同之处。

首先，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以来，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日趋丰富，活动领域的愈益广泛，社会机体的结构开始变得逐步复杂起来。因此，在艺术这类高级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形成了一系列中间环节。在这里，艺术依然依赖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但这种依赖已经由直接变成间接的了，经济关系对艺术的影响，通常要通过中间环节起作用。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在文明社会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间，可以依其同经济基础联系的紧密程度划分出“高级的”和“低级的”两类。其中，法权、政治、道德等，是直接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它们的社会功能，或是集中阐述人们的行动纲领，或是明确人们的活动规范，非常切近地表达了人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98页。

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而属于低一级的意识形态体系。与此不同，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等，距离经济基础比较疏远，更多地体现了“思维与想象的一切创造活动”^①，被普列汉诺夫列为较高级意识形态体系。如果说，文学和艺术在依照社会生活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候，总是“同人民意识其他方面的发展密切地联系着的”^②，那么，它在一般情况下要更多地受到较低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写道：“……社会关系的改变使各种不同的‘因素’行动起来，而哪一个因素当时对文学、艺术等等的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决定于许多同社会经济完全没有直接关系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原因。经济对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一般是极少看得出来的，最常发生影响的是其他的‘因素’，即政治、哲学等。有时候其中一种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例如，在前一世纪的德国，对艺术的发展影响非常强烈的是批评，即哲学。在复辟时期的法国，文学处在政治的强烈影响之下。”^③

从理论上说，艺术作为高级的意识形态体系，必然要从政治、法律、道德等较低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吸取思想，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在实践上，文学、艺术并不直接把政治、法律、道德等的理论观点原封不动地搬到自身的内容中来。如果是这样，它就会流于空洞的说教，或限于对某些抽象的概念作简单的图解。这种缺乏血肉与生命的艺术，既不能引起人们欣赏的乐趣，也无法使人们得到任何美的享受。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最大特点，是以具体的感性形象来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爱好、兴趣、风俗、习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自身中溶和着政治、哲学、道德乃至宗教信仰的社会心理，就成了文学、艺术的最直接的泉源。事情正如普列汉诺夫指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页。

②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5页。

出的那样，“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的心理”^①。法国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在叙述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时早就表示，他反对古典主义悲剧刻画性格的类型化的方法。他主张戏剧描绘的“不是性格，而是当时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当时革命的社会倾向”。普列汉诺夫认为狄德罗的这个意见，非常出色地表达了文学艺术同社会心理的密切联系。

从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每个时代出现的有影响的艺术家，大都是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普列汉诺夫称赞巴尔扎克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者，指出他的作品是研究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普时期的法国社会心理的不可缺少的史料。他还称赞高尔基是无产阶级的富有才华的艺术家，因为高尔基的作品令人满意地表现了工人运动的心理。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心理对于文学艺术的影响极为广泛而又深刻。比如，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等级制度的君主政体达到了鼎盛时期。1667年的佛兰德战役，更使法兰西王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当时，统治等级的社会舆论中充满了渴望“宏伟”、光荣、胜利的情绪。“太阳王”周围到处流露出豪华、荣耀的景象。这种情况，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就形成了追求崇高、尊严、华贵和装腔作势的风格。到了路易十五时代，国王和他周围的贵族只知道恣意寻欢作乐，追求荒淫放荡的生活。这时候，“艺术的理想就从宏伟转向愉快。到处流行着优雅的气派和细腻感官享乐。”^②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人们从内心深处崇尚革命的道德，因而使艺术在否定贵族时代的一切旧的审美观念传统方面达到了极端的地步，以致连戏剧也“长裤党化”了。

由此可见，任何时代的艺术要获得充溢的生命和旺盛的活力，使艺术作品能够打动人的心弦，在欣赏者的灵魂深处激起感情的波澜，其中关键的条件之一，是把握住构成时代特征的社会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82页。

② 同上书，第484页。

心理。普列汉诺夫从这里作出结论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①

其次，在人类历史由野蛮阶段而转入文明时期以后，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开始冲破了单纯的血缘联系而具有了阶级对立的性质。在文明民族那里，阶级斗争成了社会生活机制中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只有考察了这个推动力，只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了它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才能够稍微满意地弄清其文明社会的‘精神的’历史；‘社会思想的进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和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②在阶级社会里，艺术作品表现着时代的性质，主要地就是表现这个时代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性质。

阶级斗争对艺术发展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不同的阶级过着不同的生活，具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并因而创造出了适应自己审美需要的特殊的艺术作品。普列汉诺夫谈到这点时写道：“人们的美的概念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不同社会阶级的美的概念很不相同，有时甚至恰好相反。某个时期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也在文学和艺术中占有统治地位。它把自己的观点和概念带进文学和艺术。”^③在17世纪的法国，从路易十三开始，以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政逐步得到巩固，随着贵族阶级统治的加强，原来在戏剧舞台上占重要地位的闹剧很快被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273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96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85页。

古典悲剧所代替。闹剧又称趣剧，它以滑稽和夸张的手法表现人民对上层等级的不满。这种戏剧，被贵族们视为只合乎仆役的口味而为高雅之士所不齿的娱乐。相反地，悲剧则是贵族的创作，

“表现着上层等级的观点、趣味和愿望”^①。法国悲剧的这种贵族等级的起源，在戏剧的整个性质上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它强烈地影响到戏剧的登场人物、编剧规则、表演风格以及演员个人的表演技巧。在古典悲剧中，登场人物必须是身居高位的帝王、“英雄”；构思他们的故事情节要严格服从“三一律”；表演他们时要遵守等级的礼节，装出伟大和崇高的模样，烘托出富丽堂皇、庄重威严的气氛。

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艺术的演变，必须注意到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它发展起来，达到鼎盛时期和统治地位，最后则趋于衰亡。它的文学观点和它的美学概念，也与此相应地发生变化。”^②总之，一个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盛衰荣辱，势必要在它的文学艺术中留下非常明显的标记。以法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史为例，当资产阶级在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已经成长起来，在经济生活中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而在政治上尚未足够强大的时候，它所追求的目标就仅仅限于以道德宣传来修正旧制度，而不是推翻旧贵族的统治。这时候，资产阶级只能创造出“流泪的喜剧”，借以宣扬它自己的家庭美德，抨击贵族腐化堕落的恶习。当资产阶级同贵族的矛盾激化到由消灭贵族的恶习进而转入消灭贵族本身的时候，日益迫近的强大革命气息把艺术家们对待自己事业的整个态度根本改变了：他们的作品的内容由道德转向政治，作品的主人公是古代共和主义的英雄，艺术格调也一反旧派的矫揉造作和浓艳娇媚，并代之以严峻的朴素。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就不再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69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265—266页。

醉心于古代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了，表现这些人物的古典主义手法对他们也变成了冷冰冰的陈规旧套。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阶级斗争的进程，不仅决定着一个阶级的文学艺术的盛衰，而且决定着新兴阶级对旧的文学艺术传统的批判继承。就一般情况来说，新兴的上升的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以前，总要受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压抑、榨取和损害，在他们的心目中，统治阶级的生活总是不正常的，应当受到谴责的。因此，反映这种生活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就不能使新兴阶级的艺术家感到满意，并使这些艺术家对旧的文学艺术传统采取激烈批判的态度。但是，在法国文学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如下奇怪的现象，即由贵族阶级所创立的古典主义并没有被资产阶级革新家所彻底抛弃，它只是在新制度建立以后很久才逐渐衰落下去。“法国文学史家往往惊讶地问自己道：法国大革命的准备者和活动家在文学领域中始终是守旧者，这个事实是由于什么原因呢？”^①普列汉诺夫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艺术家在启蒙时期所创造的“流泪喜剧”，只限于描写资产阶级道德生活的风俗画，却不能唤起投身革命风浪的英雄主义；资产阶级艺术家在借“流泪喜剧”为本阶级塑造“肖像”的时候，只限于模仿英国的戏剧，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独创性；由于“流泪喜剧”本身平淡无奇，从而削弱了人们对它的兴趣，延缓了古典主义悲剧衰亡的时间。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实际上，当时革新家在文学上的守旧是纯粹表面的。如果悲剧作为形式没有变化，那么它在内容上就有了重大的变化。”^②初看起来，资产阶级革新家们也是在古代世界中寻找文学趣味的范例，但他们所醉心的，已经不是奥古斯特君主政体的时代，而是普卢塔克的共和主义英雄人物了。比如索伦的悲剧《斯巴达克斯》，它的主人公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在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80页。

讲话中不断地提到自由和博爱。很明显，资产阶级革新家改变了古典主义悲剧的性质：“这里在文学的旧皮囊中装进了完全新的革命的内容。”^①

发现阶级斗争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这本是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事情，但当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争得了统治的宝座之后，它对这种斗争开始感到心惊胆颤了。谁要经常提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它就认为这是为了动摇现存秩序而进行的居心叵测的煽动。资产阶级极力回避社会上阶级斗争的事实，他们的思想家则表现出不愿意把这个观点贯彻到理论研究之中，并把社会生活和科学问题有意无意地转移到虚无缥缈的抽象王国里去。针对这种情况，普列汉诺夫指出：“忘记了各种社会成分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和磨擦，艺术理论家们闭眼不看这个在一切意识形态的历史上能说明很多问题的异常重要的因素，他们失去了理解艺术史上的许多细节的可能性，而不理解这些细节，就无法摆脱理论上的公式主义和抽象化。”^②

研究人类文明时期社会生活的机制，对于用唯物史观科学地说明文学艺术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他晚年的时候已经注意到，随着他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的广泛传播，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理论修养很差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德国的一些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青年作家，表现出了一种恶劣的教条主义习气。他们往往把一些名词概念当作时髦用语，像贴标签一样到处生搬硬套。恩格斯在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人的片面倾向是“对于经济方面给予过份的重视”，把一切意识形态都直接和物质经济基础联系起来。恩格斯逝世之后，这种趋势有增无已，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与史料的结合上具体分析了艺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所存在的许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81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多中间环节以及由这些环节所构成的复杂体系,说明了阶级斗争、社会心理及各种思想体系在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把恩格斯在这方面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四、论评价艺术创作的科学方法

为了指导文学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卓有成效地继承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学艺术财产,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艺术的评论工作,并阐明了评价艺术创作的科学方法。

在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创作倾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它们不仅各有特点,彼此区别,而且有的还互相排斥,互相反对。普列汉诺夫认为,评价它们,不应该依据道德情感,而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这种客观的态度就是:“不是哭,也不是笑,而是理解”^①。从这种立场来看,“科学的美学是不给艺术任何指示的;它不会对艺术说:你应当遵守某些规则和手法。它只限于考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各种不同的规则和手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②

以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为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些人倡导艺术为现实服务的功利主义观点,另一些人则宣传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普列汉诺夫指出,在文学史上,坚持功利主义创作原则的艺术家中间固然有许多进步人士,但也有不少保守分子,撇开政府的“圈子”不谈,那些主张功利主义艺术的人们,远不是都出于进步的动机。比如维克多·雨果就力主使戏剧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但他在自己生活的很长时期是企图恢复旧制度的上层等级的代表。他曾经表示,“历史只有在我们从君主制观念和信仰的高度去观看它的时候,才是富有诗意的。”^③此外,像亚历山大·小仲马、拉马丁和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885页。

② 同上书,第188页。

③ 同上书,第234页。

克西姆·杜康等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也并不是要借助于艺术的力量从根本上革新现存的社会制度，而是企图巩固被无产阶级运动大大动摇了的资产阶级关系。这些情况说明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写道：“从这一切完全可以确凿地作出结论说，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倾向于这种观点的只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某一种——不论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或强烈的兴趣；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缘故而消失，那么这种倾向也就没有了。”^①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原理，如果弄清了功利主义的艺术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容易发现在文坛上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的社会根源了。这个原因就是：“艺术家和对艺术创作有浓厚兴趣的人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是在他们与周围社会环境之间的无法解决的不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②就拿法国浪漫主义者来说，他们同周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确是不协调的，这些浪漫主义集团的成员，虽然也是年轻的资产者，但他们本人却对资产阶级生活的腐化、无聊和庸俗感到愤怒。他们那么倾心地迷恋自己的艺术创作，那么热烈地主张艺术的绝对独立，意在把艺术园地当作借以躲开腐化、无聊和庸俗生活的一个避难所。“在他们看来，使艺术成为有教益的东西，就意味着迫使艺术为他们所深深鄙视的资产者效劳。”^③当然，单单由于艺术家同周围环境不协调，还不足以构成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的全部理由。因为，每个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革新者，他们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也是不协调的，甚至可以说是更不协调的。使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拥护者同革新家相区别的原则界限在于：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拥护者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834页。

② 同上书，第829页。

③ 同上书，第827页。

只限于反对现实生活中的不良风气，却绝不反对这种不良风气赖以存在的土壤，即社会关系。他们不期待，而且也不愿意现存的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因此，他们同周围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是完全无法解决的。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这种消极的、悲观主义的态度，使他们极力用在“象牙之塔”中构想出来的浪漫蒂克的生活，来弥补现实生活中所感到的缺憾与空虚。

既然不同的艺术创作原则产生并依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那么，它们之中的哪一种更有利于艺术的发展呢？普列汉诺夫认为，对于这类的问题，同样不容许作绝对的解决。尽管他本人极力主张艺术应该为现实斗争服务，为社会进步事业效力，但并没有因此一概否认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也有某种积极的意义。比如普希金和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他们都曾受到过官方的关注，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仆从们都希望这些艺术家能够写一些“歌颂祖国”的有益的作品。假如沙皇政府的意图能够如愿以偿，假如普希金变成了屈从于统治者的御用诗神，结果会怎么样？不难预料，他的创作就会明显地衰退，大大地丧失自己的真实性、力量和吸引力。当然，普希金事实上并没有向统治者屈服。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承认某种创作原则和艺术手法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作用，是否意味着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就没有客观标准了呢？当然不是。他明确认为，这样的标准是有的，这个标准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他说，艺术创作的一切规律“最终不过归结为一点：形式必须和内容相适应。……这个规律对于一切流派——不论古典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等等——都是重要的。”^①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艺术的真正本质，无非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达人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一方面，不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它总是叙述着什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935页注301a。

么东西,因为它总是表现着什么,“甚至连那些只注重形式而不关心内容的作家的作品,也还是运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达某种思想的。”^①另一方面,艺术作品表达人的思想和感情有它自己的特有方式,“艺术家用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政论家则借助逻辑的推论来证明自己的思想。如果一位作家不运用形象而运用逻辑的推论,或者他虚构出形象来论证某一论题,那末他已经不是艺术家而是政论家了,即使他所写的不是著述和论文,而是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或剧本。”^②因此,作家在创作艺术作品时,必须努力做到使健康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错误的思想,不仅会降低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会损害作品的艺术形式;反过来,拙劣的艺术形式,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

普列汉诺夫一再谆谆告诫人们,在用形式与内容一致来评价艺术作品的时候,一定要竭力避免抽象的观点。他说,“从抽象的观点只能看到真理与谬误之间、善与恶之间、现有的事物与应该有的事物之间的抽象的对立。在反对已经腐败的制度的斗争中,这种抽象的因而也是片面的对事物的看法有时候甚至是非常有益处的。但是它妨碍着对事物的全面研究。由于它的缘故,文学批评变成了政论。批评家研究的不是他分析的作品中所讲的东西,而是这个作品中可能讲的东西,假如它的作者掌握了批评家的社会观点的话。”^③

抽象的观点的另一个表现,是奢望先验地建立一种本来应当仅仅作为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的东西,建立一套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典,并把它当作是普遍适用的评价艺术作品的固定原则。普列汉诺夫认为,从这方面来看,别林斯基的美学法典也暴露出某些狭隘的性质。为了这个法典,别林斯基不得不斥责法国悲剧,特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836页。

③ 同上书,第238页。

别攻击它的三一律，仿佛这种形式是按照大臣黎塞留的随心所欲的要求而产生和确立起来的。这种意见当然是幼稚的。事实上，法国悲剧之具有自己的形式，是由法国社会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原因决定的。如果不是从永恒不变的美学法典而是从法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具体进程出发来看待问题，那么，法国悲剧所特有的形式，恰恰意味着现实主义对于中世纪幼稚幻想在戏剧体验上的胜利。至于谈到它在表演上的程式化的东西，必须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加以理解。“别林斯基所认为程式化的和不逼真的东西，实际上是由于想使戏剧的程式化和戏剧的不逼真减少到最小限度的意图而发生的。当然，法国悲剧中还留下很多程式化的和不逼真的东西。但是，因为这种程式化的东西是永远规定了的，并且是公众所周知的，所以它并不妨碍公众看到真实。还应该记住，现在看来是程式化和勉强的东西，其中有很多在17世纪看来是单纯的和自然的。”^①

对于历史上的艺术作品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于当代的艺术作品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普列汉诺夫认为，资产阶级在当代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守财奴的境地。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就像生活在敌人中间一样，他们把自己的人民当敌人看待，处处提防劳动者，玩弄阴谋诡计，欺诈和愚弄别人。在这样的时代里，“资产阶级衰落时期的极端个人主义把艺术家的真正灵感的一切源泉全给堵塞住了。它使艺术家完全看不见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并使艺术家无谓地纠缠于毫无内容的个人体验和荒诞到病态地步的臆造。这种纠缠最后带来的东西，不但与任何的美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显然荒谬的东西，只有借助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诡辩的歪曲才能为之辩解。”^②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普列汉诺夫也还是注意保护资产阶级艺术家追求新东西的努力，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247页。

② 同上书，第379页。

肯定对新东西的追求正是进步的源泉。比如对印象主义者赫尔曼·安格拉达的绘画作品，他一方面批评它们丑陋不堪，同时也欣赏画家描绘大城市夜间在人工照明之下所得到的效果的意图。他写道：“至于要把她们放在夜间灯光照耀之下来描绘，这个想法也应当承认是值得赞许的。事实上，在现代的大城市里，黑夜往往变成白昼，而促成这种变化的是由现代技术所提供的新的光源；普通煤气灯、电石灯、电灯——这些新的光源都以各自的方式给对象以照明，现代的绘画必然会注意这些光源所产生的光的效果。”^①

普列汉诺夫关于评价艺术创作的科学方法的论述是多方面的，他反复论述的基本思想是：理解是评价的基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评价的最高标准；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具体评价的重要原则。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失去它们的科学价值。

第五节 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与评论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和阐明宗教问题，早就引起了普列汉诺夫的浓厚兴趣。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具有了更为迫切更为突出的意义。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面，不仅在资产阶级著作家中出现了以替俄罗斯人民寻找“失去了的上帝”为其职责的“寻神派”。而且在社会民主党内也出现了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所谓“造神派”。普列汉诺夫于是决定“很认真地考虑和谈论宗教问题”^②。

一 阐明宗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宗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04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65页。

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①由于详细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会遇到许多困难，因此，普列汉诺夫选择了这样一个摆脱困难的办法：“对于我们毫无可能整个地加以研究的过程，就研究它的最一般的特征。”^②在这里，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着重研究了万物有灵论的起源，原始宗教的形成，宗教在文明社会所经历的变迁。

（一）关于万物有灵论的起源

普列汉诺夫认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观的基础，而万物有灵论的出发点是灵魂与肉体对立的观念。它早在社会的权威关系形成之前，即在社会分裂为统治的剥削者和被统治的劳动者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万物有灵论的出现，有着比社会的权威关系这种因素更为深刻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而归根到底，问题并不在权威关系的生产组织，而在于原始人进行生存斗争时所处的技术条件。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促成万物有灵论产生的各个方面。

首先，原始人的智力发展和思维方式，是同他们所占有的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的。原始人的生产力很不发达，他们控制自然的能力很低，由于人影响自然的范围极其有限，从而造成了人的知识异常贫乏。而人的知识越贫乏，对自然现象越是缺乏真正的了解，就越是需要求助于幻想来解释他们并不明白的问题。在原始人的智力发展阶段上，“类比判断是对自然生活的一切虚幻解释的基础。人观察自己的行动时，就会看出，在行动之先，存在着与其相适应的希望，用更接近他的思想方式的话来说，这些行动是由这些希望引起的。因此，他以为，那些使他惊异的自然现象也是由谁的意志引起的。这些用自己的意志引起使他惊异的自然现象的存在物，始终是他的外部感官所不能感触的。”^③这样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63页。

③ 同上书，第373页。

就形成了原始人万物有灵论的观念。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到处充满精灵的王国。

其次，在原始人所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他们一般地都过着狩猎生活。当然，低级的狩猎部落不仅食用打猎所获得的动物的肉，而且食用植物的根和块茎，还经常同“非动物界”的其他事物打交道。但现代人种学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证明，狩猎活动在原始人的生存斗争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原始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实质上就是猎人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他们根据已知借以判断未知的经验储备，基本上是取自于动物界。在原始狩猎者的心目中，人和动物似乎没有任何界限。当他们用类比法判断事物时，更加强了他们观念中关于人和动物在各方面都类同的想法：既然人有灵魂，那么，动物也应该有灵魂，动物和人一样，也要死亡，死亡之后的灵魂和人一样，也离开它们的身体。原始人在狩猎生活中养成的这种思维方式，巩固了他们头脑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观念，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

再次，原始人用万物有灵论解释现象发生过程的具体形式，也体现了他们在控制自然的能力方面所特有的局限。普列汉诺夫认为，原始人的生活的突出特点，主要限于多多少少地花费一些劳动去采掘和攫取那些不经过他们的创造性努力而由自然创造的东西。比如，男的捕鱼和猎取动物，妇女则挖野生植物的根和块茎。原始猎人在生产技术上的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的宇宙起源论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在原始神话中一般极少谈到创造世界和创造人的问题。“他们的神话所回答的基本问题不是谁创造人和动物，而是人和动物从哪里来，一旦找到了对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原始人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的求知欲不会向他们提出新的问题。要达到求知欲提出新问题的程度，他们在技术发展方面必须先有新的进展。”^① 总之，作为低级狩猎者，原始人认为世界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80页。

现象是众多精灵活动的结果，由于原始人本身还没有掌握使现存事物发生巨大变化的高超技艺，他们心目中的精灵也就暂时不具备什么创造奇迹的能力。

（二）关于原始宗教的形成和瓦解

原始人最初在用万物有灵论解释现象的起因方面，的确显得幼稚可笑。在这一历史阶段上，原始人关于精灵的观念，与未来的宗教观念相比，还有相当明显的区别。主要之点在于，原始人这时的万物有灵论停留在简单地相信超自然实体存在的水平上，他们的精灵这时还没有表现出对人的命运有任何影响。普列汉诺夫认为，真正的宗教观念却是在这样的時候才产生的，即一种族开始相信，它同某一超自然实体或某些超自然实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不仅约束着人们，而且甚至也约束这些实体。宗教的主要特征是对神或诸神的信仰，当然，每一个神都是超自然实体，但决不能把一切超自然实体都看作神，这样的实体必须经过一整套进化过程，才能变成神。普列汉诺夫在揭示这一进化过程时表明，原始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从人需要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本性中产生的，它同样是由人赖以生存的现实条件所促成的；而且，只是从物质生活的特定条件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原始宗教所具有的特殊形式。

普列汉诺夫根据许多学者的意见指出，图腾崇拜是宗教意识的“原始形式”。图腾崇拜有两种形式，即动物图腾崇拜和植物图腾崇拜。其中，动物图腾崇拜在时间上又先于植物图腾崇拜。这种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原始人把被自己当作图腾崇拜的动物，看作是神圣无比的东西，并对它们怀有最真诚的敬意。就实质来说，宗教本来是对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但原始人当初神化的并不是人，而是动物，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动物在原始人的生活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援引冯·登·施泰因的话说：“印地安人确实应把自己文化的最重要成就归功于动

物。……动物的牙齿、骨骼、贝壳都是他们的劳动工具，没有这些工具，他们就不能制造任何武器和器具。猎取动物是当时制造武器和工具的必要先决条件，每个儿童都知道，动物至今还提供这一切极必要的东西。”^① 在一些原始狩猎部落的传说中，有些动物甚至尽力给人取火，做了只有普罗米修斯才能办成的事情。既然如此，原始人类最初把自己的神想象为动物，而没有想象为人，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不仅如此，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动物之神，又明显地带有原始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其一，由于人的个体还完全没有从血缘联合体中分化出来，与此相适应，神的个体化的过程也完全没有开始。因此，在图腾崇拜时代，被奉为神的不是个体，也不是为数众多的一群个体，而是整整的一种动物或一类动物，如熊，龟，狼，鳄鱼，猫头鹰，等等。其二，在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原始人时时刻刻都在受到大自然的威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恶劣的周围环境作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也比较容易调整。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神——确切地说是神族——并不像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等的神那样关心人的道德。原始神族只有当人们触犯它的时候才惩罚人们。……但是，在这里，起初受惩罚的也不是个人，而是他的整个血缘联合体，因为报血仇是原始的非米斯女神（希腊神话中的司法之神）的基本规则。”^②

图腾崇拜后来之所以遭到瓦解，其原因在于原始人的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人开始驯养动物，不仅把它们用做消费需要的现成手段，而且在生产活动中使用它们，使它们成为听从自己指挥的得心应手的活的工具。尤其在原始人的生活方式从狩猎过渡到农业以后，人对动物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86页。

② 同上书，第388页。

的役使就逐步变得普遍而又经常了。普列汉诺夫在说明这一变化过程时指出：“宗教意识的原始形式——图腾崇拜，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原始狩猎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宗教意识促成并加强了原始猎人与某几种动物之间的某些关系，使狩猎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增长。这些生产力的增长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而主要是改变了人对动物界的看法。人开始把自己同动物对立起来了。这就很有力地推动了神的观念的拟人化，图腾崇拜的时代过去了。”^①

（三）关于宗教在文明社会所经历的变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逐步由野蛮时期踏入文明的门坎。进入文明阶段之后，作为社会上层建筑设施之一的宗教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如果说，原始宗教较多地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那么，文明时代的宗教则更多地反映了人对异己的社会力量的依赖性。但是，普列汉诺夫不同意据此把宗教分为“自然宗教”和“社会宗教”，不同意把“自然宗教”当作宗教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单独阶段。在他看来，“广义的而且当然是在确切得多的意义上的宗教，实际上只有当社会人为了自己的道德或一般地为了自己的行动和设施开始向神或诸神寻求恩准的时候才产生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宗教都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形式”。正由于人类在文明时代的“社会形式”与野蛮时代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原有的宗教才在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表现在：

第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氏族生活方式在农业和奴隶制的影响下发生了瓦解。在血缘氏族联合体的胞胎里，诞生出了单个的家庭。独立的家庭一出现，家神和家祭便应运而生。在家祭中，家长起着祭司的作用。家庭这时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95页。

② 同上书，第343页。

利益，就必然在人们的宗教观念中得到相应的反映。普列汉诺夫指出，“父权制家庭的神就是祖宗的神灵。因为这种家庭的成员把对自己的家长的那种亲属间的眷恋之情转移到祖宗神灵身上。人认为自己爱神必须有子女爱父亲一样的感情，其心理基础就是这样产生的。”^①

第二，在奴隶制的条件下，社会分裂为利益彼此冲突的不同阶级。人们虽然亲身经历了这一深刻的变化，却无法弄清它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在人们普遍囿于用唯灵论观点来考察和思考问题的情况下，宗教观念指引人们很快在神的意志那里找到了解释。普列汉诺夫援引《摩奴法典》中的说法写道，“宇宙的创造主用自己身体的不同部分创造了不同社会阶级的人。用嘴（嘴被宣布为最高贵的部分。——格·普）创造了婆罗门；用手创造了刹帝利；用大腿创造了吠舍；用脚掌创造了首陀罗。创造主想使下等阶级永远服从上等阶级，并解释说，现存的社会阶级划分应当永远不改变，犹如一年四季的先后相继一样。”^②在这里，首先是阶级分化的事实决定了宗教观念的内容，而宗教在观念上所作出的解释，又进一步神化和巩固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第三，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联合体瓦解之后，不仅形成了家庭，而且由国家组织代替了部落组织。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它依靠一定的政府和一定的法律来统治它所属的被压迫者。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情况对宗教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政府一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产生一定的关系。统治者有关心被统治者的福利的义务，被统治者有服从统治者的义务。此外，在存在一定法律的地方，当然也存在着职业保护人：立法者和法官。人们之间的所有这一切关系也在宗教中得到了虚幻的反映。神变成了天国的统治者和天国的法官。”^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396页。

② 同上书，第706页。

③ 同上书，第397页。

第四，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不仅通过法律，而且也借助于道德规范来约束被压迫的人们。宗教在这里也不失时机地适应了这种新情况：它宣扬神会惩恶扬善，严厉制裁那些在尘世间有不正当行为的人的灵魂。在图腾崇拜时代，原始人相信自己死后的生活同生前完全一样。如果他认为他的血缘联合体由龟变来，他就很容易设想，他本人死后也变为龟。但是，文明民族对于灵魂转生的信仰却同人死后得到相应的信仰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普列汉诺夫举例说，在印度教中，灵魂转生由上到下形成这样的序列：开始是神和圣徒，经过高级的管修者、婆罗门、宁芙女神、国王和大臣，到演员、酒徒、鸟、跳舞者、骗子、象、首陀罗、野蛮人、野兽，等等，等等；而在柏拉图的《共和国》第十篇中，借巴菲里亚人埃尔的灵魂在阴间的游历，着重描述了罪人，特别是弑父者和暴君的惨不忍睹的痛苦。

通过对宗教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考察，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认为：（1）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宗教的进化决定于经济的进化，人关于神灵的观念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2）宗教观念是无知者的世界观，宗教的本质是把人和自然的一切美好属性都归之于神，使人和自然空虚，在阶级社会里，宗教的社会作用是麻醉劳动者，把他们遭受的苦难神圣化。（3）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人们终究有一天会变成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主人，并彻底消除一切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而“当人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界和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的时候”^①，对宗教的需要也就消失了。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用科学思想武装工人阶级，它既不需要地上的老爷，也不需要天上的神明；它的目标是：“从暴君那里夺取王笏，从上天那里夺取火神。”^②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66—67页。

二、对“造神说”和“寻神说”的批判

“造神说”和“寻神说”是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宗教哲学思潮。

俄国“造神说”的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他以世界第五宗教的先知自居，试图建立一个无神的宗教。他硬说，人按其本质来说是信仰宗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宗教哲学。根据他的主张，社会主义应当成为新式的宗教，这种宗教式的社会主义对于俄国人民将“易于接近和接受”。“造神派”这些说教的要害，是企图使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带上宗教迷信的性质，并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臆造的某种神明身上。对于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所宣扬的“造神说”普列汉诺夫作了深刻的剖析。

为了创立“无神的宗教”，卢那察尔斯基求助于费尔巴哈。他认为，费尔巴哈把宗教看作是对隐藏在人身上的宝藏的胜利发现，是对人的内心活动的承认，是对人的爱情秘密的公开信仰，等等，这才真正抓住了宗教的本质。正是从这点出发，费尔巴哈在把神学降低到人类学的水平的同时，又把人类学提高到了神学的水平。卢那察尔斯基兴高采烈地说：“从宗教哲学观点来看，马克思光辉地继承了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水平的事业，也就是说，最终地帮助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的宗教”^①；而他本人创立无神的宗教，则是努力促使这一“光辉事业”得以最终完成。普列汉诺夫就此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立场，完全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水平，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直接对立的。

普列汉诺夫指出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同马克思完全相反，“马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15页。

克思认为，宗教是由颠倒了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颠倒了的世界观。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推断说，因此，甚至在社会关系不再是颠倒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力求颠倒人的世界观。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而我们这位能言善辩和神经过敏的作者推断说，因此，即使当人‘获得’自己的时候，宗教也必须存在。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幻想的太阳，只是因为人还没有学会围绕自己旋转，它才围绕人而旋转。而我们这位‘第五宗教’的新先知得出结论说，因此，甚至当人学会围绕自己旋转的时候，幻想的太阳也必须存在。惊人的结论！铁的逻辑！”①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分析，卢那察尔斯基把人的自我意识变成人的宗教，这就意味着把人的自我意识重新加以神化，使人们不是按着事情的本来面目认识自己，而是使这种认识变成只在虚幻的想象中才存在的东西。这样做，同传统宗教所做的没有什么两样。

卢那察尔斯基没有看到，费尔巴哈力图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的水平，这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弱点，不是表明他思想的深刻，而是表现出他对唯心主义的让步。普列汉诺夫谈到这点时写道，恩格斯其实早就嘲笑了费尔巴哈创立无神的宗教的企图；

“费尔巴哈想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宗教，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作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是可能的话，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就可能了。”②

如果说，费尔巴哈创立无神的宗教是对唯心主义的让步，那末，卢那察尔斯基重新要弄这套把戏则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还迷恋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上所信奉的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18页。

② 同上书，第420页。

论，是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正是这种哲学，使他“在物理世界规律同我们的真理、理想、我们的道德世界之间找不到任何共同之点”^①。在他看来，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经常怀有对幸福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但是，科学不能解决“实践理性”提出的这些要求，不能向人们提供信心。因此，谁不善于从宗教上来思考世界，谁就注定要悲观厌世，而宗教正是为了摆脱烦恼所必需的。在这里，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唯心主义暴露得更加明显了：他既然承认宗教能够在人们陷于烦恼的时候给人们以某种安慰，那么，不管他愿意与否，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承认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道德力量的存在。

在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时，卢那察尔斯基也完全忠实于马赫主义的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并没有能够由科学加以确认的目标，它不过是对人们美好愿望的一种表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不是由于科学向人们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是由于人们深信自己能够“在希望中得救”。卢那察尔斯基向人们吹嘘，他的社会主义宗教完全相信人类潜藏着像神灵所具有的那种“最高位能”，因此用不着由神来提供什么保证。他的新宗教完全致力于行动，始终奉行着不倦地活动的原则。但是，为了说明人类达到“最高位能”的东西具有多么了不起的威力，他又说，“社会神话的理论，可以最好不过地应用于新的宗教意识（无产阶级的，而不是贵族别尔嘉也夫的）方面。神作为全知者、全圣者、全能者，作为无所不包的永恒的生命，的确是具有最高位能的一切‘人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这样说：神是具有最高位能的人类。”^②这样说了之后，他就情不自禁地对自己的崇拜对象唱起了赞歌：“神圣，神圣，神圣，天地充满着你的光荣”^③。普列汉诺夫据此做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24页。

② 同上书，第429页。

③ 同上书，第430页。

出结论：卢那察尔斯基答应给我们创造无神的宗教是假的，其实，他的宗教同样是超人的、有神的。

普列汉诺夫继续揭露说，卢那察尔斯基极力使社会主义同宗教合流，不仅有其认识上的原因，而且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他指出：“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杜撰自己的宗教时，简直是讨好现在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情绪。现在，由于许多社会性的原因，我国对‘宗教’有巨大的需求。而在有需求的地方，也就会有供应。”^①卢那察尔斯基把自己打扮成“第五宗教”先知的角色，正是为了满足这种对宗教的需求。

在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上对宗教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需求呢？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在革命失败这种不幸结局的影响下，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对任何先进社会理想即将胜利的信心。当人们失去对社会理想的胜利的信心时，他们对自己的宝贵个人的关怀就提到了首位。对于个人的“人世躯壳”死之后个人会怎么样这个问题的关怀，就是这种关怀之一。人们越是由于看不到前途而陷于烦恼，就越容易热烈地追求宗教。“有一些人，他们身上的烦恼使他们狂饮。有一些人，同样的烦恼——确切说是另一种烦恼——使他们在某种旧的宗教中寻找安慰。最后，有一些人，另一种不同的烦恼使他幻想某种新的宗教。”^②卢那察尔斯基的真正意图正在于医治患烦恼症的全俄“知识界”的精神创伤。

卢那察尔斯基把他创立社会主义宗教的举动看作是一项新发明，同时向人们保证，他的新宗教将易于为俄国人民所接近和接受。但是，历史表明，他的这些奇思妙想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历史陈迹。普列汉诺夫在揭露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0页。

② 同上书，第423页。

那察尔斯基正在重复前人的错误这一事实时写道：“他借口前进和为了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而醉心于自己的臆想。但是，我们已经指出，他对待宗教的态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根本相反的。现在我再补充一句：他为了给社会主义裁制宗教外衣，像虾一样向后退，退到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宗教观点上去了。”^①这清楚地表明，“造神说”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

在俄国众多的宗教探寻者之中，“寻神派”与“造神派”有些不同。“造神派”起初宣布神是虚构，后来又承认人本身就是神，这就等于使人归于虚无，归于消灭，因而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与此相反，“寻神派”则公开地美化神，美化宗教，“寻神派”的代表人物梅列日柯夫斯基把自己列入精通欧洲文化的人的行列，声称他要把宗教、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以达到宗教的改革，实现宗教的复兴，让崇高的神明继续指引人的心灵，使人真正摆脱不幸。普列汉诺夫在对“寻神派”和“造神派”做了大致的比较以后说，尽管梅列日柯夫斯基不同意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这“不等于他本人在宗教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的观点。不，他犯的错误一点儿也不比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轻。但是，他犯错误的方式不同”^②。如果说，“造神派”是在重复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那么，“寻神派”则是在拾取资产阶级颓废派的牙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寻神说”不过是颓废派的福音书而已。

在“寻神派”的队伍中，有些人不仅同情过现代的社会运动，而且本人曾经有过革命的经历。把这样的人归入颓废派一边，是否合适呢？普列汉诺夫解释说，一个人在社会思潮方面倾向于什么派别，同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角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34页。

② 同上书，第454页。

色，并不是一回事。在颓废主义的故乡法国，“‘新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时也是‘革命阵营中’的歌手”^①。

颓废派分子在政治上的突出特点是随政治风云变幻摇来摆去。他们在某种历史环境下有时不得不表示同情真理的呼声，甚至可以同进步人士结成同盟。但是，他们的同情通常维持不了多久。普列汉诺夫由此作出结论说：“他们缺乏坚强的性格。他们幻想超人，他们把力量理想化；但是，他们之所以把力量理想化，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力量强大，而是因为他们软弱。他们加以理想化的不是他们所具有的东西，而是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此，他们也就不能逆流而行。他们总是随风倒。他们有时被革命之风顺便带进了民主主义者的阵营，这难道令人惊异吗？”^②

当然，普列汉诺夫之所以把俄国“寻神派”归入颓废派的营垒，并不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经历上的雷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思想上的一致，因为他们对社会现实及其未来发展都抱有悲观主义的看法。首先，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表现出极其鄙视的态度。他们认为，指导工人参加斗争的思想原则，无非是“教条的唯物主义：‘肚子在人身上是主要的东西。如果肚子安静，那末灵魂也就活着，——人的一切行为都从肚子中产生出来’。”^③从这方面来看，饥饿的无产者像饱食的庸人一样，都信奉“中庸庸俗温饱的宗教”；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欧洲的贵族作风和庸俗习气一样，都是在“个人主义的原罪中受胎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是使物质福利继续降低到大家都能享受的最低水平的庸俗理想。普列汉诺夫就此指出，俄国“寻神派”在工人运动面前摆出一副自我清高的面孔，是极其虚伪的。

其次，“寻神派”由于对工人运动的动机怀有阴暗的心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77页。

② 同上书，第479页。

③ 同上书，第459页。

所以丝毫感受不到工人阶级解放斗争所引起的道德上的复兴。对于无产者为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而作出的自我牺牲，他们诬之为是单个的人为非个人的、人数众多的氏族、民族和人类而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不仅谈不上崇高，还因此否定了神所塑造的美好的个性。普列汉诺夫感慨地说，在这一点上，俄国“寻神派”和他们的精神前辈颓废派是一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的狂热拥护者——‘高蹈派诗人’，坚信他们生来‘不是为了生活的波动，不是为了贪财，不是为了斗争’，他们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绝对不能了解由历史上阶级‘斗争’所引起的那种‘生活的波动’的伟大道德意义。他们这些真诚地仇视‘庸俗习气’、‘自以为’真正崇高的人，把他们当时的整个文明人类都列入庸俗范围，以真正可笑的愤怒心情指责那个旨在结束庸俗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而根除道德领域的庸俗习气的伟大历史运动，说它庸俗不堪。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所谓庸俗习气所抱的这种可笑的轻视态度，从高蹈派传给了颓废派，先传给法国颓废派，后来又传给俄国颓废派。”①

“寻神派”一方面真诚地痛恨资产阶级社会的庸俗习气，另一方面又深深地依恋于产生这些庸俗习气的社会关系，这就使他们像颓废派一样陷入了同周围的社会环境处于不可克服的不协调之中，在心灵中产生了不可解脱的苦恼。普列汉诺夫指出，这种情况，正是“寻神派”分子热衷于宗教探寻的深刻的心理上的原因。“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苦恼的。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忍受悲观主义。于是‘庸俗习气’的痛恨者就使自己的眼光不看这个永远渗透着‘庸俗习气’的人世，而转向……天堂。这样，就产生了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使人和自然陷于空虚的现象’。彼岸的幻影被看成一切反庸俗习气的无穷无尽的源泉，从而，铺成了一条通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72页。

向神秘主义领域的笔直的道路。”^①

“寻神派”既然从根本上鄙视社会主义运动，轻则对它漠不关心，重则对它采取敌视态度，那么，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为什么曾一度对它表示过同情呢？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普列汉诺夫认为，他们在一定条件下接近社会主义运动，当然不是要真心诚意地“皈依”这个运动，而是为了在运动中为自己的新宗教“布道”，向运动的参加者传播他的“福音书”，从而把运动引入歧途，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要成为高尚的运动，就必须摆脱“罪恶多端的唯物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不致陷入“物象崇拜的密林”，才会走上至善至美的上帝所指引的方向。在他们看来，“一切道德高尚的东西，一切崇高的东西，一切真正人的东西，都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人所创造的彼岸的幻影。”^②因此，彼岸的幻影是人类的道德复兴和一切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上帝，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把追求幸福的过程看作是在心灵深处寻求神的过程，千万不要为了“聊以充饥的扁豆汤”而否定神在人生中的优先地位，这就是“寻神派”为社会主义留下的“圣喻”。由此可见，“寻神派”接近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新宗教的圣水洒在现代正在斗争的人类的经济愿望上，并点起自己‘新的’神秘主义的神香”^③。

第二，他们“还想按照自己的精神素质来改造上述愿望”^④。普列汉诺夫指出，现代的宗教探寻，主要是围绕着个人不朽问题旋转的。登峰造极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得人们把自己个人的不朽问题看成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看来，唯一的可以感触的现实就是“我”，宇宙不过是为“我”所画的一幅相当精美的图画；每个人都要爱惜自己的“我”，要尽力保护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63页。

③④ 同上书，第492页。

他，使他免受外人、野蛮人的侵害。所以，当社会主义者为了正义事业而不惜自我牺牲，并深信为正义事业献身的人将永远活在千千万万进步人士的心目中时，“寻神派”却认为这是把体现神性的“我”毁灭了。“一般地说，这些精明的先生们都非常倾心于唯心主义（据唯心主义看来，世界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已），他们听到自己有朝一日仅仅活在别人的观念中，就感到极大的委屈。他们需要保存的正是他们的宝贵的‘我’；没有这个‘我’的世界，在没有自由的他们看来，是黑暗混乱的世界。”^①“寻神派”认为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是对个人的压制，他们讨厌群众，认为突出群众就会使个人“默默无闻”。他们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状态，甚至把无政府状态看作是俄国革命的潜在的灵魂。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的目的的是社会主义，而它的神秘的无意识的目的则是无政府状态。”^②

普列汉诺夫在评价“寻神派”的所作所为在历史活动中的性质时写道：“这些可敬的神秘论者实际上不是在走，也不是在跑——人只能在地上走和跑，而我们当然不能在地下，——而是在飞，在头朝下地飞。”^③就是说，他们是企图把社会主义拉向倒退，把劳动者引向堕落。

第六节 对哲学史的研究与贡献

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特别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俄国民主主义哲学有精深的研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哲学史论著。他的《唯物主义史论丛》、《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等著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490页。

② 同上书，第495页。

③ 同上书，第495—496页。

作曾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赞赏。

普列汉诺夫从事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熟练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对哲学史的考察。正是这个特点，使他的哲学史研究高屋建瓴，气势非凡。普列汉诺夫对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造诣尤深，他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贯穿于全部哲学史论著中，而且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对哲学史研究工作有重要的价值。

一、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 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视坚持和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必须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去说明哲学发展史，而不是相反。他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写道：“从我个人荣幸地置身的那个学派的立场看来，‘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中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现象而已。’如果愿意从这个立场去研究观念的历史，就必须下一番功夫去说明一个时代的观念怎么样以及以何种方式为它的社会情况所造成，亦即归根到底怎么样为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在他看来，“作出这样一个说明，是一种巨大而有意义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使观念形态的历史面貌焕然一新。”^①他从史前期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论的考察，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各个流派的剖析，都贯穿着这一原则和方法，力图透过各种中间环节去发现它们同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一切观念运动，“只是反映着社会运动，观念运动所开辟的不同的途径，所不断采取的种种方式，正是适应着社会运动中力量的不同结合情况，思维的方式永远依存在的方式而定”^②。所谓“存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73—74页。

的方式”，就是指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人们的经济关系。

普列汉诺夫批评了那种把哲学思想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哲学家的“主观逻辑”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按照唯心主义哲学史观，人们总以为费希特的哲学体系只是遵照“逻辑的方式”从康德哲学中得出来的，谢林的哲学体系只是遵照“逻辑的方式”从费希特哲学中得出来的，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则只是按“逻辑的方式”从谢林哲学中得出来的。普列汉诺夫指出，上述观点完全没有说明，从一种哲学体系过渡到另一种哲学体系，为什么“有时是很快地完成的，在几年内就完成了，有时却需要一整个世纪。”这种情形，仅仅依靠“思想之间的逻辑继承关系完全不能说明”^①，归根到底还应当到复杂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中去寻求答案。

普列汉诺夫还批评了折衷主义哲学史观——“因素论”哲学史观。这种哲学史观只看到了社会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经济因素影响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又影响经济因素；经济、政治因素影响思想因素，思想因素又影响经济、政治因素，如此等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则只看到诸如“法律影响宗教，宗教影响法律，而两者又分别地和共同地影响哲学和艺术，哲学和艺术转过来又相互作用，还作用于法律，作用于宗教”^②之类的现象。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只看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和方法，是“没有根基的，悬在半空中的”。它不过是掩盖各种因素起源的完全煮不烂也完全不能消化的“大杂烩”，不是接近真理，而是窒息真理。“因素论”只是抽象地谈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却根本否认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之间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第二性的，何者是本原的，何者是派生的。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和现象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折衷主义“恰巧在严格的科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75页。

思维开始充分取得自己权利的地方停止了思想。”^①用这种折衷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史，只能把哲学史研究工作引入死巷。

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反对把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简单化。他反复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只是在“最后意义上”才表现出来，因此，决不能以此取代和否定哲学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决不能用社会经济史去“剪裁”哲学史。

二、对人性论的批判

普列汉诺夫对欧洲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了深入批判，这不仅是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发挥，也是对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哲学思想发展史作了深入考察后指出：在马克思以前，许多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去解释历史和说明哲学的发展，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是这样，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和费尔巴哈也莫不如此。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不断地讲到‘人性’，以为它可以说明人类的历史，指示出一个‘完善的法制’必须具有的性质。这种思想是一切乌托邦的基础；空想家们在理想中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时，总是从人性的观点出发。”^②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为依据，而是诉诸人们的善良感情”^③。他们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无论在评价现存社会秩序时，或是在努力设计新社会组织时，他们都把人的本性当作一成不变的标准。”^④几乎与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时，对历史表现出深刻理解的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也在用人性去解释历史，他们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75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2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688页。

④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14页。

的观点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至于费尔巴哈哲学，尤其是他的社会历史观，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更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在欧洲哲学史上，黑格尔曾认识到“‘人性’观点的缺陷”。他在《历史哲学》中嘲笑空想主义者力求设计出一种完美无缺的政体。因此，他“不在人性之中而在人性之外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①这无疑“是很大的一次进步”^②。然而，黑格尔终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虽然不赞成用“人性”去解释历史，并力图到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量中去找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却没有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中去发现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在‘绝对观念’中，在‘世界精神’中找到了这种动力。”^③可是，“绝对观念”、“世界精神”之类，“无非是人类思维过程的抽象”^④，因此，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观念的逻辑特性亦即理性就成了历史的动力。这无异于从前门赶出了“人的本性”，却又悄悄地从后门把它放了进来，只不过给它换上了“适合于肃穆端庄老成持重的德国哲学界的服装”^⑤。这说明，黑格尔虽然力图抛弃以“人性”解释历史的错误观点，但实际上，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却使他转弯抹角地接近甚至重复了这个观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用人性去说明历史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和方法。这种观点和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有时也许在鼓动的意义上是有益的，然而对于历史学这门科学来说却从来没有什益处。”^⑥因为人性论的观点“是排斥对历史的任何科学解释的”^⑦。普列汉诺夫机智地驳斥了用人性来解释社会生活和说明历史的观点。他指出，人性要么是“不变的”，要么是“变化的”，如果说它是“不变的”，它就不能说明历史，因为“不变的”人

①②③④⑤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0—21页。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356页。

⑦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86页。

性不能作为不断变化的历史的原因；如果说它是“变化的”，那它就决不能成为历史的最后动因，因为还必须回答它的变化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总之，不论人性是“不变的”还是“变化的”，它都不是历史的最后动因，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

普列汉诺夫指出，在马克思以前，人的本性被当作认识社会历史的出发点，一切说明人类历史的企图都是由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陷入迷误。马克思的理论则“结束了这一切虚构，这一切迷惘，这一切矛盾”^①。同人性论观点相反，马克思不是用人性解释历史，而是用历史说明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②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影响他以外的自然时，也就使自己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因此人性本身就有个历史，要辨明这个历史，必须了解人是怎样影响他以外的自然的。”^③亦即了解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的历史。不是人性决定历史，恰恰相反，而是历史决定人性，正是“历史运动使人的本性具有这种或那种形态”^④。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极为重视，并把它视为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他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哲学思想的考察，特别是对18世纪法国哲学、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哲学和俄国民主主义哲学的研究，都运用和贯彻了这一原则和方法，对哲学史上的人性论观点作了深刻的剖析。

三、坚持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

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一向重视坚持历史主义的原

①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④ 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3页。

则和方法。

首先，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及其思想的演变，总是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肯定其历史贡献，又指出其历史局限性，甚至还深入探讨了那些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的错误和失足的经验教训。一般地说，他力求从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评价一个哲学家，从不苛求前人，否定一切。例如，他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时指出：这派唯物主义者和当时的官方思想家进行了热烈的争辩，他们驳斥了官方思想家关于人的观念具有先天性的错误论断，是“无畏的始终彻底的感觉论者”^①。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许多论据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许多东西”，然而他们却有“不可争辩的宝贵的功绩，即他们是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的观点上彻底思想了的，而这是能够和应该要求于思想家的一切。”^②

普列汉诺夫很欣赏黑格尔所提出的“不要把先天的虚构加到历史上”的原则和方法，认为这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他指出，黑格尔一再强调“应当如实地来考察历史”，“应当从经验上来处理历史”，而不要像一些历史专家特别是德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那样对历史做“先天的虚构”，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黑格尔不仅没有彻底贯彻这一原则和方法，反而在许多方面违背了它。这是因为黑格尔本人是一个“绝对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因，因此，每当经验材料不适合于他所虚构的哲学体系时，他便扮演“削足适履”的角色，即“为了理论而曲解事实”^③。

其次，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对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作历史的比较，在广泛深入的历史比较中作出应有的历史评

①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71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89页。

价，揭示其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他对18世纪法国哲学、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及俄国民主主义哲学的评价，都是在广泛深入的历史比较基础上提出来的。由于运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这就使他对以往哲学家及其思想的评价一般说来较为公允，也往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例如，他在考察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时，就既把他的哲学思想放到俄国思想史的长河中同以往哲学家的思想作历史的比较，又把它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历史的比较。通过前一个比较，他充分肯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把他誉为俄国启蒙运动的“始祖”；通过后一个比较，他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像马克思一样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但他却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批判地改造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思想并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界限。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说：现在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可以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观点和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指责，然而，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国家来说，他的观点，甚至就连我们现在认为是错误的那些观点，“也终究是极其重要和有益的，因为它们激发了俄国的思想，并且把俄国思想推上了它在前个时期尚未能走上的道路，即推上了研究社会问题 and 经济问题的道路。”^①他的名字“标志着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整整一个时代”^②。

再次，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中还特别重视用发展的观点揭示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在他看来，发展的观点是历史主义的基本内容，离开了发展观点便谈不到历史主义。

普列汉诺夫认为，在黑格尔之前，“发展原则”曾遭到程度不同的忽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除了狄德罗之外，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进化的观点，每当遇到自然界或社会的发展问题时，便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85页。

② 参看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暴露出了他们惊人的肤浅和薄弱。在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虽然闪耀着辩证发展思想的火花，但是由于他们极力追求一种对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来说都是至善至美的社会制度，表明了他们缺乏坚定地站在发展观点上的那种本领。黑格尔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辩证论者，在一切领域中都坚持用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因而给哲学、美学、法学、历史学、宗教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几乎“没有一个杰出的工作者在自己的发展上及对自己学科的新观点上不是获益于黑格尔的。”^①

普列汉诺夫吸取了黑格尔的上述积极成果，在哲学史研究中着力于揭示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探寻其发展规律。在探讨历史观发展史时，他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为中心，从神学历史观，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和黑格尔的历史观，再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观的发展史，展现了人类历史观从低级到高级、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循序发展的清晰画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积极成果，也都包含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又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新的发展阶段的思想体系又面临着新的矛盾。人类的历史观就是在这些对社会历史现象认识积极成果的不断积累和错误因素的不断排除的过程中，在人们对社会历史现象认识过程的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说马克思以前的历史观从总体上说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飞跃，那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则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标志着科学历史观的形成。

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史研究中虽然力图按照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对每一时期的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作出客观的评价，但并非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43页。

没有失误，甚至也有某些与这一原则和方法相违之处。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过高评价就是一例。

四、关于哲学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普列汉诺夫所处的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普列汉诺夫也不例外。他在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考察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与社会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哲学思想的社会阶级基础，并把它视为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普列汉诺夫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社会生活的机制”，而“在文明民族那里，阶级斗争是这种机制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只有考察了这个推动力，只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它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才能够稍微满意地弄清楚文明社会的‘精神的’历史”^①。这是因为，“社会思想的进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阶级和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存在，人们的生产活动直接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和审美趣味，但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是依靠各阶级的地位、需要、意图，以及各阶级相互斗争的行程而改变的。”^②因此，要想对阶级社会哲学发展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应当首先了解社会阶级划分的状况、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演进的具体影响。他批评了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爱斯比纳斯只是用生产力和技术来解释古希腊哲学和宗教演变的观点，指出这位法国学者对于影响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思想体系发展的其他因素“如像阶级斗争几乎完全没有加以注意。可是，这个‘因素’却有着极大的意义”^③。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496页。

②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189、185页。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时，对这种影响作了具体的分析。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并非在任何时期都是一样的，它有时表现得较为强烈，有时则表现得比较缓和。一般地说，当社会的阶级斗争较尖锐和激烈时，它对哲学的影响就较为强烈，较为突出；反之，当社会的阶级斗争较为缓和时，它对哲学的影响也就不那么强烈和突出了。他在分析笛卡儿哲学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同法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关系时指出：在笛卡儿所处的时代，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还不十分尖锐，特别是由于经过16世纪长期流血的宗教战争之后，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相对缓和了下来，在此情形下，笛卡儿认为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增加自然科学知识，以增进人们支配自然界的能力，这就使他的哲学对生产力发展抱有极大兴趣。同是在法国，一百年之后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形。18世纪的法兰西，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激烈，这一斗争对18世纪法国哲学产生了强烈影响，使它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成为哲学史上著名的战斗唯物主义。在作了上述对比之后，普列汉诺夫写道：

“如果说笛卡儿哲学出自对于社会和平的要求，那末18世纪的唯物主义则是新的社会大动荡的预报者。”^①

在考察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时，普列汉诺夫反对那种把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19世纪的希腊社会学家爱柳塞罗浦罗斯在他的《经济和哲学》一书中牵强附会地把色诺芬尼说成是“希腊无产阶级意志的哲学上的表现者”，认为他的哲学的各个部分，从他对神的观点起，到我们通过外感觉器官而得到的概念虚构性学说止，“都是逻辑地从他的改革企图的理论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普列汉诺夫批评说，爱柳塞罗浦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92页。

想揭示哲学家及其思想体系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避免将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简单化、庸俗化。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机会主义者之后，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所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在他成为机会主义者之后就逐渐地背离了阶级斗争观点，在政治实践上转变为阶级调和论者。这个转变对他的理论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期的哲学史研究工作。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始于1883年普列汉诺夫所创建的“劳动解放社”。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普列汉诺夫是全面系统地向俄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先驱。

普列汉诺夫曾经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哲学家。他在1883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20年间，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和方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创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1903年以后他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机会主义道路，1914年演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但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仍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他在反对民粹主义、马赫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具体化了，作了深入的发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在走上机会主义道路之后在哲学思想上也有一些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著作和思想，

无论从正面和反面都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普列汉诺夫博学多才，在哲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他著述最多、贡献最大、影响最为久远的是唯物史观、美学和哲学史这三个领域。他几乎对这三个领域中的一切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富于创见的，他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哲学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普列汉诺夫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未能对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作出正确回答，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普列汉诺夫未能承担起开辟这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

第三章 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实行时期的哲学思想

青年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哲学方法，分析和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由普列汉诺夫开始的从思想体系上对俄国民粹派的批判；他相继批判了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错误理论，阐明了俄国新型工人政党的建党理论，制订了俄国革命的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方法，开辟了在新的历史时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道路。

第一节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22日（俄历4月10日）出生于伏尔加河岸的辛比尔斯克（现名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直接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著作，参加革命实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虽然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不完全成熟到完全成熟的过程，但他与马克思、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不同，没有经过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或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转变过程，而是直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一、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

列宁青少年时期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社会环境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是沙皇俄国专制制度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时期；另一方面，当时的俄国也是具有革命民主主义优良传统并且马克思主义已经得到传播的时期。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就有一批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亚·尼·拉吉舍夫、维·格·别林斯基以及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亚·伊·赫尔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这些先驱者的代表。他们的著作充满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深刻思想，揭露了俄国人民的苦难以及这种苦难同沙皇专制制度的联系，主张用革命手段摧毁封建农奴制度。

在哲学观点上，赫尔岑已经“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主要哲学著作《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也贯彻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还看到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改变现实世界。但是，他仍然认为人们的智力活动在社会进步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俄国革命民主派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有质的区别。但他们痛恨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剥削与压迫、追求人民生活美好未来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和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直接的联系。赫尔岑在晚年转向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他认为国际是未来社会制度的萌芽。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则在俄国革命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62页。

主义者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1870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拥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流亡者，在日内瓦建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半年后，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民粹派的一位杰出活动家格·亚·洛帕廷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矛盾重重的俄国社会现实以及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的需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得到迅速传播。而且，俄国革命民粹派也十分敬重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看成是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早在40年代，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曾接触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著作。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了革命民粹派的研究对象。他们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米·亚·巴枯宁曾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于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洛帕廷和丹尼尔逊在马克思亲自指导和关怀下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并于1872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译本。《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出版之后，销售很快，引起了极大的反响。70年代后半期，俄国经济学界围绕着《资本论》的评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俄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几乎都卷进了这场争论。在列宁的青少年时代，俄国已有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版本。这些也是列宁在中学时代就能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直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客观条件。

青年列宁之所以直接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没有经历民粹主义的思想阶段，还有以下客观条件。在列宁的青少年时代，即8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受到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它在俄国先进知识界的统治地位已经瓦解。普列汉诺夫从1880年1月流亡国外开始，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在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下，巴·波·阿克雪里罗德、维·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以及瓦·尼·伊格纳托夫等人也由民粹主义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1883年9月，他们组成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成立之后，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运用这些著作的

基本观点分析研究俄国的社会实际和革命问题，批判民粹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列宁青少年时代阅读了这些著作，并接受了这些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列宁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利的。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虽然不算一个革命者，但是——位接近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启蒙派思想的平民教育家。他出身于阿斯特拉罕的一个贫苦市民家庭，完全靠勇于自我牺牲的哥哥的供养和自己的顽强努力才得以受教育。大学毕业之后任中学教员。由于多年劳绩，他于1869年担任了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视察员，后又任该省国民教育总监。1886年1月12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他一生专心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长年奔走于穷乡僻壤，为使贫苦农民子弟能够上学读书而不遗余力地工作和斗争。在家里，他按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教育子女，并把他所见到的农民的愚昧疾苦和社会不公平现象讲给孩子们听。克鲁普斯卡娅在1924年1月26日列宁追悼会上回忆列宁的一生时说：“他的心对全体劳动者，对全体被压迫者充满了热爱。”^①这与列宁少年时代从父亲那里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有关的。

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由于童年时代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入校学习，只受过家庭教育。但她天资聪颖、勤勉好学，掌握了好几种外语，经过自学并通过考试，她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她没有到校任教，而是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家庭，贡献给了对孩子的教育。

列宁的母亲怎样教育和影响童年和少年列宁，除了列宁的兄弟姐妹有关他们当时和睦与友爱的家庭生活的回忆外，没有留下文献资料。但从列宁母亲一生对子女革命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情况。她的丈夫去世一年之后，她的上大学的

① 《列宁回忆录》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页。

长子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被捕处死。这对一个母亲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她并没有阻挠长女安娜和次子弗拉基米尔（列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她的六个孩子，除了夭折的奥里佳之外，都相继走上革命道路，而且都遭到过逮捕、监禁和流放。但她总是勇敢坚毅地承担子女从事革命斗争所带来的困难与牺牲。她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活动，却以伟大的母爱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关心子女所从事的革命斗争，直到她在俄国革命胜利前逝世。

比列宁大四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列宁也有过很大的革命影响。

列宁的哥哥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青年，有着高尚的道德品质。至今保存下来的他在中学时期的一篇作文鲜明地表现了他的高尚道德理想。在这篇题为“怎样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人”的作文中，他写道：

“要成为一个对于社会有益的人，应该诚实，学会顽强地劳动；为了使他的劳动带来尽可能多的成果，就需要智慧和专门知识……一个人从年轻时候起就必须培养诚实的品质，正确理解自己对周围人所负的义务，因为一个人选择何种职业，以及选择的时候，是从社会利益还是从个人私利出发，都取决于这种信念……

“对劳动的热爱不仅应该体现在轻而易举和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而且应该贯穿到乍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事情上。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就必须学会顽强地劳动，以便在任何困难和障碍面前决不退缩，无论这些困难是由外界条件还是由本身的弱点和缺陷所造成的，为此就应该善于驾驭自己的意志，培养顽强的坚韧性格。”^①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开始进行革命活动。他参加了革命青年小组，并在工人中进行政治宣传。1887年

^① 参见黄德森、曾盛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3月1日，他由于参加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而被捕。在法庭上，他勇敢地揭露和抨击沙皇专制制度，说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同年5月8日，21岁的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英勇就义。

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当时属于民意党，但从他在狱中所写的《民意党恐怖派纲领》可以看出，他已开始从民意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虽然仍然认为，恐怖斗争是可取的；知识分子具有巨大的独立作用；工人阶级按社会作用来说次于农民；俄国的农民经济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他也已经认识到，

“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正如一旦国家走上货币经济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可避免一样。”^①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是它的最积极的部分，党的主要力量就应当放在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上。”^②

在家里，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深得弟妹们的爱戴。据列宁的姐姐安娜回忆，童年的列宁处处模仿哥哥。虽然哥哥当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对家人也是保密的，但他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思想无疑会影响列宁。列宁正是从哥哥学习的书籍中，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哥哥的英勇牺牲，不仅坚定了少年列宁的革命意志，而且使他开始思索革命的道路和方法。

二、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

研究列宁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对于了解列宁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这一课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基本上仍然是一片空白。其原因在于，青少年时期的列宁遭到沙皇政府的监禁、流放，列宁和

①② 《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9、1011页。

全家常常遭到搜查并处于反动警察的监视之下，而且有几家举家搬迁，因而列宁青少年时期的作文、笔记和书信等文字材料均已荡然无存，所以很难确切再现列宁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现在保存下来的列宁的第一篇著作，是23岁的列宁在1893年春天所写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列宁当时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这篇著作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问题，但是，它从分析俄国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来驳斥民粹派的观点，也就是用经济事实来证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阐明村社农民的阶级分化，从而驳斥民粹派的谬论：村社未被资本主义触动，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俄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它着重指明商品经济在俄国农民经济变动中的意义，表明列宁已深刻理解了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材料，也是列宁随后所写的被看作《资本论》的直接继续的理论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础之一。一年之后，即1894年春夏列宁在继续批判民粹派时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剖析和批判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哲学社会学观点，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无疑已是列宁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标志。

毫无疑问，列宁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必然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不完全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根据现有的材料，主要是有关人士的回忆，这一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怀有不满现实的强烈革命情绪的学生时期。这一时期包括中学时期和1887年下半年在喀山大学不足4个月的大学时期。

中学时期的列宁怀有相当强烈的革命情绪。后来，列宁曾对

克鲁普斯卡娅说过，那个时期他很想把那些使他激动不安的思想与任何人交谈。有一次，“他发现一个同班同学好像有革命情绪，于是便决定和他谈谈，并且约好了到斯维亚加河边去谈。但是结果没有谈成，因为这个中学生一开头就谈如何选择职业。他说，应当选择能过舒服生活和可以升官发财的职业。伊里奇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我想，一个想升官发财的人，决不会是一个革命者。’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和他谈。”^①

据列宁中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库兹涅佐夫回忆，列宁曾有一篇中学作文表达过革命观点。列宁的作文历来写得好，总是得满分。校长兼语文课教师费·米·克伦斯基因此也偏爱他。可有一次语文课教师在发还作文时却非常生气地对列宁说：“你在这里写些什么被压迫阶级，这和你有什么相干？”^②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捕和牺牲发生在列宁中学毕业之前，当时列宁17岁，这一事件对少年列宁思想发展无疑有着重大影响。

当列宁的母亲得到长子不幸的消息时，当天就准备到彼得堡去。列宁为母亲到处寻找同伴，但谁也不愿和他母亲同行。在这以前，母亲是人人赞扬的总监的妻子。而现在，整个“自由主义社会”都躲着乌里扬诺夫家。这使少年列宁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怯懦的真面目。

母亲去彼得堡后，17岁的列宁在家照顾弟妹，继续坚持自己中学毕业课程的学习。他变得严肃、沉默，但在年幼的弟妹面前仍像以前那样说笑。据当时经常去乌里扬诺夫家的好友、女教师卡什卡达莫娃回忆，这时，每当她跟列宁谈到他哥哥时，列宁总是重复地说：“那就是说，他必须那么作，——他不可能有别的作法。”^③几十年之后，列宁的妹妹玛丽娅回忆道，当她们得到

① 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页。

② 参见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

③ 《列宁的青年时代》，伊·阿·伊万斯基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59页。

大哥判处死刑的消息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那一瞬间的脸部表情至今历历在目，他的话仍在我耳边回响：‘不，我们要走的不是这条路。不应当走这条路。’于是他开始为他要走的道路作准备”^①。

玛丽娅·乌里扬诺娃1924年2月8日在莫斯科市苏维埃举行的追悼会上紧接着说：“他（指列宁）认为，这条道路应当引导我们走向胜利而且确实已经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在玛丽娅看来，列宁当时已经确定了引导俄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十月革命道路。这样估计列宁当时的思想状况显然也是过头的。

列宁当时作为一个17岁的中学生，唯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他从哥哥那里看到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列宁当时看完了和看懂了《资本论》这样大部头学术著作。即使看了《资本论》，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和确定十月革命的胜利道路相距甚远。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由于哥哥被杀害，激起列宁对沙皇政府的仇恨，使他对以往俄国革命家十分崇拜，接受了这些俄国革命家的思想。而这是在列宁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事。因此，列宁这一阶段思想的发展，实质上是俄国社会政治思想革命传统的继续，属于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范畴。

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当时的列宁作为一个中学生，还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世界观。虽然列宁天分甚高，除各科学业成绩优秀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托尔斯泰的著作都是他所喜爱的作品。他从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中，吸取的还只能是一般的革命精神。对于他哥哥的牺牲，不论从所有回忆的情况记载，还是从列宁随后的行动看，列宁都

^①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63页。

没有走向单纯为哥哥复仇的道路。而是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并思索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没有同他哥哥的民意党恐怖派同事发生任何联系，也没有在思想上沿着民意党恐怖派道路发展。

列宁中学毕业之后，选择上喀山大学法律系。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也表明他决心献身革命斗争。^①进入喀山大学后，很快参加了喀山革命学生小组，并成为1887年秋天学潮的最坚决、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遭到逮捕和开除学籍的处分。他的在校大学生生活总共不足4个月。

在列宁被捕前往监狱的途中，列宁和一个押解他的警察局长有一段表明列宁的强烈革命信念的对话。那位警察局长大概根据这个只有17岁的年轻大学生的外表来判断，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偶然地被牵连在本案之内，是受了同学们的“坏影响”。因此这位局长说：“小伙子，你为什么造反？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墙呵！”年轻的列宁却勇敢地作了寓意深长的回答：“但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塌的！”

总之，列宁在17岁之前的学生时期，已有强烈的、坚定的，但也是一般的革命信念和情绪。他还没有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民主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系统理论观念。他在世界观上还处在浅层的不成型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喀山时期，包括被放逐喀山省拉伊舍沃县科库什基诺村一年和回喀山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半年时间，即从1887年12月至1889年5月。

列宁在流放科库什基诺村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这个时期读书之多使他以后都难于忘怀。他曾回忆道：后来在他的一生中，即使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也从来没有像从喀山放逐到乡下的那一年读那么多的书。简直是从早到晚手不

^① 参见黄楠森、曾盛林：《列宁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释卷。

由于当时列宁和姐姐都受警察监视，平常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访，因此列宁很难读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其它违禁的革命著作。列宁主要阅读的是已故姨父书橱里留下的旧书籍杂志，亲友从喀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杂志和订购的几份报纸。他除了自学大学课程之外，努力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和统计方面的著作。尽管列宁当时阅读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他的思想却是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他读书的目的是要探求革命真理，因此他能从各种杂志报纸的文章中，特别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中，吸取革命思想的营养。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些优秀著作，也的确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革命精神。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充满阶级斗争的精神，贯穿着推翻专制制度和消灭农奴制的革命思想，并且阐述了唯物主义观点。1888年夏天，列宁曾在几个星期中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反复读了5遍，并且每次都在书中发现新的使他激动的思想。看来，正是由于列宁有这个时期的亲身体会，所以后来他才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通过自己的受检查的文章来教育真正的革命者。

列宁在科库什基诺村读书之后，没有信仰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明，是他在1888年秋天允许回到喀山之厝马上参加了尼·叶·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费多谢也夫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死于西伯利亚流放地。在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时，列宁与费多谢也夫没有见过面，后来互相通信，讨论过世界观问题。费多谢也夫死后，列宁对他作了肯定的评价。

据列宁的姐姐安娜回忆，列宁在喀山时期开始深入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并热情洋溢地给她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和这一学说开拓的新天地。^①安娜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

^①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19—20页。

信仰是在1888年冬天形成的。^①

在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列宁和小组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研究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秘密版本或译文手稿以及普列汉诺夫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组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报告，共同讨论，相互启发。这个时期，列宁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列宁在这几个月的时期里，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没有经受理论和实践上的考验。

第三个阶段是同民粹主义斗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经受考验并进一步成熟的萨马拉时期，即从1889年5月至1893年8月。

萨马拉是民粹主义者的聚居地之一，具有相当浓厚的民粹主义传统。列宁在这里也的确同民粹派的各种代表人物有过较多的交往。有的西方学者据此认为，列宁这时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列宁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民粹主义阶段。

这种观点没有科学根据。他们提到的一个具体证据是列宁同持有民粹派观点的“雅各宾主义者”哥卢别娃的交往，因而认为列宁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雅各宾主义者”，是“民意派”的拥护者。但哥卢别娃本人的回忆，证明与这个结论完全相反。哥卢别娃回忆说，当列宁“知道我是因雅各宾-布朗基派案件被流放，我是一个雅各宾派时，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感兴趣，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研究对象。一般地说，当我回忆萨马拉时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当时不仅研究马克思，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一切交往吸取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他们相识的第一个晚上“就辩论了很久”。列宁“平心静气、坚定不移地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略带讽刺但决不使我难堪地驳倒了我”。他们虽然争辩，但友好交往从未停止，每星期总要见两次面。^②从认识列宁之后，哥卢别娃逐步放弃了用阴谋手段夺

① 《列宁的青年时代》，伊·阿·伊万斯基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09页。

②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第33—34页。

取政权^①观点，90年代末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现有的回忆资料证明，列宁在萨马拉的四年间，一开始就展开了反对民粹派思想的斗争，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社会实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889年5月列宁来到萨马拉时，那里已有主要由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组成的几个秘密小组。但这些小组中民粹派思想影响很浓厚。他们把米海洛夫斯基看成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权威”。列宁参加的是当时最活跃的阿·巴·斯克利亚连柯领导的秘密小组。列宁向这个小组的成员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批判民粹派的观点。在列宁的影响下，这个小组的一些成员，包括斯克利亚连柯本人在内，都抛弃了民粹派的观点。从1890年春天起，萨马拉的秘密小组逐渐从民粹派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1891年3月初，一个游动的民粹派宣传员罗西涅维奇来到萨马拉作报告，大谈民粹派的陈词滥调。列宁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就俄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发表演说，反驳了罗西涅维奇。“这个民粹派宣传员是来驱散对俄国‘不适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在所有的人，连罗西涅维奇本人在内，都看清了他的失败，因此第二天这个民粹派的台柱就从萨马拉走了，拒绝了许多次预定的报告。”^①

列宁在萨马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他曾利用去彼得堡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考试的机会，会见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在这一期间，除了继续钻研《资本论》之外，还学习和研究了《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它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当时只有德文本和法文本。他曾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在秘密小组中宣读过译文。他

^① 《列宁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75页。

曾同斯科利亚连柯小组成员一起作所谓“环球旅行”，即坐小船顺伏尔加河而下，直到萨马拉河湾尽头，渡过向北流入伏尔加河的一条河流。在旅行期间，他们作专题报告，讨论大家最关心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列宁在萨马拉已着手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还善于利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了解和分析农村情况。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俄国农村经济情况，批判民粹派的观点，多次给萨马拉革命小组作报告。1891年末，列宁给萨马拉铁路工人小组作《论村社及其前途和革命道路》的报告。报告用大量数字说明俄国村社的瓦解，证明民粹派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的观点是梦话。1893年春季或夏季，列宁批判尼·弗·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一书，并在萨马拉小组作了报告。1893年8月20日以前，列宁就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写了《瓦·沃著作中民粹主义的论证》一文，并在萨马拉小组中作了同一题目的报告。可惜，这些报告和论文的文字记载都没有找到。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1893年春天列宁研究了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之后所写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不过，从这一篇文章已完全可以证明，列宁这时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三、早期的哲学研究

列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不仅没有经过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而且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之中以及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的整个早期活动中，即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实行时期，他主要不是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批判分析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专门的哲学著作中阐明自己的哲学世界观。而是在他分析

俄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阐明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制定俄国革命的策略等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卓越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方法，从而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当然，在这样长的时期里，列宁不是不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完全没有专门研究哲学问题，只是比较而言，在列宁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前的时期，专门的哲学研究不是他的理论活动的主要方面。

早在萨马拉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显然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据萨马拉斯克利亚连柯小组成员回忆，在1889到1890年间，列宁给这个小组成员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谢苗诺夫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我们介绍了完整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①列宁当时讲解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是没有疑问的。至于说列宁已介绍了“完整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就言之过份了。

1895年列宁第一次出国期间，在国外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并作了摘要。这份摘要编入列宁著名的《哲学笔记》。列宁在这一摘要中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形成，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鲍威尔兄弟的唯心主义主观社会学的批判。

同年9月19日之后，列宁为悼念恩格斯逝世写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该文虽然是简略地，但却是精辟地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情况。

列宁在《〈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中，还详细摘录了马克思深刻评述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作用的那一章。看来，列宁这时已打算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特别是17—18世纪

^① 《列宁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46页。

的英法唯物主义哲学。不久，列宁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果然集中精力研究哲学。这从当时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母亲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沃洛佳现在正努力阅读各种哲学著作（现在这是他的正业），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等。”^①后来，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他们流放中的生活时也说，列宁“晚上通常是读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②。

据克鲁普斯卡娅和弗·威·林格尼克回忆，在1898—1899年间，列宁和林格尼克曾在通信中讨论康德哲学问题。流放在西伯利亚的林格尼克当时住在离列宁的流放地舒申斯克村70俄里的捷斯村。列宁大概从同志们那里知道他对休谟和康德的哲学有兴趣，于是同他通信讨论哲学问题。林格尼克起初向列宁讲述自己的信仰，讲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有时还引证休谟和叔本华的话，大谈其极端怀疑主义。列宁在回信中，“总是以休谟怀疑主义、康德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的身份，拿马克思、恩格斯朝气蓬勃的哲学同它们作比较，非常委婉但又十分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热情地指出，**人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认识应当不断向前发展，应当随着革命工人运动的开展，扬弃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糟粕……**”^③正是由于受到列宁通信的启发和帮助，林格尼克丢开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转而集中思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遗憾的是列宁就哲学问题写给林格尼克的这些信件至今没有找到。

列宁这时集中精力研究英法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是因为他极为关心批判伯恩施坦和俄国修正主义者所宣扬的新康德主义。1898年9月2日，列宁在给波特列索夫的信中认为，普列汉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3卷，第501页。

②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280页。

③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第15—16页。

夫极有必要在俄国刊物上批驳新康德主义，不能让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畅行无阻地宣扬新康德主义^①。1899年3月，为了回击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列宁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该文批驳了司徒卢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歪曲，同时指出，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的征兆。列宁在这里特意加上一个脚注指出，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不是在进行严肃批评，而是在用新康德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列宁说，他在这里不想，也没有可能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意见：

“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②列宁并以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作为后者的例子。在这里，列宁不仅概要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用新康德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企图，而且说明，他研究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正是捍卫和发展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道路。

1899年6月27日，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直接谈到，为了认真对付新康德主义，他要多多地学习哲学。列宁说：“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我已弄到了最主要的哲学名家的最主要的著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7页。

作，但没有新康德主义的作品（我只订购了朗格的著作）。”^①

列宁还说：“我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学习些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②列宁在集中精力学习和研究哲学之后，也没有撰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他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不够，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当时忙于革命斗争任务的最主要方面。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他正在撰写经济理论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束流放之后，他为创办《火星报》、建设和巩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批判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而进行极为繁忙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制订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指导紧张的革命斗争，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直到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之后，当哲学斗争的任务提到首位时，他才撰写了专门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已溶化进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学说的捍卫和发展之中。他在1898年2月为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所写的《书评》中，着重指出，“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的突出优点，正在于作者始终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说明某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的时候，通常总是**结合该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来‘叙述’政治制度、家庭关系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派别。”^③许多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缺点，就是把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素”“诗意般地混杂”在一起，因而叙述混乱，不能给人明确的概念。列宁强调指出：“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澄清这种混乱，才能广泛地、有条理地、精明地观察社会经济的特定结构，把它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特定结构的基础。”^④列宁自己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认识，列宁这一时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2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页。

期也就从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自觉地运用、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节 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 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列宁初登政治历史舞台的首要功绩，是彻底完成对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为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奠定理论基础。这不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丰富和发展。

一、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19世纪下半叶，英法等主要西欧国家早已推翻封建王朝。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腐朽性已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如火如荼。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抨击之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时的俄国却仍然处于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之下。

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痛恨沙皇封建农奴制度。他们也看到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是极不合理的。他们反对与沙俄封建专制政府相勾结共同镇压欧洲革命运动的西欧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他们先是从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尔后又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求俄国革命的道路。但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他们并不理解马克思已经阐明了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客观规律。他们幻想在俄国可以实现一条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直接通向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道路。他们以为，古俄罗斯遗留下来的村社制度的残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捷径的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日益传播，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的争论集中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上。正如列宁所说：

“《资本论》一出现（《资本论》第一卷俄文译本是在1872年出版的——引者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问题，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①

俄国革命的哪些“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呢？

如果俄国应该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便是俄国村社的农民，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就是唤醒村社农民的知识分子，这个革命的道路就是知识分子发动农民暴动，打倒沙皇，然后巩固和发展村社制度，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好的，但它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等等是不适宜于俄国的。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现实，那么，俄国革命的领导者便是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建立俄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俄国革命就必须先在无阶级领导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然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学说以及它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哲学观点，又在俄国这样一个有不同于西欧特点的大国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丰富。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的重要性是容易理解的，但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就不容易理解了，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是理所当然的，轻而易举的。其实不然，当时的情况相当复杂，就连马克思本人对此也十分为难。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32页。

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马克思面临各种复杂情况，曾在1877年11月左右写的，当时没有寄出和发表的《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拒绝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努力发表明确的看法^①，也就是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拒绝发表明确的看法。1881年3月，马克思在声明不能适合于发表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且还说，他深信，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②。这封信马克思写了四遍草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初稿的篇幅达12页，最后定稿只有1页多，而且声明不适于发表。可见马克思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为难程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恩格斯晚年也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恩格斯在答复俄国民粹派朋友的信件中，一方面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③恩格斯肯定，俄国从1854年以来，避免资本主义式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完全是两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恩格斯紧接着说：“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④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页、第269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8页、第38页。

恩格斯在著作和信件中一再提到,对于一些俄国人要他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的争论发表看法的请求,他总是拒绝。“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了解得很不够”^①。“我不能让自己卷入一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用一种我还不能像我所熟悉的西方语言那样使用自如的语言进行的辩论,而且是在那种我最多能看到零星的片断,却根本不可能仔细观察争论的各个阶段和详情的刊物上进行的。”^②此外,恩格斯还认为,“对农民公社的神奇力量的信念,认为从农民公社的深处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社会新生的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舞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并不因为他们这是一种空想“而去同他们争论”^③。

普列汉诺夫在80年代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批判民粹派的过程中也批判了民粹派的基本观点,即认为俄国应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公社是未来社会主义基础的观点。但是,普列汉诺夫一直未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系统、详细和具体的论证。这也使他在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纲领性原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例如,他在1902年初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起草党纲理论部分时,只是一般说明资本主义,没有指出俄国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矛盾和社会灾祸。他对俄国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过高。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没有看到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没有说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资本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因而他对作为工人阶级同盟者的农民的作用估计过低。这些正是普列汉诺夫堕落为孟什维克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正是年轻的列宁在90年代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结论,系统、详细和具体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8页。

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而且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包括哲学原理），在俄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社会历史中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列宁登上俄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早期，他的著作几乎全部是围绕批判民粹主义思想体系、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中心问题。现存列宁的第一篇文章，1893年春写于萨马拉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就是用事实证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阐明村社农民的阶级分化；从而批判民粹派关于村社未被资本主义触动，俄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谬论。

现存列宁的第二篇文章，1893年秋写于彼得堡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列宁用马克思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制度，详尽地阐述了社会分工使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进而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说明了这一演进过程同市场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的错误论调。

1896年8月至1897年3月，列宁从彼得堡监狱到流放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写了《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这是一本批判民粹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性专著。它概括了西斯蒙第学说的要点，揭露了俄国民粹派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列宁阐明，西斯蒙第和俄国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是空想的，又是反动的。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代替小生产的历史必然性，美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和行会手工业。他们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1897年8、9月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了《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列宁在这一著作中利用有关调查材料证明，手工业者已发生了非常明显的阶级分化，手工业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和不同发展阶段。

列宁的以上著作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他的理论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则最终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粉碎了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的争论作了科学的总结。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捍卫和发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1. 关于国内市场形成的原理。马克思虽曾在《资本论》中阐述过这一原理，但在列宁以前，还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作过专门研究。列宁根据俄国具体情况，全面、详细地论证了国内市场形成的理论。2. 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列宁驳斥了抹煞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及民粹派把这种矛盾歪曲为产品价值不能实现的谬论，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他把这些矛盾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深刻揭露了再生产矛盾的根源及实现再生产的矛盾过程。3. 关于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马克思没有专门考察小商品生产者在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资本主义分化，他所着重指出的是资本原始积累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夺。列宁则全面地分析了小商品生产分化为资本主义的道路。4. 列宁详尽地论证了俄国地主经济演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多种形式，从而阐明了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的规律。此外，在工场手工业的形成途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以及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集中化、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贫困化、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上，列宁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实践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纲领和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它科学地分析了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深刻论述了俄国村社经济结构的性质。它证明，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它阐明了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农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具有很强的革

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小资产阶级性，有业主倾向。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它为工农联盟思想和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提供了全面和深刻的经济理论根据。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列宁在1895年底至1899年1月写成的。为了撰写这一著作，他考察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不过，列宁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突出的功绩，更根本的原因是他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原理和方法，正如列宁自己说的，就是“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①学习和研究列宁的哲学思想，当然不能忽略他在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运用的唯物主义方法。

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是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结构，而是经济结构决定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列宁把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

如何看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和民粹派在哲学方法上的首要分歧，就表现在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出发还是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出发。列宁指出，民粹派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建筑在纯粹的虚构上面。他们没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事实。在他们看来，仿佛社会经济制度可以按照某群人物（“知识分子”或“政府”）的意志而建立或消灭。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32页。

此，他们才提出资本主义是否“能够”发展，俄国是否“应当”经历资本主义，村社是否“应该”保存等等问题。和民粹派相反，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所根据的是现代俄国经济现实中的种种事实。他把问题从“可能”和“应当”这种毫无裨益的臆测中移到现实的基础上来，移到研究和解释俄国经济制度怎样形成、为什么正是这样形成而不是那样形成的基础上来。

列宁在揭露民粹派和西斯蒙第的思想渊源的关系时，批判了他们在哲学观点上的唯心主义实质。列宁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和幼稚的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唯心主义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①。西斯蒙第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科学要诉诸“良心”。他责备李嘉图，不是责备李嘉图的分析没有涉及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责备李嘉图的分析是客观的，说李嘉图“把人遗忘了”。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们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②。因此，列宁强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驳斥民粹派对俄国资本主义演进的态度及其议论时，必须“驳斥他们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③。

关于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西斯蒙第的理解也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英国的“一切灾难只是产生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政府实行了“错误的政策”。“如果政府对致富的欲望加以调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比仁慈的政府”^④。民粹派和西斯蒙第完全一样，二者都同样忽略实际的经济的发展，而是呼吁政府的干预，“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破坏”。

在“村社”土地所有制同俄国资本主义客观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也暴露了民粹派观点的唯心主义性质。他们顽固地坚持

①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00、420页。

②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75、203页。

“村社”原则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相容，把村社土地占有制这种法律制度看成是从根本上决定经济发展的东西。列宁在阐发这个问题时证明，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可能遇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些前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都不会最终阻止资本主义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因为土地所有制作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对社会的发展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客观经济的发展。农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并不一定必须有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土地所有制。相反，在它产生的最初一段时间往往会遇到同它自身不相适应的土地制度，只是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同它相适应的土地制度才会被创造出来。

列宁在1894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明确指出，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唯一科学方法”，只有以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作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才是合乎科学要求的理论。他要求俄国的先进分子遵循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寻求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问题的答案。他说：“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才能指望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①

列宁自己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是贯彻唯物主义方法的典范。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利用俄国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水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60—261页。

和生活情况的大量资料，全面地说明了改革后俄国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列宁得出结论说，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农民中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表明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与经济竞争，表明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并受到商业资本的剥削。租地、买地、改进农业技术等现象都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形态。这说明村社中的经济关系结构不是特殊的结构，而是普通的小资产阶级结构。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最牢固的基础。

列宁并没有限于仅仅从理论上指出由于小生产者的分化必然要在俄国农村生长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进一步利用了俄国地方自治局的大量调查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独立的整理和计算，从而具体详尽地说明了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例如，雇佣劳动的使用是农业资本主义形成的证明。列宁利用地方自治局的材料，说明了农业雇佣工人移入和移出的主要地区及流动的规律。列宁引用统计材料说，在欧俄19个省中的148个县的剩余劳动力中，外出从事农业雇佣劳动者在黑土地带约占25%，非黑土地带约占10%，如按这个比例计算，在整个欧俄地区大约有350万农业雇佣工人，占整个男劳动力的20%。这些外出作工的农民主要是到富农和地主那里作雇工。这里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和俄国农村的第一批企业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彼此依赖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列宁在研究俄国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和基本特点时，以地主恩格尔加尔特的实际经营史作为典型，说明了地主经济通过自身内部的改革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必然性。

列宁在论述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问题时，并不仅仅限于运用马克思关于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论，而是以确凿的事实研究了包买主在俄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个体的小手工业者在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下如何

破产并沦为无产者，而积累在包买主手中的金钱如何变成了资本；包买主是如何逐步奴役大批小手工业者，如何组织起以个体小手工业及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大的资本主义手工业生产，大包买主如何在竞争中提高技术，直至建立起大机器生产，并且最终自己也变成为工业资本家。

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中，民粹派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合理、是否“应该”的主观愿望出发，形形色色的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的人，则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拒绝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关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列宁特别声明，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证，“宁肯被人指责为叙述枯燥，也不愿使读者认为我的观点是根据对《资本论》的‘引证’，而不是根据对俄国资料的研究。”^①

列宁还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揭露了民粹派观点的阶级根源。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人们的理论和观点反映一定社会的物质利益，反映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列宁引用了马克思的如下观点：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②。对于俄国民粹派，根据他们把小生产理想化和攻击大资本，不了解小生产和大资本之间的联系，没有看见他们所偏爱的小生产者即农民实际上正在成长为小资产者，所以列宁把他们评定为小资产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三、贯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

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创造性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90页。

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是他始终贯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俄国民粹派不理解这一思想，他们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没有根基的，把小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对立起来，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列宁详尽地考察了俄国小生产方式逐步演进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历史过程，不仅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而且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

列宁在驳斥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时指出了他们在哲学方法上的错误。民粹派从来没有说明俄国资本主义从何产生，如何产生。在他们看来，好像资本家是从外面什么地方来的，而不是就从那些“直接生产者”当中来的。列宁为了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离开俄罗斯民族整个历史生活的道路，而是俄国多年来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而是这个过程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来界定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发展。他说：“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的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①第一个转化是由于出现了社会分工，这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第二个转化是由于个别生产者在各自单独为市场生产商品时，发生的一种竞争关系。结果必然是少数人发财而大众破产，使独立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许多小企业变为少数大企业。

按照上述观点，列宁把俄国村社经济体系中生产者渐次发生的变化列成图表，来说明自然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纯粹是一种自然经济，产品根本不进入市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72—73页。

第二阶段，出现分工，社会总产品有 $1/9$ 进入市场。第三阶段，分工继续发展，引起市场的扩大，社会总产品有 $1/3$ 进入市场。第四阶段已是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生分化。手艺较好，精明强干的生产者更为强大，弱的、手艺差的生产者垮台。第五阶段，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也扩展到农业生产部门。第六阶段，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完成，雇佣工人完全失去独立经济而专靠从事雇佣劳动过活。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进一步全面地、详尽地阐明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从三个方面阐明了这一过程。

1. 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列宁根据俄国的统计资料，从商品流通、工商业人口、雇佣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等方面，说明了俄国当时国内市场形成的实际自然历史过程。俄国有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列宁揭露了民粹派否定国内市场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即他们离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问题。列宁指出，市场同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是完全不可分开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的关键。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建立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因此，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是错误的。

2. 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列宁详尽论述了农民的分化和地主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还专门论述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指出，俄国改革后农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农业愈来愈带有商业性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进一步确立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内

市场。

俄国民粹派和西斯蒙第一样，他们把小生产理想化而攻击大资本。列宁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揭露了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错误。列宁说，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臆想出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小经济，而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这种小经济实际上是处于商品生产的环境中，——无论19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的小经济，或者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农民经济，都是这样。因此，被浪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捧上天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是小资产者**，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也处在同样的矛盾关系中，同样用斗争来捍卫自己，这种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分离出少数大资产者，另一方面则把大多数人赶入无产阶级的队伍。”^①列宁阐明，只要看看现实情况，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活生生的有机过程，即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增长的过程。农村中的“非农民化”是这个过程的开端，它的萌芽，它的早期阶段；城市中的大资本主义是这个过程的结尾和它的趋向。民粹派把这个过程的两个现象分割开来，把它们看成孤立的互不依赖的东西是完全错误的。

3. 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列宁根据马克思划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阶段的原理，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三个基本阶段，依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揭示了这三种工业形式的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和继承性。民粹派把资本主义工业的范围仅限于大机器工业（工厂），把工厂以外的其它形式资本主义工业统统美化为“人民工业”，不仅否定它们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而且看作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列宁虽然把论述的重点放在大机器工业阶段，但同时详细分析了大机器工业前的各个阶段，有力地论证了它们历史地、逻辑地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必然性，揭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89页。

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由于列宁把资本主义的发展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发展中来考察和评价，因而科学地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进步性和历史暂时性。资本主义的进步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列宁在总结资本主义在俄国经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时，强调指出，“承认这种作用的进步性，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和黑暗面，与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所必然具有的那些揭示这一经济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矛盾，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叙述事实的每一阶段上都力求详细指明这一点）。正是民粹派竭尽全力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正是他们犯了过低估计（有时是抹杀）俄国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的毛病”^①。与民粹派相反，列宁深刻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是在全面的、内在的矛盾中发生发展的，从而阐明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法则。

四、阐明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

列宁在批判民粹派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还阐明了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最深刻的根源的思想。民粹派极力隐讳矛盾，试图调和矛盾，他们以为包含着矛盾的东西是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在他们看来，事物发展的基本根源在于“有批判头脑的个人”的信念。列宁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用事物发展的矛盾法则为理论武器，深刻揭示了客观经济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内部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正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对于俄国村社农民的情况，民粹派从抹煞矛盾的观点出发，把村社农民看成一个本身没有差别的整体。他们在利用有关农民占有土地、农具、牲畜等等情况的统计资料时，往往把这些数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548—549页。

平均化。他们在谈到村社农民的贫穷和破产时，掩盖村社农民的分化。列宁在分析研究农村情况时，反复指出把有关农村的统计资料平均化是不科学的。他总是具体分析村社农民的情况和过程。列宁指出，俄国村社农民中所发生的并不是一般的贫穷化和破产的过程，而是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过程。拿种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大批地抛弃土地，丧失经济独立性，变成无产者；另一方面，农民不断扩大耕地并采用改良的耕作法。一方面农民丧失农具和役畜；另一方面，农民购置改良农具，开始购买机器等等。一方面，农民抛弃土地，出卖和出租份地；另一方面，农民租进份地并贪婪地购买私有主土地。这一切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俄国村社农民也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再拿手工业者来说，在改革后时代，不仅有新的行业产生出来，旧的行业获得更快的发展，而且大批手工业者愈来愈穷，陷入赤贫境地，丧失了经济独立性，而极少数则靠牺牲这些群众而富有起来，积累巨额资本，变成包买主，包揽销路，并终于在俄国绝大多数手工业中组织起完全资本主义式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总之，列宁指出，在俄国小生产中存在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已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同任何事物一样，它本身就是矛盾，它正是在矛盾中产生和发展的。列宁依据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分析和揭示了它的客观内在矛盾，从而科学地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进步性，并从其内部矛盾中阐明了摆脱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

俄国民粹派不能正确认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根源就是他们不理解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不理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在这方面，俄国民粹派的观点和西欧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观点一模一样。列宁在揭露民粹派观点和西斯蒙第学说的关系时，批判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歪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刻

揭示。

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体现。西斯蒙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他的功绩。但是，列宁指出，他不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部矛盾来解释危机，而是用生产之外的生产和工人阶级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的理论完全承认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即消费不足的事实，但把这个事实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他指出这个事实不能解释危机，因为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这两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释在哲学上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马克思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特殊性来解释危机的。列宁指出，“消费不足（似乎这能解释危机）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中都存在，而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①其次，如果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就会把希望建立在恢复比例、消灭矛盾上，就会认为资本主义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而要去寻找“另外的道路”。如果从这个矛盾中引出危机，就一定会认为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矛盾也就愈困难。相反，如果用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危机，就会承认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和进步性，并指责寻找“另外的道路”是荒唐的。从而也就承认，这个矛盾愈向前发展，摆脱这个矛盾就愈容易，而出路正在于这种制度的发展。列宁着重阐明，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源。通过比例失调、危机等等而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发展。“根据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在现代社会中，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84页。

列宁还专门论述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发展造成过剩人口的矛盾。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点。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发展造成了过剩人口，指出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指出这一矛盾是他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但是，西斯蒙第不打算科学地分析这个矛盾，不打算考察它是怎样在该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它会引起什么结果等等。他只是用小资产阶级的道德代替分析，只是从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矛盾的抽象理想社会出发，把这个矛盾用作自己痛恨这种矛盾的材料，只有一些怨言、牢骚和天真的愿望。民粹派也一样只限于确认人口过剩这个事实，也只是利用这个事实来埋怨和控诉资本主义。

列宁阐明了马克思和西斯蒙第对待这个矛盾的根本区别。列宁指出，马克思对这一矛盾作了科学分析。这个分析证明，过剩人口毫无疑问是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这部机器的必要组成部分。大工业愈发展，对工人需求的波动就愈大。而波动的情况如何，则要看整个国民生产或其每个部门是处于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而定。这种波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随时都能给任何工业部门或任何企业提供劳动力的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在西斯蒙第和民粹派看来，过剩人口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其实恰好相反，过剩人口是过剩生产的必然补充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附属品，没有它，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

列宁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在过剩人口问题上的矛盾之后，指出资本主义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律，说明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列宁说：资本主义过剩人口的矛盾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矛盾不等于不可能……资本主义积累这个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也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成为一定的经济制度的规律。资本主义的

其它一切矛盾也是这样。”^①

第三节 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 捍卫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民粹派的俄国社会发展“独特”论，二是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时，直接捍卫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列宁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直接论述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的主要领域。他在1894年春夏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的第一编中，集中剖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领袖米海洛夫斯基的哲学社会学观点。此外，列宁在1894年底至1895年初所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7年底所写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中，也驳斥了民粹派的歪曲和攻击，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一、驳斥民粹派，论证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形态理论的哲学意义

19世纪90年代，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时，采用一种狡猾的手法。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伯恩斯坦声称：“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②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采取了类似的手法。

米海洛夫斯基公开宣扬历史唯心主义的主观社会学，极力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51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版，第255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在70年代曾发表文章热烈祝贺《资本论》俄文版的出版。他还发表文章驳斥茹科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攻击，说《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经济规律。他也试图用《资本论》来证明，野蛮的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不适用于俄国，俄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走另一条道路。此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进步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和享有崇高声誉。因此，当他90年代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采取否定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手法。他在《俄国财富》上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在概述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后，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接着他攻击《资本论》似乎仅仅只是狭隘的“经济理论”。于是他得出结论：“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①他甚至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②，也是可以完全回避的。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首先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种狡猾的攻击，从而也驳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同样的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给予当时那种企图以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逆流以有力的打击。这是列宁早期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列宁怎样驳斥米海洛夫斯基，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叙述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著作呢？列宁首先阐明，《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然后，列宁从三个方面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的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就是社会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它是与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根本对立的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3、118页。

第一，马克思得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同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活动的（结果）形式。”^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种方法就把物质决定意识的这个一般的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指出了社会历史领域里面什么是物质的东西，什么是精神的东西，什么是客观的东西，什么是主观的东西，什么是本原的东西，什么是派生的东西，什么是第一性的东西，什么是第二性的东西。前者是社会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后者是社会的思想关系，即上层建筑。这就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前，社会学家不善于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一切历史观察证明，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人们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就是如此。因此，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它从物质的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从思想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基础，才能科学地如实地阐明历史。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7、120—121页。

列宁指出，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主观社会学。因为主观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也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他们不是从社会的物质关系而是从社会的思想关系来“阐明”历史。他们的论据是：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根本谈不上什么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①社会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因此，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社会历史之所以会有不合乎心愿的事物，那是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和“缺陷”。米海洛夫斯基公开声称：“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主观社会学方法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米海洛夫斯基从“人的本性”来评判社会历史的观点，不过是对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拙劣模仿。从前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未来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则不然，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言。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从而指明了这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7页。

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是由于他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现代社会关系，从而说明了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剥削的必然性及其发展规律。

第二，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仅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贯彻物质关系决定思想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解决了社会的发展有没有规律性的问题。列宁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①

列宁这里说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出现的东西，也就是指不同国家的历史所具有的共同性、普遍性，即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共同的规律性。列宁在这里强调，只有概括出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科学概念，才能使社会历史的研究由单纯的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转变为科学的分析。例如，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找出它们的共同性，便能发现其重复性和常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09—110页。

规性，就能指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性。因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把生产关系从所有社会关系中划分出来，并把它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就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使人们有可能把社会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本质的、必然的东西和非本质的、偶然的東西区别开来。一旦抓住了那些主要的、本质和必然的东西，就能弄清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重复性和常规性，即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也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

第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包含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列宁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①

如果仅仅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那只是揭示了生产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只是揭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但还不能说明生产关系本身是由什么决定的，它的变化和发展的根源是什么。生产关系诚然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物质的社会关系，但它还不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原因。列宁认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原因是生产力。他在同一时期即1895年9月所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们的意向、观念和法律。”^②这就是说，只有不仅用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物质关系去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而且用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去说明社会的物质关系，才能彻底揭示社会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6页。

史发展的物质原因，才能说明，社会历史同自然现象一样，也是由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原因决定的，只有这样，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从以上三个方面，既深刻论证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就是唯物主义的史观，也深刻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虽然列宁当时不过24岁，但他的这一论述的确深刻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他的这一论述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宝库中的经典表述。当时，在批判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方面，总的说来，普列汉诺夫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列宁。但在发挥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方面，普列汉诺夫却没有什么建树。普列汉诺夫在与列宁这一论述差不多同一时期写成的重要哲学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不约而同地引用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资本论》不是唯物史观著作的同一谬论。可是，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却主要说明，《资本论》说到“价值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是他的历史理论^①。显然，这与列宁的论证相比就逊色多了。

列宁在论证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就是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又进一步驳斥米海洛夫斯基，阐明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列宁说，马克思“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卷，第750页。

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列宁同时接着指出，虽然马克思“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因此，与米海洛夫斯基的攻击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因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①

列宁接着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所阐明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证明。米海洛夫斯基攻击“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列宁驳斥道：“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②“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的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③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10—112页、112页、115页。

二、驳斥民粹派，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

列宁在论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哲学意义时，深刻论证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决定社会的思想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指出，像马克思那样，把这种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就是“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①无论是米海洛夫斯基之流的主观社会学家“从某种空想开始”，从“人的本性”出发，还是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在着手研究事实之前，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的一般理论，都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方法是很荒谬的”^②。

此外，列宁在驳斥民粹派时，还捍卫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俄国民粹派和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者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似乎它是一种把经济因素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的机械的、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列宁驳斥米海洛夫斯基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③。他们在任何著作中也没有把它叫做“经济唯物主义”。米海洛夫斯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硬说它荒谬到不愿考虑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列宁驳斥道：“其实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④

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普列汉诺夫在《论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14—116页、11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2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1页。

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中,都批判了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企图。列宁在这里的批判不及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全面和详尽,但也表明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企图,并独立地作出了最初的批判。7年之后,即1901年春天,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就详尽地阐明了政治、理论、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的能动作用。

米海洛夫斯基还歪曲攻击历史唯物主义,说它的历史必然性思想就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据米海洛夫斯基说,从历史必然性思想得出结论: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自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

列宁概括了当时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心主义者在这方面的争论,指出,把决定论同道德观念,把历史必然性同个人作用完全对立起来,正是主观哲学家喜爱的一件法宝,以便通过这个对立的解决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否定个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列宁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他说:“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摒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①

主观社会学家们在谈到“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的冲突”时,总把历史是由“进行斗争的单独的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放在第一位。米海洛夫斯基说得更明白:“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29页。

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列宁指出：“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①。主观社会学家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前人创造的既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创造着历史。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必然要受到既定的历史条件制约。同时，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个人的活动只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重大的成果。因此，在评价个人的活动时发生的真正的问题是：要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有什么东西能保证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的群众行动的汪洋大海之中。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个人创造活动的同时，又强调这一创造活动是受历史必然性制约的，或者说是在承认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主观社会学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忘记了人”。而历史是由“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创造的。因此，他们是把“活的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它们才是实在论者。列宁从社会学方法的角度比较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驳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

列宁揭露了主观社会学方法的荒谬性。他们的议论似乎是从“活的个人”开始，强调一切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但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研究的个人同具体社会环境隔离开，因而他们就不能研究真实的个人及其思想和感情，而只能把主观社会学家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安在这些个人身上。因此，他们研究的个人实际上是一些没有思想和感情的木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60页。

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从而也就是研究真实的个人，因为这些关系是由个人的活动组成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者在研究实际的社会关系及其实际的发展时，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活动的产物，也正是研究活的个人怎样创造了和继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因此，他所研究的是真正的“活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思想和感情，即个人的已经表现为行动，已经造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思想和感情”。

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使社会科学取得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①。它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把极为多样的个人的活动归结为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个人的方法概括为“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这是列宁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列宁驳斥道，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列宁阐明，理论符合现实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唯一标准；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是它的根本出发点。列宁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是一种超出了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根据理论符合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这一点，而是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的，而且他们也不能根据别的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自己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并且以此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72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列宁以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证为例，指出，他不是靠马克思的任何威望，不是靠什么抽象公式，而是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演进。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①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民粹派时，也不是依靠什么抽象的历史公式。如果“只是把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对照，那就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方法”^②。而是必须把他们的思想和现实的俄国社会经济关系加以对照，指明他们的思想在俄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揭露他们的思想和纲领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

列宁从他的早期革命活动开始就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1899年，他在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在驳斥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教条”时，就写了一段有名的话：“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③

俄国民粹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优秀的传统，拒绝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遗产”。^④列宁于1897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63—164页、20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1页。

年底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写了《我们拒绝什么遗产》一文，驳斥了民粹派的歪曲和攻击。这篇文章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思想派别的杰出典范。它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启蒙派、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三者的观点作了分析对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优秀文化遗产的态度，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的原理。

列宁指出，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社会的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这是启蒙者从根本上优于民粹派的地方。但是，启蒙者看不见社会发展所固有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如民粹派。他们一般地谈论人民，而看不见人民中的阶级区分。他们根本没有提出俄国改革后社会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发展扫清道路。

民粹派与启蒙者不同的是，它在俄国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虽然是错误的解答，但这就把问题提到了社会思想界面前，因而是民粹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可是，民粹派分子对资本主义矛盾问题的解答是错误的，它的根据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理论，因而它的解答就成了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他们害怕当前社会的发展，竭力阻止这个发展，竭力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而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对遗产必然持矛盾的态度。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启蒙者一样，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们从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观点出发来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矛盾的问题，并且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他们不仅以劳动者的利益为标准，而且以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标准，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对这个遗产

作了补充。列宁作出结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比民粹派分子彻底得多、忠实得多的遗产保存者**。他们不仅不拒绝遗产，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驳斥那些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顾虑，这些顾虑使民粹派分子在很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拒绝接受启蒙者的欧洲理想。”列宁接着进一步指出：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①，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分析批判，使其优秀部分得到发扬。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之外产生的，而是人类各种先进思想发展的继续，是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之集大成。

列宁的论述阐明，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而社会意识遗产的继承归根到底受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制约。任何社会思想意识对文化遗产的继承都不会无条件地像档案保管员保存旧文件那样，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是经过加工改造予以吸取。怎样加工改造，摒弃哪些，发展哪些，这在根本上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现实情况和需要以及思想家们的社会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三、驳斥民粹派，初步阐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列宁在驳斥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和攻击时，还对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作了初步阐述。他主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二个特征：其一，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其二，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即它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

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根据主观社会学来研究和寻找俄国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还是一种纯粹形而上学的方法。他把社会关系看作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简单的机械组合，看作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联结。例如，他从中世纪形式中抽出土地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17页。

于耕作者的现象，而从资本主义中抽出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然后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臆造了一个乌托邦。他以为从一种形式中抽出某种现象，可以随意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的形式中去，就像一所房子上的砖可以砌到另一所房子上一样。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法，不知道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只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他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因而歪曲了这种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过是地主奴役农民的手段。他指出了多数人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总之，他不是去分析说明一定的社会形态，而是从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毫无意思地抽出个别要素。因此，建立在这种形而上学方法上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的社会演进相脱离。

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的形而上学方法，青年列宁第一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① 列宁关于社会是活的机体的论断，是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发展。马克思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列宁在阐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比做“活的机体”。这一提法形象生动地说明了社会和自然一样的唯物辩证性质。同时列宁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论述又清楚地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有机论”划清了界限。斯宾塞把社会矛盾等同于生物机体的矛盾，把社会阶级关系等同于生物各器官的分工，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辩护。列宁把社会基本矛盾看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6页。

盾。社会有机体的“骨骼”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包裹着社会有机体骨骼的“血肉”是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因此，运用辩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就是要通过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揭示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从而把社会看做是在一定条件下，由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和要素有机结合起来的整体。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它们都是客观的、有规律地变化和发展着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主义时，诬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部学说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纯粹是被辩证地提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来说，纯粹是维系在黑格尔三项式链条的最末一环上的。”^①总之。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在社会学中的辩证方法，看成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

列宁指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同起来，攻击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这种责难已被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得够滥的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攻击并没有什么新奇。列宁从几个方面驳斥了这种攻击，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

首先，列宁引用马克思自己的声明，说明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那里，观念的发展决定现实的发展。因此，只有在黑格尔那里，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在马克思看来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的东西的反映”。列宁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重心不在专门的哲学方面，但他也很注意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7—138页。

性质。他在一年之后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写道：“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与黑格尔和其它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①

第二，列宁指出，说马克思“借”黑格尔三段式来进行论证，是米海洛夫斯基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去的。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述过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等著作，都根本没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演进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实际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

第三，列宁指出，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因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驳，完全适用于米海洛夫斯基。

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反驳。杜林攻击马克思，似乎他如果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无法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性。恩格斯的驳斥说明，马克思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分析，依据对资本主义现实过程的研究，才得出自己的结论。马克思只是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5—6页。

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①列宁指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样断言马克思把未来纯粹维系在黑格尔链条的最末一环上。而恩格斯的反驳说明，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

列宁在这里对米海洛夫斯基的驳斥是十分有力的。他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他强调辩证法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不是单纯辩证公式的逻辑推演，而是依据于对事实的唯物主义分析。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24岁的列宁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时对哲学的专门研究还是不够的。他对黑格尔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关系，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内容，还缺乏全面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在这里，主要表现在列宁对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黑格尔那里是以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表现出来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还没有看到它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

列宁引用恩格斯驳斥杜林的好几段论述，但只引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不是以否定的否定来证明历史过程为止。恩格斯接着列举各方面的事例，并得出结论，否定的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②。列宁对此没有理会。这个遗漏不是偶然的。

列宁在读了恩格斯列举的大量“辩证”过程的例子之后，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得出否定的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发展规律的结论。反而写道：“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①

那么，恩格斯列举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列宁接着作了如下回答：“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唯物主义者任务是正确地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既然已经断然声明，用三段式‘证明’任何事物都是荒谬的，说谁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辩证’过程的例子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这不过是表露了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②

列宁在这里强调恩格斯立论的重心是正确的。但他还不理解：辩证法规律虽不是证明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据，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因而他认为，坚持辩证法，选择例子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基本内容。

列宁的另一论述同样表明，他没有把“三段式的辩证规律”看成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看成盖子与杯子的关系，认为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只能起着使庸人们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的作用。^③关于盖子与杯子的比喻，本是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时提出的。他说，马克思理论的实际内容是杯子，辩证公式是盖子。从内容上去掉这个公式，“就像从杯子上去掉盖子一样，并不会改变什么。”^④列宁没有驳斥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和辩证法规律的错误比喻，而是驳斥他只“和这个并不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

此外，列宁还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等著作关于辩证法的定义和叙述，都“根本没有说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3—134页。

③ 同上书，第137页。

④ 同上书，第134页。

到黑格尔的三段式”^①。总之，列宁的确这时还没有认识到，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三段式表现出来的否定的否定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阐明了的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一。它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内容，而不是可以去掉的盖子或外壳，它是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容之一，而不只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

看来，列宁这时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念论和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的思想，尚未作出明确的区分，因而列宁也还不十分明确，马克思在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论的同时，又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发展过程的思想。从列宁对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跋中一段著名论述的不确切转述，可以看出这一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说，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截然相反”。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显然，马克思这里说明，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截然相反”的地方，是在对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思维过程与现实事物，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个问题的回答“截然相反”。在这里，“截然相反”的地方不包括“三段式的辩证规律”。所以马克思在下一段明确说：虽然“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③可见，在包括“三段式的辩证规律”的“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并不是“截然相反”的。

列宁对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却作了这样的转述：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来，观念的发展，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决定现实的发展。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①在这里，列宁把马克思说的与黑格尔辩证方法“截然相反”的地方，加上了黑格尔的“按照三段式的辩证规律”而辩证发展的观点。因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三段式的辩证规律”。“三段式”、“辩证过程”都仅仅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念。

以上这些，都是列宁在1894年春夏时期的哲学思想状况。1895年，列宁在第一次出国时期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并作了摘要。他仔细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认识又有了质的升华。因而他在1895年9月之后所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明确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②。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无疑包括“三段式的辩证规律”的思想。

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专门谈到党内斗争的辩证法。他用黑格尔三段式的术语“正题”、“反题”、“合题”来叙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党的组织和思想问题上的斗争过程，并且作出结论：“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③

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把“否定的否定”列入马克思辩证法的内容之中。而在后来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学说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吸取了其中的合理因素。他不仅明确肯定否定之否定是客观事物发展本身所固有的规律，而且对这个规律的一般性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12页。

第四节 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派， 阐明和发展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列宁一方面批判了俄国民粹派，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批判了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论证了俄国革命的策略路线。俄国民粹派是小生产方式、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从小生产者的主观愿望出发，提出了避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则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美化俄国资本主义，维护资产阶级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继续，是资产阶级影响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映，“‘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①。

在哲学理论方面，民粹派鼓吹主观社会学，因此，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强调经济关系、物质关系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强调理论要符合现实，也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方面。“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则鼓吹客观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因此，列宁对他们的批判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强调阐明了政治上层建筑、革命理论、政党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方面。

一、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阶级性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04页。

反对民粹主义斗争中的同路人。当时，在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己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服务，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们最满意的是对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为进步的有理有据的论证。于是他们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合法的即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报刊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别尔加也夫等。由于他们毕竟进行反对民粹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斗争，因此列宁曾同他们结成暂时的联盟。但他们批判民粹派，承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从中作出革命的结论，而是为了绝对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同民粹派决裂，就是从小市民社会主义（或者说农民社会主义）转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①。因此，列宁在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民粹派时，时刻没有忘记批判他们的自由资产阶级观点。

早在1894年秋，列宁就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争论。1895年，列宁“就指出司徒卢威先生是一个不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他划清界限。”^② 这年4月，列宁发表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后来又撰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1898年）、《非批判的批判》（1900年）等著作，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在哲学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内容，打着“客观主义”的旗号，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带有庸俗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同伯恩施坦等人一样，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89、92页。

否认马克思主义包含“有根据的哲学”，力图证明康德的“批判的唯心主义”同唯物史观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因此，他们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列宁对这种以“新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企图十分愤懑。还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他就团结了周围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展了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对新康德主义的态度使他感到生气。他在1898年9月2日致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普列汉诺夫“过去不在俄国书刊中反对新康德主义，现在也不坚决反对它，却容许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去争论这种哲学的枝节问题，似乎这种哲学已成为俄国学生们的观点的一部分了。”^①1899年，列宁在看了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之后，对他们宣扬的新康德主义，“愈来愈感到愤怒，”并且“发现的确须要认真地对待新康德主义”^②。列宁在3月写了《再论实现论问题》一文，回击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列宁指出司徒卢威歪曲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的先期成果。”司徒卢威“重复着自己的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③

列宁当时曾系统研究新康德主义著作和哲学史，有意撰写批判新康德主义的专门哲学著作，但列宁当时“意识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没有多多学习以前，“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7页、第30～3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7页。

章。”^①后来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完成了这个任务。当时，列宁主要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立场。

列宁在《再论实现论问题》及《市场问题述评》等文章中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否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立场。列宁指出，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歪曲为按比例分配的理论，实际上抹杀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内部的固有矛盾。无限扩大生产的意图和必然的有限的消费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本性一方面要求无限地扩大生产消费，无限地扩大积累和生产，而另一方面则使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化，把个人消费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民粹派等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小生产的破产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造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因此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一般地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认为两者是完全协调的，危机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生产和消费是有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必须跟着生产走。既然生产力要求生产无限增长，而消费又由于人民群众的无产状况而缩减，这里就一定会产生矛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而指出这些矛盾，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看到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形式的条件和原因。”^②

列宁还通过批判“合法马克思主义”所标榜的客观主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它的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45页。

级性，它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显著特征。

1894年，司徒卢威发表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该书主要从经济上批判了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司徒卢威根据新康德主义先验论的观点，把资本主义抽象地描述为以私有者的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经过辩证的发展走向社会化的过程，把它归结为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生产资料，解决人口过剩的矛盾的社会化过程，而完全撇开剩余价值、危机等表现资本主义阶级对抗的东西，根本抹煞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列宁把这种拒绝对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片面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观点，从哲学上概括为客观主义和狭隘客观主义。列宁说：司徒卢威的“论断的基本特点是他的狭隘客观主义：只证明过程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性，而不尽力揭示这一过程在每个具体阶段上所具有的阶级对抗形式；只是说明一般过程，而不去说明各个对抗阶级，虽然过程就是由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形成的。”^①

司徒卢威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时，强调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他认为这种历史趋势不仅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活动的出发点、而且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列宁指出：“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②列宁进而将客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作了对比，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列宁说：“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矛盾，从而确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58页。

② 同上书，第362页。

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

列宁这段话及当时的有关论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点。

1.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彻底贯彻阶级斗争理论。司徒卢威谈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但他始终停留在一般抽象原理的高空。他重复了米海洛夫斯基的主要错误，即抽象地泛谈一般“进步”，而不去研究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进步，司徒卢威没有把阶级斗争坚持到底。列宁认为，这就是没有完全贯彻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总是具体分析一定的社会形态及其对抗关系，揭露阶级矛盾。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唯物主义指明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指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指明构成这种必然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为了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说明，无产阶级只有自己起来斗争才有出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62—363页。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同科学性是一致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标榜“客观主义”，但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当作全民的利益，把资本主义的存在当作一种永恒的现象，拒绝对历史过程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否定了历史过程发展的客观内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仅指明了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这才能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是更深刻、更彻底、更全面的客观主义。因此，它的阶级性同科学性是一致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他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了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同时，这一理论“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

4. 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攻击马克思的学说带有“论战性”、“倾向性”。他们摆出一副似乎不偏不倚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超然态度。列宁揭露了这种貌似公允的客观主义的荒谬可笑面目。列宁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活动家分析了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那么凭着什么奇迹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呢？既然他弄清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还在这里说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01页。

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1905年，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文中，彻底揭露了无党性的标榜者的虚伪面目。列宁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党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卫道士的必然特征。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谁就不能不倾向于无党性的思想，就是对各阶级各政党的工作漠不关心，就是支持统治者，在现代的欧洲就是支持资产阶级。“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因此，“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①

二、批判经济派的庸俗经济决定论，阐明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经济派是19世纪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列宁从经济派出现之时起，就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99年初，列宁从彼得堡出狱流放西伯利亚之前，就在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者会议上同刚出现的经济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批评了经济主义的策略。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看到经济主义者的宣言《信条》之后，立即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接着，列宁又为批判经济派撰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27—128页。

了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在1901年秋至1902年2月，列宁写了《怎么办》一书，从政治上、理论上对经济派进行了系统的清算。

俄国经济派机会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1900——1903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在俄国，经济危机使一切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工业停滞，经济萧条，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资本加速集中，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因严重歉收而饥寒交迫。人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沙皇政府日益加强的警察迫害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懑和反抗。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专制统治的运动也活跃起来。俄国革命的高潮日益临近。但在俄国革命工人运动内部，从19世纪末起，以列宁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领导者相继被捕和流放。一些工人运动的新的领导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修养。他们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搞不清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因素和自觉因素的相互关系，不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他们不能抵制而是追随当时在第二国际中泛滥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策略路线。因此，他们局限于组织一些工人基金会和狭隘的工人职业团体，力图用改善工人福利待遇的局部的经济罢工和经济斗争取代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主张让自由资产阶级去包办政治活动。他们赞美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活动状况，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承袭伯恩斯坦的手法，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极力贬低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

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之流的机会主义一样，他们在理论上也必然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关系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原理，歪曲成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否定政治上层建筑、政党、革命理论等因素的能动作用。同时他们又把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搬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斗争

形式和策略的关系中来，割裂各种同样受阶级利益所决定和制约的斗争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把经济斗争这种形式看作是决定其它斗争形式的东西。例如，经济主义者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工人事业》杂志上发表了《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他写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着首要的意义。”^①因此，经济派鼓吹，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对每一个卢布工资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贵。”他们认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他们甚至说，政治斗争的“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

列宁驳斥了克里切夫斯基的歪曲，指出，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不能推论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有着首要的意义”的结论。前者是整个社会关系中何者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后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式中经济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等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列宁说，克里切夫斯基在这里从前者推论出后者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列宁接着说：“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②

列宁在批判经济派崇拜自发性、崇拜争取改良的经济斗争时，论述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辩证关系；同时阐发了政治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批判了庸俗经济决定论，并且为“革命的根本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44—45页。

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提供了哲学论证。

列宁指出，历史经验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压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当工人没有自由，没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时，任何经济斗争都不可能使他们在经济上得到稳固可靠的改善，甚至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任何经济斗争。事实上，俄国工人每次为争取经济利益而举行的反对资本家的罢工都会引起军警对工人的袭击。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为政治斗争。至于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就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达到。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定经济斗争的意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和必要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驳斥了否认经济斗争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过了20年左右，当在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轻视经济斗争的意义的表现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就曾警告过，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列宁也肯定了俄国工人所进行的经济斗争的意义。它通过“传单”揭露了工人的贫困生活状况、沉重而艰苦的劳动以及无权的地位。这种揭露激发了所有的工人，甚至包括最落后的工人，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这种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是始终有意义的，它可以成为唤起阶级觉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起点。

列宁在肯定经济斗争的意义时，着重指出了经济斗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列宁指出，按照我们的习惯用词，所谓经济斗争全都是指“经济实践方面的斗争。”这种经济斗争本身其实还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只是工会、工团或工联的工作。这种经济斗争所能得到的成绩顶多不过是使出卖劳动力的人较为有利地出卖这种“商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也就是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但是，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

争的任务，不仅要争得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以经济斗争为限，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工作当作他们的主要活动。如果像经济派所鼓吹的那样，仅仅从事经济斗争，为了从事经济斗争而忘掉了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丢给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工人们就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因而也就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资产阶级的忠实拥护者经常试图组织纯经济性的工会来引诱工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主义。统治阶级总是极力设法假仁假义地施舍人民小恩小惠，目的就是使人们不去考虑自己毫无权利和受压迫的状况。经济派以经济斗争取代政治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迎合了资产阶级的需要。

列宁在说明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解放的决定作用时，还阐明了这里所说的政治斗争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批判了经济派所鼓吹的工联主义的政治。经济派声称，他们并不否认政治斗争，但是他们认为，不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做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政治斗争只是实现工人运动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即要求国家采取某些措施，以改善工人的地位，减轻他们的困苦，而不是彻底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

经济派还提出“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观点，就是要求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在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这是英国工联主义者一直在进行的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列宁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从来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并不仅仅局限于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是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并不只限于经济上的政治鼓动，他们的任务是要把工联主义的政治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斗争，利用经济斗争给予工人的初步政治意识，把工人提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的水平，通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

列宁在分析经济主义的政治观点时，还把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作了对比。列宁指出，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崇拜自发性，它们各自崇拜自发性的一个极端。经济派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主张让工人自己去“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恐怖派崇拜知识分子的最狂热的愤懑情绪的自发性，主张让知识分子靠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政治斗争，当然，他们所用的是恐怖手段。

列宁针对经济派的错误，着重阐明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统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事业的斗争中，过去和将来都存在着某个时候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问题。但是，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成统一的阶级斗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因此，社会民主党的座右铭，应当是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而且要帮助工人进行政治斗争，不仅要进行维护当前经济利益的鼓动，而且要进行一切反对政治压迫现象的鼓动。

列宁在1899年为《工人报》写的文章中就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①列宁在援引马克思的名言——“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之后又指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3页。

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①

三、阐明革命政党的重大历史作用

经济派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另一表现，是反对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轻视革命政党的作用。他们维护和赞美当时党内存在的涣散状态、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活动方式。他们认为，为了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完全不需要建立一个全俄统一的党，尤其反对建立一个全俄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组织，他们声称，要在俄国成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言论，是人云亦云，把他人的任务搬到俄国来。

列宁以1894年—1901年间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活动情况为例，分析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活动中存在的手工业方式的特点及危害。列宁指出它是一种病态，它领导不了不断发展的运动。手工业方式的工人小组根本不能胜任政治任务。因此，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克服分散落后、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政党。这个党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职业革命家组织，它是由人数不多的、经过考验、具有理论知识、富有斗争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人组成。他们是党的领导核心。另一部分是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既有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

列宁针对经济派轻视革命政党和轻视革命家组织的错误，阐明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因素的政党和革命家组织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才能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才能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只有在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和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6页。

大劳动群众的解放斗争才能从自发走向自觉，才能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达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的。如果工人运动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去从事烦琐的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尾巴，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第二、只有有了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革命者的一切力量统一起来，才能组织真正有力的阶级斗争。列宁指出，只有有了坚强的有组织的党，才能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持久和巩固；只有有了坚强的革命政党，才能率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去同阶级敌人作勇敢顽强的斗争，并在条件不具备时，又不致作轻率的进攻。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这种领导者组织并不因为自发性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失去重要性，恰恰相反，随着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

第三、关于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列宁针对当时俄国的历史情况，用一句名言来表达：“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①只有把少数革命家组织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同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整个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还没有获得有充分修养的、富有创造精神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在这样的时候，蛊惑人心提出拒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15—116页。

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煽动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破坏群众对领导者的信任，就会使工人运动失去坚定性和稳固性。自发运动的崇拜者极为轻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这正是现在的革命组织的缺点；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职业革命家，就需要建立牢固的、集中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

经济派指责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观点是“民意主义”。列宁指出：第一，他们把战斗组织看作是民意党人特有的东西，以为凡是主张建立反沙皇制度的战斗组织的思想就是“民意主义”。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都是错误的。民意党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建立战斗组织，而在于它没有正确的理论，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至于当前俄国自发工人运动的高涨，不是解除而是加强了革命家组织的责任。第二、他们把革命家组织的秘密性和密谋主义混同起来。我们始终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但决不是否认建立革命家组织的必要性。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秘密性对革命组织是绝对必需的，但它与密谋主义截然不同。

经济派还指责建立革命家组织的观点同“民主原则”相抵触。列宁指出，在当前俄国条件下，实行完全公开选举的民主原则是行不通的空话，这只能给警察提供破坏革命组织的机会。因此，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

经济派也谈“组织起来”，不过他们所谈的是指建立罢工储金会、互助会、工人储金会等等一般工人群众组织。显然，他们把一般工人群众组织同无产阶级政党、职业革命家组织混为一谈。经济派在组织方面的任务也像在政治任务方面一样，总是从社会主义滑向工联主义。因此，他们把“工人的组织”和“革命家的组织”等同起来。

列宁指出，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应当是尽量广泛和少带秘密性的职业组织。而后

者由于党的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必须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不很广泛、尽可能秘密和不受职业所限的政治组织。后者领导工人的组织，但并不像经济派认为的那样，只是负责工人经济斗争的“执行组”，而是要把工会运动纳入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轨道，使工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只有从扎扎实实地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才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固发展，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如果从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开始，这两种目的都不能实现。所以当经济派宣传“组织起来”时，列宁说，“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使自己和全体俄国人民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奴隶地位。”^①

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革命家组织的重要性的论述不仅大大提高了俄国无产阶级建立集中统一的坚强革命政党的自觉性，而且阐明了革命政党的重大历史作用，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上层建筑能动性的原理。

四、革命理论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能动作用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产物，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革命理论是革命实践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实践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斗争实践的产物。它是考察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8页。

的结果。“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①但是，不能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庸俗化，不能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成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

经济派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流行的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认为依靠工人的自发运动本身就能“养成”社会主义意识。列宁通过对经济派的批判，阐明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革命理论的相对独立性。

当经济派的《信条》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流行的那种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时，列宁指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当马克思主义出现的时候，当时流行的实践是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一出现就是反对这种流行的实践的。即使到了马克思已经写了《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与流行的实践也不是一致的。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政治斗争也还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还有英国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各国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那种流行的实践即自发的工人运动产生的。列宁总结了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用历史来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实践，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

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引用了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长段论述，其中恩格斯谈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必须批判继承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必须批判继承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合理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容。也就是说，只有在掌握了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专门的深刻的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之后，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以，列宁说，社会主义学是说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说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不能由工人群众在他们的自发运动中创造出来，并不是说工人就不可能参加这一创造工作，而是指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本身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受奴役的地位，不可能有时间、经费和精力来掌握丰富深刻的科学知识，来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工作。所以，列宁说，“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①

经济派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出发，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认为这种作用是“很渺小的”。他们还责难列宁“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列宁批判了经济派，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了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的实际关系，阐明了革命理论的能动作用。

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它指出了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8页。

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指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这样的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总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才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第二、只有掌握革命理论，才能正确地吸取别国的经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定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由此可以懂得，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才能正确地吸取别国的革命经验。

第三、只有掌握革命理论，工人群众的意识才能真正成为阶级意识。工人群众在工人同厂主的关系的范围内，在工人同厂主的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是不能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列宁指出，当工人还没有根据各种具体而且确实现实的政治事实和事件学会观察现代社会中其他各个阶级在其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与集团的活动以及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现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吸取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意识。而这就需要有革命理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当经济派以所谓反对思想僵化、反对学理主义的词句掩饰自己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时，列宁着重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并且强调：“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

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①列宁这里所说的“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是指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说教。他们叫喊“反对正统”和“批评自由”，极力攻击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指导意义。而经济派则醉心于狭隘的实际活动，丝毫没有指出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根本不提理论工作及其在目前的任务。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强调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列宁还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为什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说来，理论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第一，俄国党还在幼年时期，思想上还不成熟、不统一，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派别；第二，俄国党是一个年轻的党，要运用外国的经验才能顺利发展，这就需要雄厚的理论力量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第三，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而俄国社会民主党所担负的任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已有的社会党的任务更复杂、更艰巨。

经济派的刊物还得意洋洋地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他们想借马克思的名义来竭力贬低理论的意义。列宁指出，他们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是多么不合时宜，就如同在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一样。而且马克思在有这句名言的同一信件中，也指出了决不能拿原则来作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这一著名论断就是针对当时理论混乱的时代提出来的，并在许多著作中阐明了这一论断的含义。列宁这一论断，也是直接继承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他1883年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就提出了这个论断，并说明了其含义。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3页。

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时才是革命的。就其内容说，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将只在某几方面，但远不是在一切方面有革命的意义。”^①

列宁在论述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时，还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列宁指出，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最初是互不相关的。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和建立工会，而社会主义者则站在工人运动之外，著书立说，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要求用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这种制度。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入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因此，列宁指出，必须用革命理论来武装工人运动，“从而使已经开始在俄国土壤上生根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工人运动结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俄国的革命运动同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结合起来。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结合，才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民主工党，因为社会民主工党不只是为自发的工人运动服务……社会民主工党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才能使俄国无产阶级完成它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把俄国从专制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

自发的工人运动是由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必然产生的，它是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厚基础。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这种看法在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87页。

下述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因为社会主义理论比其它一切理论更正确地更深刻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根源，因此，工人阶级就更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但是，肯定自发的工人运动的意义，决不能像经济派那样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因为工人运动在没有得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之前，它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一贯利用它控制的学校、教会、报纸、文学艺术及其它思想影响的渠道来压抑工人的意识，妄图从精神上奴役工人，使工人阶级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放。

列宁在论述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时，还提出了思想体系的阶级性问题。他明确指出：“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 **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这是“十分正确而重要”的^②。当然，社会民主党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是指“充实无产阶级”，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仅仅当作消极被动的因素硬灌。而是必须尊重工人群众的创造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工人群众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创造条件，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修养，把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

因此，列宁强调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是在肯定实践的决定作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37页。

用以及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的前提下，并在适合“时宜”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这里决不是经济派所攻击的“轻视发展过程的客观成分”、“夸大思想的作用”的唯心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经济派鼓吹自发论，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单纯的经济现象变化的过程，形而上学地割裂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把客观因素，即经济的决定作用绝对化，完全否定主观因素，特别是政治斗争、革命政党和革命理论等上层建筑因素的能动作用。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作用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自发论决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对唯物史观的庸俗化。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实际揭露了经济主义的荒谬性、继恩格斯之后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阐明了上层建筑诸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方面。

第五节 批判孟什维克，在建党和制定革命策略的斗争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从理论上粉碎了经济派的自发论，为在俄国建立一个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1903年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孟什维克是“经济主义的后裔。”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孟什维克走上了另一种自发论，认为党是靠自发的思想影响来维持的成分复杂、组织涣散、没有定形的团体，列宁批判了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阐明了党的组织原则，贯彻了党的思想一致必须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使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斗争的焦点。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中，杰出地运用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物辩证

法思想。

一、关于党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 物质统一来巩固的思想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但它没有制定出正式的纲领和章程。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委员会成员就被捕了。作为一个统一组织的党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时，事实上由列宁创办和领导的《火星报》及其代办员网实际上成为党的组织中心。1903年夏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统一的纲领和组织章程，完成了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任务。但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内部又发生了分裂。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之间，围绕建党的组织原则和选举中央领导机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列宁的拥护者得到了多数票，因而称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反对列宁的马尔托夫的追随者得到的是少数票，因而被称为少数派（孟什维克）。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孟什维克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坚持其机会主义立场，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克服小组习气、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前进了一步。代表大会后孟什维克的破坏分裂活动使党又倒退两步。为了揭露和批判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阐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于1904年2月—5月写了《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

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阐明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组织原则。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组成的，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部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或者几乎整个阶级都提高到先进部队即

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党只能包括本阶级的真正觉悟的少数人，不可能整个阶级都参加党。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

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党必须按照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体党员同样遵守统一的纪律。党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它要领导工人阶级其它一切组织，必须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列宁详细分析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章特别是党章第1条条文的争论。列宁提出的条文强调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马尔托夫的条文却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只要经常协助党就够了，实际上是主张让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和每个罢工者或游行示威者都有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权利。列宁指出，要使党成为有组织的部队，党就只能容纳有组织性的分子，即参加党的组织的人。这样，才能对党员进行监督和领导，使党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如果承认不参加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是党员，党的机关就不可能对党员进行任何监督和领导。不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党员的必要条件，那就会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混淆不清地搞到党内，造成党组织的混乱和涣散，无法形成一个整体。

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特征，就是仇视组织性和纪律性，反对按照集中制原则把党建设成一个从中央到基层的严密组织体系。他们声称，组织不过是形式，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党纲比党章重要等等。以此来维护小组习气和涣散状态。列宁把孟什维克的这些论调斥之为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列宁指出，诚然，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备条件。但是，只有这个条件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

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①

列宁着重阐明了组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应当是一个整体。党的力量不是简单的算术数字，它首先取决于党的成员的坚定性，取决于内部的团结。党的组织愈坚强，党的队伍中的动摇性愈少，党就愈能领导群众、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如果党没有组织，就等于没有党。党只有组成为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的部队时，才能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团结统一的组织，就不能顺利领导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达到胜利。列宁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②

孟什维克还攻击列宁自相“矛盾”，说他在《怎么办》等著作中谈到思想影响，强调党的纲领、理论的重要性，而现在又强调组织的重要性。列宁指出，这种攻击完全是幼稚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从前，俄国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在这些集团之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关系。那时，党在进行的是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而现在，俄国党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的组织形式，就不应当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而应该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的体系。列宁认为，组织对于纲领、策略等思想性的东西来说，是物质性的东西，党的组织上的统一是党在思想上一致的保证，他说：“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6页。

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①

二、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辩证法思想

对具体情况要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的辩证法原理，是列宁在批判民粹派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批判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者”和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俄国革命的战略中始终贯彻的思想方法。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在批评普列汉诺夫向进行分裂和破坏党的活动的孟什维克让步时，指出，普列汉诺夫所以陷入不幸，正是在于他违背了他自己提到的“一个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②普列汉诺夫陷入可笑而又可悲的境地，“其根源就在于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③列宁总结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时指出，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经历了一些彼此显然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真正的辩证法的态度，“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④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4月间，由布尔什维克倡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3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这次革命中的基本策略路线。孟什维克拒绝参加这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37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2页。

代表大会，单独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制定了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为了从理论上论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决议，彻底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列宁于1905年6月至7月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列宁在这一著作以及同一时期的一系列有关文献中，彻底贯彻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思想。

孟什维克在论证他们的机会主义策略时，从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出发，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永远固定的，不变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看作是绝对的、抽象的、僵死的。他们拒绝对俄国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而是僵死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他们认为，俄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那就应该把革命的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

列宁在论证俄国革命的策略时，再次强调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①

列宁具体分析了俄国革命不同于以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在17、18世纪的西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还是一个历史上进步的、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远不如资产阶级强大。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则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已从进步的、革命的阶级变成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阶级。俄国无产阶级同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相比有着高得多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它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它先于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比其它一切政党都先进，它有全党通过的精确的纲领。因此，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68页。

导者。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同封建专制制度有矛盾，需要政治自由。但是，它同沙皇政府和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它特别害怕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的武器来反对自己。它的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彻底性并力图与沙皇妥协而叛卖革命，因而决定了它不能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孟什维克从僵固的资产阶级概念出发。断言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无产阶级不应当成为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列宁指出，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阶段。资本主义广泛而充分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民粹主义者曾经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早就坚决摒弃了这种荒诞言论，指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①接着，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说明：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他说，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是要这些改革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2页。

尽可能少发扬工人、农民的革命主动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资产阶级总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列宁根据这种具体分析得出结论：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①

孟什维克不顾时代的变化，不分析俄国的具体情况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只是生搬硬套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他们认为，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么发动农民就会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使革命的规模缩小，无产阶级陷入孤立地位。列宁具体分析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俄国农民的情况，驳斥了孟什维克的谬论。列宁指出，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一切经常的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成为完全而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因为只有获得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获得他们所希望的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须的一切。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主义君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34页。

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共和派的领导。列宁在驳斥孟什维克关于民主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的谬论时指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列宁由此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基本策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

三、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实践，明确区分了俄国革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阐明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列宁在1905年革命之前已初步形成。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给农村贫民》等著作中，已经提出俄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反对专制制度，争得政治自由，也就是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是反对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时要联合全体农民，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要联合农村贫民。但是社会民主党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①因为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1905年革命爆发后，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社会主义和农民》等著作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阐明了更加丰富、生动的辩证法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9页。

首先，列宁把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俄国社会革命明确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俄国当时正在经历的全民革命，也就是在专制制度内部发生的，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

列宁指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或者按照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相同的。”^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这个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它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民主革命决不是只有穷人才关心，民主革命的最深的根源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切身需要和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就是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也就是同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和妥协性作斗争，摧毁和粉碎专制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就是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不倒向资产阶级而靠拢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奋斗。列宁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把民主主义的农民运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86页。

同社会主义运动混淆起来的民粹派观点，并且指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①

列宁不仅具体分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他科学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通过对现实的具体分析，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它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②因此，为了要达到最终的目的——社会主义，就要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

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打下基础。民主革命在社会方面进行的改革提高俄国经济的发展程度，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客观条件。民主革命在政治制度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所受到的训练和教育，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与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因此，进行民主革命决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③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潜藏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2页。

内部的新的矛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新的斗争，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要在民主革命中就把这个斗争预先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斗争。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因此，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

此外，列宁也还指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是互相交错的。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也是事物辩证发展、相互联系的常有情形。在以往欧洲民主革命时代，也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在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也会有许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需要去最终完成。

列宁着重论述的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联系，即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分析转变的可能性，阐明转变的条件。列宁这时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思想。对于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他既是根据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又是把俄国革命和整个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当时他设想，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将引起欧洲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信号，而欧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就会反过来帮助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了。但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却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上许多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论述了革命斗争的形式问题，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在

1906年9月发表了《游击战争》一文，则集中从哲学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考察斗争形式的辩证方法。^①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第二，“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第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采用新的斗争形式。“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越来越新和越来越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决不限于只是在某一时期可能实行的斗争形式，认为随着一定社会局面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为这个时期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新的斗争形式。”“未来的危机必定会给我们带来现在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第四，斗争形式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公式、一切教条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它不是“凭空想出”各种斗争形式，而“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发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综合、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第五、马克思主义要求“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在具体考察俄国革命的各种斗争形式时，彻底贯彻了上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他在1905年革命时期关于武装起义是主要斗争形式的论述，就是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范例。1905年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2页。

1月9日事件以后，鉴于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已经发生，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开始》、《革命的日子》两篇文章中号召立即武装工人和全体公民，提出了“起义的无产阶级万岁！”的口号。1905年1月16日，列宁在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指出，目前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①以后，列宁总结了工人、士兵、农民此起彼伏的起义，特别是莫斯科起义的经验教训，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莫斯科起义的教训》等著作中，进一步阐明了武装起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以及武装起义和其它斗争形式的结合等辩证唯物主义道理。

当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孟什维克都反对武装起义，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列宁指出，在尖锐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发展成武装起义。各国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只有用强力才能解决。一切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俄国专制政府一贯而且顽固地这样做。1月9日以后刺刀已经真正摆在政治日程的首要地位，所以起义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②因此社会民主党在不忽视工人运动，不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的同时，“应当在革命时期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59页。

这当作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①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机会主义者借此鼓吹武装起义已经过时。普列汉诺夫非难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说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勇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列宁说：“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②

列宁在阐明武装起义是主要斗争形式时，同时阐明它必须与其它斗争形式相结合。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中已经指出，群众性政治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③ 1920年，列宁在回顾1905年革命的经验时指出，1905年最后三个月，“是革命斗争的两种最有力的方式——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时期。”^④ 使武装起义同群众性罢工结合起来，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经验对全世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都是有意义的。

在是否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上，列宁批判了孟什维克的谬论，说明了社会民主党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策略，阐明了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斗争形式的辩证法观点。

孟什维克从教条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参加临时政府而要“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只能从下面施加压力，推动资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逻辑终点。如果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0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67～368页。

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那就是“变相的米勒兰主义”。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关心和积极运用革命政权，从原则上说，社会民主党可以派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从巴黎公社失败以来，笼罩着欧洲的长期的政治反动，使社会民主党习惯于考虑“从下面”行动。但是，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的时期。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可把自己束缚在陈规旧套当中，除了“从下面”行动以外，还要采取“从上面”行动的新的斗争形式，以便利用革命政权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斗争和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把革命行动完全局限于从下面施加压力，拒绝同时又从上面施加压力，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孟什维克“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终如一地’像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①

法国的米勒兰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在历史已经向工人阶级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任务的客观条件下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他们在争取共和国的掩饰下拜倒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面前，诱骗无产阶级离开社会主义变革。而俄国的历史进程向无产阶级提出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在这种变革时期，不能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简单地对立起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层，他们同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无产阶级如果不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就不可能完成民主主义变革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等于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7年“六三”政变以后，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列宁彻底贯彻关于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思想，批判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错误策略，阐明了秘密斗争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59页。

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正确原则。

“六三”政变以后，孟什维克中以唐恩、阿克雪里罗德为首的大部分人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革命不会重新高涨，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立宪革新”。因此，他们主张取消秘密的党和党的秘密工作，代之以一种公开的不定形的团体，单纯进行合法活动。他们被称为“取消派”。布尔什维克中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少数人则走向另一极端，他们不顾形势的变化，否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仍然坚持革命高涨时期的策略，反对党参加杜马、工会等合法组织和进行合法活动，要求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杜马中召回来。他们被称为“召回派”。

列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了“六三”政变以后的政治形势，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各种矛盾依然如故，反动统治必然加深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但是，现在革命已处于低潮，反动统治暂时恢复，反动政府不允许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合法存在，拼命反对和镇压一切革命活动。在这种局势下，革命高潮时期那种公开冲击的策略已不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转入地下，建立和巩固秘密组织，进行秘密工作，以维护自己的生存，如果取消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就是取消党、取消革命。

另一方面，列宁又批判了召回派的错误。列宁指出，“六三”政变后，俄国专制制度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在资产阶级君主制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沙皇专制政府不得不建立杜马这样公开活动的、具有全国意义的机关，并在这个机关里组织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在革命低潮时期，当反动派破坏党同群众的联系、削弱党、妨碍党进行广泛的工作时，掌握议会斗争武器就成了党的特殊任务。党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一切合法的、半合法的机构，以便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保持党同群众的联系，掩护秘密组织，为未来的革命高潮作准备。如果拒绝参加杜

马和合法活动，党就会脱离群众，陷入孤立，实际上同样是取消党、取消革命。

列宁认为，在“六三”政变之后的具体环境下，党必须把长期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提到首位，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有计划地、适当地结合起来。列宁全面地阐明了新的时期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秘密的党的组织是基础，合法的组织是秘密的党的工具。党的合法活动、合法组织、杜马党团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意志、决议和策略。杜马活动、杜马（议会）斗争是争取工人解放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它是从属的次要的斗争形式，它必须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的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总的利益。另一方面，合法组织、合法斗争是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的掩护物，从组织形式上说，秘密组织要适应合法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和巩固秘密组织。列宁关于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相结合的论述深刻阐明了革命斗争形式的一个辩证思想：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简短的结论

在列宁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他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实行时期的哲学思想占有特殊的地位。

如果从保存下来的列宁的第一篇著作的写作时间即1893年算起，到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1907年止，这个时期几乎占了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一生的一半；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也占他一生整个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

列宁涉世之时，俄国已孕育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传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不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或普列汉诺夫不同，

没有经过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或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明显转变过程，而只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由不完全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列宁科学地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制订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列宁作出这些杰出贡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他深刻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它溶化在对俄国社会现实和革命实际的科学分析之中。这正是列宁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突出特色。

列宁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紧紧围绕着革命任务的需要。他没有撰写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在批判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的错误理论时，也阐明和发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由于列宁对错误理论的批判是围绕着革命的纲领策略进行的，所以列宁阐明的这些基本观点一般属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如，社会的物质关系决定社会的思想关系的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以及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要把社会看作发展着的活的机体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辩证方法等等。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准备和实行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已是列宁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突出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已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 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0世纪初,欧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成为主要危险。在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转入低潮。党内围绕着如何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制订新的斗争策略,出现严重分歧,思想上十分混乱,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或背叛。正是从国际、国内斗争的全局战略出发,为了从哲学上正确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粉碎修正主义在哲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澄清理论是非,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全党,保证党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准备和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列宁把注意力转向了哲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①1909年5月列宁发表了他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部承前启后、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文献,是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科学前沿一些新成就的哲学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一大潮流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的第二代进行系统批判的代表作。本章着重研究和阐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用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29页。

和意义。

第一节 列宁研究哲学问题的背景

列宁在1908年之所以十分重视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问题，集中精力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哲学斗争的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次自然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一切给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从而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哲学领域，认识论问题提到了首位。其原因一方面西方哲学家们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自然观、社会观、思维观、方法论等）给予新的解释，从而形成了一批新的哲学派别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除了来自外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攻击之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内，主张用“最新哲学”来修正、补充以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这两方面的集中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整个实证主义思潮的对抗。

一般认为实证主义思潮的最早代表是孔德、穆勒和斯宾塞等人，70年代出现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他们被看做实证主义思潮的第二代，此外还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内在论等等，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证主义色彩。它们在理论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标榜反对形而上学，反

对所谓“本体论”，既反对唯物主义、实在论，又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否认经验以外的任何存在，认为只有实证的，即经验的，才是存在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贝克莱主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的混合，用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的方法来否定唯物主义特别是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以新的形式保存和发展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起初，这种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不大。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证主义都很鄙视，几乎不予理睬。马克思在《资本论》跋文中说，这是“一种没有生气的折中主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序言里，也称之为“折中主义残羹剩汁”。但后来这股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892年，恩格斯就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着重批判了新康德主义和新休谟主义。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修正，在哲学上就是用实证主义思潮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先是伯恩施坦等人企图用康德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后来则在奥、俄等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公开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对于这种情形，列宁在当时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神父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带着傲慢的微笑嘟哝着（同最新出版的手册一字不差），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轻蔑地把黑格尔视作一条‘死狗’，耸肩鄙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报官家给的俸禄，修正主义者就向他们靠拢，竭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

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的‘私人的事情’。”^①总之，是亦步亦趋。因此，当时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批判修正主义，而要批判修正主义，就非同时批判资产阶级哲学不可。列宁在1908年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十分明确地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并且预告说：“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②这里所说的“小册子”就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开始写作此书的时间是1903年春）。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明确指出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内在论等等的关系是“战友”。他说：“这个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唯物主义和整个广泛的实证论思潮（其中既有奥·孔德、赫·斯宾塞、米海洛夫斯基，又有许多新康德主义者以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间的根本分歧”，“整个实证论思潮”，包括实用主义在内，因为“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差别，就像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间的差别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和极不重要的。”^③

因此，研究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代表的列宁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必须从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立这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对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作出全面的估价。那种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作只是俄国共产党内党派争论的著作的观点，显然是狭隘、片面的。

二、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

是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代表

实证主义即科学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之一（另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的注①。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13页、258页。

大思潮是人本主义)。这个思潮的创始人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他在1830—1842年写了《实证哲学教程》一书,提出要以实验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来建立“科学的哲学”,强调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反对超越人的经验范围的神学和所谓“形而上学”的幻想。到五、六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和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进一步修正、发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倾向,并使之系统化。这就是科学主义思潮的第一个历史形态。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产生了以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彼得楚尔特、彭加勒、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即马赫主义)则是第二代实证主义。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又发展出所谓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等科学主义思潮的流派。

恩斯特·马赫(1838—1916)是奥地利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声学、热力学、光学、感官生理学、心理学和科学史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科学研究增长了他对哲学的兴趣,后来他便转向了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他试图把心理学和物理学结合起来,从心理学方面解释物理学,对物理学作一种认识论上的解说。

马赫是最早认识到经典力学的缺陷的科学家之一。在经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转变的时期,马赫主张把科学解释和力学解释区别开来,用相对主义的方法怀疑和批判机械论自然观(特别是牛顿时空观)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这对当时自然科学家们突破经典物理学理论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此,普朗克、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都是承认的。爱因斯坦曾说过:“马赫曾经以其历史的批判的著作,对我们这一代自然科学家起过巨大的影响”^①。但是由于马赫不懂得唯物辩证法,把他的整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84页。

个哲学学说建立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上，结果就夸大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在反对它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同时否定了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导致了怀疑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正如列宁所说：

“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①。

在哲学方面，马赫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感觉的分析》（1885）和《认识和谬误》（1905）。马赫的哲学思想发展是从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向右退回到贝克莱和休谟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关于要素的理论。他主张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都是由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等要素构成的要素的复合。他认为，这样，自我与世界、感觉（现象）与物体的对立就消灭了，“在这种概念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②。马赫和马赫主义者宣称把繁杂的感性世界简化成少数性质相近的“要素”，用这种所谓“中立性的观念”来描绘世界，就能否定“形而上学”，取消哲学根本问题，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这种作法最符合所谓“思维经济原则”，因而是最科学的。其实，马赫的“要素”不过是感觉的别名。在他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一切‘物体’只是代表要素复合体（感觉复合体）的思想符号。”^③

“说世界仅仅由我们感觉构成，这是正确的。”^④因此，实际上，他在哲学上所走的仍然是从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不过他的哲学具有折中主义的特点，即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和自发地倾向唯物主义的一些言论混合在一起，是休谟主义和贝克莱主义的混合物。

马赫用这样的哲学观点来研究物理现象，引申出一系列唯心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4页。

②③④ 《感觉的分析》第240、23、9页。

主义观点。如认为假象与实在的区别在科学上没有意义；物理概念不过是“作业假设”，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幻想的自在之物的类推”^①；原子是人造的、假设的，是精神设计物，是把经验符号化的经济方法；自然界没有原因和结果，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概念是人们凭意志的活动创造出来的；时空只是一系列的感觉协调体系，运动只是感觉和表象的运动，等等。在他看来，科学不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是按照“思维经济原则”，对感觉要素的函数关系的一种“方便的描述”。

理查德·阿芬那留斯（1843—1896）瑞士哲学家，生于巴黎，先后任莱比锡大学、苏黎世大学教授，经验批判主义的另一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纯粹经验批判》（1888—1890）和作为该书绪论于1876年出版的《哲学——按费力最小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人的世界概念》（1890—1891），《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等。阿芬那留斯与马赫素昧平生，但在各自独立的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而被看作同一派别的创始人。阿芬那留斯也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把“意识”和“环境”、“自我和非我”、“主体”和“客体”放在彼此对立的地位，是割裂了统一的世界。因此，他提出，根据“费力最小的原则”（即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这个“理论概括的根本”，必须清洗掉“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下的‘物质’”，抛弃要求哲学认识自在之物的客观本质和测定认识自在之物的能力的“徒劳无功的任务”，在世界观中取消掉“实体表象”，回到所谓“自然的世界概念”，这就是“应把存在者设想为感觉，感觉是不再以无感觉者为基础的。”^②在他看来，世界是由所谓“纯粹经验”构成的，这种“纯粹经验”，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心理的，而是“第三种东西”，即“其中没有渗入

① 《感觉的分析》俄文版序。

② 《哲学是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1917年柏林版，第65页。

任何本身不是经验的东西”^①。他声称，每一个“完全的经验”都包括“自我”（称为“中心项”）和“环境”（称为“对立项”）这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从属，不可分割，原则上是并立的，等价的，“总之，一切经验本来都是同格的，其中那个称为‘自我’的构成一个（相对的）常项，环境组成部分，例如那称为‘树’或‘同伴’的，构成（相对的）变项。我把这称为经验批判的原则同格”^②。经验批判主义者相信阿芬那留斯的这个理论，既承认了所谓“素朴实在论”的全部价值，又消除了“自我”与“环境”、“意识”与“物质”的对立，调和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实阿芬那留斯不过是重复了贝克莱、费希特等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旧错误，这就是看到了认识过程中主体（自我）和客体（环境）的联系，但歪曲了这种联系，把认识离不开主体、自我，离不开感觉、经验，夸大为主观事物（对象、客体）的存在本身离不开主体、自我，离不开人的感觉经验，不能在人的感觉之外独立存在。不过他采用了“同格”（即相互从属）、“并立”、“等价”以及经验的“综合概念”和“分析概念”等“新”概念，以为这样他的折中主义理论就得到论证了，然而这是徒劳的。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换了新装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③

阿芬那留斯观点的唯心主义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在他的所谓反对“嵌入”的论点上。他公然否认头脑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头脑的机能，这个早已被自然科学所证实的真理，并说这是流行的心理学违背了“自然的世界概念”（即“原则同格”），作了不能容忍的“嵌入”的结果。因为按照阿芬那留斯的观点，自我和环境、思维和头脑是不可分割的同一经验，可是自然科学却把世界

① 《纯粹经验批判》第1卷，1907年莱比锡第2版，第3—5页。

② 《人的世界概念》，1912年莱比锡版，第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84页。

二重化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思维和头脑，而把二者对立起来后，再把前者放到后者里面，这样就“把（实在的）环境的组成部分变成了（观念的）思维的组成部分”。他说：“我把这种将‘被看到的东西’置入人体内部的现象称为嵌入。”^①阿芬那留斯的这个论点最明显地说明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反科学性，所以列宁讥笑他是“无头脑的哲学家”。

除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之外，作为一种流行的哲学思潮，马赫主义在德、英、法、俄、美等国都有它的代表和追随者，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哲学家彼得楚尔特（1862—1929），法国著名的科学家亨利·彭加勒（1854—1912），和俄国的波格丹诺夫（是亚历山大·马林诺夫斯基的笔名，1873—1928）等人。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和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以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论”，都是马赫主义的变种。

由于马赫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者之中有像马赫、彭加勒等一些有成就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制造的很多新概念、新理论（如：“要素说”、“原则同格”、“思维经济原则”、“约定论”等等），被信仰者吹捧为“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现代认识论”等等，又由于他们打着批判机械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侈谈“经验”、“感觉”，宣扬自己所主张的是所谓超出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陈旧对立之外的无片面性的“中派哲学”，是“最新实证论”等等，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到20世纪初，马赫主义开始流行于欧洲和俄国，不仅在一些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中产生了影响，而且在奥、俄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内得到了传播，出现了一股公开把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修正”党的理论基础的思潮。如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的维·阿德勒（著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之子）在当时就是马赫主义的狂热信

^① 《人的世界概念》，德文版，第124页。

徒，在马赫70寿辰时他专门撰文吹捧马赫哲学是“世界要素的发现”，公开主张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历史观，缺乏自然科学基础，而马赫主义是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世界观，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马赫主义不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补充，而是与这种观点相符合的对自然界的认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并不在于它增进了对历史的认识，而在于它在整个世界图景中是和马克思历史观并列的平等部分。利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只会得到好处”^①。而在俄国党内，马赫主义流传的后果就更加严重。

三、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思想战线的形势把哲学斗争提到首位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在力量上占有优势，而革命方面没有坚强的工农联盟，工人阶级特别是党的领导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组织的统一等原因，这场革命于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发动“六三政变”后遭到失败。沙皇政府实行斯托雷平大臣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公开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则加强反动的政治、思想统治。在政治上，一个突出事件是解散第二届议会，逮捕流放65名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修改选举法，另产生一个第三届议会，使黑帮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代表占绝大多数。在思想上，则用宗教迷信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来腐蚀革命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成为沙皇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帮凶。他们出版“路标”文集，攻击革命，反对民主，极力维护沙皇的专制制度，同时，在社会上掀起了“批判”、“谴责”马克思主义和

^① 阿德勒：《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股“寻神”的反动思潮，大肆攻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扬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正是适应了这种反动的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马赫主义在俄国得到了传播。对此，列宁曾尖锐地指出：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必然。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毕竟已被折裂。路标派帮助先进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即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唯心主义的变种在客观上是反动派的工具，反动派的宣传手段。因此，在1908—1910年这个历史时期，既然我们看到‘在上面’不仅有十月党人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拜神杜马’，而且还有拜神的立宪民主党人、拜神的自由派资产阶级，那末‘在下面’进行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①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俄国党本来已经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这时又出现了新的政治分歧和组织分裂。这表现在革命高潮时期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一部分脱党、投敌、叛变，留在党内的一批动摇分子则走上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道路。在布尔什维克方面，以列宁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认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矛盾依然存在，在革命低潮时期，必须实行正确的退却策略，这就要巩固和发展地下党，利用议会等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揭露沙皇政府，宣传组织群众，从思想和组织上准备和积聚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但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少数人反对列宁的路线，他们不顾革命失败后的客观现实，硬说俄国正走向革命高潮。为此，他们反对任何妥协，反对利用议会进行合法斗争，先则主张抵制议会选举（被称为“抵制主义”），后则要求召回议会中的工人代表（被称为“召回主义”），停止党在一切合法组织中的工作，准备新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36页。

武装暴动。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这样做只能使党和群众隔绝，这是一种“左”倾盲动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孟什维克方面，多数人被反动势力的一时猖獗所吓倒，悲观失望，不相信革命会重新高涨。他们认为“六三政变”后，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政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了，因此，主张取消党的秘密组织，以放弃党的纲领为代价，把党变为一个沙皇政府法律允许的合法组织。这实际上是取消党和革命，被称为取消主义。而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少数人，在对待1905年革命的策略等问题上虽然与布尔什维克派有分歧，但不同意取消主义的路线，与列宁结成了护党联盟，共同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

在政治上发生严重分歧的同时，党内思想上也出现混乱和涣散。革命的失败使一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试图以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修正以至取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反动思潮的影响下，有些人公开宣扬“造神”，主张“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建立“无神的宗教”。然而，在党内影响更大的则是马赫主义的泛滥。当时热衷于宣扬马赫主义的有波格丹诺夫（当时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巴扎诺夫、苏沃洛夫（以上当时属布尔什维克派），别尔曼、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以上当时属孟什维克派）等人，他们和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互相呼应，企图用马赫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吹捧马赫主义是“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是“自然科学领域里最进步的倾向”，要用它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说什么“马赫从事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论前提，实质上是非常正确的合理的，……不仅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紧密相联，而且直接与之相吻合”，“从革命的观点出发，马赫的哲学对于自觉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是特别的必要和有益。”^①另一方面，他们跟在马赫、阿芬那留斯后面，将“物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中册，第733、728页。

质”、“客观真理”“绝对真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作为“思想偶像”加以摧毁，攻击唯物主义承认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是“二元论”，是陷入了“康德主义”。实际上，他们用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别的，恰恰是马赫主义的折中主义、相对主义方法和唯心主义观点。如果他们的企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被篡改和否定。

对于当时俄国思想战线的形势，列宁后来有这样的描述：“反动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唯心主义哲学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①“目前是一个反革命得势时期，是涣散时期，是造神说时期，马赫主义、召回主义、取消主义时期。”^②正是马赫主义成了取消主义、召回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党内马赫主义者的斗争，有一个发展过程。波格丹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三大’后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即领导核心成员），在哲学上他是马赫主义者，是党内哲学上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主要哲学著作有《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经验一元论》（1904—1906）、《信仰和科学》（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1914）、《普遍组织起来的科学概论》（1912）等。早在1903年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曾向列宁解释过波格丹诺夫观点的错误。1904年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相识，波格丹诺夫将刚出版的《经验一元论》第一卷送给列宁，这是波格丹诺夫宣扬马赫主义的主要著作。列宁读后很快就写信给波格丹诺夫说，他的著作使列宁更不相信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更相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正确的。当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曾专门写文章批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13页。

判波格丹诺夫的马赫主义观点，对此列宁是支持的，认为那些观点“是资产阶级‘批判’意向的新变种”。1906年波格丹诺夫又将他写的《经验一元论》第三卷送给列宁，列宁读完之后非常生气，说：“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极端错误的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道路。”^①当时列宁就写了封关于哲学问题的长达三个笔记本的信给波格丹诺夫，并想以《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发表，可惜后来失落了。可见，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上的原则分歧由来已久。但是，当时彼此在政治上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布尔塞维克的领导核心成员，而哲学斗争在全局上也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争论没有公开，而是约束在同志之间私下交换意见的范围内。可是1907年以后，随着革命转入低潮，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严重分歧，党内思想理论方面的斗争也急剧尖锐化了。表现在哲学上是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真正的讨伐”^②。当时的情况是：1. 马赫主义者的进攻非常猖狂。

“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③它们公开叫嚷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应当用马赫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非常气愤地写道：“每篇文章都使我气得简直要发疯。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经验批判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和经验符号论者都在往泥潭里爬。他们劝读者相信‘信仰’外部世界的真实性就是‘神秘主义’（巴扎罗夫），他们把唯物主义同康德主义混淆得不成样子！（巴扎罗夫和波格丹诺夫），他们宣传不可知论的变种（经验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论），教给工人‘宗教无神论’和‘崇拜’人类最高潜在力（卢那察尔斯基），宣布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为神秘主义（别尔曼），从法国某些‘实证论者’（主张‘符号认识论’的该死的不可知论者或形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181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7页。

上学者)的臭水沟里吸取东西(尤什凯维奇)!不,这太不像话了。”^①2.修正主义者结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尽管这些人本来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但是,“他们之间的局部分歧,由于他们共同反对(而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消除了;作为一个流派的马赫主义的反动面貌明显地暴露出来了。”^②3.党内马赫主义者采用“跪着造反”的策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马赫主义标榜所谓“科学哲学”和无党派的“中派哲学”,本来就具有很大的虚伪性。而党内马赫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发动进攻时,在口头上他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反还以“维护”、“改善”、“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幌子。正如列宁所说,俄国马赫主义者“从折中主义的残羹剩汁里获得自己的哲学,并且继续用这种东西款待读者。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他们拼凑起来,于是含含糊糊地说这种杂烩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③这就很容易使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了解不深的人上当受骗,造成党内的思想混乱。4.还存在着一个复杂的情况,这就是派性利用哲学分歧。普列汉诺夫是反对马赫主义的,可是在政治路线上又反对布尔什维克路线,因此,他有意把马赫主义同布尔什维克扯在一起,似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的分歧是由于布尔塞维克派拥护马赫主义。而波格丹诺夫恰恰以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核心成员的身份公开写文章吹捧马赫主义,这就更加造成思想的混乱。

以上情况说明,斗争已不可避免。只有批判马赫主义,分清理论是非,捍卫党的理论基础,才能避免党的思想和组织的分裂,才能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因此,哲学理论问题在当时已成为关系俄国革命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列宁当时写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1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7页。

③ 同上书,第196页。

这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当时正是“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各方面历史条件决定了党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哲学上，“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在党内进行一次哲学“清理”。①“在目前的困难时期，理论上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维护党的斗争已经提上了日程。”②“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问题已经提出来了。”③而且这样做不仅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和党的思想建设的需要，还具有国际意义。“世界其他国家早就为进行这种哲学上的‘清理’做好了准备，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应由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照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④于是列宁从1908年2月开始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准备实行“哲学整顿”。

1908年5月，高尔基把列宁和波格丹诺夫邀到一起企图调解，结果失败。1908年6月，波格丹诺夫就在日内瓦举行哲学报告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挑战。列宁认为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就写了《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这个批判马赫主义的提纲，委托印诺肯齐（即当时布尔塞维克领导核心成员、《无产者报》编辑委员杜勃洛文斯基）到会宣读，这个提纲以提问的方式鲜明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几乎同时，在政治上双方的矛盾也激化了。1908年2月，列宁同波格丹诺夫等人在对待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策略上开始发生分歧。6月，根据列宁建议，《无产者报》开展了关于召回主义的辩论，7月，列宁在给沃罗夫斯基的一封信中就尖锐指出：“他们把分裂建筑在经验一元论——抵制主义的基础上。事情发展得很快。

①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1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299页。

③ 同上书，第246页。

在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争吵。完全有可能分裂。”^① 1909年2月,《无产者报》公开批判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波格丹诺夫提出抗议,结果就发生激烈的组织上的冲突。1909年5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6月,列宁主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对波格丹诺夫的错误进行了批判,通过了《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斥责“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是‘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时揭露了波格丹诺夫的政治路线与马赫主义哲学观点的联系,指出“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过去企图从原则上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根据的一切尝试,不可避免地要使他们否定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②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断绝和马克西莫夫(即波格丹诺夫)同志的关系》的决议,实际上是从组织上宣布了同布尔塞维克内部的马赫主义者的决裂。

对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出版列宁极端重视,他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快些出书,我这样着急出书,不仅因为这是一项著书立说的义务,而且还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义务。”^③ “我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④ 应该说,书的发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揭露了打着“现代认识论”、“20世纪自然科学哲学”等招牌的马赫主义的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本质以及它们作伪的诡辩手法,这就使俄国进步思想界特别是党的干部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仅给了俄国马赫主义思潮以粉碎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捍卫了党的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2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3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40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5—9页。

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布尔什维克党能在思想上政治上团结一致，顺利地渡过因1905年革命失败而经历的困难时期，为坚定和发展自己的队伍，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节 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党性原则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贯彻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紧紧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精华，作出了精辟的解释，而且根据当时哲学斗争的新经验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路线和中间派

把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明确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并给予科学的表述，是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恩格斯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对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总结。在这方面列宁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进一步明确哲学基本问题既是世界观（即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的提法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了两大阵营。”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在哲学上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如贝克莱、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都有过深刻的论述，恩格斯显然是吸收了前人思想的积极成果。然而，把它明确规定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则是恩格斯的贡献。与前人相比，这显然是前

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是对哲学史的一个科学总结，达到了对哲学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因而无论是对哲学基本原理还是哲学史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此应该充分肯定。但是恩格斯的表述确有不够精确之处。如“本原的”（Primary又译作“第一性的”）这个概念一般是从宇宙本体（arche本原、始基，being有、存在。）意义上理解的。所谓“本原的”问题就是指“世界是神或某种精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这样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仅限于本体就狭窄了。有人就由此引申说恩格斯的论断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以本体论为代表的旧哲学的概括。加上恩格斯又特别强调“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这就更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只限于本体论（Ontology应译存在论）的范围。这当然不是精通德国古典哲学的恩格斯的本意。而且按照这样的理解去考察哲学史的实际也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哲学发展到近代和现代，哲学家们越来越热衷于讨论认识论问题，这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经常成为哲学上各派争论的中心，相对地说，至少在表面上，本体论问题的争论倒似乎不那末突出和集中。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科学文化的普及、提高，使哲学上本体论方面的争论的古典形式阶段（如世界是否是由神或某种类似神的精神实体创造的？）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至少对大多数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现在，这个过程已经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大都有意回避本体论问题，或者（像实证主义、实用主义、马赫主义那样）采取把这个问题攻击为是“形而上学”而主张取消的策略。当然，这不等于本体论问题果真消除了。本体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问题无论在世界观上或者认识论上，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将永远保持其不可改变的地位。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本体论方面的争论也仍将以新的形式展开和继续下去，这是无疑的。然而，尖锐的问题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对于以研究认识论为主的近代和现代哲学是否适用？在认识论上是否同本体论上一样，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显然，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同马赫主义以及整个实证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列宁来说是必须首先回答的，而列宁的贡献正在于他能紧密结合实践的发展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

研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可以看到，列宁没有囿于恩格斯的个别提法，而是根据《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在内）的完整论述；以及同一著作中关于“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关于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①的论述，并联系到《反杜林论》中关于“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和“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②的观点，坚持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统的原则，明确指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③。这就是说，本原的问题不仅应该从本体论的意义上了解为世界的本体、本质，万物的根源、元素、始基，而且应该从认识论的意义上了解为认识的泉源、对象、出发点、起点。因为归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223—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2页。

根到底，世界的本体就是人类认识的唯一（最终的）泉源。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哲学的历史和现实，那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无论是研究世界观（本体论）问题还是认识论问题，都不能回避本原的问题，区别只不过在于对什么是“本原的”，即什么是世界的本体、什么是认识的泉源，有不同的认识而已。这样，从列宁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哲学基本问题应理解为既是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这就把世界观（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在我国哲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第一方面所谈的只是本体论问题，第二方面所谈的只是认识论问题。这种理解也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按照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第一方面所要回答的问题既是世界的本体又是认识的泉源；而第二方面也不限于认识论的内容，它所解决的既是世界是否可以认识的问题，同时也是关于本原问题即本体论的证明问题。所以，两个方面都包含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只有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对本体论和认识论基本问题的完整回答。

（二）提出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

根据上述思想，列宁不仅主张在认识论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别，而且进一步引申出在认识论上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的结论。列宁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坚持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路线。”^①这就是说，应该根据一种哲学所自觉主张和实行的认识路线来确定它的基本性质，即它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呢还是唯心主义认识论。这里所讲的认识路线，主要是从认识的过程来考察：认识从什么出发，什么是起点，什么是最终结果。即所谓从物到感觉和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5页。

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

列宁这一思想不仅对于揭露马赫主义认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各种哲学认识论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提示要解剖一种哲学思想，首先应该搞清它所主张和实际贯彻的是什么样的认识路线，最重要的是立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这是确定一种哲学基本性质的主要根据。

但是，列宁的这个“基本路线”的思想，确切地说，还是属于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第一方面的一种发挥，还不是概括认识全过程的完整的认识路线的科学表述。按照毛泽东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整个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①。列宁所说的“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只是反映了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列宁这样讲对于回答认识从什么地方开始（即从何入手）？感觉、思想从何而来？即认识的出发点、泉源、对象——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前提问题，对于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反对认识论的唯心论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此为止，还是不够的，不完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对于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来说，更重要的是进入第二个阶段，这就是拿了经过第一个阶段所获得的关于对象（即物、存在、客体）的思想、理论去指导实践，以检验思想、理论是否正确，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为此必须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论，充分估计和自觉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当然在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无论是感性认识的获得，还是感性认识经过抽象思维到理性认识的飞跃，都是主体对客体发挥能动作用的结果。但是第二个阶段主体的能动作用更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839页。

突出。)因此,对认识路线的完整的正确的表述,似乎应该是:从物(经过实践)到感觉和思想,再从思想(经过实践)到物。当然这里所说的从思想到物,是在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前提下,以实践为基础和中介,既不同于以感觉、思想为出发点和基本前提的唯心主义,也不是把物和感觉、思想并列的折中主义、二元论,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三)明确指出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派”,不可知论本质上是折衷主义的混合物。

这是列宁对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又一发挥和发展。

自从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对哲学领域的矛盾斗争出现了二个观点:一是哲学上存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哲学家不是唯物主义者就是唯心主义者,非此即彼,没有例外;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回答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第二方面的回答则是区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在我国哲学界,有一些哲学文章和教科书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二个观点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思想。一是把复杂的哲学理论问题简单化、把哲学斗争绝对化了;二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方面的理解并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这里涉及到: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着“中间派”,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理论意义,不可知论的本质、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深刻地阐明了这些问题。

一开始,在《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中,列宁就根据恩格斯的思想,明确承认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派”。他写道:“恩格斯把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作是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说康德主义是不可知论的变种?”^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页。

这就是说，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只是基本上如此。同时还存在着“亦此亦彼”，即“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而这里所指的中间派就是不可知论。

列宁在阐述如何认识不可知论的性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时，不仅引证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关于不可知论者“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著名论点，而且着重引证并详尽解释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批判不可知论的论点，即不可知论者“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关于这些，他是一点也不能确实知道的），而只是这些事物和特性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①正是以此为据，列宁强调指出，恩格斯公开明白地说过：“他和不可知论者的区分不仅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模写的正确性，而且还在于不可知论者怀疑能否谈论**物本身**，能否‘确实地’知道物的存在。”^②“我们唯物主义者，继恩格斯之后，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做**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否定客观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③又说：“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的’东西。”也就是说“连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都不允许**”^④。这就是说，不可知论之所以是不可知论，不仅在于它怀疑人们的认识能力，即自在之物的可知性，更重要的是怀疑认识的真正泉源——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可见，不可知论的问题并不只发生在第二方面，而且也存在于第一方面。事实上，在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回答中，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12页。

③ 同上书，第128页。

④ 同上书，第106页。

存在有介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当然，除了不可知论之外，中间派还有二元论，不过一个是同时怀疑、否定物质或精神是本原，而另一个则是同时肯定物质和精神都是本原）。不仅如此，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不可知论“本质上是折衷主义的结合”，而且这个结合“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比例，有时主要强调这种混合物的这一因素，有时主要强调它的另一因素”^①，因而具有不同的“色彩”。例如，在赫胥黎那里，不可知论是唯物主义的遮羞布，而在马赫那里，情形就完全不同。这就是说，中间派的情况也是复杂的，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不能“一刀切”。

如果列宁对恩格斯关于不可知论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是正确的，那就不能认为不可知论的问题只存在于认识论范围或只涉及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也不能说第二方面问题的意义主要是用来区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这不仅是由于在第一方面即关于本原问题的回答上，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还存在着介于两者之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其中就包括有不可知论；更重要的是第二方面要求回答世界是否可以认识即意识的本质和作用问题（或者叫做如何判断人的认识能力，如何正确估计人的主体能动性问题）。虽然如恩格斯所说对此大多数哲学家是肯定的，只有少数不可知论者表示怀疑或否定，似乎据此可以引申出第二方面主要是用来区分所谓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然而这只是一种形式的推论。只要认真研究恩格斯的著作就可以看到，在论述第二方面时，恩格斯不仅提出了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认识是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问题；不仅批判了以休谟、康德为代表的不可知论，而且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唯心主义，还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所以，第二方面同样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14页。

形而上学的对立。决不能因为他们都承认世界可以认识这个共同点，而看不到彼此在认识论上（以及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实，就夸大精神的作用这一点来说，不可知论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第二方面把不可知论突出出来，不是冲淡了、而是更加深刻地反映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

二、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和实践

早在1895年，列宁在批判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错误时，就提到了哲学的党性问题。他说：“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是指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社会集团”是指阶级、阶层和政治上的党派。“党性”是指阶级性，主要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社会问题时必须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针对马赫主义标榜无党性，特别是俄国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党性”这个科学概念，阐明了它的内涵，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思想。

按照列宁的论述，哲学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所谓哲学的党性，包含以下二点内容：其一是指学术上的派别性。这就是说：

“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②它们的根本差别（划分），是由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决定的。既然谁都不能回避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那末，任何一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51页。

哲学家，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必然具有自己的基本倾向，都毫无例外地归属于其中的一条基本路线、一个基本派别。所谓中间派不过是动摇于两个基本派别之间，在两者之间搞调和、妥协、折中、混合，但它总有一个侧重点，或者倾向唯物主义，或者倾向唯心主义，它的特点是动摇、不彻底、不稳定。在哲学上企图凌驾于唯物唯心之上，超越两者的对立，搞什么“中派哲学”、

“第三条基本路线”，寻求所谓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第三种东西”，等等，都是不可能的，“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①。其二是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这就是说：“哲学上的党派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既然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末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它的性质也不能不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不能不带有阶级性。它是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是一定阶级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哲学上一切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当然都有认识上的原因，有当时生产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但从社会方面看，都必然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同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密切联系，归根到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害，因而总是社会现实生活矛盾，特别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理论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超阶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从几千年阶级社会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来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符合历史上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一种进步的世界观；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则适应没落、保守、反动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需要，是一种落后的世界观。因为进步阶级（包括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同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一致或相近的，因而它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56页。

② 同上卷，第357页。

敢于正视客观现实，要求认识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和变化的规律，要求如实地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变革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没落、保守、反动的阶级则与此相反。当然社会实际生活是复杂的，也存在有个别例外和矛盾交叉的情形，这可以通过具体分析得到理解，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上述一般的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就成为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在哲学领域，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倾向和思想体系。不管以任何形式宣传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的客观的阶级作用和社会效果，都必然是在思想上加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削弱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

正因为哲学具有这样的特性，所以列宁认为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哲学上应该自觉地坚持党性原则。具体说来就是：第一，必须以两条基本认识路线的对立为中心来考察和说明哲学的历史和现状。无论是研究哲学史还是对待当前哲学领域的重大原则争论，都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而应当从哲学领域客观存在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基本路线对立的实际出发，自觉地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理论上必须抓住根本，要求彻底和明确，反对调和、折中、妥协，批判掩盖或者抹杀两个基本派别对立、歪曲两条基本路线斗争的倾向。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产阶级性。这就是直率而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公然申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思想武器。对待哲学上一切重大原则争论，都必须研究它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研究它同当时社会矛盾、阶级斗争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各种哲学思潮的社会阶级实质和它所起的客观阶级作用；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

的哲学，批判各种否认哲学带有阶级性的所谓“超阶级”、“超党派”的观点，同时还“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善于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①

这就是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性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的发展。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列举事实，说明马克思是坚持哲学党性原则的典范。列宁指出，早在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就写信给费尔巴哈，请他批判“妄想包罗和超越一切已往的哲学派别的”谢林；之后马克思就经过费尔巴哈直接走上反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道路；过了30年，即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同样明确地把他的唯物主义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即最彻底最发展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同时轻蔑地抛开孔德的‘实证论’”；此外，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对毕希纳、朗格、杜林、费希纳等人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等等，说明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开始向科学社会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过渡的时候，“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之后列宁认为在差不多半个世纪里，马克思恩格斯都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鄙弃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企图。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②

承认哲学的阶级性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早在1844年，在马克思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哲学时，就在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发表了一句名言，公开宣布了它的阶级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58页。

② 同上书，第355页。

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列宁说，这就是“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②也就是说，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同时，一开始登上哲学斗争的舞台，马克思就强调哲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斗争和革命实践的结合。他写道：“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③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马克思始终坚持这个原则，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政治的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④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和马克思也是完全一致的。如在1885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中，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⑤。马克思恩格斯对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思潮也作过阶级分析。例如，马克思说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不过是埃及种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的激进的启蒙者。恩格斯则说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法国革命的先导。19世纪德国哲学革命作了政治革命的前导。而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者休谟则是英国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等等。这里就包含有哲学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有联系，各派哲学都带有阶级性的思想。而且很自然地可以引申出研究哲学应当重视哲学和政治、哲学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联系，要分析哲学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和它的客观社会作用的结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7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同上书，第417—4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前提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政治学、法学、文学、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等）的党性原则就是从这两个理论前提出发引申得来的，而且彼此具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既然立论的前提是正确的，推理又符合逻辑，结论又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和现实材料检验证明了的科学真理，那末，这个原则就是可靠的，能够成立的，不可能被推翻。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不仅提出了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而且这部书本身就是自觉地贯彻党性原则的一个典范。

（一）整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指导思想，贯彻全书的一条红线，就是坚持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它以哲学基本问题为纲，把马赫主义“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①首先揭露了马赫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的唯心主义实质。接着从认识的对象、泉源问题，真理观，实践标准，物质观，经验观，运动观，时空观，世界统一性问题，自由与必然问题等方面，充分揭露了马赫主义如何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其重复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旧错误。最后则彻底贯彻唯物主义于社会历史领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代绪论》和《第四章》列宁着重做了这项工作。经过考察，列宁证明了马赫主义的血缘关系，它走的是从康德主义出发走向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它的方法则是折中主义，是无原则的拼凑的“大杂烩”。完成了对马赫主义的批判之后，列宁指出，发生在马赫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场争论，再一次证实了哲学是有党性的，写下了如下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论断：“在我们所涉及的每个认识论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74页。

题上，在新物理学所提出的每个哲学问题上，我们探究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词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是否把自然界、物质、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看作第一性的东西，而把意识、精神、感觉（用现今流行的术语来说，即经验）、心理的东西等等看作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实际上**仍然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这方面的成千上万的错误和糊涂观念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在各种术语、定义、烦琐辞令、诡辩字眼等等的外表下，**忽略了**这两个基本倾向（例如，波格丹诺夫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唯心主义，因为他所采用的不是‘自然界’和‘精神’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而是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这类‘经验的’概念。字眼改变了啊！）。”^①列宁的这个经验对于我们当代哲学研究中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各种哲学思潮，特别是那些打着重新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所谓“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主义”和“人本主义”，主张用这种或那种西方哲学来“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是有重要的方法论的启示的。

（二）特别强调贯彻哲学党性原则，必须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反对形而上学和诡辩论。在书中列宁一再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教育大家，如对“特别缺少辩证法”的费尔巴哈、杜林、毕希纳等人的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文中对实证论者、新康德主义者对黑格尔辩证法攻击的反驳，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评介，希望这位“大辩证论者”能帮助人们看出当时德国和英国的时髦哲学不过是在重复黑格尔以前的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所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旧错误；等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之所以能够坚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62页。

并发展唯物主义，纠正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啄出辩证法的珍珠，并把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也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正是运用辩证法揭露和批判了马赫主义玩弄相对主义、折中主义等诡辩，借口反对机械论、形而上学来否定唯物主义宣扬唯心主义的诡计，从方法论上划清了两种认识论的界限。同时，也正是由于运用辩证法才能超越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及时地、正确地、从哲学上概括当时物理学的新成就，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坚持并发展了唯物主义认识论。

（三）认为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必须实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提出了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修正”的深刻思想。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特别注意把辩证法贯彻于唯物主义认识论。他反复强调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而人类的实践也是不断前进、发展的，因而人类的认识也必然要随着客观世界和人类实践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人们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无穷地前进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曾详细论述过唯物主义怎样随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由古代素朴的唯物主义到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变化过程，对此，列宁是非常重视的。他写道，恩格斯直率地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那末，改变唯物主义的“形式”，叫不叫修正主义？列宁解释说：“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形式’的修正，对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

的自然哲学论点的修正，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的东西’，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我们谴责马赫主义者的决不是这样的修改，而是他们的纯粹修正主义的手法：他们在批判唯物主义的形式幌子下改变唯物主义的实质”^①。这就是说，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修正”：一种是用实践和科学的新成就、新经验来修正唯物主义某些过时的“形式”或个别“论点”，来充实、丰富和发展唯物主义，这是符合客观辩证的运动规律要求的正确的认识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贯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另一种是借口实践和科学的新成就或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新问题，以批判唯物主义过时的形式（如形而上学机械论）为幌子，攻击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改变它的实质，这是纯粹修正主义的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俄国党内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正是这样的哲学修正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失误的一个教训就在于不懂得要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修正”。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写文章批判马赫主义的代表，他的工作有成绩也有失误和缺点，未能制止住马赫主义的泛滥。粉碎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攻的任务是由《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完成的。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之所以未能完成任务，一个重要原因是普列汉诺夫理论脱离实践，不了解当时自然科学前沿、主要是物理学革命的最新成就，不了解“新物理学中的一些学派跟马赫主义和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变种有联系”，而马赫主义等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正是以所谓新物理学“驳倒了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就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概括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以反击马赫主义。列宁说：“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3—264页。

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也就是为了恩格斯的某个词句而牺牲恩格斯的方法。”^①什么方法？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联系或结合的唯物辩证法。而列宁之所以能够克服普列汉诺夫的缺陷，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彻底揭露和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实质，就是因为他能及时从哲学上正确总结当时物理学革命的最新成就，回答了新的实践对哲学提出的新问题，修正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既要反对歪曲实践否定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也要克服脱离实践使理论停滞、僵化的教条主义，真正做到理论与不断变化着的实践相结合。

（四）坚持阶级分析法，注意揭示哲学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联系，揭露马赫主义对当时俄国革命斗争客观上所起的消极的、反动的作用。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最后阐述哲学的党性原则时，列宁特别注意分析马赫主义和一些马赫主义代表人物对宗教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言论，以此来揭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场哲学斗争的社会意义。他写道：

“对宗教的态度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最好地说明了反动派确实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在利用经验批判主义。”^②列宁的逻辑是：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就必然拥护自然科学，主张无神论反对宗教神学；而否定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就是在客观上宣扬蒙昧主义，这正是宗教神学和信仰主义所需要的；可是宗教神学是为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问题不在于马赫个人对宗教的态度，而是以马赫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客观社会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一是着重揭露了政治上是布尔塞维克成员而在哲学上由于信奉马赫主义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卢那察尔斯基。他在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66页。

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提出所谓“造神说”、宣扬“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宗教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等等，正好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鼓吹的“寻神”等反动思潮相呼应，造成十分有害的政治影响。二是通过对比马赫等人（作为马赫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对待宗教和自然科学的态度（一方面认为“宗教的见解是私人的事情”，对宗教神学采取调和、中立的态度；另一方面则始终攻击“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即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说明“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①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结论、也是全书的最后一段话中，列宁明确指出：“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②

（五）揭露和批判“无党性”的虚伪性和反动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者公开申明自己哲学的党性相反，马赫主义者以“无党性”自夸，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者讲党性是偏见，是“狭隘性”、“片面性”，把马赫主义说成是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无党性”哲学。因此，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的同时，着重批判了哲学“无党性”的谬论，认为这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诡计”。

资产阶级思想家标榜“无党性”，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状况有关。作为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居民中是少数，本身力量不足。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联合工农劳动群众反对封建制度，它就曾标榜自己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把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利益，把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说成是全社会的“公意”。到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75页。

19世纪9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阶级矛盾激化，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在国际工人运动占主导地位，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抵制、反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思想，欺骗、蒙蔽群众，资产阶级更需要掩盖自己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的真理。所以从那时起，以实证主义思潮为代表，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极力掩盖自己的党性，一方面给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另一方面就标榜“无党性”、“超党派”，宣扬“客观主义”，吹嘘自己的哲学是如何全面、公允、不偏不倚、中立等等。而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了掩饰自己的动摇和背叛，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也需要玩弄“无党性”、“超党派”的口号来把各种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党内的代表们的表演就是一个典型。所以，“无党性”口号的出现和泛滥本身正是思想战线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

其实，宣扬“无党性”完全是虚伪的，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方法上是一种折中主义的诡辩。拥护“无党性”反对党性的人，不是有意混淆是非、制造混乱，就是思想糊涂，没有原则性。因此列宁讽刺之谓“哲学上的无头脑者”。拿马赫主义来说，无论是立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还是一系列认识论结论都渗透着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都是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列宁写道：“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么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奢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

路，替他们忠实服务。”^①所以，“无党性”不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哲学向无产阶级哲学斗争的一种策略，用以攻击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掩盖和保护自己的唯心主义罢了。

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是十分重要的思想遗产。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这一原则的理解、解释和运用确实存在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中国有一个时期党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发生过‘左’的偏差，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那时，对党性原则的理解、解释和运用确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主要是混淆哲学和政治，把哲学上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简单地归结为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强制哲学为政治上错误的理论、路线甚至具体政策作论证；结果造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来解决哲学问题，导致对一些理论问题的错误批判，甚至颠倒了是非，伤害了同志，严重挫伤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后来，在纠正上述‘左’的错误时，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又出现了否定列宁关于哲学有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的言论，主张哲学应当脱离政治，反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错误倾向。因此，正确总结列宁提出哲学党性原则八十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的基石——物质观

物质这个范畴是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历来哲学史上各种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反对唯物主义时的首要攻击目标。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曾引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贝克莱的话从反面证明了物质问题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57—358页。

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斗争中的战略意义,贝克莱说:“物质或未被感知的物的存在不仅是无神论者和宿命论者的主要支柱,而且也是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所依据的原则。”“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一切渎神体系是建立在物质学说或有形实体学说的基础上的……他们的一切怪异体系之依存于物质的实体,是如此明显、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这个基石抽掉,整个建筑物就一定倒塌。”^①因此,贝克莱在他的著作中集中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企图通过否定它来否定整个唯物主义。这当然是妄想。但是应该承认贝克莱的话确实是看到了唯物主义的要害,表现了他坚持哲学唯心主义和神学世界观的高度自觉的哲学上的党性。马赫主义和整个实证主义思潮也不例外。可以说,同他们的理论上的前辈贝克莱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贝克莱主教只是妄想借助诡辩来推翻物质概念,以维护上帝和宗教神学;而马赫及其追随者则是打着“20世纪科学哲学”的旗帜,企图歪曲利用当时物理学的新发现,通过攻击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陷从根本上推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针对哲学战线这一变化了的新情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学说,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理论的首要前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

一、对物质范畴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和唯心主义的各种精神本体论,坚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主张由万物所组成的世界是在人的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着,物质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本体、本质,即所谓物质本体论,这基本上是合理的。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水平和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确实存在

^① 《人类知识原理》,中译本第24、25页。

着严重的缺陷。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原始的实体、最后的质料，它是不可分的、无结构的、不变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这种最小的基质按不同的形式结合和分离造成的，所谓“终极的宇宙之砖”，物质之名由此而来。在西方，古代唯物主义认为原始的物质实体是地、水、火、风、原子；在中国古代则认为是五行（水、木、金、火、土）、气等等。直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革命（人类的实践和认识开始进入微观世界）之前，人们对物质的了解，在思想方法上，仍然没有超出古代原子论的水平。这就是把物质归结为某种原始的实体——原子，认为它具有广延性、不可分性、不变的质量、运动等特性。实际上是用物质系统的某种具体形态或某种属性来定义物质，把它归结为世界的本原，不了解哲学上的物质范畴应是概括物质世界所有层次、一切形态和共同属性的最高抽象，旧唯物主义观点等于是把白马等同于马，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再说，猜测存在着所谓“物的不变的实质”、“绝对的实体”的想法也是违背事实的，不了解物质世界是无限的，运动、变化、发展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此外，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也是不彻底的，不能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不了解社会形态的物质性和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对客观物质世界变化的意义。

所有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抓住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上述缺陷进行攻击，在这方面，马赫主义者的观点在现代哲学中具有典型性。他们直接继承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观点，根本否定物质的客观存在，说物质是“无”，是“未知的东西”。他们硬把唯物主义的“物质”同康德的“自在之物”混为一谈，攻击承认“物质”的存在就是“超越”客观现实，承认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陷入了“康德主义”，就是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说这是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形而上学”（即现时一些人称为“旧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根源。他们还污蔑唯物主义承认物质是“神秘主义”，是像宗教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神圣的物质”这个

偶像，是崇拜“物神”。他们还用相对主义方法歪曲现代物理学的新成就，如放射性元素和电子的发现等（这些科学事实打破了原子是物质存在的最小实体、质量不变、不可分等观念），以此作为否定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根据。当时一些物理学家的著作中确实根据新的实验事实同旧的物理学的物质概念的矛盾，说过一些不确切的话。如：“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①“电代替了物质。”^②等等。马赫主义者就据此轻易地引申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已经否定唯物主义的哲学结论。如俄国马赫主义者瓦连廷诺夫就写道：“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③与马赫等人有同一倾向的康德主义者柯亨也宣称，对实物的化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定会根本克服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电的理论一定會在物质观上引起最大的变革，并且经过物质转化为力而导致唯心主义的胜利。他们还用折中主义方法对物质作唯心主义的解释。把物质说成是不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独立存在的，是由人的感觉所构成和规定的、即由意识所派生的东西。马赫说：“对我们来说，物质并不是第一位的已有的东西。倒不如说，这种东西是一些要素（它们在某种已知关系中被称为感觉）。”又说：“实体、物质并不是无条件恒久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物质是各个要素（感觉）之间的某种合乎规律性的联系。”英国马赫主义者毕尔生则说物质是“比较恒久的感性知觉群”的“集合”。阿芬那留斯则根据“原则同格”的理论，把物质（物理的东西）看成是与自我（‘中心项’）处于不可分离的同格之中的‘对立项’。这就是说在坚持唯心主义‘经验要素’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承认‘物理的东西’的存在，但是把物质摆

① 法国物理学家，路·乌尔维格：《科学的进化》（1908年版）第63页。

② 意大利物理学家，奥·里希：《现代的物理现象理论》（1905年版）第131页。

③ 瓦连廷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1908年版），第67页。

到附属的地位，认为它是依赖于自我，不能离开我的感觉、经验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他们从逻辑上非难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波格丹诺夫就批判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是简单地重复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公式，言下之意是这违背了形式逻辑下定义所要求的属加种差的规则。

正是记取了历史上唯物主义在物质观上失误的教训，针对唯心主义特别是马赫主义对唯物主义物质范畴的攻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哲学上的物质范畴作出了新的概括和阐述。他写道：“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①应该说列宁的这个定义是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物质观，特别是近代唯物主义者诸如霍布士、洛克、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物质观，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狄慈根、普列汉诺夫等人有关物质的论述的合理思想，同时是从哲学（即世界观和认识论）上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新成果的一个总结。

首先，列宁的物质定义概括了世界上一切事物共同的特点和本质，确定了它们和人的意识之间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客观实在性。列宁强调说：“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②。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实在，既是从世界观上概括了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把握了世界的真实本原，又是从认识论上找到了认识的唯一的（最终的）泉源。一方面正确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统一；另一方面抓住了哲学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两条基本认识路线对立的实质，击中了所有唯心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3、148页。

主义的要害，从出发点和基本前提上同一切唯心主义以及二元论等折中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

其次，列宁在定义中指出物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其他很多地方，列宁还指明物质“是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为科学所反映”等等。这就是说，物质是可以认识的。不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从出发点和基本前提上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

再次，列宁在定义中强调物质是“哲学范畴”，客观实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这是从方法论上总结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考虑到了旧唯物主义在物质观上失误的教训，这就是不会辩证思考，不懂得哲学的物质观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关于物质构造等原理的联系和区别；同时也是在世界观这个思维最高层次上，对现代人类实践和科学已经展现的客观世界的辩证本性的科学抽象。列宁写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按照如何解答我们认识的**源泉**问题即认识（和一般‘心理的东西’）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而区分开来的，至于物质的构造问题即原子和电子问题，那是一个只同这个‘物理世界’有关的问题。”^①“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按：确切地说，应是新物理学产生后，少数物理学家在哲学世界观上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是恩格斯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实证论者即休谟主义者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澡盆里泼出去了。他们在否定物质的至今已知的元素和特性的不变性时，竟滑到否定物质，即否定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②“从恩格斯的观点看来，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4页。

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正是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存在于人的意识和感觉之外**这一点，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同相对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①所以，列宁在制定物质定义时，把辩证法贯彻于物质论，严格划分世界观认识论问题同具体科学问题的区别；既要坚持唯物主义，考虑到它同精神、意识、心理的关系，又要坚持辩证法，考虑到它是对客观世界自身的最高抽象。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基础，或者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归根到底就在于它是普遍的、无限的、永恒的客观实在。也只有对世界作这样的认识和概括，才能从个别中看到一般，从相对中找到绝对，从暂时中把握永恒，符合客观世界的辩证本性，从根本上驳倒一切唯心主义、相对主义、折中主义的诡辩，也才能彻底纠正旧唯物主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陷。

这样定义物质也就消除了所谓哲学和自然科学在物质观上的“矛盾”，达到了两者的一致。一方面，哲学上对物质范畴的正确规定，为自然科学探索宇宙的奥秘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提供了指导，不是阻碍而是促进科学家们不断加深和发展对物质的各个层次、结构、形态、特性、规律等等的研究；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之所以如此规定，正是以人类全部实践和科学所已证明了事实材料为根据，而一切实践和科学的新成就则将进一步证实和深化人们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认识，只能是丰富和发展哲学的物质观，而决不会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由于自然科学提出关于物质构造的新理论而受到唯心主义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本身是真正反科学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5页。

这样定义物质也纠正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不能贯彻于社会领域的不彻底性。列宁写道：“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①包括辩证唯物论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而其不可分割的基础就是包括社会历史领域在内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原理。可见，列宁的物质定义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能够达到客观真理的前提，尽管社会领域的种种物质现象和关系往往比自然领域复杂得多，更难把握，但既然是客观实在，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实践、感觉和思维去认识它们。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列宁坚决驳斥了波格丹诺夫要求对物质下定义不应重复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指责。他写道：“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极其广泛的概念‘系列’下一个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定义’。”^②因为哲学范畴，如：物质、意识等等，都是广泛已极的概念，本身就是最大的属，用“属+种差”那种形式逻辑下定义的方法是不可能的，只能根据同它相对应的概念的相互关系来下定义。客观事物是对立的统一，反映事物本质的概念也应该是对立的统一。拿物质和意识这对范畴来说，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最根本的就是谁是第一性的，即本原的，谁是第二性的即派生的。所以，给物质下定义就是：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是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等等；而对意识下定义就是：意识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态——人所特有的属性，是一块特别复杂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1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等等。其实，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对物质下定义也是“简单地重复”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如：物是“感觉的复合”，是“感性知觉”，是“感觉群”等等。只不过与唯物主义相反，是根据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来下定义罢了。至于像阿芬那留斯那样，标榜自己的“原则同格”理论是所谓“中性的”，说什么“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则是一种掩盖唯心主义回答的狡辩。列宁指出，“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①。因为，他一方面反对唯物主义的所谓“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下的‘物质’”，另一方面又主张物理的东西是和中心项（心理的东西）不可分离的对立项。列宁关于下定义的上述思想，不仅对于物质范畴，而且对于所有广泛已极的哲学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启示。

国内外学术界在评论列宁的物质定义时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列宁的物质定义只是认识论定义而不是本体论定义。有的则进一步把列宁的物质定义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物质的论述对立起来，说列宁讲的是认识论上的物质概念，而恩格斯讲的是本体论上的物质概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所谓本体论在其合理意义上就是世界观。如前所述，列宁的定义是体现了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统一。至于涉及恩格斯关于物质的论述，那末，众所周知，列宁生前未能见到《自然辩证法》（此书第一次发表是在1925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是这样写的：“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9页。

住”。^①只要认真对照一下，就可以认定列宁的观点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恩格斯说物质是一个抽象概念，列宁说物质是“哲学范畴”，意思一样，但列宁这样强调就更明确地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包括所有层次和一切物质形态即“各种实物的总和”的最高抽象）同具体科学的物质概念（即关于某一层次物质形态的抽象）区分开来；恩格斯说物质是一切事物的“共同属性”的概括，列宁则明确指出这种共同属性最根本的就是客观实在性；恩格斯说物质是“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列宁说“是人感觉到的”、“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都是贯彻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原则。所以，认为恩格斯是从本体论上定义物质，而列宁只是从认识论上定义物质，这种人为的分裂，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由于主要是讨论认识论问题，因而列宁特别强调物质问题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如说：“接受或抛弃物质概念这一问题，是人对他的感官的提示是否相信的问题，是关于我们认识的泉源的问题。”“他们否认物质，也就是否认我们感觉的外部的、客观的泉源，否认和我们感觉相符合的客观实在，这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解答。”^②但并不能由此就引申出列宁关于物质的定义只是认识论的，而不同时是而且应该说首先是本体论（即世界观）的。

有人引证恩格斯所说的“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存在着的東西。”^③以此为据来指责列宁的物质定义有狭隘经验论的缺陷。

的确，恩格斯说过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抽象”，“不是感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0—148页。

③ 《自然辩证法》，第233页。

存在着的東西”这样的话，但联系前后文就可以看到恩格斯说这话正是为了批评不可知论。他说：“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不能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他们是可以意识到的事物，而不是可以感觉到的事物，但是一切认识都是感性上的测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困难：我们当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抽象的水果。”^①然而恩格斯说“这是一种可怜的遁辞”，是一种经验论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当不可知论者说物质本身是不能感觉到的因而是不可知时，其错误在于：一是把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了，不懂得它们的辩证关系，不懂得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个别之外，只有通过认识个别才能认识一般，认识到了个别也就能认识到一般。所谓认识，不仅是感觉经验而且是理性思维。人们通过对从感觉得来的大量个别的、具体的感性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就能够从中抽象出一般，即对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及其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来。正因如此，所以列宁说，物质、自然规律等“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②二是把各种运动形式人为地隔开，不懂得事实上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因而人借助实验仪器作为联系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客体的中介，靠感官不能直接感觉到的运动形式就完全可以转化成为我们能够感觉到的运动形式。例如，通过望远镜和显微镜就能观察到单凭感官不能感觉到的天体和微观粒子。至于列宁在物质定义中强调物质“是人感觉到的”，那也是为了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说明物质不是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康德），而不是认为物质的存在局限于感官所能直接达到的感觉经验的“现象”的范围。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2页。

实，只要不是孤立地摘取片言只语加以挑剔，而是完整地研究列宁的思想，那就很容易发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多次提到物质是“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等等。所以，指责列宁的物质定义有狭隘经验论的缺陷是没有根据的。

有一种观点批评列宁的物质定义是素朴、直观反映论的观点，是旧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的倒退。理由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只适合于人类产生以前的、或原始人所面临的原始的、“纯粹的自然界”，而现存感性世界即人周围的现实事物是经过人的实践改造的或创造的，它是人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人的需要、愿望和意志，因此，对这样人化了的世界就不能再简单地说它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就不存在什么客体，物质是主客体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统一。有人还说，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本原），是指人类出现以前的自然界，而不是指桌子等人造的东西，可是列宁说的“物”、“世界”、“环境”、“客观实在”，却把一切认识的对象都包括进去了，如此等等。其实这种观点是似是而非的。

确实，列宁所定义的物质、客观实在，它的外延是指人的意识之外的整个现实世界（包括物质实体的人在内），它是相对于意识、精神而言的广泛已极的最高范畴，其中不仅包括人类出现以前的原始自然界，也不限于迄今尚未“人化”的那部分自然，而且包括所谓“人化自然”在内。这里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人化自然”。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的术语^①。它的涵义是指经过人的实践、生产劳动加工改造过的那部分自然，其中包括在原始自然中没有原型，完全由人创造发明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各种产品，即所谓“人造自然”。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主要是用它来说明人的本质，说明人类所特有的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如他说：“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①但能否引申说这种再生产的自然界不包括在列宁所说的“物质”之内，不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呢？当然不能。第一，实践的对象、自然界、外部世界是在实践之前就已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是实践得以发生的首要物质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②这是构成“人化自然”新的物质实体（原材料、能源）的基础，第二，实践本身是一种客观性的物质活动。劳动、生产能力是一种特殊物质实体——人所特有的运动形式、存在状态和本质属性，实质上是用包括人自身的体力、脑力在内的自然力去反对自然力，用一些物质力量去改变另一些物质力量，是物质的相互作用，因而人在实践过程中必须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而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胡作非为；第三，人的实践当然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所支配，表现为需要、欲望、理想、意志、激情等等，构成行为的动机和预想的目的，然而这些都不是人生来就有的、固定不变的、纯粹主观的东西，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同他的生存、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界、社会和其他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必然联系及其反映，也就是说，指导实践的意识同样有其物质根源；第四，实践的产品不是观念的东西，也不是意识的派生物，而是物质、客观实在的一种新的形态。经过实践，由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对象的认识，结合主体自身的状况（能力、需要、理想、意志、情感等等），再在头脑中构思、设计、创造的计划、方案、蓝图等等观念的东西，已转化成为物质的东西，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② 同上书，第96、92页。

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已凝结在对象之中，精神已经转化为物质，主体因素已经客体化、对象化、物化了。而一旦自然物、原始材料经过加工制作被再生产出来成为新的实物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它就已经是不以任何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因而，一切人工改变和创造的事物，并不是什么“主客体不可分割的联系”，也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具有主客体双重本质的折中主义的混合物，而是地道的客观实在，已成为整个物质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也是以后人类实践的物质前提。第五，只要实践在继续，已经人化的自然，完全可能再人化。另一方面，自然力量的自发作用，以及对人类盲目实践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可以使“人化自然”被毁灭。迄今为止，人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抵抗能力仍是很有局限的。所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无论人类的实践如何发展，包括“人化自然”在内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①所以，借口人的实践、意识等主体的能动性来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否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列宁对物质所下的客观实在的定义是完全错误的。而所谓物质是主客体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统一，等等，一是夸大了实践的作用，歪曲了物质和实践的真实关系，用实践取代了物质的本体地位，使实践成为物质之上之外“创造”物质的神化了的绝对；二是用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主客体关系（所谓“不可分割的联系”）偷换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上的物质和意识关系，实际上是重复了阿芬那留斯“经验原则同格”的错误。至于在这个问题上人为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对立起来，指责列宁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后退，也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无论对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的思想都是一种曲解。

现在还有一些人对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否适合于微观世界提出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了怀疑，甚至作出了否定的结论。他们宣传说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同科学相矛盾的。因为据说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人们不能凭自己的感官直接观察、感知微观世界，对微观粒子的认识必须借助电子显微镜或其他实验仪器作为中介，这样就存在着仪器对被观察物体——电子或其他微观粒子存在状态的干扰，结果(?)就造成了所谓电子“奇怪的行为”，即测量它的位置时，就必然干扰它的运动，使它的动量或速度成为不确定的。反之亦然。有人就借口这个所谓的“科学事实”引出结论说，离开了人的观察来谈电子是什么是没有意义的。“电子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它，我们不能离开人的感知（包括使用眼、手和各种感官的延长——仪器）来谈事物的性质。那种独立于我们感觉和意识之外的客体或性质只是一种古老的幻梦！”甚至公然宣称：“实验结果明显倾向子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月亮在无人看它时确实不存在！”“只有承认存在就是被感知。”“唯物主义今天已经被证伪了！”等等。显然，他们所要否定的不只是列宁的物质定义，而是整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种观点所依据的不是科学事实，而是对科学原理的严重误解甚至曲解。所谓“测不准原理”，准确的译名应是“不确定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根据推导和证明这一原理的物理学家海森堡的论述，它的本意是说明微观粒子具有与宏观物体不同的特性，这就是它的位置（坐标）和动量（速度）具有不确定性，它的状态是用某种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的， $\Delta q \cdot \Delta p \geq h$ 。（其中 Δq 代表微观粒子在空间坐标分布上的不确定量， Δp 代表微观粒子的动量分布的不确定量，而二者的乘积必大于或等于某个确定数值 h ，即普朗克常数。 h 的值是 6.626×10^{-27} 尔格·秒。）因此，这个原理所涉及的只是微观粒子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完全不依赖于人们是否对它进行测量。换句话说，不能认为，“观察仪器的干扰”或“测量”是产生电子“不确定性”这一

“奇怪的行为”的原因。按照海森堡自己在《量子论的物理原理》中的解释：“测不准关系所讨论的，是在量子理论中同时测量几个不同量的精确度问题。这一关系对单独测定位置或速度的精确性并无限制，它的作用只表现在：任何一个测定位置的实验，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对于速度的认识。”^①所以，把不确定原理（或称为“测不准关系”）解释成是仪器的干扰造成了电子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引申为“在量子世界中，被测客体与观测仪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主体和客体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等等，企图以此作为否定物质是不依赖人这个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的论据，完全是对科学理论的一种歪曲。

其次，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一种诡辩。微观物质是否是在人之外、不依赖人的观测、感知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而人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必须借助于仪器作为中介，因而存在着仪器与认识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到人不能同时测准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一个认识的精确度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二者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混淆的结果导致把人对微观客体的认识必须依赖于仪器，歪曲、夸大为微观物体本身的存在须依赖于仪器，而仪器又被归结为主体的一部分，它是感官的延伸，是由作为观测者的人所制造和操作的，这样就轻而易举地经过貌似全面、折中的原则同格式的主客体的统一，最后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否定唯物主义。所以，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思想，不过是重复马赫、阿芬那留斯、贝克莱等的唯心主义诡辩而已。

综上所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的定义是正确的、全面的，是物质范畴的唯一合理的规定，不仅得到现代唯物主义者的赞同，也得到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拥护。当然，

^① 《量子论的物理原理》，第16—17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将不断扩大和深化，哲学上对物质的概括也会不断修正、充实、发展，定义也会更加精确，但列宁的基本思想是人类全部实践和逻辑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永远不会过时。

二、对实体、运动等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不仅对物质范畴作了科学规定，而且结合对马赫等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阐发了与物质观直接有关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实体、运动、时空、因果性、必然性以及世界统一性等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一）关于实体。实体这个范畴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亚里斯多德最早明确提出并加以论述的。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探讨世界的存在和本原的学说，制定了实体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十类范畴中最基本的核心范畴。亚里斯多德认为实体是一切存在物生成、变化的基础，它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东西而客观独立存在着。对于其他范畴来说，实体是主词，即一切属性的承担者、主体，而其他范畴都是作为属性、作为宾词依赖于它、说明它的。他又强调个别具体事物是“第一性实体”，是最根本的、最真实的存在，而包含个别具体事物的一般“属”和“种”则是“第二性的实体”。第一性实体是第二性实体和其他一切属性范畴的基础。这些思想包含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素朴的观点和倾向。但亚里斯多德认为第二性实体并不存在于主体里面，属性变化时，实体却是不变的；还认为只有形式才是真正的现实的实体，形式高于、先于质料；还主张“灵魂”也是一种实体，并最后推导出“在感觉事物之外有一个永恒不变动而独立的实体”^①，这个实体是没有质料的“形式的形式”，是万物最终的目的，是“第一推动者”——神。这些观点带有明

^① 《形而上学》第12卷，第7章1073a3—4。

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在亚里斯多德之后，经过中世纪到近代、现代，在西方哲学史上实体问题和本原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一直是围绕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各派探讨和争论的热点和焦点。

在实体观上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唯物主义坚持实体的物质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培根、霍布斯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时所指出的，“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①唯心主义则把实体理解为上帝或精神性的东西，或者根本否定实体概念。马赫主义在实体问题上如同物质、经验问题一样，直接继承了贝克莱、休谟、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他们攻击唯物主义的实体概念“是旧的非批判观点的残余”，是同物质概念一样的陈腐观念，必须予以消除。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一书中写道：“物体除了颜色、声音等等要素的结合以外，除了所谓属性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人们“习惯于认为物体的一切特性都是由常久核心出发，通过身体的中介而传到自我的‘作用’，我们把这种作用叫做感觉。可是，这样一来，这些核心便失去了它们的全部感觉内容，变成赤裸裸的思想符号了。……就是完全无用的和多余的了。”^②可见，马赫是将物质的属性和实体割裂，否认作为特性的载体的实体（即所谓“常久核心”）的客观存在，同时将物、客体的属性及其对主体的作用归结为人的感觉。对此，阿芬那留斯说得同样明确。他在《哲学是按照费力最小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一书中写道：“人们主张我们没有这个隐藏着的实体就不能理解我们之外的存在”（109节），但是“根据费力最小原则，却必须逐渐地、日益可能地抛弃这种解释。”（110节）“就是说，在思维的成长过程中，必定要达到一点，开始意识到所谓物的性质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

② 《感觉的分析》第5页、第9页。

是感觉主体的感觉；这样，性质就不再从属于物本身，……”（111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实体表象看作被取消了的。”（115节）“实体消失了，还剩下感觉；因此应把存在者设想为感觉，感觉是不再以无感觉者为基础的。”（116节）^①可见，阿芬那留斯认为，为了否定物及其属性的客观存在，就必须否定实体。俄国马赫主义也是如此。如尤什凯维奇宣传所谓“新”经验符号论，主张外部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是认识的“经验符号”。“就象时间、空间、质量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不是物体、实体；能量是常数，是经验符号”^②。可见，马赫主义者在否定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时，除了把物质客体所固有的各种属性归结为主体的感觉（“经验符号”也一样）外，一个重要做法就是否定唯物主义意义下的实体范畴。

列宁没对实体范畴作专门的系统的论述，也没有对实体范畴作明确的正面的界定，但从他批判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实体观中可以看出他是肯定唯物主义实体观，并以辩证法思想来研究实体范畴，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体观。

一是列宁指出马赫主义在“实体”问题上的“新”思想，其实不过是二百年前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重弹。贝克莱在1710年出版的《人类知识原理》中就明确否定唯物主义的实体概念。他写道：“实体一词如果是取其通常的意义，即如果是指各种可感性质的合体而言（类如广袤、凝固、重量等的合体），那末人们便不能诬我们把实体去掉。但是实体一词如果是指哲学的意义，如果是指支撑心外各种附性（或性质）的一种东西而言，则我切实承认，我们是把它去掉了，——如果根本不存在，甚至不存在于想象中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去掉的话。”（第37节）所以他攻击物质是“虚无”（第80节）^③，是“不存在的实质”（第68

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中册，第721—7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71页。

③ 《人类知识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4、64页。

节)。然而贝克莱并不否认一切实体,而是在否认实体的物质性的同时,明确主张实体就是精神。他说:“观念的原因:……它不能是有形的或物质的实体,因此,我们只得说,观念的原因乃是一个无形的、自动的实体或精神。”(第26节)^①可见,贝克莱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自觉地意识到哲学上存在着两种实体观的对立;根据他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原则,实体就是感觉的集合;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作为事物各种性质的基础和“支撑”的实体是不存在的。而根据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则恰恰相反。所以,实体观上的对立,不是一方承认实体,另一方否定实体,而是对实体的不同解释。唯物主义坚持实体的物质性,而从贝克莱到马赫的唯心主义路线则把实体和物质的各种属性一样,归结为人的感觉,坚持实体的精神性。

二是列宁尖锐地批判了阿芬那留斯的诡辩。列宁写道:“感觉可以不要‘实体’而存在,也就是说,思想可以不要头脑而存在!”^②阿芬那留斯是替无头脑的哲学作辩护的哲学家中的一个。而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感觉和思想是一种特殊的实体(人脑)的机能。因而否定物质实体就必然使人的意识活动失去真实的承担者而导致认识论的唯心主义。

三是纠正旧唯物主义在实体观上形而上学绝对主义的缺陷,把辩证法贯彻于实体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写道:“空洞的教授哲学所描述的任何其他的‘实质’、任何‘绝对的实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都是不存在的。物的‘实质’或‘实体’也是相对的;它们表现的只是人对客体的认识的深化。”接着,列宁还特别说明:“这种深化昨天还没有超过原子,今天还没有超过电子和以太,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

^① 《人类知识原理》第34页,2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3页。

的、近似的性质。”^①这就是说，1. 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否定实体的客观存在，恰恰相反，它坚持所有唯物主义的共同立场，主张实体是客观实在，它是构成物质的一个要素，与其他要素（运动、时空、属性、关系等等）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其他要素的承担者、载体、主体，在物质系统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2. 辩证唯物主义扬弃素朴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在实体问题上的反辩证法的绝对主义错误，认为任何“物的不变的实质”、“绝对的实体”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物的相对的“实质”或“实体”。这是因为由无数实物的总和所构成的物质世界是个无限广大的系统，其中各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组成部分，存在着的是由不同的内部矛盾所规定的各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所有物质运动的实体既具有共同的本质——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是物质系统诸要素——运动、时空、属性、关系、信息、规律等等的承担者、载体，这些要素都依附于实体，都是实体的表现和存在方式，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同时，作为各个不同层次上的特殊运动形式存在的基本单位，各个具体实体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实体的特殊本质，这就是说，实体的具体存在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例如：天体、人、生物有机体（从物种到蛋白质、核酸等大分子、无机物、分子、原子、光、电等微粒子 and 场等等，就是代表着各种物质运动基本单位的不同实体。3. 人们对实体的认识，和对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一样，也是不断深化的，不可穷尽的。因而，所谓“不变的实质”、“绝对的实体”、“终极的元素”，等等，在认识论上也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既不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也不符合实践所证明了的人对实体的真理性认识。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又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从认识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实体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应该从认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6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物质深入到认识（理解）实体，以便探究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我们的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这里已把实体认定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对它的认识需要不断探究和深化，进一步肯定了实体作为一个哲学认识论范畴的意义。

上述列宁关于实体的理论是立足于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吸收了哲学史上关于实体认识的合理因素，又排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歪曲，形成了既唯物又辩证的实体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贡献。现在国际和国内哲学界中都有人主张实体范畴是旧本体论的概念，已经过时，应予抛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也有人认为无需在物质概念之外再加一个实体范畴，唯物主义的实体就是物质。因此，研究列宁关于实体的理论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运动、时空、因果性、必然性以及世界统一性。除了物质和实体以外，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有关物质观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如运动、时空、因果性、必然性、世界统一性等等，也存在原则的分歧。马赫主义者以歪曲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为论据，批判旧唯物主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陷，制造了很多唯心主义观点。如，借口原子可以分裂，电子的质量与运动速度有关等物理事实，宣传“物质消失了”，主张没有物质的运动；利用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批判，夸大时空概念的可变性、相对性来否定时空的客观实在性，主张时空“是感觉系列的调正了的体系”，“是感知物的方式”^①；公开否认自然界的因果和必然性，宣传只存在逻辑的必然性，规律是“由人类理性加给自然界的”^②；世界统一性是人根据自己身体和精神的稳定性推断的，是按照“费力最小”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62、168页。

② 同上书，第172页。

则、即思维经济原则对世界的要求，等等。

列宁认真研究并吸取了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有关科学问题所作的唯物主义解释，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提出了以下一些重要论点：

1. 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自然界中既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① 物质实体是运动的承担者、主体，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原子的分裂和放射，电子的发现，质量与运动速度有关等等物理事实，不是“物质消失了”，而是人类对物质结构、物质运动认识的深化，它说明物质运动具有无限多样的形式，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确证。质量和能量都是物质的属性，既不能把质量等同于物质，也不能用能量来取代物质。“唯能论”的错误在于夸大能量的作用，企图以此否定物质的客观存在，取消哲学基本问题，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关键是它不能正确认识物质、能量和运动之间的关系。想象没有运动的物质，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都是错误的。

2. 时空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物质实体是时空的承担者、载体，运动是时空的本质。脱离物质运动的时空和没有时空的物质运动都是不存在的。时空是可以认识的。时空概念对客观时空的反映是近似的、相对的、可变的，但它们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马赫等人根据相对主义原则建立时空的认识论，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人类实践是时空客观实在性的证明。

3. 因果性、必然性问题上分歧的实质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唯物主义从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个前提出发，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承认人类的因果性、必然性观念是客观世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在人脑中近似正确的反映；唯心主义则从意识、理性、逻辑等等中引出自然界的秩序和必然性，否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16页。

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马赫主义重复康德和休谟在因果性问题上的不可知论的错误，并滚向唯心主义。要坚持恩格斯的思想，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因果和必然。如，在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因果就融化为普遍相互作用，必然性是在无穷无尽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等等。

4. 世界统一性问题上同样存在两条路线：或者从思维中，或者从客观实在中，得出世界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主张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马赫主义实际上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人的感觉。把思维经济原则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把主观设想的“费力最小”、“经济”、“简单”作理论概括的根据和真理的标准，只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不过马赫的思想是混乱的、折中主义的，当他将思维经济定义为“事实的经济陈述”时，就包含有唯物主义因素。

从上所述可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针对当时自然科学新发现所提出的新问题和哲学斗争出现的新情况，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比较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为后人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的基础——反映论

作为论战性的著作，列宁在1908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论战对象和任务，既不同于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不同于1878年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前者的论战对象是青年黑格尔派，实际上是清算马、恩以前的哲学信仰——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当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马、恩特别注意的是如何把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这个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倒立着的辩证法取

出来，再把它倒过来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以此作为方法去研究社会历史，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历史唯心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而后者的论战对象是杜林，主要是通过对杜林的由庸俗唯物主义、先验主义、形而上学方法和历史唯心主义等拼凑而成的折衷主义的哲学体系的批判，全面地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可是列宁当时的论战对象是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者，主要是通过对用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等方法掩盖其唯心主义经验论实质为特征的马赫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捍卫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一、对反映论的坚持和发展

由于马赫主义者在认识论上遵循的是从贝克莱到休谟的唯心主义（感觉）经验论路线，集中攻击唯物主义反映论，因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特别强调并反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反映论的基本思想。一方面注意保护已往的唯物主义哲学（从狄德罗、费尔巴哈到狄慈根、普列汉诺夫等），吸取他们有关反映论和反对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合理思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把实践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注意克服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陷。

什么是反映论呢？

反映论是所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虽然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思想带有素朴的直观的特点或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但其中包含的基本思想是合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是肯定和坚持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观念的东西不过是反映在人脑中，被转换成了思想形式的物质世界。”^①恩格斯说得更彻底：“一

^① 据德文版和英文版重译，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①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开头，列宁就明确宣布自己的反映论思想是直接来源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②的思想。

列宁极其重视反映论在认识论中的地位，明确规定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如说“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③。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也就是人在认识永恒运动着和变化着的物质方面的唯物主义反映论”^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⑤。根据列宁的论述，反映论大致包含以下几点内容：

1. “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⑥。它是人的认识的最终的（唯一的）泉源。承认这一点是反映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

2. “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⑦

3. 意识的本质是外部世界的主观映象。它是通过认识主体（人）和认识客体（对象、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在人的头脑里发生的各种心理、精神过程的总和。它的特点是以感觉、知觉、表象、思维、情感、意志等主观观念形式，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特性、本质、规律以及主客体的关系。（除反映一词外，用再现、反射、复写、摹本、摄影等词也可以，所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无非是对意识活动的一种象征性的、比喻性的描述。）

4. “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⑧通过反映，人必须而且可能达到客观真理，即达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1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④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8页、第1页、第101页、第238页。

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153页。

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0页。

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

以上四点基本上是包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内的所有唯物主义反映论所共同具有的观点，也是它们不同于所有唯心主义认识论以及不可知论的所在。但是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停留于已往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而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密切结合同工兵斗争的实践，把反映论推向前进，发展成为既唯物又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论。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来看，重要的发展有以下四点内容：

（一）根据反映论的原则，系统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经验的理论，深刻批判了马赫主义的感觉、经验论。马赫在哲学上所遵循的是贝克莱的从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它的特点是极端夸大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把客观现实与主观感觉的实际关系颠倒了，主张感觉是本原、是第一性的，而对象、物、物体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因此，感觉是马赫主义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它的基石，如同物质这个概念是唯物主义的基石一样。马赫的代表作就是《感觉的分析》。只要对照一下贝克莱和马赫关于感觉的言论，那就可以看到，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等，和马赫的物是“感觉复合的思想符号”、“世界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即所谓“自然界的要素是感觉”）^①。“第一性的东西只是要素（要素在某种确定的意义上叫作感觉）”^②，以及阿芬那留斯的自我和环境的“原则同格”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一重点，就是根据反映论的原则，结合对贝克莱到马赫的唯心主义感觉论的批判，系统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感觉的理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2页。

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第696页。

一是如何认识感觉的本质。针对马赫关于“世界仅仅是由我们的感觉构成”的观点，列宁明确指出：“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物、环境、世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和任何人而存在着。”它是感觉的源泉。“感觉是客观地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结果”。“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①

二是如何认识感觉能力的起源，即从生物到人的感觉能力的发生和发展。这是当代自然科学的一大难题。马赫主义利用现在人类还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干脆在哲学上排斥感觉的起源问题，武断地声称：“对我们来说，物质并不是第一位的已有的东西。倒不如说，这种东西是一些要素（它们在某种已知关系中被称为感觉）。 ”^②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因为以明显形式表现出来的感觉只和物质的高级形式（有机物质）有联系，而‘在物质大厦本身的基础中’只能假定有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③对于科学实践尚未解决的问题，决不能像马赫那样用混乱的唯心主义来取代科学，“用‘要素’这个空洞的狡辩的辞令把问题弄糊涂，使它离开正确的途径”。而是应该采取严肃的尊重科学的态度。他写道：“对于那种看来完全没有感觉的物质如何跟那种由同样原子（或电子）构成但却具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感觉能力的物质如何发生联系的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再研究。唯物主义明确地把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从而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推动人们去作进一步的实验研究。”^④

三是如何认识感觉的生理机制、即主体感觉能力的物质基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65页、64页、118页。

② 《感觉的分析》，第188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9页、40页。

（生理机制）。机械唯物主义特别是庸俗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确有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则利用这种错误通过相对主义的方法来宣传唯心主义。说什么“用感觉即心理要素构成任何物理要素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不能设想，任何心理体验怎么可以由现代物理学所使用的要素即质量和运动构成。”

“应当把存在着的東西设想为感觉，在它的基础中没有感觉以外的任何东西。”^①甚至公然否认感觉和思维是头脑的机能和产物，这个科学和实践早已证明了的常识问题。对此，列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它“不在于从物质的运动中引出感觉或者把感觉归结为物质的运动，而在于承认感觉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一种特性。”^②事实是：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感觉依赖于大脑、神经、视网膜等等，即依赖于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物质。这就是说，感觉本身不是物质，但也不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東西，它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是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人脑的机能、产物。当然要揭示感觉和人脑之间联系的一切条件，有待于科学不断地实验和研究。

四是如何认识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针对马赫主义极端夸大感觉的作用的错误，列宁指出：“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③这就是说，感觉确实在认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意识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它是认识的起点，是构成一切复杂的意识现象的基础，没有感觉就不可能有认识。另一方面，感觉本身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种意识形式。这个意识事实不是头脑所固有的，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根源于物质（外部刺激力），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正因为物质、客观世界是感觉的真正泉源，所以感觉才能成为联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0、43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系意识和客观外界的桥梁，才能成为物质变精神的第一步。当然，认识不能停留于感觉，还有待于深化、发展到思维（理性认识）。

与此相反，“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象，而是看作‘唯一存在的东西’。”^① 贝克莱、马赫等等唯心主义感觉论者，都标榜自己最重视感觉的作用，然而正因为他们违背了反映论的原则，极端片面地夸大感觉的作用，用相对主义、折中主义等各种诡辩手法，或者是把物和物的特性割裂，把物及其特性和感官的相互作用同这种作用的结果即对这种作用的反映——感觉混为一谈；或者是用感觉的相对性来否定感觉内容的客观性，把人对物从其特性的认识离不开感觉、夸大客观事物的存在离不开感觉。总之是使感觉脱离了它的真正泉源——物质、客观世界，并本末倒置地把感觉设想为构成对象、物、物体的第一性的东西。结果就走向反面，本来是联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桥梁，变成了隔离双方的墙壁；本来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被颠倒成为“唯一的存在”。可见，要正确认识感觉的本质和作用，关键不仅在于是否承认感觉是认识的源泉（这对于批判唯理论是特别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于是否承认客观实在是感觉的源泉。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是唯物主义同贝克莱、马赫等等唯心主义经验论两条认识路线分歧的实质所在。

与感觉问题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经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贝克莱和休谟的唯心主义经验论，

“经验批判主义”正是由阿芬那留斯的代表作《纯粹经验批判》得名的。把经验和批判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是模仿康德，借以表明自己的哲学同所谓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对立，标榜自己的哲学是以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5页。

用，关键要看它如何处理经验和物质世界的关系。

（二）明确提出实践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因而当然也就是反映论的基础。这是从根本上突破了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局限。马赫主义者否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和可以认识，并据此攻击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批判了马赫主义的不可知论立场，坚决捍卫了恩格斯关于对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驳斥得最彻底的就是实践”的重要论点，并进而引申出著名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即：1. 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2. 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3. 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識。列宁写道：“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物主义自觉地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基础。”^①“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②“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③。关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贡献，本章第五节将专门加以论述。

（三）把辩证法运用于反映论。上面已经提到，列宁关于认识论的三个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强调在认识论上应该辩证地思考。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诡辩论，是列宁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1页、144页、195页。

列宁之所以特别重视在认识论中贯彻辩证法，除了吸取旧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教训之外，也是吸取了普列汉诺夫的教训。普列汉诺夫是当时俄国马赫主义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也是最早起来批判马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收效不大，而且批判很不彻底，还经常出错。之所以如此，从认识论上来说，就是因为他多半是从一般唯物主义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没有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因此，列宁认为，要批判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关键是在认识论中贯彻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马赫主义的认识论。

在《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中，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阐明了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如：在制定物质概念时注意纠正旧唯物主义机械论的错误，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一般）和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结构的学说（特殊）区别开来，把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分清物质和意识在认识论上对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在运动观上既坚持运动的客观实在性，主张运动是物质不可分离的特性，反对关于存在脱离物质的运动和不运动的物质的观点，又注意纠正机械论把运动归结为某一形式的错误，批驳把运动简单化的看法，宣布“原子的可破坏性和不可穷尽性、物质和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的可变性，一向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①强调人的认识就是对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在时空观上既坚持时空的客观实在性，又承认人类的时空观念的相对性和可变性。在实践标准问题上，既坚持这一标准的客观意义，反对对实践标准作主观解释，又注意防止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提出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真理观上既坚持客观真理的立场，又深刻阐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95页。

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法，等等。（这些内容在本章各节中分别展开论述。）特别重要的是列宁在书中进一步发挥了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的观点，他把自由观和真理论结合起来，指出：“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同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指出，必然可以转化为自由，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跳跃”^①。“在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在人脑中客观正确的反映的结果，它证明这个反映（在实践向我们表明的范围内）是客观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②这种观点既克服了抽象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应该说，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的一个范例，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精华。

在书中，列宁还特别注意运用辩证法来剖析马赫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马赫主义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折中主义。表面上它似乎凌驾于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和路线之上，声称“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强调主、客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对“心物二元论”等等；同时制造一些抽象的、可以两解的，或者是生造的、含糊不清的名词、概念，如：“经验”、“要素”、“原则同格”等等，把“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唯物主义的个别结论混在一起”，给人以一种全面的假象，以此来混淆物质和精神这两个认识论上的基本概念的原则区别，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实质上是在所谓“没有片面性”、“超党派”、“中立性”等伪装的掩盖下，搞无原则的拼凑、杂乱的混合，继续坚持唯心主义。所以，列宁说这是一种“认识论的诡计”，“哲学诡计”，是“调和派的骗人把戏”^③。在书中，列宁运用唯物辩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95页、196页。

③ 同上书，第358页、360页、366页。

证方法来揭露和批判马赫主义的折中主义是贯彻始终的。马赫主义的另一主要方法是相对主义。这表现在,一方面是攻击并夸大旧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绝对主义错误,完全否定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另一方面是以感觉和科学原理具有相对性为论据,否定认识的客观真理性,主张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书中,列宁明确指出,相对主义是马赫主义及所谓“物理学的”唯心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通过对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列宁反复阐明了辩证法同相对主义的区别。此外,列宁在书中还熟练地运用矛盾分析法,从前后、正反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做到了历史的和逻辑的统一,全面彻底地揭露了打着“科学哲学”旗号的马赫主义的反科学的真实面目。

(四) 为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框架(雏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认识论有很多精辟的、深刻的论述,但分散在很多著作中。列宁通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把它集中起来、系统化了。通过对反映论的系统的论证,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以此为主导线索,加上对物质、感觉、经验、因果性、必然性、自由和必然等一系列范畴的论述,加上真理论,加上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的论述,就为我们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框架(雏型)。其中包括:认识的泉源、对象、本质、内容,认识的基础、目的,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内在矛盾和辩证发展过程,以及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的原理(即“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盲目地、尚未被认识的“自在的必然性”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的必然性”。“从理论到实践的跳跃”,通过实践人类从“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变成为统治“自然界的主人”)等。后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认识论专著,可以说,都是以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提供的这个框架为基础或蓝本,对列宁所提出的重要结论和原理加以解

释、发挥和进一步系统化，并根据实践的新经验和哲学斗争的新情况再作补充、修改和发展。

二、对马赫主义经验论（“要素”、“原则同格”）的批判

“要素”是马赫哲学的核心概念。为了掩盖自己和贝克莱之间一脉相承的思想联系，马赫在1883年提出了“要素”的理论。他认为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物体和自我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物体或自我不是第一性的，第一性的东西是要素，世界是由要素构成的复合体。要素复合体分为三类，一类叫做物体，由颜色、声音、压力、时间、空间等等要素组成，用字母ABC…来表示；另一类叫做身体，由耳、眼、鼻、舌、皮肤等生理感官和神经系统等等要素组成，用字母KLM…来表示；再一类叫做自我，由记忆、印象、情感、意志等等要素组成，用 $\alpha\beta r$ …来表示。他说：“通常把组成自我的复合体 $\alpha\beta r$ …KLM…与组成物质世界的复合体ABC…置于对立的地位。但是有时只把 $\alpha\beta r$ …视为自我，把KLM…ABC…视为物质世界。初看起来，好像ABC…是离开自我而独立的，并且是与自我相对立的，可是这种独立性只是相对的，一经细究，就消失了。”这就是说没有离开自我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其所以这样，是由于这几种要素复合体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着的。“同一物体的物质似乎为我们的身体所改变，以我们的身体为条件。”“ABC…总是由KLM…共同决定的。”因而“我们只能回答说，不同的KLM…与不同的ABC…相结合。”而且，“这两种联系不是单独地存在着的，而是一起存在的。我们只能暂时撇开这种或那种联系。因此，看来连那些纯粹力学的过程往往也是生理学的过程。”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由于“一切复合体所含有的要素是同类的。”

“在物理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里，并不是题材不同，只是探求的方向不同罢了。”“ABC…中和 $\alpha\beta r$ …中的基本成分是相同

的……，只是它们相互联结的方式不同罢了。”“简言之，整个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就都是由少数同类的要素所构成。”他把这比喻为是“一团胶质”，并且声称在要素这个概念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消除了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对立起来的“二元论”。^①因此，

“要素论”是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之上的没有“片面性”的哲学。所谓要素，从马赫著作中大量论述看，就是感觉。如说：“自然界的要素是感觉。”^②“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一切‘物体’只是代表要素复合体（感觉复合体）的思想符号。”^③“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物体），而是颜色、声音、压力、空间、时间（即我们通常称为感觉的那些东西）。”^④等等。但其中也有自相矛盾的申明，如说，只有在ABC…这种要素与KLM…那种要素相联系的情况下，才把ABC…叫作感觉，认为ABC…属于自我。“凡是把‘感觉’、‘感觉的复合体’这两个名词和‘要素’、‘要素的复合体’这两个名词同时并用，或是用前者来代替后者的地方，读者必须经常记住，只有在这里所指的联系或关系中，只有在这里所指的函数的依存关系中，要素才是感觉。在另一种函数关系中，要素同时又是物理对象。”^⑤

正是根据这种所谓使自我与世界、感觉（现象）与物体的对立归于消失的“要素”理论，马赫完全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否定了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公然主张物体和自我都是一些“假定”，只是用以达到某些实用目的的“权宜的工具”；原子是“人造的、假设的”，“是精神设计物”；^⑥甚至说什么实在和假象的区别也“只有实用的意

① 引文均见《感觉的分析》，第一章，第五、七、八、九节。第十四章，第二节。

②④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2页。

③⑤ 《感觉的分析》，第23页、12页。

⑥ 《感觉的分析》，第十四章，第一节。《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7页。

义，不能够有科学的意义。以此类推，究竟这个世界是实在的，还是纯粹梦想的，这个常常提到的问题毫无科学的意义”。而科学也只是描写要素的联系（函数的依存关系），“不必同时解释何以有这种联系。”^①

马赫的“要素”论得到了修正主义者的热烈赞扬和拥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维·阿德勒专门在党刊上发表文章，为马赫七十岁生日祝寿，题目就叫《世界要素的发现》，文章后来被译为英文和俄文发表。波格丹诺夫在反驳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批评时则辩解说：“我不能承认自己在哲学上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在总的哲学观点上，我从马赫那里采纳的只有一点，即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的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观念。”^②可见，马赫的“要素”论在马赫主义者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实际上，“要素”论根本不是什么新发现，正如列宁所说不过是已往掩盖和抹杀哲学上两种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对立的旧的哲学谬误的重复而已。

列宁批判“要素”时写道：“这里的确没有片面性，然而却有彼此相反的哲学观点的杂乱混合。”^③他尖锐地提问：要素是什么？如果“‘要素’是感觉，那末，先生们，你们的哲学就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或者‘要素’不是感觉，那末你们的这个‘新’字眼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这不过是讲些无聊的空话，装腔作势而已。”^④针对马赫自相矛盾地承认只有在ABC…与KLM…的联系上，要素才是感觉，而在ABC…之间的联系上，要素同时又是物理对象的言论，列宁揭露说：“如果颜色仅仅在依存于视网膜时才是感觉，那

① 《感觉的分析》，第8—11页。

② 《经验一元论》，第4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8页。

④ 同上书，第48—50页。

末，这就是说，光线落到眼网膜上才引起颜色的感觉；这就是说，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和我们的意识存在着物质的运动，……它们作用于视网膜，使人产生这种或那种颜色的感觉。”而这正是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反映论关于感觉的观点。因此，马赫的这种承认实际上不过是玩弄‘要素’这个字眼“悄悄地偷运唯物主义”，而“这种偷运是非法的、放肆的、折中主义的”①，“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因为这种承认是和马赫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不相容的，这种承认也是虚伪的，马赫说得很清楚，‘物理要素的联系’和‘心理要素的联系’不是彼此单独存在，而只是一起存在的，只能在研究它们时，暂时撇开这种或那种联系，所以，归根到底物理要素是不能离开心理要素而独立存在的。针对波格丹诺夫所说他从马赫那里只采纳了关于经验要素的中立性的申辩，列宁驳斥说：“这一点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错误，就是整个这种哲学的基本错误。”②而波格丹诺夫以及一切马赫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的共有的根源，和贝克莱一样，是主张唯心主义的物理经验的要素和心理经验的要素同一的理论，背离了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一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

“原则同格”是阿芬那留斯的核心思想。他是在《人的世界概念》（1891）和《关于心理学对象的概念的考察》这两本书中提出这个理论的。按照他的解释，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主张一切都是“经验”。房屋、树木、山川、人等等，包括自我在内，都是“经验”。或者说，一切都在我的经验之中。二是“一切经验本来都是同格的”。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经验都包括自我经验和环境经验两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们“互相从属、不可分割”，自我不能脱离环境，环境也不能脱离自我而独立存在，自我和环境、自我和非我“总是被我们一起发现的”，缺一不可所谓经验；同时，“两种经验价值，即自我与环境二者，在相同意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9、54、52页。

义上属于每一个经验，是在原则上并列的、等价的。”他举例说：“我在我的经验中，树也在我的经验中。我经验到树与我经验到我，是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下，都是属于一个经验的。我说我经验到树时，这仅仅是指：一个经验是由一个较丰富的要素复合‘自我’和另一个较不丰富的要素复合‘树’构成的。”^①三是在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即相互关联）中，自我是中心项，环境是对立项，中心项是常项，对立项是变项。这就是说，任何经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环境就是自我的环境，环境（对立项）离不开自我（中心项）。用阿芬那留斯的话说就是：“对现存的东西的任何完全的描述，不能只包括‘环境’而没有某个自我（这个环境就是这个自我的环境），至少不能没有那个描述我们所见到的东西的自我。”综合起来，一句话，这个学说的本质就是主张“我们的自我和环境不可分离的同格（即相互关联）。”^②正是根据原则同格的理论，阿芬那留斯批判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是所谓没有中心项的对立项，是必须从“完全的经验”中清洗掉的“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污蔑唯物主义反映论是什么“嵌入”。阿芬那留斯及其追随者们吹嘘说，唯心主义只讲“自我”；唯物主义只讲“环境”，都是一种“片面性”，而原则同格是全面的，它遵循所谓“费力最小的原则”，“追求统一性”，清除了把自我和环境、主体和客体、心和物对立起来的“非经验的”、“形而上学”因素，如：物质、实体、自在之物等等，恢复了由“纯粹经验”构成的自我和环境“真实的统一”世界，即回到了所谓“自然的世界概念”，承认了普通的非哲学的素朴的观点的全部价值。马赫则表示他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趋向是非常一致的”，最重要的核心之点是主张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各种不同的要素依存关系。俄国马赫主义者也以为阿芬那留斯的理论

① 《人的世界概念》，1912年莱比锡版，第83、84页。

② 《人的世界概念》，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62页。

是真正保护“素朴实在论”：他们承认自我，承认环境，你们还要什么呢？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于这种似是而非、具有很大欺骗性的直接反对唯物主义和反映论的哲学诡辩，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首先，列宁指出：“原则同格”的理论来源不过是费希特的“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设定’（创造、产生）的”、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等谬论的翻版，新名词不过是老调重弹。“他们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取消从物到意识和从意识到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这是换了新装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①

其次，列宁指出，原则同格的要害是否认对立项（环境）的独立性。因而它根本不是什么“素朴实在论”，本质上仍然是主观唯心主义。对实在论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实证主义的、实用主义的解释。在唯物主义看来，所谓“素朴实在论”就是正常人的素朴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就是认为“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②因而判断原则同格的性质，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对立项的存在，而在于是否承认对立项、环境是不依赖于自我而客观存在着。而原则同格论所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它对对立项（环境）存在的承认是以对立项不能没有中心项（自我）的存在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前提的，可见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虚伪的。正如热烈赞扬阿芬那留斯著作的内在论者舒佩所指出的：“您〔指阿芬那留斯——作者注〕默默地把您想要排除的东西定为前提。”^③而只要否认对立项的独立性，“把认识论建立在客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64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65页、66页。

和人的感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前提上(‘感觉的复合’=物体; ‘世界要素’在心理和物理方面是同一的; 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格等等), 就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①

第三, 列宁揭露原则同格是一种折中主义诡辩。阿芬那留斯企图通过玩弄“经验”、“同格”这些字眼来调和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掩盖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 结果是弄巧成拙。经验是原则同格说的基本前提, 本来就称“经验的原则同格”, 可是前面已经指出阿芬那留斯对经验的解释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他强调所谓“纯粹经验”、“完全的经验”必须批判、清洗掉物质、自在之物等形而上学的绝对概念, 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在原则同格论中他又声称每一个经验都包括自我和环境两项内容。但也不是二元论。正如列宁引用英国哲学家斯密斯的话说, 经验这个术语在阿芬那留斯那里有时是指经验活动(experiencing), 有时是指被经验的东西(experienced), 当说到我们自我的本性的时候, 他强调的是后一种意思。“‘经验’这个术语的含糊不清, 在这里正好帮了阿芬那留斯的忙。阿芬那留斯说, 思想像感性知觉一样是真正的经验形态, 这样他就回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陈旧不堪的论据上, 即思想和实在是不可分割的, 因为实在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感知, 而思想则以思想者的存在为前提。”斯密斯直截了当地指出, 阿芬那留斯这种理论的最终结果, “只是以最粗陋的形式恢复主观唯心主义”^②。至于“同格”更是蕴含着自相矛盾内容的概念。一方面强调环境离不开自我, 这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又承认自我离不开环境, 则是偷运唯物主义, 原则同格就是这两种根本不相容的观点的混合物, 而两者之间的联系完全是人为的, 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所以列宁说, 阿芬那留斯的“原则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 第6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 第67页。

格”和马赫的“要素”，“是恩格斯以应有的鄙视称之为‘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的典型。”

第四，列宁指出，原则同格这种违反科学和逻辑的谬论最后必然导致唯我论。针对环境和自我“不可分割”的观点，列宁尖锐地提出了“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人是否用头脑思想？”两个问题，无情地揭露了经验批判主义者为了克服原则同格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矛盾，不得不编造诸如：“潜在的中心项”，“蛆虫”理论，否认头脑是思维的器官、感觉是头脑的心理机能，等等荒唐的谬论，结果在逻辑上就必然“导致唯我论，认为只有一个高谈哲理的个人才是存在的。”^①

列宁对“要素”论和“原则同格”论的批判，对于认识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对于分析标榜超越“形而上学”、惯于使用调和、折中手法的整个实证主义思潮以及当代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都有重要的意义。应该承认，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忽视主体（自我）的能动作用是一个重大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素”和“原则同格”强调认识过程中存在着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因而肯定自我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合理因素。对认识过程来说，确实存在着主体和客体这一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互为存在前提，即互相依存。这是指离开了客体，主体就失去了认识的对象，而没有主体，也就无所谓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所谓认识，就是人们通过观察、实验和实践使主客相互作用，主体得以反映客体，进而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客体，这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和统一。但是，从此决不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在认识过程之外，离开主体不存在客观实在的物质世界。“要素”、“原则同格”这种唯心主义诡辩就在于有意把人的认识过程和客观实在过程混为一谈。这样，本来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主客体的同一，变成了抽象的、无条件的“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91页。

格”，结果就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否定了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因此，“要素”和“原则同格”的制造者们，尽管一再声明自己反对所谓“形而上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实际上是用主观的、虚构的联系，用人为的无原则的拼凑、混合来歪曲、否定了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联系（对立的同一）。所以，要在认识论中贯彻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在物质和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上反对折中主义，善于分清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具体的、现实的同一性，什么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抽象的、僵死的“同格”；什么是辩证法的有条件的对立的同一，什么是折中主义的无原则的拼凑、混合；以及什么是唯物主义所坚持的在世界物质性基础上的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一致），什么是唯心主义所主张的在所谓“世界要素”（实质是唯心主义的感觉、经验）基础上的物质和意识的同一（等同）。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曾揭露马赫主义者巴扎罗夫利用 совпадать 这个俄文词具有“符合”和“相同”两种含义，有意歪曲引文原意，把恩格斯关于感性表象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符合的唯物主义思想，篡改改为“感性表象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样一个唯心主义论断。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列宁是继承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合理思想，但并没有停留在一般唯物主义的水平，而且直接继续恩格斯和狄慈根所做过的工作，把反映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发展成为积极能动的、辩证的反映论。

第五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

由于马赫等人否认物质、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泉源，否认认识是外部世界的映象，否认客观真理；特别是俄国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等人，还通过攻击、歪曲恩格斯的

思想来宣传他们的不可知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因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特别注意引证、解释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9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英文版导言）有关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等论断，进一步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和真理观，批判了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

一、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释

首先，列宁根据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对实践范畴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明确指出：“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①。针对马赫主义夸大认识主体的感觉、经验，否认客体对象的存在及其可知性的错误，列宁引用了他认为“本质上是正确的”法国哲学家莱维对马克思《提纲》的分析，指出《提纲》第一条（原文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本身的。）其精神实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表明马克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已往一切唯物主义所共有的、即整个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这就是承认“同我们关于物的表象相符合的是我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4页。

之外的实在的单独的客体”^①。这就是说，马克思绝没有由于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缺点而否定从客体方面理解事物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也没有否定直观（作为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认识事物的一种基础性的、不可缺少的形式。“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遗憾的是，唯物主义曾经让唯心主义去评价能动力（即人的实践）的作用。”^②这就是批评旧唯物主义忽视了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事物，不懂得实践对认识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应该把这些能动力从唯心主义手中夺过来，也把它们引入唯物主义的体系，但是，当然必须把唯心主义不能承认的那种实在的和感性的特性给予这些能动力。”^③这就是说，马克思既不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不是什么超越唯物唯心的第三种立场，而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评已往唯物主义忽视主体能动性的缺点的；马克思强调从主体、实践方面去认识事物，不是为了否定唯物主义，而是为了补充和发展唯物主义；马克思与“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根本不同，他对主体、能动力、实践的理解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认为同人类的‘现象的活动’相符合的是‘物的活动’，即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④。因此，“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才能够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应该说，列宁对《提纲》第一条的理解是正确的、全面的。

第二，列宁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明确提出“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⑤俄国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玩弄《提纲》第二条中“思维的此岸性”这个用语，人为地捏造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矛盾，说什么恩格斯同主张“思维的此岸性”的马克思不一样，“肯定了自在之物的可知性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3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3页、第104页。

和思维的彼岸性”，言下之意，马克思是认为思维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此岸的康德式的不可知论者。列宁批驳了切尔诺夫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准确解释了《提纲》第二条。切尔诺夫把“思维的此岸性”解释为思维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此岸，而把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叫做“思想的彼岸性”，这同马克思的本意正好相反。此岸世界、彼岸世界本来是康德哲学的用语。康德认为人的认识只能达到事物的“现象”，达不到事物的本质、“自在之物”，在“现象”的此岸和“自在之物”的彼岸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在之物”=宇宙、灵魂、上帝，是属于信仰的领域。因此，这个彼岸世界不是现实的，而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马克思是反其意而用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到：“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① 这里“彼岸世界”是指宗教和唯心主义所虚构的神的世界，而“此岸世界”是指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因此，在《提纲》第二条中，“思维的此岸性”和“思维的现实性”、“思维对象的真理性”是并列句，是一个意思。正如列宁所说：“思维的‘对象的真理性’无非是指思维所真实反映的对象（=‘自在之物’）的存在，……只有休谟主义者和康德主义者才使人的思维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认为‘现象’是‘为我之物’，或者‘自在客体’的复写。”^② 也就是说都承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所以，马克思所说的“思维对象”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现实世界。“思维的真理性”是指思维的内容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而“思维的此岸性”，决不是指思维只能停留在现象的此岸，只能反映现象，恰恰相反，是指人的思维不仅能认识现象，而且能认识本质和规律。事实同不可知论者的理解相反，事物的本质、“自在之物”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区别，它不是存在于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2页。

象之外而为认识所达不到的神秘的“彼岸”，而是存在于事物、现象之中的。经过实践这个‘由此达彼’的桥梁，思维就能够通过现象达到本质，即“自在之物”可以由彼岸的东西转化成此岸的东西，变为“为我之物”，实践的成功就是“思维的此岸性”的证明。“这就是说，人的认识反映绝对真理，人类的实践检验我们的表象，确证其中与绝对真理相符合的东西。”^①可见，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其理论根据首先是来自对马克思《提纲》第二条的正确理解。

第三，列宁详细引述并发挥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对休谟和康德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或谬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的思想，并由此引申出著名的三个认识论的重要结论，而且强调指出，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的反映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唯一的和不可避免的结论”^②。列宁的这一论断，和以后本书还要提到的列宁对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英文版导言》中批判新康德主义和不可知论时关于实践标准的辩证思想的解释和发挥，是把反映论和实践论联系起来，使反映论获得了辩证的能动性，同时为反映论的真理性提供了不容置疑的、最有力的论据和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识别和分析当代哲学思潮中借口“高扬主体性”，把实践论同反映论对立起来，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等等错误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两种实践观的对立

列宁不仅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把哲学上两个基本派别、两条认识路线对立的观点贯彻于实践论，明确提出关于实践标准“可以作主观的解释，也可以作客观的解释”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4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论点^①。这实际上提出了在哲学上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的实践观的重要思想。马赫主义的实践观就是一种唯心主义实践观，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关于实践标准的观点上，列宁就下面两点作了批判：一是马赫把实践和认识割裂，把实践标准排除在认识论之外；二是对实践标准作主观的解释。

马赫在《感觉的分析》中，公然把实践和认识割裂为两个不同的领域，说什么现实和假象、错觉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的区分，以此类推，世界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从实践的观点看来是有意义的，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还说什么：

“在实践方面，我们在从事某种活动时不能缺少自我这个观念，正如我们在伸手拿一个东西时不能缺少物体这个观念一样。在生理学方面，我们经常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正如我们经常看到日出一样。但是在理论方面，我们决不应该坚持这种看法。”^②这就是说，实践和科学、理论是两回事，不能用前者来制约后者。为了给自己的观点作论证，马赫提出了这样的论据：一支铅笔，在空气中看它是直的，放在水中半截看它是弯的，但两种情况都是事实，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甚至连最荒唐的梦也是事实，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对科学来说，无所谓真假、对错。首先，列宁指出这是一种诡辩。马赫是“把对人们的谬误、人类的种种‘荒唐的梦’（如相信鬼神之类）的科学史和心理学的研究，同真理和‘荒唐’在认识论上的区分混淆起来了。”^③错觉、假象、做梦、宣扬宗教迷信（有人相信鬼神）都是事实，都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一回事；这些事实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在，是不是真理，是另一回事。浸在水杯里的铅笔看起来是弯的，这是事实。但弯的铅笔不是事实。做梦是事实，但梦境不是事实。宗教迷信宣扬鬼神是事实，但鬼神的存在不是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05页。

② 同上书，第139—141页。

③ 同上书，第140页。

实。马赫是把客观的事实和虚幻的意识混淆一起，结果是以真理和谬误都是意识事实而抹杀了真理和谬误的原则区别，排除了实践是检验科学和理论客观真理性的标准，这在逻辑上是偷换概念的诡辩。其次，马赫说“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似乎科学和哲学认识论无关，是超越唯物主义同宗教、唯心主义的斗争的，这是企图掩盖自己那套理论的反科学性质，调和科学和宗教、唯心主义。最后，列宁揭露说，把实践作为一种在认识论上不值得研究的东西加以排除，在哲学史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舒尔采、费希特早就这么做过，毫不新鲜，马赫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

马赫在《认识和谬误》中说：“认识是生物学上有用的心理体验。”“只有成功才能把认识和谬误区别开来。”“概念是物理学的作业假说。”^①俄国马赫主义者就以此作为马赫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主张以实践的效果（成功或失败）作为检验认识是真理还是谬误的标准。但这种比较完全是牵强附会。因为马克思主义与马赫主义解决认识论基本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不是停留在表面词句，而是深入分析这些论点所体现的认识论思想的实质，那末应该承认，马赫主义与属于同一实证主义思潮的实用主义倒是真正一致的。实用主义主张实践就是一切，宣扬真理只是方便的、权宜的手段或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能不能发生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杜威就说过：“一个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是衡量真理的尺度。”^②詹姆士也说：“一个观念你可以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这两句话的意义恰是一样。”^③这些论断同马赫的上述论断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呢？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标准是以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承认客观真理即科学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0—141页。

② 《哲学的改造》。

③ 《实用主义》。

的客观性原则为前提的；只有实践的成功才能检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才能证明用以指导实践的认识是客观真理。而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为人的主观感觉、经验，并以此作为自己认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前提，实践也就是感觉、经验，根本不涉及什么客观实在的东西。他们只关心实践的效果是否使我满意，对个人是否有利，根本不管指导实践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在。因而，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对“有用”、“成功”、“效果”等等的理解和解释也是根本不同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真理当然是有用的，之所以能对人有用，是因为它的内容正确反映了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因而它“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机体有用的认识，成为对人的实践、生命的保存、种的保存有用的认识。”^①所以真理是原因，有用是结果。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则是倒果为因，把对主体是否有用作为真理的根据。这就必然导致真理标准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对成功也是如此。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所谓‘成功’是指实践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而证明人们据以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指导（理论、政策、计划、方案等）符合对象的客观实际，因而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②而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所讲的‘成功’是指人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经验去行动，能应付当前的环境，能满足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凡是能产生这样“效果”的就是真理，而根本不问是否与事物的客观本性符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③

可见，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哲学家在著作中有肯定实践对科学的意义、承认实践标准的言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像俄国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1页。

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所说的“接近”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他是否同时主张客观真理，认为实践标准的意义在于证明认识是客观真理。

列宁关于对实践标准存在着客观的和主观的两种解释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对于我们在实践观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批判像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实践的唯心主义倾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前国内外都有一些人任意歪曲，攻击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提出要为马赫哲学“恢复名誉”，其论据之一就是实践问题。他们有意回避列宁批判马赫实践观上唯心主义的事实，仅仅以马赫曾说过：“力学科学来源于力学经验”、“科学是对经验事实的分类”、“理解完全是以实习为基础”这类话，就肯定实践是马赫哲学的基础，甚至声称这是马赫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容的特征”。其实只要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这种议论不过是当年早已被列宁揭露无遗的俄国马赫主义者的故伎重演而已，列宁关于实践标准两种解释的观点正是对这些议论的最有力的批驳。

在实践问题上不仅存在着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且也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实践标准，提出了关于实践标准的“确定”和“不确定”原理。列宁写道：“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这就是说不仅要坚持实践的唯物论，而且要坚持实践的辩证法，反对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诡辩的错误倾向。

之所以说实践标准是确定的，是指它有绝对性。这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除此而外，一切其他标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4页。

如：“清晰明白”、“公意”、“上帝的意志”、“宗教教义”、“权威”、“有用”等等，都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直接观察和逻辑证明是实践检验时必要的辅助和补充，但也不能取代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主导地位。凡是经过实践证明确实是符合于客观实在的思想和理论，尽管随着实践的发展可以修正它，丰富它，发展它，限制它，但是不可能根本推翻它，这是确定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由于当代实践水平的限制，一切暂时未能得到检验，或者得不到充分检验的理论和假说，随着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迟早一定会得到实践的检验，一切真理终究会被证实，一切谬误也终究会被证伪，这也是确定无疑的。借口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否认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绝对性是实践观上的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认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指责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见解是“独断主义”。对此，列宁驳斥说：“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明显，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①这就是说，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不是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中货币流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是不是客观真理，这是一回事；这个理论是否对任何时代（譬如不存在货币的原始社会或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有指导意义，都有现实价值，那是另一回事。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已由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实践所证明，因而它的客观真理性不可动摇，必须坚持，这是一回事；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随着实践的发展，情况的变化，完全可能作必要的修正、补充和发展，这又是另一回事。波格丹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4页。

夫正是由于不懂得实践标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玩弄相对主义诡辩，才导致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应该说，列宁的批判对于当前识别那种借口时代的变化而企图否定早已经过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潮，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之所以说实践标准是“不确定的”，是指它有相对性。这也是由认识对象、主体和实践的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对象、客体、客观世界就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永恒地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其次，人的认识有相对独立性，既服从于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又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人们运用辩证思维，可以从个别的、片断的直观和感性认识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必然性和规律性，通过有限达到无限。这就使认识既依赖于客观现实和实践，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当前的实践，预见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和理论来。第三，实践本身具有历史性，要受到主客体各种条件的制约。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实践的广度和深度都只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较小的范围逐步扩展到更多更广阔领域的无限发展过程。正因如此，人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当时任何理论。有的假说暂时还得不到实践的检验；有的理论虽然经过实践检验初步得到证实，但它的真理性还是相对的，还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实践检验来修正、补充、丰富和深化认识，才能使其中包含的绝对真理的成份更加精确。对象越是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范围越广，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越多，需要认识的问题越复杂、越深刻，就越加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实践，才能完成必要的、比较全面的检验。事实上，对于一个复杂的认识来说，实践检验的过程，同时就是对事物再认识的过程。

所以，不能把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看作都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行动。个别一时的、局部的成败不足以断定整个理论的真伪，只有实践的全部总和才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可靠尺度。看不到实践

标准的这种“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把实践检验认识这个主客体之间充满矛盾的极其复杂的运动过程简单化，把辩证的统一绝对化，就会把知识变成教条，导致思想僵化。

总之，在列宁看来，只有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实践标准的确定和“不确定”的辩证特性，就能防止和克服实践观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才能正确运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认识，把真理和谬误区别开来。

列宁在论述时还扩大了实践标准这个概念的外延，提出“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①。这就是说，实践不一定是直接变革客观事物的活动，它还包括在思想指导下，有目的地观察、发现、接触客观事物的活动。除天文学之外，地质学、生物学、古人类学以及其他许多实证科学都常用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一种手段。一般说来，观察是感觉、知觉等感性认识的一种基本认识方法，不是实践。但主体根据感性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作出判断（假说、理论），再进行观察以验证判断是否符合对象的实际，这种观察就具有实践标准的性质。

综上所述可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决不是现时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背离和倒退，而是继承、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理论，这是他在认识论上克服旧唯物主义机械的、直观的反映论的缺陷，创立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反映论的一个确证。后来在《哲学笔记》和《再论职工会》等一系列著作中，列宁又不断地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理论。

三、对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坚持和发展

马赫主义的真理观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俄国马赫主义者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1页。

格丹诺夫则通过歪曲甚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真理问题的论述，来宣传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唯心主义真理观。对此，列宁的做法是详细摘引并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批驳波格丹诺夫的论据，坚持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重要思想：

（一）使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进一步系统化了。从列宁的论述可以看到，完整的真理观应包含三方面相互联系的内容：一是主张真理的唯物论，即肯定客观真理，反对否定客观真理的唯心主义真理观。二是主张真理的辩证法，即同时承认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三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然，从当代哲学界对真理问题研讨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我们还可以加上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真、善、美的关系以及其他内容。

（二）揭示真理观上分歧的实质在于是否承认真理的泉源归根到底是客观实在。用列宁的话来说，真理观上的首要问题是：

“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①唯物主义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认为真理是人的意识对物质世界即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因而肯定客观真理。而唯心主义坚持“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认识路线，或者认为真理的内容是感觉、经验，是“自我”、“心灵”、“意志”的自由创造（主观唯心主义）；或者口头上也讲“客观真理”，但认为真理的内容是理念、绝对观念、上帝，实际上是“客观化”、异化了的人的精神（客观唯心主义和宗教）；或者认为是在感觉联系中形成的习惯（休谟主义）；等等。说法虽然不一，但都以不同方式贯彻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因而，实际上他们都是主张主观真理，否定客观真理。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宣称：“真理是思想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22页。

式——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它的“客观性的基础应该是在集体经验的范围内”，“是对所有人说来都是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是社会地“一致”、“协调”、“组织起来的经验”。针对波格丹诺夫歪曲马克思主义、宣传马赫主义的言论，列宁指出：一切知识来自感觉、知觉、经验，这是对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的分歧不在于此，而在于是否承认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知觉、经验的泉源。因此，按照列宁的思想，真理内容客观性的基础是物质性，即不依赖于主体、个人、集体以至人类的感觉和经验而存在的客观实在性，而不是什么“集体经验”、“普遍意义”。如果像波格丹诺夫所说的那样，真理只是思想形式，人类经验的形式，那末宗教教义至今仍为人类的大部分所信奉，比科学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也可以说是真理，这样就不会有客观真理了。而波格丹诺夫由于坚持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和感觉论的前提，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否定客观真理的道路。

（三）进一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绝对真理的理论。波格丹诺夫在《经验一元论》中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任何真理的绝对客观性的否定。”^①同时指责恩格斯承认某些“永恒真理”是犯了折中主义的错误，理由有三，一是恩格斯所列举的是一些“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陈词滥调”，不能看作真理；二是“对于事物本质的绝对客观的认识”，“同任何思想体系的历史条件的制约性不能相容”；三是承认永恒真理就是“独断主义和静力学”。列宁批驳了波格丹诺夫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对恩格斯的攻击，并通过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绝对真理和永恒真理的观点的解释，进一步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绝对真理的理论。

首先，列宁指出，波格丹诺夫说马克思主义否定绝对真理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22页。

永恒真理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唯物主义者，而对唯物主义者说来，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反映论，同承认客观真理是一回事，而承认客观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①。恩格斯与列宁举出的许多命题都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尽管它们是人们所熟知的平凡的事，但由于它们的内容反映了客观实在，就得承认它们是绝对真理和永恒真理。

第二，列宁说明，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永恒真理”论，并不是因为他根本否认有永恒真理，而是由于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庸俗地玩弄它们，“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是由于杜林否认认识的相对性，搞绝对主义，把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起来，吹嘘他所制造的那套理论是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终极真理。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列举科学发展的事实，着重说明真理的相对性，用唯物辩证的观点阐明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所以，恩格斯是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而驳斥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而波格丹诺夫却有意回避恩格斯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所作的说明，“想尽办法非难恩格斯搞‘折中主义’。他这样做，只是再一次暴露了他无论对唯物主义还是对辩证法都绝对无知。”^②

第三，列宁指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不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能不能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认识客观世界，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认识客观世界？这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唯物的和辩证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原则上阐明了这个问题。他在承认客观真理的基础上，在人类的知识向绝对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真理的相对性。这是恩格斯与唯心主义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3—134页。

不可知论根本不同之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真理的绝对性。决不能片面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和绝对绝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绝对真理。列宁进一步发挥恩格斯的辩证思想指出：“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①波格丹诺夫借口认识受历史条件限制而否认绝对真理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里关键是怎样正确理解绝对真理。列宁认为：“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愈来愈正确；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②。这就是说，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们对各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只要经过实践证明是真理，就都包含有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时，它也就是对无限宇宙的（某一部分、某一过程以至整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也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两个方面都说明各个具体的相对真理之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因素、成分。“图画的轮廓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而这幅图画描绘客观地存在着的模特儿，这是无条件的。在我们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中，我们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条件下进到发现煤焦油中的茜素或发现原子中的电子，这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然而，每一个这样的发现都意味着‘绝对客观的认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③事实上，人类总是不断突破已往历史条件的制约，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认识，这就证明了认识的相对性，又证明了人的认识是前进的，总的趋势不是远离，而是日益逼真地反映着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因而具有绝对性。所以，

①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7页。

② 同上书，第323页。

承认人的认识能够达到相对真理，也就是承认人的认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绝对真理；承认相对真理是在“发展中的”，也就应该承认人的认识是在不断地接近绝对真理。准确地说，“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外部自然界的规律，并且认为这个世界和这些规律对人来说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但又是永远认识不完备的。”^①

第四，列宁认为，波格丹诺夫说承认永恒真理是“独断主义和静力学”，这是糊涂话。因为对独断主义存在着不同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独断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它夸大事物的静止、平衡状态，否认运动、变化、发展，主张所谓某种“不变的本质”。在认识论上则主张所谓“不变的意识”，否认认识的相对性，宣布自己的思想是“绝对真理”、“永恒真理”。杜林就是一个独断主义者。所以，马克思主义反对独断主义，是批判它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片面性，主张“世界是永恒地运动着和发展着的物质，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②。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反对独断主义则是为了反对唯物主义，攻击唯物主义承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就是独断主义。波格丹诺夫就是这样。至于“静力学”，本来是古典物理学的概念，波格丹诺夫使用这个字眼也是为了攻击恩格斯承认永恒真理就是否定事物的运动变化，主张绝对静止。可是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及其他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真理观上的真正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客观世界和人的认识都是变化、发展的，而在于是否承认“反映自然界的意识和意识所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③因此，波格丹诺夫的言论只是暴露了他背离马克思主义走向马赫主义的立场。

（四）列宁提出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区分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原理。他认为，既然“世界是永恒运动着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95页。

^{②③} 同上书，第138页。

物质，而这种物质为不断发展着的人的意识所反映”^①，既然“自然界正如它的极微小的粒子（包括电子在内）一样是无限的，可是理性把‘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也同样是无限的”^②，那末，在真理观上，就既要反对庸俗地玩弄“永恒真理”、反对相对真理的绝对主义；又要反对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相对主义。同时把辩证法彻底贯彻到真理论，就应看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区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列宁写道：“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③

（五）列宁划分了真理论上辩证法和相对主义的界限，指明了相对主义的危害性。由于马赫主义者都宣称自己是相对主义者，用相对主义作为武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列宁特别注意批判相对主义，划清它与辩证法的界限。他指出：“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④在真理论上区分两者的界限，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的认识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在于是否同时承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相对主义的危害性就在于：“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作为认识论基础的相对主义，不仅承认我们知识的相对性，并且还否定任何为我们的相对认识所逐渐接近的、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准绳或模特儿。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38页。

② 同上书，第326页。

③ 同上书，第137页。

④ 同上书，第138页。

⑤ 同上书，第137—138页。

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就是主张在客观真理基础上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结论。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由于论战的需要，列宁对真理问题的论述，是着重从认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方面，批判了真理观上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这样就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了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第六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 新发现的哲学总结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上有一系列革命性的重大发现，新的实验事实与原来的科学理论发生矛盾，极大地冲击了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论自然观，在物理学界和哲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哲学看法。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介绍了当时法国哲学家莱伊对物理学界意见分歧的概括，莱伊认为，“根据现代物理学家的认识论倾向，他们可分为三个学派：唯能论或概念论学派；绝大多数物理学家现在继续支持的机械论或新机械论学派；介于这两种学派之间的批判学派。马赫和杜恒属于第一个学派；昂利、彭加勒属于第三个学派；旧物理学家基尔希霍夫、赫尔姆霍茨、汤姆森（开尔文勋爵）、麦克斯韦以及现代物理学家拉摩、洛伦茨等人属于第二个学派。”^①当然，莱伊的划分未必准确，但说明物理学家们在哲学观点上确实存在“十分深刻的分歧”。与物理学家们的分歧相联系，哲学界也出现了围绕物理学新发现产生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其突出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的对立。因此，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和其他现代资产阶级哲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9页。

学时，必须对物理学新发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哲学争论作出回答。但是在处理这个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时，列宁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声明，“我们决不想涉及专门物理学理论。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从一些明确的论点和尽人皆知的发现中得出的认识论结论。……因此，我们的任务仅限于清楚地说明，这些派别分歧的实质何在，它们和哲学基本路线的关系如何。”^①

一、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总结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对刚刚开始20世纪物理学革命进行了初步的哲学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思想：

（一）物理学新发现不是消极的“危机”，而是一场“自然科学革命”。

怎样估计物理学新发现的意义，当时无论在物理学界还是哲学界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面对新的实验事实同原有的理论的矛盾，一些物理学家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发生了怀疑、动摇、甚至否定。他们惊呼物理学发生了“严重危机”，摆在面前的是一堆“被推翻了的”旧原理，“怀疑时期”已经到来了。因而他们怀疑科学的价值，否定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用莱伊的话来说，他们“抛弃了理论的本体论价值而特别强调物理学的现象论意义”，

“探求那种尽可能排除物质假说的、纯粹抽象的理论”。在这些人看来，“科学不过是符号的公式，是作记号的方法”，而“被作上记号的东西，只是人为了标记（为了符号化）而事先创造出来的东西。”科学“是纯粹人造的作用于自然界的手段”。“科学所能提供的只是实用的处方，而不是真实的知识。”有的人像彭加勒就得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结论，说什么：“不是自然界把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给予（或强加于）我们，而是我们把这些概念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4页。

给予自然界”^①。“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因为我们不能思考思想以外的任何东西。”^②这就是说，物理学的原理不是自然界、客观实在的主观映象，而纯粹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马赫主义者宣传“新物理学据说把唯物主义驳倒了”^③。其中像俄国的瓦连廷诺夫竟攻击说：“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④

列宁坚决反对对新事物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从而得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结论。他明确宣布，物理学的新发现不是什么科学的“危机”，而是一次自然科学革命。在哲学方面，也不是什么“新物理学驳倒了唯物主义”，而是“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⑤。除了散见在全书的一系列论述之外，列宁在书中专列一章来讲物理学新发现的认识论问题，这一章的标题就是《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自然科学革命”的提法直接取自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约瑟夫·狄奈——德涅斯的论文。列宁在这一章开始就先介绍了这篇论文的观点。德涅斯在论文中把物理学的新发现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作了比较，写道：“所有这些新知识归结起来就是恩格斯想要提到首位的一点：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对立，没有任何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差别’。它们‘多么辉煌地证实了恩格斯的名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事实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然界完全和历史一样，是受辩证的运动规律支配的。”^⑥列宁完全赞同德涅斯的观点，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并且把它同所谓“危机”的观点直接对立起来。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5页、306页。

③ 同上书，第263页。

④ 同上书，第271页。

⑤ 同上书，第327页。

⑥ 同上书，第262、263页。

实际上，在人类认识史上，每当生产和科学实验有重大进展或突破时，特别是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时，旧的原理被补充、修正甚至被新的原理所代替，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现象，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物理学的新发现严重冲击了机械论的自然观和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更加真实的世界图景，使物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现代物理学，同时也使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新的证实，获得了更加牢固的科学基础。因此，如果要说什么“危机”，那不是物理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危机，只能说是机械论自然观、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而对于自然科学和真的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都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二）围绕物理学新发现而产生的不同哲学观点的分歧集中在认识的泉源问题即认识同物理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其实质在于是否承认物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否承认科学理论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这个分歧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对立的继续和表现。

列宁在书中详细摘引了莱伊关于物理学家哲学争论的历史叙述，因为“莱伊仔细地、一般讲来是诚实地引用了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丰富的文献。”它说明所谓“现代物理学的危机”，在哲学方面，实质上是两种倾向的对立和斗争。它表现为：“旧物理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物质世界的实在的认识’，就是说，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物理学中的新思潮认为理论只是供实践用的符号、记号、标记，就是说，它否定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并为我们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存在。”^①而第三派（即被莱伊称为继承了机械论传统的“新机械论”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则“都以实在的运动为出发点。”他们“把力学现象看作物理现象的特殊情况。因此，力学的规律依然和物理学的规律有着直接的联系，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9页。

学的概念……是比较缓慢的运动的模写。……对于高速度，则有另外一些运动规律。”^①对此，列宁写道：“承认理论是模写，是客观实在的近似的复写，这就是唯物主义。”同时这“就最好不过地证实了下述事实：实质上，斗争是在唯物主义倾向和唯心主义倾向之间进行的。”^②列宁分别考察了这两种倾向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表现，以及物理学家的哲学倾向和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的联系。他用大量事实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对物理学新发现所作的唯心主义哲学解释是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列宁称之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他对物理学加了引号，就是说不是物理学这门科学是唯心主义的，或有唯心主义的物理学，而是指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物理学成果的哲学倾向。

（这是受费尔巴哈的启发。1866年，费尔巴哈曾把生理学家约翰奈斯·弥勒用唯心主义观点解释某些生理学成果的倾向，称为“生理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同时列宁指出，俄国马赫主义者吹嘘马赫哲学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最新的自然科学的实证论”是“双重的虚伪”。因为马赫主义哲学只和“物理学”唯心主义这个国际性思潮有联系；而不是和“在物理学家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它被不确切地称为实在论、新机械论、物质运动论）”^③有联系。

（三）必须对物理学的新成果作出新的哲学概括，以此纠正旧唯物主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陷，粉碎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进攻，捍卫并修正、充实、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认为，物理学上一系列重大发现，决不是像俄国马赫主义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已经驳倒了唯物主义”、“导致唯心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这一切不过是再一次证实了辩证唯物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77页。

② 同上书，第278页。

③ 同上书，第318页。

义。”^①因为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自然界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运动着的物质会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在我们看来似乎和它不可调和的另一种状态”^②。因此，“不变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人的意识（在有人的意识的时候）反映着不依赖于它而存在和发展的外部世界”^③。所以，“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④正是以这样彻底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为指导，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一系列哲学原理作出了新的概括。这些概括在前几节中已作介绍，不再重复。

（四）马赫主义者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作业假说，认为它们只具有方法论意义，这是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

在物理学新发现的冲击下，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相对性充分显露，“物理学”唯心主义就极端夸大这一点，完全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他们提出，科学来自经验，但经验中并没有必然性、规律性，因此，科学规律与原理不过是根据经验而由人假定、创造出来的，是用以协调经验、研究经验的方便的工具。至于它是否与客观世界符合，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科学理论都是“作业假说”，只具有“纯方法论的意义”。马赫在《力学》一书中就主张原子是“精神设计物”。“这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特别设计的产物。原子不能被感官感知；像一切物质一样，它们是思维的东西。”“所起的作用与数学中的某些辅助概念相似。”^⑤其他马赫主义者或者把物理学理论看成是“方便的手段”（彭加勒）；或者说是“经验符号”（尤什凯维奇）、“经验的协调”（波格丹诺夫），等等。被列宁称为“唯灵论者”的英国哲学家华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274页。

③④ 同上书，第275页。

⑤ 《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47页。

德则认为“物质构造的原子理论和其他理论仅仅是作业假说”^①，他把自己和彭加勒等持相同观点的人称为“物理学的符号论者”，以区别于“物理学的实在论者”。德国唯心主义者哈特曼更明确主张不能仅仅认为原子、电子、以太是简单的符号、简单的“作业假说”，也要宣布时间、空间、自然规律和整个外部世界是“作业假说”^②。法国唯心主义者勒鲁瓦也宣布：“科学的真理是约定的记号、符号”^③。奥斯特瓦尔德也多次强调能量概念的纯方法论意义。

列宁在书中揭露和批判了这些动摇和否定科学理论客观真理性的唯心主义观点。首先，列宁把这些观点同大多数物理学家承认科学理论是客观真理的唯物主义观点对立起来，指出：“的确，现代物理学中的两个学派的区别只是哲学上的，只是认识论上的。的确，基本差别只是在于：一个学派承认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最终的’（应当说，客观的）实在，而另一个学派则否认这一点，认为理论不过是经验的系统化、经验符号的体系等等。”^④这就是说，根本分歧是在于是否承认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而这又取决于是否承认实践是证明科学的客观性的标准。

其次，指出不能混淆科学理论与假说的区别。科学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假说虽然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形式，但毕竟只是根据一定材料作出的一种推论，是否真实有待实践检验。科学史说明，有许多假说被证实了，但也有许多假说被证伪了，如“热素说”、“以太说”，等等，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第三，指出被马赫、奥斯特瓦尔德等人长期否定的原子论（主张原子是物理实在）已不是什么假说，更不是什么“精神设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293页。

② 同上书，第300页。

③ 同上书，第304页。

④ 同上书，第292页。

计物”，而是科学实验证明了的物理事实，因而原子论也已不是假说而是一种科学理论，具有客观真理性。由于实践水平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许多物理学家曾经认为原子是不可分的最小实体，这是原子论所包含的错误，但不能由此根本否定原子的存在，否定原子论的合理性。恩格斯根据辩证法的思想，早在1866年到1885年，就多次批评形而上学的错误，明确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① 19世纪末物理学的新发现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遵循着与恩格斯一样的辩证思维方式，列宁进一步推论：“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②。这在当时也仅仅是一种假说，但现代物理学在微观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经使这个卓越的思想成为物理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科学理论。

第四，指出把科学理论等同于“作业假说”，把它说成只是主体为了方便而约定的一种“符号”、“记号”，纯粹是一种工作方法、手段、工具，更是完全错误的。所谓“作业假说”，是人们为了工作需要而制定的操作规程、工作制度等，它们当然要符合客观规律，但毕竟是主体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习惯规定的，而且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加以修改，有很大的主观性。而科学理论则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要求客观性，决不能凭主观需要来规定。把科学理论归结为作业假说，就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至于符号、记号更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决不能与科学理论混为一谈。

（五）物理学数学化和相对主义方法是“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列宁指出：“在物理学的客观性问题上的‘思想动摇’，就是

① 《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第24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75页。

时髦的‘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①产生这种“思想动摇”并形成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不是偶然的。除了复杂的社会背景之外，从思想方面来探究，列宁吸取了莱伊所做的分析的合理因素，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物理学的数学化，即所谓“数学精神浸入物理学的判断方法和对物理学的理解”。数学的特点是高度抽象性，它不涉及具体对象，只是从概念（公理、定理）出发，对数据进行逻辑的推演和方程式的运算。结果就形成一种观念似乎它的对象是学者的智慧所创造的，而与物质世界无关。物理学同数学有很密切的联系，19世纪以来在研究中更广泛地运用了数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几乎成为数学物理学，几乎成为一门数学。这本来是科学的进步，而数学既然与物质无关，物理学也就与物质无关了。于是，物理过程被想象为完全非物质的、纯逻辑的，剩下的仅仅是微分方程式所表示的形式关系。“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屏障。”结果导致一些物理学家也和数学家一样，“忘记了物质。‘物质在消失’，只剩下一些方程式。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仿佛是通过新的方式得到了旧的康德主义的观点：理性把规律强加给自然界。”^②“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主义原理**，即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原理。这个原理在旧理论急剧崩溃的时期以特殊力量强使物理学家接受；**在不懂得辩证法的情况下，这个原理必然导致唯心主义。**”^③

当然，这两个原因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有些人这是一种思想上的病态，即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他们从一个极端（绝对主义、忽视主体性）到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夸大主体性）。用列宁的话来说“是暂时的曲折，是科学史上暂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20页。

^{②③} 同上书，第322页。

的疾病期，是多半由于已经确定的旧概念**骤然崩溃**而引起的发育上的疾病。”^①绝大多数物理学家还是自发地坚持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唯心主义的。即便是那些在哲学观点上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科学家，从他们的全部言论来看，包括马赫在内，也都或多或少地不自觉地发表过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这是因为科学和唯物主义具有天然的一致性。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其对象都是客观实在，其成果都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唯心主义的种种怪论归根到底是和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不相容的。所以，尽管由于唯心主义的干扰，发生了暂时的曲折，但主流还是健康的。以物理学新发现为标志的自然科学革命，在哲学上的积极成果是“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命”——辩证唯物主义。

（六）必须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

列宁认为，围绕着物理学的新发现而展开的这场哲学争论说明，“‘物理学’唯心主义，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物理学家的一个学派的唯心主义，既没有‘驳倒’唯物主义，也没有证实唯心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②。而“物理学的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正如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一样，将克服所有一切危机，但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去代替形而上学唯物主义。”^③因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唯一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正确概括、总结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全部实践的经验。因此，必须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联系。一方面，哲学家要听从恩格斯的教导，密切关注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自觉地补充、修正、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使它永远保持真正科学的哲学的地位。列宁自己以身作则，唯物主义和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19页。

③ 同上书，第320页。

经验批判主义》对物理学新发现所做的哲学概括就是一个表率。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家要学习哲学，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有素朴的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面对唯心主义的挑战往往不能识别、抵制，产生思想混乱，甚至不承认唯物主义，其原因，除了庸俗的偏见之外，就是他们缺乏哲学修养，不懂得唯物辩证法。而另一些自然科学家，像马赫、彭加勒等，批判了机械论自然观的绝对主义错误，但未能进一步走向科学的世界观，而是经过相对主义陷入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其原因也是不懂唯物辩证法，不能区分辩证法同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的界限。列宁写道：“总之，今天的‘物理学’唯心主义，正如昨天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不过是意味着自然科学一个门类里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学派，由于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①这个历史的教训应该记取。同时列宁认为，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自然科学也是现代自然科学自身发展的要求。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本性日益暴露出来，科学家只有把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保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才能更有效地、准确地揭示各种物质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后来，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论点，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的重要思想。

二、关于列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家 哲学思想的评论

由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讨论的很多哲学问题都与当时围绕物理学新发现而展开的哲学争论有关，马赫又是马赫主义的创始人，因此，列宁必然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哲学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27页。

思想作出评论。对此，现在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必要专门加以说明。

俄国马赫主义者吹捧马赫主义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哲学”。对此，列宁是否定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剥除马赫哲学的科学伪装，说明经验批判主义是同自然科学不相容的。列宁认为，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等人在科学上有卓越的成就，但是它们的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是“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①称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

马赫表白自己不想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说：“并没有马赫哲学那样的东西。”但又声明他是在“寻找一种哲学立场”，想“引起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建立“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于列宁的批评，他是不接受的，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党派争论的著作，而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去甚远。”^②之后，一些西方哲学家也攻击列宁对马赫等人的批判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现在中国哲学界中也有人认为列宁的批判过分了，应当首先肯定马赫哲学对克服机械论自然观的历史作用，认为它的主导方面是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说伟大的科学家不可能是渺小的哲学家，列宁对彭加勒等人的批判曲解了原意，不符合事实，等等。

我们认为列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的评论基本上是公正的、正确的。诚然，列宁当时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由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有些地方用词也很尖锐，但是，从以上各节所作的介绍可以看到，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是根据确凿的事实材料，进行了严格的逻辑论证，它的主要论据是充分的，因而结论是科学的。而且列宁在批评时注意到了区别马赫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27页。

② 洪潜：《谈谈马赫》，《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人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哲学上的错误观点，区别他们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和自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列宁还考察了马赫从康德出发经过贝克莱走向休谟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揭示了他在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特点，所以，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

不错，马赫是最早批判机械论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特别是他对牛顿绝对时空概念的怀疑和批判，对当时自然科学家们突破古典物理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解放思想，客观上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爱因斯坦、普朗克等对现代物理学的建立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大科学家后来都是公开承认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证过，不再重复。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马赫所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哲学路线，是从对感觉、经验的半贝克莱主义半休谟主义的解释出发，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他就不可能正确认识新的实验事实同旧的古典物理学理论的矛盾的实质所在。结果他对机械论自然观的否定，并没有导致正确的结论，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把古典物理学自然观中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同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和正确内容混为一谈，在否定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同时否定了自然科学的对象——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真实关系，否定了唯物主义，陷入了唯心主义。正因为这样，马赫主义不但没有为当时正在临产中的现代物理学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把形而上学宇宙观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反而把它引向邪路，对科学的理论思维起了阻碍作用。

有两个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马赫、彭加勒等人的实际表现。他们当时都站在物理学发展的前列，就个人的才能和学术上的造诣来说并不比爱因斯坦、普朗克差，但由于坚持错误的哲学立场，他们都担当不了物理学革命的重任。甚至像马赫这样的科学家，不但自己没能创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且在别

人创立之后还采取不承认的保守态度。^①另一个是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哲学立场。他们早年都受过马赫主义很大影响，但是后来都坚决摒弃和批判马赫哲学。爱因斯坦明确主张：“相信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②他评论马赫说：“他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因此，他相信他能够克服心理学同物理学之间的差别。只要他把这种想法贯彻到底，他就必然会不仅否定原子论，而且还会否定物理实在这个概念。”^③他认为马赫的认识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④。普朗克则几乎和列宁同时（1908年）公开批判马赫主义，他同马赫进行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激烈论战。普朗克在谈到他同马赫主义关系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基尔时期（1885—1889年），我得乐意承认我当时也算是马赫哲学的一名坚定的信徒，马赫哲学对我的物理思维曾发生过强烈的影响。但是后来便背弃了它，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看透了马赫的自然哲学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自己的光辉诺言兑现。这个诺言就是从物理认识论中把一切形而上学的要素全部除掉。”“物理世界图景难道只不过是我們精神的一种或多或少的创造吗？……抑或它是反映实在的、完全独立于我们的自然过程呢？……如果当我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这种回答是跟一个自然哲学学派针锋相对的。这个学派现在在马赫的领导下，……”^⑤对于普朗克和马赫的论战，后来德国著名物理学家A·索尔菲曾经这样叙述过：“普朗克认为自己应该去捍卫……物理学世界观的健康，以免被这样一种哲学所摧残：这种哲学企图把自然规律贬低为没有丝毫

① 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74、438页。

② 同上书，第292页。

③ 同上书，第438页。

④ 爱因斯坦：《自传》。

⑤ 普朗克：《论马赫的物理认识论——一个答复》。

因果色彩的、纯函数的关系式，并且企图把自然科学说成只不过是‘把我们的思维去经济地适应我们的感觉’这样一种学问而已。这种哲学恰好就是马赫这样一位全能而显赫的自然科学家所拥护的。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吓倒普朗克，他始终坚持符合事实的判断：这种哲学是没有结果的，是个废物。”^①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两位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对马赫哲学的认识几乎和列宁完全一致。这两个历史事实就足以说明马赫主义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所起的作用整个说来是消极的。那种主张“它的主导方面是对科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观点，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怎样看待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现在也有不同认识。有人不同意列宁的批判，认为这个原理不能否定，它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的支持，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在前面第三节中，我们已经说明，列宁在批判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时，已注意到了马赫思想的矛盾，这就是他关于“思维经济”的理论中有的论述包含有科学方法的简单性原则的合理因素，因而与阿芬那留斯的观点有所区别，这表现了马赫哲学思想的混乱和折中主义的特点。但是，从整体上看，马赫所提出的是哲学认识论的原则。有二个不容否认的事实：1. “思维经济”和马赫整个哲学的基本前提——唯心主义经验论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提出“思维经济”是为了废除世界的“二重存在”（现象和实在），取消不经济的形而上学的物质实体，把一切都归结为要素的集合（感觉的集合），达到本体论的“经济”，即所谓要素一元论。2. 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一样，是把“思维经济”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他们把经济、省力、简单作为真理的标准，否认事物的因果联系，主张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数学函数对经验事实之间的依存关系作经济的

^① A·索尔曼：《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祝辞》。

描述、设计。这显然是主观真理论。无怪乎爱因斯坦批评马赫的“思维经济”是“纯粹心理上的简化”，这种简单性观念是“太主观”了。^①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正是从哲学认识论上批判马赫主义的思维经济原则的。他说：“‘设想’原子是不可分‘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阳电子和阴电子构成的‘经济些’？……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看出在这里使用‘思维经济’这个范畴是荒谬的、主观主义的。人的思维在正确地反映客观真理的时候才是‘经济的’，而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②这样提出和分析问题是抓住了“思维经济”理论的实质，而现在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恰恰是回避了真理标准问题。

至于列宁批评马赫、彭加勒、奥斯特瓦尔德等人是“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伟大的化学家和渺小的哲学家”是否恰当，应该看列宁对这些“物理学”唯心主义代表人物的批评的根据是否属实。事实是这些人虽然在科学上有过卓越的贡献，但是在哲学上确实都是自觉地反对唯物主义，倾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他们用相对主义、折中主义等方法，制造了要素论、唯能论、约定论、符号论等等。而且正是由于他们在哲学上的失足，使他们不仅不能担负本来理应担负的物理学革命的历史使命，而且还陷于唯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迟迟不承认原子的客观存在，不承认相对论这个伟大发现，这难道还不可以说是渺小的哲学家吗？有意思的是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说：“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学家，但却是一位拙劣的哲学家。”^③还应指出，列宁毫无伟大的科学家必定是渺小的哲学家的想法，相反，他一贯认为伟大的科学一定会产生出伟大的哲学。

当然，列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评论也不是完美无缺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13—214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同上书，第169页。

的。例如，书中批判马赫在时空观上的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时，对马赫批判牛顿绝对时空观对当时物理学界解放思想所起的积极作用确实肯定不够；批判所谓物理学“危机”问题时，摘引彭加勒的言论，个别材料也不够准确，只注意其否定经典物理学的一面，忽略了还有肯定经典物理学的一面；强调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的客观社会作用是为宗教和信仰主义服务时，对他们作为科学家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倾向这一面，个人对待宗教往往是持中立或反对的态度的事实考虑不够，有的评论有点简单化；又如哲学评论中过多地出现政治性的用语，如“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等等，这可能是当时白色恐怖条件下，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环境的影响。但这些都属于枝节问题，不影响主要论点、论据的科学性。决不能抓住这些个别的枝节上的缺点，加以夸大，以此怀疑甚至否定列宁对马赫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的“物理学”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

必须指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做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不限于以上各节所介绍的内容，还有不少。例如，针对俄国修正主义者宣称“马赫主义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相容的，”主张马赫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结合”的观点，列宁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决不可以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的原理。列宁还批判了马赫主义者所制造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论”、“社会生物学”、“社会唯能论”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这些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社会历史观领域中学会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各种形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又如，列宁在书中还提出了研究哲学史的正确方法，认为，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

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列宁在对马赫主义的剖析中就运用了这种从联系中和发展中研究和评论哲学流派的方法。书中还用这种方法对许多哲学流派和哲学家进行了评论，特别是深刻分析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经验论、不可知论和实证主义思潮，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哲学史的范例。列宁的方法对于后来的哲学史研究起了指导性的影响，今天也是适用的。

简短的结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列宁生前公开发表的一部长篇哲学认识论专著。从本章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列宁通过对当时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思潮——实证主义思潮的第二代代表——马赫主义的系统批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新发现的哲学概括，全面地、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实际上是对恩格斯逝世以来哲学领域中两个基本派别、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作了一个总结。这本书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抵制、反击了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在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内分清了理论是非，克服了思想混乱，巩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权威，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部承前启后、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文献，它对捍卫、发展、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现在，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对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仍然存在着不同认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批判列宁的物质观，人为地制造所谓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列宁的反映论的对立，指责列宁“背叛”和“逆转”了马克思主

义认识论，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论点、论据实质上是和马赫主义攻击唯物主义的论点、论据一样的，从前面各节中有关物质观、实践观、反映论等等列宁思想以及它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一脉相传的详细论述，已从正面回答了这些责难，读者自可鉴别。

由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针对资产阶级哲学的进攻，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和恢复下半截的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相对地说，对主体的能动的方面的论述就没有展开，比较薄弱。此外，作为一部主要是批判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专著，它没有专门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特别是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漏洞。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等著作中，在这些方面都有极其精辟和深刻的论述。

第五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它的固有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对立，日益暴露出来并趋向尖锐化。1907年出现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上述矛盾和对抗的大暴露。

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1912年又开始走向高潮。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反动当局加强了对革命运动的压制和破坏。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和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固有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围绕着时代提出的迫切课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展开了反复的剧烈的斗争。新的历史条件向俄国的以及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新的艰巨的政治任务和理论任务，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深入分析时代的基本矛盾，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和平与革命的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揭露他们的诡辩手法，用新的理论武装革命群众，为实现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而奋斗。

1913年至1917年，列宁在分析形势制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同时，深入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地总结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探讨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的生长点及其新的形态。在这期间，

列宁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两篇总结、概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文章，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哲学笔记—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它》、《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等关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四部笔记，写作并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两部著作，以及若干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重要论文。这些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提出了解决新时代课题的哲学、经济学、社会革命论的基本观点，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哲学是其基础和灵魂。在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他首先系统研究、阐发并坚持贯彻和运用到整个体系的，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

第一节 列宁系统考察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动因

列宁自从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理论斗争事业以来，一向重视辩证法的学习与运用。他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学说的“基石”、“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但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论述这个“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却是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列宁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战争初发时革命斗争的暂时“沉寂”，使他获得了研究学说的“宽余”时间，以及住在中立国瑞士的伯尔尼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以利用等客观条件外，还有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以下对这些原因分别考察一下。

一、探讨解决时代迫切课题的根本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情况。当时的欧洲各国，生产发展迅速，经济十分繁荣，科学技术不断获得新的成果，70年代以来的“和平发展”给人以劳资协调、政治民主自由的假象。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垄断，垄断又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竞争，盲目的发展和有计划的控制交织着。后起的国家利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快速赶上并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步入20世纪，这种“生机勃勃”的状况仍然在继续着。但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及新产生的对立，尽管被繁荣兴旺的表面现象所掩盖，却在日益尖锐，1907年就开始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外加紧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对内加强压榨工人，破坏工人运动，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

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增强，反抗也相应地提高。在20世纪初经济危机开始前后，19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30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结束了。以1905年俄国革命为契机，西欧工人运动重新兴起，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要求也日趋强烈。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经过几年的反思和积聚力量，1912年又开始走向高潮。与欧洲工人运动相呼应，东方殖民地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1908—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国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1905—1908年印度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斗争，等等，有力地配合了西欧工人运动。帝国主义在繁荣一阵之后，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之中。

为了抢夺殖民地、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早就剑拔弩张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的袭来，更使它们加紧扩军备战，加快军国主义化的步伐，在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中逐步形

成了“协约”和“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它们策划、支持并直接参与地区性的武装冲突，从1905年至1913年，局部地区的战争，连年不断，终于发展成世界性的战争。1914年8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掠夺性战争，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者在准备和发动战争的同时，使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收买御用文人和工人运动中的败类，制造种种谬说，诸如只有发展军备生产，方能保证充分就业；只有积极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取胜，方能保持并扩大民族利益，等等，力图煽起民族主义情绪，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他们甚至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和打击迅猛发展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如何科学地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现象、新情况，判定新的历史时代的性质、特点，如何看待战争、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这些新的历史时代的迫切课题，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摆在工人运动面前。事物、过程本身的矛盾、性质、特点，有一个暴露的过程，人们对它的认识、判定，也有一个从表面、片面到本质、全局的过程。囿于某些片面和表面的认识者有之，把握全局、本质的认识者也有之，于是争议、辩论由此而起，例如对帝国主义战争性质的认识就是如此。早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第二国际召开多次会议，就战争、和平、革命问题展开了讨论和辩论。在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下，1907年8月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1912年11月在巴塞尔召开代表大会，经过革命左派的努力，大会通过的决议、宣言都向工人阶级预告了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的严重危险性，明确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非正义性，并责成各国社会党人要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然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领导人没有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没有执行国际庄严的决议。他们放弃国际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的神圣职责，转而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战争预算。第二国际的最

大权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居然声称战争是两重性的，既是帝国主义性的，也是“防御性”的，要惩罚战争的祸首，要工人“保卫祖国”，这实际上是要工人为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卖命。他们打着辩证法的旗号，玩弄诡辩的花招，替这种叛卖的行径辩解。而当时的一些左派，由于缺乏辩证法和理论上的软弱，满足于指出早已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同战争紧密相联系着等一般道理，虽然积极批判机会主义，但无力纠正其错误论证，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推进。

关于战争性质的争论的背后存在着对时代性质的认识上的分歧。早在19世纪90年代，伯恩斯坦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过程，但他曲解并否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以新康德主义作为他的认识论基础，其结论是：资本主义体系有很大的灵活性，能使自己今后发展避免经济危机，因而在这种新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将会造成经济上的混乱，破坏现代生产的最复杂的结构，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正确的策略是通过民主改革，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这种幻想被随后发生的经济政治危机和世界性战争的事实击得粉碎。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考茨基看到了帝国主义扩张领土和军国主义化的现象，但他却认为这只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定阶段，因而也就谈不上他对这个阶段的性质、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按照他的逻辑，上述帝国主义政策可以被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代替，超帝国主义将以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对世界共同剥削，代替民族金融资本间的斗争。这种国际垄断的发展过程最终将导致建立统一的世界性垄断，排除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从而消除民族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并消灭战争。他还认为，即使在帝国主义政策下，当帝国主义者开始明白他们没有钱去扩充军备，因而彼此达成和平协议时，军备竞赛就会停止，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考茨基的这一套歪理，同样被当时严酷的事实彻底地否定了。当时的左派中也有一些人，例如卢

森堡，在对时代性质的分析中，也是不科学的。她认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积累过程在为了夺得尚无人染指的非资本主义世界的残余部分而竞争时的政治表现”，一旦这些“残余部分”消失了，资本主义就必然崩溃。这种浅薄的“理论”显然不能制服、纠正机会主义思潮。思想上的这些分歧与混乱显然是由于他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准确的掌握和灵活具体的运用造成的，尤其是对辩证法的掌握和运用。

面对时代斗争的迫切课题，面对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在理论和策略上的争论，列宁不断探索和寻求着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逐步意识到判明时代的内容、特征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关键性问题，而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好的。为此，他再次研究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及其历史发展，先后写作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等论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些观点，“极其彻底而严谨”，形成“完整的世界观”；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活的灵魂”，是辩证法这种“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它是马克思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索，列宁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到了科学分析时代课题的思想武器，从而下决心系统地考察和论述它，使自己以及其它革命者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使时代的迫切课题能得到科学的解决，从而把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推进。

二、对“经验一元论”的追悼批判

波格丹诺夫在受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尖锐

批判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他不仅对列宁进行了反击，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各种错误观点，继续影响着党内外思想界。他从1910年至1914年连续发表如下论著：《伟大拜物教的蜕化，信仰和科学，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10年）、《生动经验的哲学》（1912年）、《意识形态》（1913年）、《普遍的组织科学（组织形态学）》第1卷（1913年）、《关于社会意识的科学》（1914年）等等，顽固地坚持并发展他的错误理论，并且形成集团，创办刊物，开设“党校”，极力扩大他的错误理论的影响。

在上述论著里，波格丹诺夫一方面继续坚持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进一步展开他的经验一元论，企图以它来补充、代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另一方面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出所谓新的辩证法理论——“平衡论”。波格丹诺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已经过时了，不能满足人类实践活动与认识的全部需要。至于像普列汉诺夫及列宁一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辩证法还停留在19世纪唯物论的水平上。他们与马克思的冲突有两点：对于作为自在之物的物质的了解，与对于绝对真理的了解。在这种“极不成熟的观点下”^①，要想使他们与辩证法联合起来的企图，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观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并没有说明和解释辩证法本身，而哲学的任务是要“从组织的一切可能途径与方法的观点，来研究宇宙的过程”，因而，辩证法是一种“经过对立的争斗的组织过程”，准确些说，辩证法是“组织过程的特殊情况，组织过程是可以经过其它途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辩证法并不是一种普遍的东西，它不能成为认识的普遍方法”，“辩证法的原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出来，但是生活与运动，却不能为这些原素所概括”^②。波格丹诺夫认为，他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同，因为马克思所说的是

① 见《生动经验的哲学》，转引自《五大哲学思潮》（卢波尔等著，生活书店发行），第447—448页。

② 同上书，第448页。

“发展”，而不是他所说的“组织过程”。这个“组织过程”的实质是一个“经过对立力量的争斗过程。假如这一过程亦有起点的话，那么在起点以前，便没有对立力量的争斗，便曾存在过某种的平衡，假如这过程亦在某处完结的话，那么，无疑地，这两个力量的争斗那时便没有了，那时便形成了某种新的平衡。”因而，他的“三位一体”理论就是：“从平衡，经过破坏这平衡的两个力量的争斗，达到新的平衡”^①。根据这种“理论”，他认为社会是一种“系统”（体系），这“系统”与环境矛盾着、对立着，这矛盾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矛盾斗争的组织过程，是要达到某种平衡，才能使生产发展，社会进步，而社会“系统”内部的矛盾，按他的观点，是纯粹“心理的”，是仅仅存在于认识内的，可以通过逐渐的“民主化”来解决。因此，他用组织的，即心理的分歧、精神的瓦解，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历史更替。例如古代社会，由于过分的分化，“在整个社会里的‘精神联系’，亦即共同利益与互相了解，是减弱了，减少了”，“联系削弱了，内部的瓦解发生了，社会的生产能力因而降低，所以必然要崩溃”^②。

波格丹诺夫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上述责难、曲解，对所谓“组织过程”的辩证法、平衡论的鼓吹，以及从社会系统与环境的矛盾和社会系统内部的矛盾斗争的“组织过程”，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其主要倾向无疑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但是它却从另一角度提醒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辩证法科学理论体系，并把它贯彻到各个方面，是解决时代课题的当务之急。

列宁密切注视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前进派”集团的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对其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第一，他广泛搜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响的材料，例如

① 见《生动经验的哲学》，转引自《五大哲学思潮》，第450页。

② 见《组织形态学》，转引自《五大哲学思潮》，第451页。

1913年4月17日，写信给在巴黎的加米涅夫，要他搜集并带回刊有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评论文章的杂志。第二，他对受错误思潮影响的著作家作耐心的说服工作。例如1913年多次给高尔基写信，批评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马赫主义唯心主义的言论，批评高尔基在《再论卡拉玛卓夫性格》一文中的造神说观点。经过交流思想、交换意见，高尔基告诉列宁，前进派分子将逐渐摆脱马赫主义和造神说。第三，他给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写信，对于报纸刊登波格丹诺夫宣传马赫主义观点的《意识形态》一文，表示愤慨，严肃指出，“我们希望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马赫主义的报纸”。第四，他撰写并发表文章，继续公开批判错误思潮，从1914年2月至6月，连续发表了《关于亚·波格丹诺夫》、《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等论文，这些文章指出，他们的“马赫主义”是波格丹诺夫修改过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即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卢那察尔斯基的“造神说”，斯·沃尔斯基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所维护的哲学，也就是用“无产阶级哲学”的假名称隐藏在“前进”集团的纲领里的哲学。实际上，这种哲学是巧妙地为宗教辩护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变种，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文章还指出，现在亚·波格丹诺夫在一些“新”著作里，极力为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极端反动的哲学辩护，他的创作活动总的来说，不外是企图把资产阶级哲学家粉饰过的唯心主义概念灌输到无产阶级意识中去。因此，文章明确指出，应当弄清楚波格丹诺夫学说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波格丹诺夫的学说完全是另一回事。工人报纸应当清除无产阶级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成分，而不应当用自己的篇幅来传播这种倒胃口的大杂烩，我们决不纵容维护“马赫主义”，或者“前进派思想”的行为^①。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372—373页。

列宁追踪错误思潮，从总体倾向上对它作决定性的揭露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种思潮之所以存在和发展，总是有它的根据和条件的，其体系中总是有某些可以“吸引”人的地方，总有某些使人难以一眼看穿的能够迷惑人的东西。修正主义哲学思潮为什么屡批却是顽固地花样翻新，并在某些“高层”人士中有“市场”，这不能不引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看来列宁在追踪批判之后，在繁杂的剧烈的实际斗争暂时沉寂下来时，曾冷静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从他多次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多次强调要总结思想斗争的经验，以及他随后的研究活动，可以看出他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在于：第一，总结同错误思潮作斗争的经验教训。经过研究、思考，他得出“1. 普列汉诺夫对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进行批判，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多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肤浅地驳斥它们的议论，而不是纠正（像黑格尔纠正康德那样）这些议论，不是加深、概括、扩大它们，指出一切概念和任何概念的联系和过渡。2. 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初）对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进行批判，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和按照毕希纳的方式）多于按照黑格尔的方式。”^①意思是说，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等的批判，较少以作为哲学科学的唯物辩证法为武器，因而不能纠正错误，不能达到预期的批判效果。总结这个教训，当然就要在这方面狠下工夫了。第二，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修正主义哲学思潮反复宣告，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科学的认识论，因而要用他们所创造的“自然科学哲学”、“现代科学认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对待这种谬说，简单地斥之为胡说，作一般性的反驳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认真地总结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总结当代科学新成就，完整准确地坚持和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0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列宁系统研究和论述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就是沿着上述思路进行的。

三、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得到的启迪

要正确解决时代斗争提出的基本问题，克服和纠正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就得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如何坚持和发展呢？列宁在思考着、探索着。191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版，这部通信集是恩格斯生前嘱托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编辑的，通信集分四卷，共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来往的书信1386件。这些书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它记录了两位大师研究问题、形成理论的过程，阐述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和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通信集》出版后几个星期，列宁一拿到书便立即着手研究。他在两三个月内反复阅读了这四卷书信，除了在书上写下着重标记和批语外，同时还在笔记本上写下许多重要书信的内容提要。通过对《通信集》的阅读和研究，列宁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列宁强调辩证法是“整个通信集的焦点”，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进的天才的一步。”^①

列宁研究《通信集》的这个体会和认识，同他1910年《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所说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的论断是一致的，并且还进一步把它具体化和发展了。这种认识对于列宁集中系统考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76页。

和论述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理论，应当说是一个最直接的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第二，列宁认识到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应当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通信中指出，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是关于客观世界及认识规律的学说，而那种“把大量事例归纳成一个普遍原则，并不是辩证法”^①。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理解。”^②后来，马克思又对约·狄慈根表示，他在完成《资本论》以后，要“写一本辩证法”的专著^③，但是，这个宏愿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实现，恩格斯也一直没有写出辩证法理论体系的专著。而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6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认为，虽然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④，就是说，他对辩证法只有一些零星的论断，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这里给列宁的启迪是：辩证法是真正的哲学科学，它不是简单的方法和论辩技巧的汇集。它揭示的是规律而不是实例的总和。马克思有过撰写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愿望，但一直没有实现，恩格斯也是如此，这也就在他们的整个学说体系中留下空隙，给人以“缺乏系统专论”的口实，因而，要继承马克思的事业，要克服和纠正错误思潮，剥夺其迷惑人的“口实”，就得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

第三，列宁找到学习研究辩证法的途径和方法。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辩证法理论的“真正的宝藏”，《大逻辑》触及事物的辩证本质要深刻得多，而《哲学全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318、35—36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89页。

书》即《小逻辑》中的论述的例证大都取自自然科学领域，并极有说服力，此外由于论述比较通俗，因而唯心主义较少^①。而60年代末的约·狄慈根的著作之所以只有辩证法的一些零星思想，马克思认为，是由于狄慈根没有研究过黑格尔^②，拉萨尔则卖弄黑格尔的思辨概念，他的《赫拉克利特》一书只能是一部“小学生的习作”，他“妄想通过赫拉克利特来阐明黑格尔的《逻辑学》”，“没有想到要说出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某些批判思想”^③。

怎样研究辩证法，从何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和作法有所不同，各有特色。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入手，认为它的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研究黑格尔必须从《现象学》这个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恩格斯则主张从《逻辑学》入手，因为它是辩证法的“真正的宝藏”，他的《自然辩证法》较多地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自然辩证法》两部著作在列宁生前都没有出版，因而他不可能见到，但《通信集》里恩格斯的上述主张，则给列宁以启发，列宁后来对辩证法的研究，正是从《逻辑学》开始的。

第四，列宁明确地认识到《资本论》作为逻辑学的意义。《通信集》里马克思说，1858年他重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运用其中的辩证法的合理思想研究政治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写作《资本论》^⑤。在《资本论》中运用辩证的方法，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形式的分析入手，这里“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⑥，往后的分析逐步揭开这些秘密。这里，以辩证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163、90页。

③ 同上书，第36—38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163页。

⑤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450、445页。

法为指导进行研究而获得的东西，要用历史来进行检验^①，而事实、实践是这个理论的基础^②。这样的分析、论述、检验，就形成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统一的科学体系。这是马克思成功地“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③，“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④。

列宁一向重视、推崇《资本论》的方法论，并运用它分析俄国社会，分析与制定革命策略，但是在读《通信集》之前，他对《资本论》的方法论体系、《资本论》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的认识，是处在一般的、比较抽象的层次上。《通信集》中马克思对自己的《资本论》的创作过程、遇到的难题和运用的方法、以及《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的叙说，对于增强和提高列宁对《资本论》方法论体系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之后的辩证法研究中，列宁处处注意把《资本论》中运用的辩证法的成果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比较分析，批判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对于辩证法的性质、功能、研究和叙述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认识，都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也就是说达到了比较具体的认识。

第五，列宁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科学发展与辩证法的互相推动的作用。在《通信集》中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把被数学家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搞得神秘莫测的求微分的方法，变得简单易懂^⑤。马克思研究科学史、工艺史，得出例如“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⑥，即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科学技术的结论。在通信中，恩格斯则以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来论证辩证法。他还经过八年的“脱毛”过程，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存在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写作《自然辩证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442、86页。

③④ 同上书，第460、443页。

⑤⑥ 参见同上书，第179、348页。

法》。

列宁在他的哲学理论活动中，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新成就的研究和总结。1908年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当时新物理学中的一些学派跟马赫主义哲学的一些变种有联系，是丝毫不容怀疑的，因此，“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忽视这种联系来研究马赫主义，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一方面他强调自然科学不能离开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另一方面他坚持恩格斯所说的，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认真总结科学新成就，修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形式”，“不但不含有任何通常所理解的‘修正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然要求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对辩证法以及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联系起来，这是很正确的。恩格斯创作《自然辩证法》的具体计划、要点，对列宁的研究活动无疑也会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之后的辩证法研究中，列宁一再强调辩证法是科学史、技术史的总结、结晶，一再强调辩证法的正确性要由科学史来证明，并且把各门科学史列为从中可以总结出辩证法的知识领域，这不能不说是《通信集》对他的启发。

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长达40年的通信中，关于辩证法谈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辩证法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系统阐发辩证法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从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对辩证法的论证和揭示、他们在写作《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反复钻研和评议……等，阅读《通信集》使列宁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大大加深了，并极大地激发了列宁继承马克思的事业，继续深入系统研究和阐发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决心。从《哲学笔记》可以看出，列宁力图从《资本论》和《逻辑学》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去完成马克思、恩格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63—264页。

斯建立辩证法体系的未竟事业；还可以看出《通信集》所起的直接的影响有：其一，列宁对《逻辑学》的评价和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几乎是一样的。其二，列宁对《资本论》与《逻辑学》、辩证法的关系所说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①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其三，列宁对《逻辑学》所持的态度：“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观念的神秘主义**；这还要做大量工作。”^②这里坚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其四，列宁对拉萨尔《赫拉克利特》一书的评价，注明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四、撰写《卡尔·马克思》，认识到马克思 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列宁为撰写《卡尔·马克思》而重读《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加上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研读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撰写，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认识到系统阐发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这是列宁下决心进行这项工作的又一直接原因。

经过几年的反复研究，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它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极伟大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③。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完整世界观”，是一个“十分完备而严整”的思想体系。其中，“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是人类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它给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1、22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1页。

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则揭露了“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①。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改变，由于“直接行动的任务”的重大变化，因而马克思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②。马克思的两个可以与科学史上伟大发现相媲美的是：第一，唯物史观，第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毕生精力，概述、论证和运用这两个伟大的理论发现，写成了划时代的理论巨著。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学说的形成中“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③。

然而，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却是辩证法。马克思在其埋头于《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时，曾两度表示要系统阐发辩证法，但都未能实现，他对辩证法思想的理解、设想，以及研究和叙述方法等，都体现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中。就是说，在《资本论》这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著作里，包含着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以及辩证思维的逻辑方法论体系。马克思自己没有来得及总结，这就给后来者留下研究的课题。恩格斯以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从自然科学史方面来批判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论证自然界也是按辩证规律进行的。他对辩证法的内容、性质、功能以及辩证法的研究方法、途径，都有自己的设想，这体现在他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列宁反复读过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45页。

《反杜林论》，而对《自然辩证法》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但是列宁读过《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其中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1882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谈到他当时脑子里出现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辩证法（这实际上就是恩格斯关于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全面构思的起点）。列宁在信边作了旁批，说明他知道恩格斯当时正在研究“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的一些主要成果（但当时列宁却误认为“这里像是《反杜林论》的草稿”^①）以及恩格斯关于在自然界的每个领域中系统地揭示和阐发辩证法规律，“是一个巨大的工作”^②，“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③等提示和要求。从这些可以看出，列宁对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及其构想是会有一个概要的了解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发辩证法的计划要求，马克思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恩格斯揭示自然科学、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亟待加以总结概括，把计划加以实现，一方面这是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因为对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勾画、概述，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经济学说，都有了详细叙述、展开和论证的专门著作，而唯独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作为整个学说的“灵魂”的辩证法理论，却没有详加论述的专门著作，这不能不是个缺陷，从理论、学说体系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说，是需要尽快填补上的；另一方面，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理论研究的成就，总结思想史上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一切成就，系统阐发辩证法思想体系，用它为指导剖析时代和具体的形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以及揭露机会主义者的诡辩手法，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使命。列宁经过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及其《通信集》，通过概述马克思学说体系及其发展史，已经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把作为哲学科学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180、186—18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3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8卷，第182页。

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的深入系统研究，摆到紧迫的议事日程上，认真地加以对待。

从列宁自身理论思想的发展来看，自1907年至1917年这整整十年，实际上是他锤炼和锻造理论武器的时期。在剧烈的哲学理论斗争中，列宁在不断地探索和总结，1908年他反复阐述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论反映论。但一般的唯物论原理，克服、纠正不了错误思潮。马克思已经提出并积累了丰富思想材料的辩证法理论，如不加以说明和发挥，就无法对付各种思潮的挑战，也无法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实际斗争问题。应该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发表后，列宁已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逐步把研究的重点转到辩证法，转到辩证法与认识论有机结合这个重点上来。

1914年7月至11月，列宁应格拉那特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的约请，就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著述活动，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及各个组成部分的要点，撰写《卡尔·马克思》一文。他在叙述马克思的学说体系时，首先简略地介绍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其中专列一项概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1914年9月至1915年，列宁研读了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写下命名为《哲学笔记本。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八本蓝皮笔记本，在这些“笔记”里，系统考察并论述了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理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见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贡献

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给剖析时代的迫切课题和制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提供理论指导，列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研究。他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看作一

个严整的体系，在这个整体中哲学是基础，所以，他把哲学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考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摆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来研究。自从他投身革命和理论斗争事业，他就是这样做的，特别是1913年以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哲学史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入，撰写并发表不少有自己独特见解的论著，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

一、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过程及其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不断地回顾和总结自己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叙述了自己和恩格斯的学说的形成过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前提、自然科学条件以及理论形成的历史进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关著作中，他们对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意见。此后，梅林、普列汉诺夫首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前提，为此梅林写了《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等著作，普列汉诺夫撰写《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等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包括列宁在内的整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及其历史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1. 1905年之前，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等著作，写下《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等论著和准备材料；2. 1905年至1912年，列宁研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论历史唯物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等著作，撰写《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

中的几个特点》等著作；3. 191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是列宁系统考察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理论来源、学说发展史及其理论基础的重要时期，其研读的著作除上述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4卷、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的传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著作^①，撰写《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卡尔·马克思》、《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所有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时期划分、各个时期的内容特点、各重大理论原理（如唯物史观、认识论、国家学说等等）的历史考察、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评价，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等等，都提出一些有科学价值的独特见解。

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考察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特点。第一，列宁研究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是为了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而且是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遗愿，建立和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体系。列宁认为认识论、辩证法（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是哲学史、认识史的总结、精华、结晶，他把哲学史列入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辩证法的知识领域，而且把它摆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首，说明它是最高层次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知识领域，因为它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各个时期哲学思想的比较分析中，可以总结、概括出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规律，可以总结出哲学理论原理。而哲学基本理论原理之是否正确，不能靠感性直观的事实材料来论证，而要靠哲学和科学长期的历史发展来论证，也就是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83—95页。

说，从它们的历史发展的考察，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在理论上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列宁就是这样为了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潜心研究哲学史（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学说史结合起来。例如1908年列宁为了批判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系统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约·狄慈根、普列汉诺夫坚持和阐发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历史过程及其基本观点。1913—1915年，列宁为了阐发唯物辩证法学说体系，批判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古代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把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与集辩证法之大成的黑格尔逻辑学作对比、分析和总结，从而提出对辩证法理论有重大突破的见解，勾画了辩证法学说体系的蓝图。

第二，列宁总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中考察和研究，从不孤立地考察它们。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虽有其特定的内容、结构，也有其特殊的功能，但这些部分又相互联结、相互渗透，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是它的理论基础，是它的灵魂。在介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后，列宁指出，“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①。在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策略时，列宁指出，“马克思正确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②。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他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离开实践，离开把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运用于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并付诸行动，那就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62、77页。

既不是实践的，也不是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离不开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它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中吸取自己的营养，促进自己的发展的。列宁深知这个道理，并努力按这样的见解去进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第三，列宁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历史的研究为主干，进一步追溯考察其理论来源，同时结合研究自己民族的哲学理论传统。这样做，既可以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可把它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使之带有民族的特色。在列宁的一生中，他始终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思想及其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他反复研读并不断提出新的见解。比如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中，列宁认为“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①，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进一步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他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同时，还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的马克思的理论来源，尤其是对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近代哲学，根据理论研究、理论斗争的需要，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例如，按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在流放时期，列宁就研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期，列宁除了研究唯物主义者的著作，并引用其精辟的言论外，还系统考察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近代代表的思想及其发展历史；在系统研究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理论时，列宁系统深入地考察、批判、总结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研究了费尔巴哈以及古代辩证法大师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8页。

思想、著作，写作《哲学笔记》，在这里面记录了他研究工作的进程及其突破性的成果，这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在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列宁时刻不忘自己民族的优秀哲学传统，尤其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他反复进行研究，并在有关哲学著作中介绍并高度评价了这些优秀代表的思想，例如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赫尔岑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点，其思想的优点和问题，特别是对其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和中肯的评介。列宁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①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列宁也认真地加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1909年初列宁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当时《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付印，这一篇文章是作为第四章第一节的补充排印在全书的最后，文章中列宁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屏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人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②在这之后，对普列汉诺夫所著《尼·加·车尔尼雪夫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2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7页，374页。

基》一书和斯切克洛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事业》一书进行研读并写了批注^①，这些都收进《哲学笔记》中。在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时，列宁所写的关于人类认识的二重化，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的评语时，提出“参看皮萨列夫论推动工作的有益的幻想以及空洞的幻想”^②。这说明列宁对于皮萨列夫的著作及其思想相当注意研究，并在考察认识论问题时加以运用。以上三方面（马克思的、欧洲的、俄国的优秀哲学传统思想的考察和研究）工作的结合，汇成一个有机的研究、探索和总结的过程，从而使列宁的研究具有时代的民族的特色。

第四，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正像他在整个马克思学说史的研究中一样，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斗争的需要，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列宁在早期着重唯物史观的研究，为的是批判民粹派以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社会学思想；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清算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思潮，列宁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出认识论的理论框架；1914年前后，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批判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进一步清算修正主义哲学思潮，科学地剖析时代、论述革命理论和策略，列宁着重系统地研究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无论哪个阶段，列宁都将它作为学说整体中的侧重点来把握，例如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没有离开辩证法；对认识论的研究，没有离开辩证法；对辩证法的研究，也没有离开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列宁认为辩证法是认识史的总结、结晶，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等等。这种在整体中把握重点、在重点中把握整体的做法，也可看作是列宁研究哲学、研究哲学史的一个特色。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523—510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7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列宁在研究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过程中，遵循了几个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原则，概括起来，大致有：

(一)列宁始终如一地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对待历史遗产和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的批判继承的经验，列宁都认真地作了重新审视和总结，并加以具体贯彻，例如他在研读黑格尔著作时，具体区分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基本观点和在体系中所包含着的合理思想，对逻辑学的评价很能说明这一点。列宁认为，“黑格尔逻辑学的总结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实质，就是辩证的方法，——这是绝妙的。还有一点，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是事实**！”^①有的人以这点为依据，说列宁转向黑格尔，放弃哲学党性原则，这是一种误解。第一，就在这段评语中列宁明确宣告，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一部最唯心的著作；第二，就在研读这部著作的开头，列宁就明确指出，“我总是竭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黑格尔是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说，我大抵抛弃上帝、绝对、纯观念等等”^②；第三，在具体分析逻辑学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时，列宁指出运动和“自己运动”的原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但是“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③；当揭示出黑格尔逻辑中的对立面的过渡、对立面的同一思想时，列宁认为“这就是黑格尔的主要东西”。“然而这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费解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④。所以“不能原封不动地**应用**黑格尔的逻辑；不能现成地搬用。要**挑选**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观念的神秘主义**；这还要做大量工作”^⑤；第四，说逻辑学中“唯物主义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02—203、86、117—118页。

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8、225页。

最多”，是指它包含着的辩证法的合理思想最多，就是说“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但是，“正是猜测到了，仅此而已”，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①。有的人还以党性会混淆哲学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为由，而反对哲学的党性，反对列宁的作法。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观点是很明确的，第一，当他谈到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会利用它，并把它巩固起来，并不是说唯心主义和阶级立场是一回事；第二，在批判马赫主义时，他主张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反对其他人把二者混为一谈的作法；第三，在舒利雅季科夫《西欧哲学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一书批注中，批判了对哲学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作法，列宁指出舒利雅季科夫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例证。它对各个时期、各种社会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不作具体的分析，只讲关于‘组织者’的空话，只作牵强附会、荒唐可笑的对比”^②。诚然，在列宁的论著中，有时有“反动的”唯心主义等等提法，但他不是就一般状况而论的，而是指具体环境下的具体人物的思想，这种提法并非无理。列宁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哲学思想持批判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队伍内部的缺点错误，列宁也同样严肃地加以批评，例如指出约·狄慈根在哲学认识论的论述中的混乱的不恰当的提法（用语），批评普列汉诺夫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重视不够，没有把辩证法看作认识论，以及把对立面的统一看作实例的总和，而不是把它看作认识的规律等等。他指出过卢森堡为了反对诡辩而否认对立面的转化的错误。对于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列宁则给予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代替聪明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6、464页。

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不动的代替愚蠢的”^①。这种严肃的从认识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批评错误的做法，丝毫也没有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评价哲学思潮时，恰如其分的指出一种思潮的科学价值和它的社会意义，是完全必要的、科学的作法。至于后来有人将哲学党性原则随意套用，搞简单化庸俗化，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个思想原则的内在价值。

(二)列宁认为对哲学史上的思想体系、思想家的评价，应当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主义原则考察哲学史，批判了把哲学史当作哲学意见的堆积的浅薄的哲学史观，要求揭示哲学史上各个哲学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认为每一个哲学体系都是哲学的本质——观念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哲学发展的必然环节，因而都有其特殊的价值。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回复到自身的圆圈式运动过程，它不能超越时代，因而不能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去改造古代的哲学家，相反地需要的是客观的历史的研究，对此，列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黑格尔“出色地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思想的‘发展’强加于古人”^②。在吸收黑格尔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列宁把历史主义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并坚持贯彻到底，认为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时，不应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应根据他们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提供了新的东西，就是说评价哲学史上的人物，应当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具体地历史地进行分析 and 鉴别，不能把后人才有的思想、概念硬挂到前人的名下。例如列宁批评拉萨尔把赫拉克利特的一切解释成黑格尔的样子，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找出黑格尔的东西^③。对于马克思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论来源问题，列宁在研究了黑格尔关于“认识观念”的真的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35、208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83页。

观念（理论观念）、善的观念（实践观念）后指出，“无疑地，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并且也就是向客观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的’）真理的过渡。因此，马克思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时，是直接和黑格尔接近的”^①。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从人类认识发展的对立统一的高度，总结哲学史发展的圆圈，把唯心主义视为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大树上的一朵**无实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视为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环节，而按发展的圆圈，它还要继续向前运动。

（三）在进行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时，列宁坚持把它与人类认识史、科学史结合起来考察。这样做有许多优点，第一，可以从认识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哲学思想、哲学体系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从中总结出思维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出哲学认识的规律性。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从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高度，揭露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摆脱危机、克服错误的出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从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的高度考察和分析唯心主义，揭露它的认识论根源，总结了人类哲学认识的经验教训。第二，可以了解各个时期哲学和各门科学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总结各该时期科学成果及其中的经验和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认识规律，对哲学发展作出恰当的评价。第三，可以从中总结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列宁认为在研究哲学时，对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潮、派别之间的联系不作具体分析，是对辩证唯物论的嘲弄，只有坚持结合研究的途径，方能使哲学真正生长在自己的根基上。

（四）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诚然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但也离不开他的战友和学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根据这个原则，列宁认为，第一，既要重视马克思著作的研究和总结，又要重视恩格斯著作的研究，他们二人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1页。

是学说的创始人。列宁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但是“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①。他们两人的思想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表现则各具特色，“在马克思方面，是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②。他的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著作。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是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③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里，还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讨论具体科学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列宁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那种夸大两人的差别，甚至把它说成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是毫无根据的，而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别和恩格斯思想的特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战友以及后来的追随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都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也有各自的特点，而且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有的人甚至转到另外的思想体系上去了，这些都应作具体的分析。列宁也注意到这一点，比如对卡·考茨基，列宁认为当他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对于约·狄慈根，列宁既肯定他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在哲学斗争中坚持党性原则，又批评他在一些提法和用语上乃至某些观点上的混乱；对于卢森堡，既肯定她坚持革命立场批判机会主义，也批评她缺乏辩证法；对普列汉诺夫既肯定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译著和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培养了俄国整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修正主义哲学思潮方面作出的贡献，同时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0、9、16页。

也指出他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注意不够以及政治上陷入机会主义沙文主义、玩弄诡辩花招等错误。按照列宁的这些方法去研究和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史，才能是内容丰富、色彩多样的。当然，列宁还没有把这个思路充分展开，但是值得继续下去的。

(五)在考察马克思学说史分期上，列宁始终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这个本质特征，以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大历史转折为依据，来划分学说史的时期和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列宁提出马克思学说发展的两个五十年，以及这两个五十年的理论斗争的特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而“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①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列宁又进一步提出：“马克思首次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 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2. 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3. 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②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参考书目中，列宁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又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1842年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批评、关于林木盗窃法、维护政教分离等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说明“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已彻底完成。”^③在《哲学笔记》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列宁又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83页。

一步对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变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①列宁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两种说法不同，后者是在系统考察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后所作的，是他的一个研究的新成果，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列宁研究马克思学说史、哲学史的成果中，有着方法论意义的部分。列宁还把这些原则适当推广于分析、批判和探讨哲学史上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著作，从中汲取和总结出唯物辩证法理论原理。

第三节 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设想

1914年9月至1915年，列宁钻研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等著作，以及一些评述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著作、一些论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书刊，作了详细的摘记和评述，在此过程中写成的八本哲学笔记本录下了列宁研究辩证法的札记、纲要和短文。作为《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的《哲学笔记》，是由这八个笔记本和其他时期零散的哲学笔记汇集而成的。

列宁的研究工作是从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著作入手，然后追溯到古代辩证法代表人物的著作和思想。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和黑格尔的逻辑作对比、分析和研究，从中总结出辩证法理论原理，这种研究方法是合理的、科学的。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了，但是他“第一个以全面详尽和有意识的方式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3页。

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他的著作中“有一个合用的、内容广博的辩证法纲要”^①。具体地说，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对辩证法的各个基本范畴作了细致地考察和论述并把它们构成一个体系而外，还对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形成、构筑的基本原则、途径及其方法，都作了探讨和论述。对于所有这一切，列宁都极为重视，除作了大量摘录和评语外，还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著作中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写下了《辩证法的要素》、《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形成的知识领域》、《谈谈辩证法问题》等纲要、短文、札记，探索并概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和辩证法要素的内在关系，抓住了它的实质；还对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基本原则、途径及其方法作了论述，这一切形成了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构想。

一、对辩证法体系的基本原则的探讨和论述

列宁在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批判改造它的辩证法合理思想，考察它的体系结构和逻辑进程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作了比较研究，写下《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这篇札记，提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②。这里，列宁明确了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人们称这个论断是构造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

对于这个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论断，有的人认为列宁指的是在《资本论》中，而不是指一般的领域，把它说成是辩证法学说体系的普遍原则，似乎立论不足。事实上，提出“在《资本论》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0页。

中”之前，列宁已总结了黑格尔逻辑学中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列宁指出，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从存在（现象）开始，揭示出这背后的本质，作出种种规定（同一、差别、矛盾、因果关系等等范畴、概念），而这一系列认识的辩证法的环节，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经过实践的检验达到客观真理。紧接着列宁就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然后，才谈到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在这之后，列宁才进一步指出，“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这说明列宁关于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论断，是总结黑格尔的逻辑，是一般，同时它又是总结**《资本论》**这个“辩证法的局部情况”^②，是个别。从个别、特殊可以揭示一般，这两种逻辑的实质、基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只要是从全文的精神实质来看，就可以得知：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论断，虽然出自**《资本论》**的总结，但它却是与黑格尔逻辑一样具有普遍意义，也是辩证法这个大写字母的逻辑的基本原则。

列宁所说的总结**《资本论》**的逻辑，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的“这一问题”^③，就是总结**《资本论》**中，唯物主义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位一体”的逻辑，并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大写字母的“逻辑”，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理论问题。这样理解的根据在于：列宁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之后，紧接着明确提出唯物主义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然后指出“这种唯物主义”是汲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并且把它向前推进了，最后粗略地勾画了体现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和方法。从这整个叙述的逻辑来看，“解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89—2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0页。

这一问题”指的是解决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学说体系问题，这个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思想，则是这个学说体系的基本原则。

列宁提出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论断，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考察这个过程也可以进一步解决这个原则并不局限于《资本论》的问题。早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就已经指出，“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①。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过程中，列宁先后写下两段话：其一，“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②这段话的第一句实际上讲的是辩证法，逻辑就是辩证法。第二句讲的是认识论，逻辑也就是认识论。所以这段话就其内容实质来说，也就是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没有作出这样明白的论断就是了。其二，列宁明确提出，“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它是认识论。”^③而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是概念、规律等等的形成过程。是对运动着和发展着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性的近似地把握。这段话实际上也就是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些即将进一步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和言论，列宁接着就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中明确提出，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论断。随后，在辩证法研究的总结性论纲《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8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7、152页。

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的论断^①。列宁提出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从哲学科学的层次上解决了辩证法学说体系的实质问题，明确了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关键所在。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指的是：第一，“同一个哲学科学”的三个方面，是作为哲学科学的广义的辩证法，作为哲学科学的广义的逻辑和作为哲学科学的广义的认识论，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这三者是从三个侧面、三种方式来反映“同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它们就是关于这个内容的学说；第三，这三者都是人类认识史、思想史的精华、结晶，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因而，这三者是哲学科学“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这个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的原则，既科学地规定了、解决了辩证法的研究对象：

“‘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或者说“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就是说这种发展规律不仅仅是客观世界的，也不仅仅是主观世界的，而是上述两者的共同规律，研究这种发展规律的学说，其性质是哲学科学。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认识论，同时也是思维的逻辑方法，“同一个东西”具有三种职能。有的人认为，列宁讲的是“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因此，是三门科学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是“三者的有差别的同一”，而不是等同的“同一个东西”。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问题是第一，列宁明白无误地说：

“它们（指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引者注）是同一个东西”；第二，从列宁提出论断的前后言论来考察，也只能理解为、解释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第三，这个三者是“同一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8页。

东西”的论断有它的特殊含义和意义，已如上叙。列宁的这个论断，是对黑格尔逻辑学和“资本论”的逻辑的实质所作的科学总结，既吸收了它们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又把它向前推进了。

二、辩证法是认识史的精华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正确的理解它、把握它，是理解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的关键。

列宁认为，辩证法是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对立面的统一既是认识的规律，同时也是客观世界的规律。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时，他反复强调提出，辩证法是认识史、思想史的精华、总结。当考察本质论中黑格尔关于“**实体是观念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实体性关系过渡到因果性关系时，列宁认为，实体概念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人们“一方面，应该从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对实体的认识（概念），以便探求现象的原因。另一方面，真正地认识原因，就是使认识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这个认识发展的辩证法思想，“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史的**精华**”^①。当分析黑格尔关于实在的根据容易导致诡辩时，列宁认为黑格尔关于事物的“全面的、活生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人的概念中的反映”，这些概念必须是灵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才能把握世界”，马克思就是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思想，因此，“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探讨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②当考察概念论时，针对黑格尔关于逻辑形式除了“按照思维现象现有的样子对它们作自然历史的描述”，还“必须前进”，即必须“**是和真理的符合**”的论述，列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33—134、122页。

宁认为，“按照这种理解，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问题”。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思想史的精华”或者说“是思想史的结果和总结”^①。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列宁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实际上说明了“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确实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②。这就是说，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它研究的是“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它既不是实例的总和，也不是对直接现实的总结，而是对反映、总结各不同领域直接现实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后来的成熟形态的辩证法理论，无疑地是对科学史、哲学史，也就是思想史、认识史的总结，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在列宁阅读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时，当看到拉萨尔反复强调赫拉克利特关于“运动无所不在”和“全部问题在于理解‘绝对的对立面的演进着的同一’”的思想，列宁就提出，“一般说来，运动和变易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于是，这个运动也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但是，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头脑”^③；当读到赫拉克利特关于“联系和联结”以及“原因的秩序和次序”的观念时，列宁指出，“自从‘万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使人信服的认识论”^④；列宁进而转述了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真实地阐明赫拉克利特关于词和语言的本质和来源的理论，指出这种本质和来源就在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6、289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5、298—299页。

于对自然界的摹仿，……对事物本质的摹仿”^①。就在以上思想、材料的准备和启发下，列宁写下著名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形成的知识领域》，这就是：“哲学的历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也“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全部知识领域”^②。列宁提出的这个“知识领域”，实际上也是一个研究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提纲（或计划），这个“提纲”有它的特色，其一，它从几个主要方面研究总结认识论和辩证法理论：1. 由全部人类思想史、认识史提供的思想系统发育方面的知识，包括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2. 由个体、个别人的个体思维史提供的思维的个体发育方面的知识，包括儿童智力发展史、动物智力发展史；3. 由语言及其历史、感觉器官、心理的以及脑力活动的过程提供的思维的物质基础方面的知识，包括语言的历史、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等。如果照这样去办，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学说体系，无疑的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其二，这些“知识领域”包含着“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思想，对它们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可以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将真正体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与认识论的同一。其三，这些“知识领域”讲的主要是学说史，是思想史、认识史，这有其深刻的意义。因为学说史、认识史反映的是某个领域的认识历程，一定阶段的认识成果，一般都经过实践检验或理论论证，有的经受住检验，成了科学的理论，有其成功的经验；有的经受不住检验，被推翻了，或者作重大“修正”，这有其失败的教训。科学的结论固然重要，但获得结论的方法（经验教训）更加可贵，既然成了历史——思想史、认识史，就有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可以总结，其可靠性也比较大。当然，这并不排斥现实的成果，它作为探索的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2、302页。

新的依据其作用是巨大的，但还需进一步经受检验，方能站得住。把历史的和现实的相结合，把总结的重点放在历史，有其科学的依据，有其特殊的意义。其四，这些“知识领域”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列宁指出：“希腊哲学已经涉及所有这些成分”^①，当然只能说是包含了上述知识领域，因为当时的学科还没有完全分化。列宁列举的知识领域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科学发展的水平、状况，所以应当具体历史地对待列宁的这个计划，既高度评价其理论价值，又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比如脑科学等在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并显示其作用，所以列宁并未列入），把它作为我们今天探索和总结辩证法和认识论学说的指导，如果我们结合当代科学认识的新成就，沿着列宁指出的认识真理的道路前进，将会获得新的进展。

概念、范畴是认识的辩证运动展开的形式，是辩证认识的环节，是认识发展的阶段性的总结。在读《逻辑学》序言关于思维形式的论述时，列宁就提出，“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②当读到规律的概念的时候，列宁认为“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总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③所以，逻辑的范畴，也就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环节”^④。列宁还认为作为认识环节的概念、范畴，并不是凝固的、僵死的，它们是流动的，它们反映的是事物、过程的对立面的统一。列宁认为概念的矛盾、过渡关系是逻辑的主要内容，并且这些概念及其矛盾和过渡的关系，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⑤。这样，每一个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的联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2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8、126、168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8页。

系中。因而，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相互过渡、往返流动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因此，对概念的分析研究和运用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联系和相互过渡^①。随着认识的发展和深化，认识不断地从一种层次的本质进到更深刻层次的本质，形成不同层次的概念，如同一和矛盾概念，按层次排列，矛盾是更深刻层次的概念。总之，作为辩证法、认识论学说体系的“砖石”的概念、范畴，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阶段。

概念和范畴与认识史的关系，除上面所说它们是认识阶段的总结外，还有概念、范畴系列的逻辑进程问题。列宁指出，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是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身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了。这给整个逻辑学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②。这是说黑格尔把他的逻辑学说成是描述概念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过程的各个阶段、环节的，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但是他把逻辑学的范畴体系、逻辑进程与哲学史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逻辑体系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认识史上最早出现的体系的核心范畴，比如“存在”这个最初的范畴，就是埃利亚学派，特别是巴门尼德所概括和提出的抽象概念；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则达到“变易”这个概念。黑格尔为了构造他的范畴体系，有时也搞牵强附会，但是这里有着合理思想，这就是逻辑和历史同一的思想，这个思想黑格尔有明确的表述，他说“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应当符合逻辑哲学的发展；但在逻辑哲学中必定有一些地方是历史的发展中所没有的。”^③列宁充分肯定了这里的合理思想，他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正确、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2—213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6卷，第97、224页。

础、根据、存在”^①。这是说逻辑要与历史一致、同一，而历史则是基础，逻辑（包括它的概念、范畴）则是历史的反映，是认识的阶段性的总结、结晶。比如在概述《资本论》的逻辑结构、进程时，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②，这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一。

列宁还认为，作为思想史、认识史精华、总结的辩证法、认识论原理，其正确性的检验，要靠哲学和科学长期发展的历史。因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原理，是客观世界及对它的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实例的总和，不是举例所能证明和检验的。列宁指出，认识的发展从现象的外在性深入到实体这样的规律，“应该用两类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自然科学史中的例子，（2）哲学史中的例子。更确切些说：这里应该谈的不是‘例子’——比较并不就是论证，——而是自然科学史和哲学史+技术史的精华。”^③如果这里还说得不够清楚，那么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内容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④，举例说明不是不可以，“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它不能被看作科学的论证。

综上所述，辩证法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它既是人类认识的规律，也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既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也是人类认识本身所固有的。所以，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精华。

三、辩证法体系的论述及其方法

列宁在研读黑格尔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作对比研究、总结的过程中，写成了一些纲要、短文和片段：《卡尔·马克思》中的辩证法一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24、290、133—134、305页。

节、《辩证法的要素》、《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中形成的知识领域》、《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些纲要、短文片段不是孤立的，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包括辩证法体系的各个方面：第一，辩证法的基本概念、范畴，它们是构造辩证法体系大厦的“砖石”；第二，构成辩证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这解决了辩证法的对象、性质和功能的问题；第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面的统一，围绕这个核心构成严密的学说体系；第四，辩证法、认识论的理论来源，以及学说原理及其体系检验的根据——哲学发展史和科学史，或者说思想史、认识史；第五，辩证法的研究和叙述方法：逻辑起点的选择以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等。

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时，列宁赞同黑格尔所说的，哲学的方法应当是它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别的更低的学科的方法，因为方法是由对象的内容的本性所决定的^①。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的对象是“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而发展规律的实质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因而，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其研究方法也只能是既分析又综合，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②。

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和《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总结了《资本论》和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和阐述方法，明确提出一般辩证法的研究和阐述方法是，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东西开始，逐步揭示、展现辩证法的一切要素。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开始，把它当作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沿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逻辑进程，体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样就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③。这里包含了几

①②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2—75，205—206，291、307页。

点意思：第一，按照列宁的意见（他是总结黑格尔的和马克思的），应选择最简单、最抽象、最普通的东西作为研究起点或逻辑起点，例如从“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开始，这就是说从最简单的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第二，列宁进一步指出，辩证法体系，从最简单的概念开始，既要进行分析，又要进行综合。这也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因素的吸取，他的《逻辑学》从“存在”开始，展开为质、量、度等等的过程，这并不是先分析后综合，而是分析中有综合、综合中有分析，是在对立面的同一中来把握对立面。这一特点也是与科学的性质一致的。有的科学偏重分析，有的科学偏重综合，但从整体上讲，任何科学都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第三，列宁提出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两者结合的方法。列宁在考察黑格尔逻辑学范畴表以后指出，“黑格尔有时从抽象到具体（存在（抽象）——定在（具体）——自为存在）”，“有时却相反（主观概念——客体——真理（绝对观念））”。“这是否就是唯心主义者的不彻底性呢？或者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呢？”^①列宁经过分析认为，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逻辑学所研究、描述的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这个逻辑过程就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过程，搞的是逻辑的推演，但是在主观逻辑（概念论）部分却又包含有这样的思想：认识是主体——人从自己出发去接近客体，即由感性而达到理性的认识，再经实践检验，达到真理性的认识，这显然表露出唯物论反映论的认识途径。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来看，这是不协调的、矛盾的，因而列宁说这是他的唯心主义不彻底性所在。但列宁肯定这里面确实包含着更深刻的道理，这就是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范畴的运动过程中包含着从具体到抽象的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89—290页。

识运动。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都贯穿着这两者一致、两者结合的思想，由抽象到具体的进程和由具体到抽象的进程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一致结成一个统一的过程。列宁认为，存在论和本质论的范畴运动，作为一个逻辑发展过程显然是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就是由抽象的、直接的把握对象到具体的、间接的把握对象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具体达到抽象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列宁说，“起初有一些印象**闪现**，而后有**某个东西**分出，——然后**质**（物或现象的规定）和**量**的概念发展起来。然后研究和思索使思想去认识同一——差别——根据——本质对现象的关系——因果性等等。”^①为何说这也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呢？列宁在给“质”这个概念作注解时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

“感觉是最先的和最初的东西，而在**感觉中**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质**”^②。从科学认识的历史进程来看，先是认识事物、现象的**质**，然后才进而研究这些事物、现象的**量**，对**质**的认识是较浅的，对**量**的认识是较深的，从**质**到**量**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这之后，列宁又对概念论进行分析，并将它与上面的分析结合起来，列宁指出，“所有这些认识的环节（步骤、阶段、过程）

（指的是**质**、**量**、**同一**、**差别**、**根据**、**本质**、**现象**、**现实**……等等——引者注）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这个检验达到真理（=绝对观念）”的过程^③。这样，就把黑格尔在客观逻辑中所论述的逻辑进程和在主观逻辑中所论述的认识进程统一起来了。或者说，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是从认识论方面对他的客观逻辑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列宁作了上述的分析和总结，就在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这种作法有着深刻的道理的。这个深刻的道理也可以说就是逻辑和认识论的同一，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同一，具体表现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与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0页。

交织在一起的同一过程。关于辩证法体系的叙述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黑格尔有一段精采的论述，列宁给予充分肯定，并且说，“这一段话对于什么是辩证法这个问题，很不错地做了某种总结。”^①黑格尔的话是这样说的：“认识是从内容向内容前进。这个前进首先是这样规定自己的，即它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益**丰富**、愈益**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进程用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因此，不应当把前进看做从某一他物到另一他物的流动。绝对方法中的概念**保存**在自己的异在之中，普遍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特殊化之中，保存在判断和实在之中；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也没有丢下什么，而且还带上一切收获，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②。剔除掉清洗掉黑格尔论述中的唯心主义杂质，这里面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方法是合理的、可取的。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的论述，也应该是这样。

列宁根据上述关于辩证法的内容、基本原则、内在关系的实质以及研究和阐述的方法的思想，对辩证法体系的阐述形式提出了一些构想，就列宁在这期间先后粗略勾画过的大致有这样几种：第一，《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围绕着辩证法是内容极其丰富的无任何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个命题，揭示、展开了发展的形式、发展的动力和实在内容、发展的过程的曲折性及其总的特点等几个方面。第二，《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围绕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这个命题，揭示并展开了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对立面的同一和对立面的斗争，同一的相对性与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客观性、普遍性以及普遍（一般）与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认识过程中的对立面统一等等。第三，在《辩证法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9—200页。

的要素》和《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纲要》中勾画的关于辩证法体系的轮廓，包括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前提及其基本原则，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及其核心，认识过程的矛盾运动等等，列宁的这种论述形式是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精华，其基本内容、倾向应该说和恩格斯是一致的，但确有其自己的特色，我们将在下一节加以评述。

列宁自己虽然没有明确说他提出的是关于辩证法体系的构想，但是根据他的研究和写作的习惯，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他确有关于辩证法写作的计划、纲要，把上述纲要、短文、片段作全面的考察，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关于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实质，以及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体系形成的途径和论述方法等等都揭示出来，一个深刻的宏伟的关于辩证法体系的研究和写作的计划、构想，就呈现在我们面前，当然，这仅仅是计划、设想，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究，有的表述有待精确化，有些原理有待增补，但毕竟有了一个好的总结前人（人类思想史上）一切优秀成果的纲要，沿着这个思路并结合我们当代的科学以及社会实践新成果，努力探索、总结，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严密的辩证法体系将会逐步形成起来的。

第四节 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的论断

在系统研究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学说时，列宁从对辩证法思想发展史、辩证法体系中各基本原理的内在关系、反辩证法思潮的各种论调的考察、分析和总结中，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的论断，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这样，在列宁的论述里，辩证法学说就不是各个基本原理、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罗列，而是贯串着、围绕着实质和核心的有

机整体，也可以说是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的展开。

一、对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的科学总结

1904年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列宁把“辩证法的道路”看作是“矛盾的道路”，这个“矛盾的道路”，就是由“正题”到“反题”，再到“高一级的合题”的发展过程^①。

1910年，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列宁把辩证法认作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

1914年的《卡尔·马克思》，列宁除了说明辩证法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外，在列举辩证法的几个特点时，把“发展的内因”来自“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即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列为六个特点之一^②。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为止，列宁对于辩证法的各原理的内在关系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考察，因而，辩证法的核心、实质是什么，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

当列宁研读黑格尔著作，总结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后，情况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黑格尔的《逻辑学》说的是概念由于矛盾这个内在本性，而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矛盾的潜在、矛盾的确立和展开、矛盾的结合和统一，也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或者“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描述这三个阶段的分别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每个大阶段都依此又划分为若干个三段。各个阶段相互联结、相互过渡、相互推演，从一个三段过渡到另一个三段。列宁研读存在论，搞清楚了存在与无（非存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或统一，提供过渡、变易。这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1—412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6页、第57页。

样，自在存在就过渡到为他存在（规定的存在、定在）等等。列宁认为，这里面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过渡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由此，他提出了辩证法是研究对立面的同一、对立面的转化的学说的新见解。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①黑格尔在本质论中说，

“同一、差别和对立都用一个命题来表达”，这个命题就是“矛盾”，或者说，“**一切事物自身都是矛盾的**”。这样的命题“更能表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因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是“在本身中包含着矛盾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②。列宁肯定了这里的合理思想。他认为，“运动和‘自己运动’”，“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即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但是“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③。黑格尔在概念论中认为通过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两个环节，可以克服主观性的片面性和客观性的片面性，达到主客统一的真理性认识，达到概念的自我完满的认识，即回到概念自身。这里包含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一般与个别等等辩证关系，即对立面的统一的合理思想。列宁肯定了这些思想，并且在“辩证法是什么？”的标题下写道，“概念的相互依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概念之间对立面的同一。”④这也就是说，“黑格尔在**一切概念的更换、相互依赖**中，在它们的对立面的同一中，在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0、115—116、117—118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7页。

中，在概念的永恒的更换、运动中，天才地猜测到的正是事物、自然界的这样的关系”^①。当基本上读完逻辑学时，列宁总结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思想，列举了辩证法的要素，考察了辩证法诸要素的内在关系，从而勾画了辩证法学说体系，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

列宁研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注意到，在哲学史中黑格尔着重地探索的是辩证的东西。黑格尔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即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自在之物与这个自在之物的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并且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它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③时，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个“发现”应当这样来表达，即“辩证法一般地说就是‘概念中的纯思维运动’，（用不带唯心主义神秘色彩的说法，也就是人的概念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相互过渡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恩格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过渡）。”也就是说，

“辩证法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质、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④当列宁读到黑格尔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思想所说的“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区分开来”，否则无法表达、描述运动时，认为，“这就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统一、同一这个公式正是表现这个实质。”^⑤以上都是列宁在分析研究黑格尔的著作中，对辩证法的实质所作的总结和概述。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6、192、212页。

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3、219页。

列宁注意到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不被他采纳到他的逻辑学中。循着这思路，他考察了古代辩证法著名代表的思想。当他阅读拉萨尔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时，对其中翻译介绍的赫拉克利特的有关对立面的统一、过渡的言论，以及对这些言论的评述的段落，都作了摘记和评议。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万物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①，列宁对此作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绝妙的说明。”^②特别引起列宁注意的是关于火与万物相互转化的思想，他摘记了“万物由火转化而生，而火又由万物转化而生，正如物品换黄金、黄金换物品一样”^③。在转述、评议赫拉克利特的上述言论的基础上，列宁明确指出，“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的基本规律是‘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④，接着列宁摘记罗马帝国时期的犹太哲学家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思想的评价，斐洛说：“因为统一物是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把这个命题置于自己哲学的首位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⑤对于这一段评语，列宁是肯定的，他除了加两条竖线外，还连加两个“注意”，说明其重要。接着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关于辩证法实质的表述，同这里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此外，列宁还研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这本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时指出，事物总是个别存在的，而个别事物决不是由于有什么在它之外且与它相分离的理念的存在而后存在，也就是说，在事物之外、与事物相分离的理念决不能产生个别的事物。他认为，凡是同一类的东西总有他们的共性（共相或一般），但是这种共性（一般）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0、298、294、296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0页。

决不是可以跟个别东西脱离开来而独立存在，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一般的房屋^①，这就是说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但在“实体说”中，他又认为第二实体（种和属）可以用来述说主体（第一实体），然而它却并不存在于主体里面，就是说它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如“人”（一般）可以用来说明个别的人，但并不存在于作为主体的个别的人里，就是说，一般可以与个别相分离而存在。在“潜能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又认为，事物的生成变化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潜在的有到实在的有，这样把事物的生成、发展理解为从潜能到现实的过渡，包含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的思想，可是他又否定事物的生成、发展是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否定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从而否定了“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个赫拉克利特的辩证观点，认为“任何人都不可相信同一个东西既存在又不存在”^②，在这里他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来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面的统一的辩证法观点。列宁读了《形而上学》认为，这本书“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③，“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探索、寻求，是向黑格尔逻辑学接近”，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④，但是，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上“陷入幼稚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⑤。

在对黑格尔、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思想进行考察和总结的基础上，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再次明确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47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7、314—31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4—25、30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8页。

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①这个表述有它的特色，其一，是从辩证法与认识论同一的高度，来表述其实质的，强调的是统一物分为矛盾着的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认识；其二，说的是辩证法的实质或它的基本的特征，同上面所说的“核心”的提法相比，其涵义更丰富，它不仅就辩证法各要素的内在关系而言，更重要的是就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区别而言。因为《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系统研究辩证法的最后总结性的纲要和唯一写成但没有写完的一篇短文，因此关于辩证法实质的表述，应该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成果，这一成果是对辩证法思想史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辩证法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二、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

列宁不仅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断，而且在批判总结辩证法思想史上已经获得的成果中，具体考察和概述了对立面的统一的各主要环节的内容。

前已谈到，列宁肯定黑格尔关于同一、差别、对立这几个本质自身有区别的环节(本质自身的反思的规定)都用一个命题来表达，这个命题就是矛盾，就是：一切事物自身都是矛盾的。应当用对立面的统一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环节的辩证法合理思想。黑格尔说的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中本质阶段矛盾运动的几个环节。列宁则把它们看作人们对事物的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过程的几个环节(规定)。列宁的肯定性的评论如下。

第一，关于同一。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抽象的同一观，就是把同一和差异对立起来，把同一看作只是形式的，它与差异只有外在的关系。这种看法产生于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丢掉具体事物所具有的各种特性，只是抓住其中的一种；并且抹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5页。

了具体事物的各种特性的不同之处，而把它们简单地概括为同一，这种抽象的同一，是一种片面的规定性。二是具体的同一观，就是认为同一本身包含了差异，就是把差异和同一看成是内在的关系。只有这种具体的同一，才是真正的同一，才能避免抽象同一的片面性和简单化。这就是说，所谓抽象的同一观和具体的同一观的对立，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具体的同一就是同一和差异的辩证同一的同一，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要在同和异的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对立面。这种具体的同一观，是辩证的合理的思想。

第二，关于差异。有两种差异，一种是直接的、外在的、非本质的差异，或者叫做杂多；一种是本质的差异。所谓杂多是不同的事物各自独立，彼此发生关系后，双方的性质互不影响，这种直接的、外在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相等和不相等。本质的差异指差异双方具有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的差异，例如同与异、相似与不相似都是相互密切联系的范畴，没有其一，就无法设想其他，所以我们只有在异中去求同，在同中求异。因此，我们不要停止在外在的差异上，而要深入认识到一切存在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差异。

第三，关于对立、矛盾。本质的差异也就是对立。因为这种差异本身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而肯定和否定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依存的，肯定不是否定，否定不是肯定；同时，每一方又都映现在对方内，只是由于对方存在，它自己才存在。这就是“对立”，在对立中相异的东西的每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反之也一样。比如上和下，上就是非下，上的规定就在于它不是下，并且只是因为有下，才有上，反过来也一样。任何可以称为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具体的，是包含区别和对立的，也就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统一就是矛盾，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可以用矛盾这个命题来表达和概括同一、差异、对立这几个规定（环节）；这几个规定按照层次排列起来，“应该

认为矛盾是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①。这些大致就是列宁给予肯定评价的黑格尔的合理思想。

列宁不仅考察矛盾过程“按层次排列”的几个环节，以及对这些环节的辩证内容的理解，而且对对立面的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作了分析和概述。他认为，矛盾双方既有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统一关系，又有相互排斥的斗争的关系，因而就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真正的辩证法”认为，对立的“这些规定，单独来看，都没有真理，只有它们的统一才有真理。”^②所以就要“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照列宁的说法，对立面的统一（同一）、斗争、过渡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并列的几个环节，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分别作为第五、六、九条要素加以论列。

关于对立面的同一（“统一”），列宁认为也许说“统一”更正确些，虽说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对立面的统一就是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分性”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③。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列宁又将“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并提。这就是说对立面的统一，有对立面的总和与对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两层意思。关于对立面的斗争，照列宁前后的论述归结起来也有对立面的“相互排斥”、对立面的“展开”这样两层意思。对立面的过渡说的是对立面的联系，列宁认为“联系也就是过渡”^④，但有时也指对立面的统一的一种质态过渡到另一种质态，是作为发展的环节来看待的。就第一层意义来说，过渡可以作为对立面的统一（同一）的一个方面的含义。就第二层意义来说，过渡是和同一并列的一个环节，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列宁说：“辩证的过渡和非辩证的过渡的区别何在？在于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6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6、98、151页。

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①同一、斗争、过渡三者不可分割，同一（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过渡，斗争则促成、实现过渡，过渡实际上也就是变化、发展。

所以，列宁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②，也就是说对立面的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立面的同一和过渡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的相互排斥、“斗争”则是绝对的。然而，这个相对、绝对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就是说，唯物辩证法认为，相对中有绝对，而主观主义的诡辩则割裂了相对与绝对的统一，认为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否定绝对的。这种见解是脱离客观实际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因而是错误的。

列宁认为，对立面的统一的内容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只有辩证的思维才能把握它，因为普通的表象抓到的是差别和矛盾，但“不是一个向另一个的过渡，而这却是最重要的东西”③，只有辩证的思维才“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只有那上升到矛盾顶峰的多样性在相互关系中才成为活跃的和有生机的，——才能获得那作为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部搏动的否定性。”④

三、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

列宁不仅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的论断，而且进一步考察和阐述对立面的统一为什么是实质的问题。

首先列宁是从辩证法思想史和辩证法诸要素的内在关系进行考察和论述这个问题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明确宣告，“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3版第55卷，第244、306、119、119页。

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①。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表示并不想以另一体系来与杜林的“体系”相对立，而是循着杜林讲的问题逐个进行分析批判。所以，对于辩证法体系中各个要素、基本原理的相互关系、内在联系作详细考察，并从而确定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并没有进行。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在研读黑格尔有关辩证法著作以及古代辩证法著作的过程中，考察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断的提出，就是对辩证法体系各组成部分的内在关系以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进行详细考察的结果。其一，黑格尔认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某物只因为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才运动，才有冲动和活动”^②。“某物之所以是有生机的，只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矛盾，因为它正是那个能够把矛盾包括于自身并把它保持下来的力量。如果存在着的某物不能在自己的肯定规定中同时把握自己的否定规定，并且把一个保持在另一个之中，如果它不能在自身中包含矛盾，那么这个某物就不是有生机的统一体，就不是根据，而会在矛盾中毁灭。”^③列宁认为这些思想言论是“正确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但需要进行正确理解和澄清。随后，他明确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自己运动的动力、泉源，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实在内容。其二，黑格尔认为质和量、量变和质变以及它们之中的环节，如有限和无限、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等等，都是对立面的统一，要求“在对立环节的统一中把握对立环节”^④，并揭示它们之间的过渡，列宁把这看作是“真正的辩证法”^⑤。当谈到否定之否定时，黑格尔认为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因而，把肯定保持在它的否定中，把前提的内容保持在它的结果中，这就是“理性认识中最重要的东西”^⑥。所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页。

②③④⑤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6、117、95、98、105页。

“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过渡到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等）。”^①这就是说，“矛盾的思维是概念的本质要素”^②。对于这些思想言论，列宁认为，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否定，是作为联系环节、发展环节的否定^③，也即肯定与否定的对立面的统一，“这对于理解辩证法是非常重要的”^④，也可以说这就是“辩证法的精华”^⑤。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列宁认为“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与“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过渡的“**实例**”^⑥。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更进一步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⑦。也就是说对立面的统一是理解和把握辩证法体系一系列范畴、规律的钥匙。所以，对立面的统一、矛盾这个命题，这种规定，同其他命题比起来是更能表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的，如果把一系列规定、命题，按层次排列起来，那么，对立面的统一、矛盾，是“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⑧。不理解、不认识对立面的统一，不懂得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在哲学中实在寸步难行”^⑨。这就是说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学说体系中的核心的东西，以致可以说，辩证法就是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

其次，列宁还从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的对立的诸表现，来考察和论述这个问题。形而上学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根据这种观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被移到客观事物之外，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这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辩证法的发

①②③④⑤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05、107、108、109、107、101页。

⑦⑧⑨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06、116、116页。

展观则是内容极其丰富、极其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它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即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这就抓住了事物内在的本质，抓住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泉源，从而正确认识并揭示了事物自我发展、自己运动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发展过程^①。这两种观点的实质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承认、是否正确理解对立面的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庸俗进化论是形而上学发展观的最常见的形态，为了强调辩证法与庸俗进化论的根本区别，列宁反复强调“辩证的过渡和非辩证的过渡的区别”，就“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②列宁在总结、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概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还反复强调划清它与形而上学的恶劣形态——诡辩论的界限。诡辩论表面上赞成辩证法，却把辩证法引向极端。所以有一个辩证法原理，就有一种诡辩。从列宁论述过程中，可归纳出诡辩论的以下特征：其一，主观随意性。辩证法讲求概念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就是反映、概括事物本质的对立面的统一的灵活性。诡辩论为了某种目的，而主观随意地运用这种灵活性。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地研究事物，考察其内在关系，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诡辩论则为了某种利益，而随便抓住某个事实，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为自己的观点论证。其二，相对主义。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这就是说，相对中有着绝对，而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其三，折衷主义。辩证法要求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进行整体的分析，把握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及其内在关系，把握其对立面的统一的本质。而诡辩论搞的则是折衷主义，似乎既考虑到事物的这一面，又考虑到那一面，既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6、244页。

看见这种可能趋势，又看见另一种可能趋势，或者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给人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就是不分析、不说明这些个方面、这些趋势的内在联系和过渡，不分析和说明它们的对立面的统一的实质^①。列宁指出：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作通向诡辩论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②。对两种发展观对立的分析以及对辩证法的实质的揭示，既是思想史上思维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当时与庸俗进化论、诡辩论作斗争的总结。

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的明确论断，以及对有关问题的概述，是对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在辩证法思想史上，黑格尔是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尽管他是立足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将辩证法服务于唯心主义体系，但他第一个系统地考察和论述了辩证法的各个方面的原理，他的合理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他在概念的辩证法中猜测到的正是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和反映这个过程的思维辩证法。在他的系统论述辩证法的《逻辑学》中，始终贯穿着两个根本性的思想：其一是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在考察辩证法范畴的内容及其关系时，要求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其二是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整个体系中范畴、概念的演进、推移，总是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进程来安排。对立面的相互依存也就是肯定与否定的不可分割；对立面的过渡，也就是从肯定到否定；对立面的同一、统一，也就是否定之否定。在论述过程中，对立面的统一和否定之否定是交织着的，并没有截然分开。而从总体上来说，他却是把否定之否定作为整个体系的总结，作为构造整个体系的最基本的东西来看待的，以致他认定“否定性”、“自身的否定关系”，是“一切活动的内在泉源，是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内在泉源”，是“辩证法的灵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9页；《列宁全集》第21卷，第99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页。

魂”^①。因而，在黑格尔那儿，否定之否定是最基本的规律，而对立面的统一，只是它的一个环节。但是，如果不停留在一般论述和形式上，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就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面的同一。黑格尔自己就认为，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第三项，并不是静止的，而正是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同一是“以自身为中介的运动和活动”，所以“向‘第三个’即向合题的辩证转化的结果是新前提”，而“这个新前提又成为进一步分析的泉源”^②。这就是说，矛盾、对立面的同一是更为本质的、更深层次的规定，在黑格尔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这样的合理思想，列宁对此加以揭示和总结，即将对立面的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分离开来，说明对立面的统一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一个突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经讲过“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③这个论述如果和前后文联系起来，就可发现它的真正的含义。马克思这里是批评蒲鲁东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却不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上述那段话之前，马克思概要地介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讲的就是“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的概念运动，它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自己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纯概念、纯理性“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说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具体来说，“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销。这两个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①至此，我们把马克思前后两段话对照，可以发现马克思讲的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也就是正题（肯定）、反题（否定）、合题（否定之否定）。所谓“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与“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从内容到表述的语言都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马克思讲的辩证法运动的实质，实际上指的是同对立面的统一交织在一起的否定之否定。当然，在表述中说的是矛盾方面的共存、矛盾方面的斗争、矛盾方面的融合。所以，马克思的这种表述，至少同黑格尔一样，没有把矛盾与否定之否定分开，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恩格斯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还是把否定之否定视为辩证运动的实质，或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概述了辩证法的“三个规律”，认为这三个规律都曾被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加以阐述，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整个体系构成的基本规律”，而它的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②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③到了1885年9月23日所写的《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恩格斯才指出，“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和我们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③ 同上书，第180页。

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① 这意思也就是说对立的相对性、对立面的同一这样一种认识，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实质、核心的论述，不仅表述明确，又从各个原理的内在关系以及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对对立面的统一之所以是辩证法的核心、实质进行论证，而且抓住这个核心、实质勾画了辩证法体系。应当说，列宁是继承和总结了黑格尔的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成果，并且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辩证法思想史上是个重大的突破。

第五节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丰富 内容的探索和论述

1910年12月，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列宁提出，辩证法是“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在1913年3月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他又指出，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接着，1914年11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列宁进一步说，辩证法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1915年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则认为，“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纵观上述言论，可见列宁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无任何片面性弊病的发展的学说。

但是，辩证法的丰富内容具体说来到底有哪些，在1914年7月之前，列宁并没有加以叙述。也就是说，这时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抽象的水平上，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断在探索和总结。从《卡尔·马克思》到《哲学笔记》，列宁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成果，批判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思想，逐步揭开并概述了辩证法的丰富内容，这时他的认识已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水平上。

一、概述辩证法的最初的纲要

1914年7—11月撰写的《卡尔·马克思》，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思想体系的全面研究、总结和概述，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学说体系所作的努力，也是列宁对当时被机会主义者搅乱的基本理论所作的一个必要的清理。《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一节，是列宁概述辩证法的最初的纲要。^①在此之前，列宁虽然十分重视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辩证法，写出很有价值的理论著作，发表一些很有见地的辩证法言论，但那是具体的、分散的、零星的，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理论的专门的比较系统的论述，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一节，是摆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作为马克思的“完整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叙述的，它概述了辩证法的对象、性质、功能及其主要的内容特点，它的写作时间和《哲学笔记》是交错的^②，内容上也有着联系，可以看作是列宁系统研究辩证法的一个成果，有待于进一步展开说明和论证的最初的纲要。

第一，它叙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区别。这个说明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思潮，即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曲解而发的，例如别尔

^①作为概述辩证法的最初纲要的《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一节，在以下各页均简称“纲要”。

^②《卡尔·马克思》是1914年7—11月写作的，《哲学笔记》是1914年9月至1915年写作的。当1914年11月《卡尔·马克思》交稿后，1915年1月4日列宁给格拉纳特出版社编辑部写信，提出《卡尔·马克思》一文的辩证法一节是否来得及再作修改？因为“最近一个半月来我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

曼在1908年《现代认识论考察下的辩证法》一文中就胡诌，马克思、恩格斯了解下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不曾确定这一唯心论辩证法在何种限度内是适用的，是合理的^①。巴札洛夫在1910年《我们的晨曦》一文中，对马克思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再掉转过来”的见解，进行歪曲和攻击，说什么“事实上，什么叫做使黑格尔从倒置之下掉转过来呢？严格说来，在黑格尔体系里，并没有顶或底，而只有中心与周围。辩证法居于中心，在其周围的则是具体的现象。很显然的并不能用‘掉转过来’的方法来使唯心论辩证法转变为唯物论的”^②。波格丹诺夫在1912年的《生动经验的哲学》中，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认识，像黑格尔一样，不曾达到充分明确性与完成性。因此，辩证法的应用，成为不确切的与烦琐的，不仅辩证法的界限不肯定，有时它的意义本身，也很利害地被曲解着^③。他们把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混为一谈，然后借着批判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列宁在“纲要”中首先明确肯定，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是“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接着列宁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拯救黑格尔唯心体系中“自觉的辩证法”，并且使它与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这种辩证法思想为科学史、为自然科学发展着的大量材料所证实，因而它已经深入到一般人的意识之中。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个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马克思不仅承认并且运用这个思想。所以，马克思不仅“接受”并且“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这就正确有力地回答了对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歪曲和责难。

第二，“纲要”强调了辩证法是内容极其丰富的无任何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也是针对当时的错误思潮而发的。

①②③ 参见《五大哲学思潮》，第445、446、448页。

例如洛希柯夫认为,“辩证法这一名词是过于陈旧了。在黑格尔哲学中,它作为发展观念而占了相当位置,然而在科学哲学里,它却是不适宜的了,‘辩证法’这一术语,早就应该用‘进化论’这样科学术语来代替”。他把辩证法归结为他们所理解的“进化论”,企图用庸俗进化论来代替辩证法^①。尤什凯维奇则将辩证法完全归结为相对论原则,认为相对论完全包括着发展的历史论、变化原则,存在诸元素的综合联系等等^②。波格丹诺夫在《组织形态学》中把辩证法归结为“三位一体”、三分法,是人们“自己的思想中创造的”,他认为“对立是我们在自己的思想中创造的”。因为存在着组织过程及其不同的形态,这形态周期地重复着自己的极端的共同的因素。于是,我们在思想里按照他们的共同性而提出这一过程的两个形态,并且空想出与两个极端都不相同的第三个形态,作为中间形态,这恰恰就是旧的辩证法,旧辩证法整个地便在于这种“三位一体”中间系统与极端之间的差别,成为对立,作为“反”,而其间的共同性则为对立之对立,或“否定之否定”^③。这种歪曲辩证法的思想言论,马克思在世时就已存在,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花样有所翻新而已。针对这种思潮,列宁不仅一般地说明辩证法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发展学说,而且进一步列举了这一学说的主要内容特点,回答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发展的形式、发展过程的总特征等等,形成了一个整体,对于上述思潮无疑是个有说服力的驳斥。

第三,“纲要”明确指出,辩证法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个学说本身包括认识论。这种见解同样是针对当时的思潮的,例如尤什凯维奇认为,恩格斯及整个“正统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使辩证法从一个简单的研究方法,从一种“观点”转变为自然界的普遍法则。然而这法则,却是无以适用的,即不

①② 参见《五大哲学思潮》,第444页、第441页。

③ 同上书,第455页。

能预测未来。因为“运动并不是照辩证法的法则而完成的”^①。照他们的意见，辩证法不是哲学科学，而仅仅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论辩的技巧。马克思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自己的认识论，有的只是从黑格尔那里搬来的“方法”。所以，还是这个尤什凯维奇公然宣称，“可以做真正的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同时抱着不同的哲学观点，因为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基础与根本，而是它的枝叶”^②。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哲学科学，是企图以马赫主义、经验一元论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去“补充”、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针对这种“谬说”，列宁明确宣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它揭示的是客观世界以及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因此，它“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当时所说的认识论指的是，研究和揭示认识的源泉、认识的过程及其环节、认识的规律及其方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把辩证法应用于、贯彻于认识过程的研究，其揭示的规律已经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增多的材料所证实，有了科学的认识论辩证法，怎能说它仅仅是一种方法呢？

第四，针对着日益猖獗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责难和曲解，“纲要”首次集中揭示了辩证法发展学说的内容的几个主要特点。这就是：“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③。列宁的这些叙述

①② 参见《五大哲学思潮》，第441、44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7页。

只是：1. 初步地概略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丰富内容；2. 针对当时流行的庸俗进化论思潮，特别强调了发展是飞跃式的、发展是渐进过程的中断以及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等等，在叙述的六个方面的特点中占了一半；3. 针对着曲解辩证法，把它简单化、公式化，归结为庸俗的“三分法”、“三位一体”公式的错误言论，强调说明了辩证法内容的丰富性、多方面性；4. 主要是概括和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内容，但在叙述的六个特点，包括否定的否定、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对立面的统一以及普遍联系、物质统一性和运动变化等内容中有新的表述；恩格斯将上述内容说成是“规律”、“原则”，列宁则称之为“特点”；对上述内容，恩格斯着重论证其客观性和普遍性，列宁则以此说明辩证法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恩格斯侧重论述、强调一切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伟大的基本思想”，列宁则强调发展是飞跃式的等等。这些，说明“纲要”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辩证法已有的基础上，虽然未有重大的突破，但已经有了许多新的进展。

概略说来，列宁关于辩证法的上述“纲要”，如果说有新的进展的话，主要是有几个反映了时代特色的突出之点，这就是：第一，把辩证法概括为一种发展学说，一种内容极其丰富的无任何片面性的、完整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并且在随后的研究中，说明了为什么这样概括。列宁指出，“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还有19世纪末）‘大家都同意’”。不过，这是一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首先，正确理解发展原则，承认“一切都发展着”，那末就应当承认“一切就都相互过渡”，因为发展显然不是简单的、普遍的和永恒的生长、增多（或减少）等等。因而，“更确切地理解进化”，就应当把它“看作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相互过渡”。其次，“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

维同存在没有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①虽然早在1908年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就明确指出，“许多人把辩证法和发展的学说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辩证法就是这种学说。但是，辩证法和庸俗的进化‘理论’有本质区别，后者完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无论自然界或历史都不发生飞跃，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只是逐渐进行的。黑格尔早就指出过，这样理解的发展学说是可笑的，是毫无根据的。”^②列宁读过这本书并且作了读书批注，在辩证法“也就是这种学说”（指发展学说）下面划了三条线。^③这说明列宁的上述概括，是继承普列汉诺夫的思想，问题在于他的表述比普列汉诺夫更为坚决明确，而且在具体说明方面强调发展、进化就是指一切事物的产生和消灭、相互过渡，强调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这比起普列汉诺夫要深刻得多。第二，认为辩证法包括认识论，这里所说的“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是指“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④。这个思想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早就有的，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论断，后来约·狄慈根明确指出，“‘认识论’亦即众所周知的辩证法”^⑤，但在具体说明上不够深刻有力，驳斥不了那股否定辩证法的实证主义思潮，而且这股思潮还渗进工人运动中，一股反辩证法、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思潮十分猖獗，屡经批驳但未能制服，关键问题在于未能进一步说清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关系，未能说清认识的起源和过程的各种环节、机制，列宁在这里的论述和说明，是为解决这个关键问题跨出的坚实的一步。第三，从发展学说的要求出发，揭示发展的形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实际内容，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5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44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6—57页。

⑤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第341页。

以及发展过程的总的特征等等。在整个论述中,其一,突出强调发展的飞跃形式、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驳斥的是当时流行的庸俗进化论思潮;其二,说明辩证法内容的丰富性,仅从“发展”这个角度简要的列举就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绝不是流行思潮所认为的只是个“三分法”、“三位一体”公式,这种论述,既顾及学说本身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又反映了时代对学说的要求,因而在内容上有所侧重。

总之,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研究和论述辩证法的基础上,列宁根据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力图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其思路和意向在“纲要”中已经有所显露。当然,“纲要”是很初步的、很简略的,它只是列宁考虑辩证法体系的一个起点。紧接着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及其所得的结果,应当看作是这个“纲要”的继续。

二、对辩证法丰富内容的进一步探索和揭示

列宁十分重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在深入钻研黑格尔《逻辑学》著作时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的实质性的东西是“穿过迷雾般的极端‘费解的’叙述才‘透露出来的’”^①。在具体论述中也有不少“毫无意义的东西”。因而,列宁认为,在研究黑格尔著作时,“必须从中剥出唯物主义辩证法”^②,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的实质性的东西,则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③,剥掉那些“外壳、皮屑”,清洗掉那些神秘性的东西。经过细心的剥离、改造的功夫,列宁总结并概述了辩证法的要素,展示了辩证法理论的丰富内容。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论述了“绝对观念”由于内在矛盾而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结、相互关系、相互过渡,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辩证法的体系。这个概念辩证法实际上反映了、“猜测到了”事

①③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9、129、117—118页。

物和人的认识的辩证法。问题在于是黑格尔所说的概念的辩证法创造事物的辩证法，还是相反。列宁与黑格尔正相反，坚持的是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的基本立场，正确地理解概念辩证法的有关环节，把它们从神秘主义的体系中“解脱”出来。当列宁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直到概念论的第三章“绝对观念”时（这一章是黑格尔对自己的概念辩证法的总结，阐述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说明认识的一般的辩证方法），黑格尔的下述言论给他很大的启发，从而写下“辩证法的要素”。黑格尔认为，“绝对的方法”（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取得规定的东西”，因为“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这就是柏拉图对认识的要求，就是“**要考察自在自为的事物本身**，一方面要从事物的普遍性去考察，另一方面也不要脱离事物，去抓枝节、实例和对比，而是要注意这些事物，并且要意识到它们的内在的东西”^①，而这种“绝对认识”的方法，是分析的，同时又是综合的，“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由于它（环节），那最初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自己的他物，——应当叫做辩证法的环节。”^②这里，黑格尔提出了“辩证法的环节”这个概念。“黑格尔的‘环节’一词，经常指**联系**的环节，联结中的环节”^③，也就是整体中的组成部分的意思，列宁从这里得到启发。但是，他认为黑格尔的上述关于辩证法的环节的规定“不是明确的”^④，在剖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的“辩证法的要素”，这就是：

“（1）来自概念自身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发展去考察事物**本身**）；

（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物），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

（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⑤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9、190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2—123、190、190页。

以上三条是列宁总结、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以明确的语言、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概述的关于辩证法的要素。从表面上看，这些原理是上述黑格尔言论的概括，实际上，它是对整个《逻辑学》的总结：第一条是存在论的总结，第二条是本质论的总结，第三条是概念论的总结。这三条是关于辩证法的最基本的原理，列宁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比较详细地”作出规定。由此，他列举了“辩证法的要素”十六条。这十六条的论列，从手稿上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首先是第1—7条，即：

“（1）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

（3）这个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它自身的运动、它自身的生命。

（4）这个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倾向（和方面）。

（5）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

（6）这些对立面、矛盾的趋向等等的斗争或展开。

（7）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①

这1—7条，就是上述三条的扩展。现在的（1）、（2）、（3）条就是原来的第一条的展开和补充，（4）、（5）、（6）条就是原来的第二条的展开和补充，（7）条就是原来的第三条的展开。从手稿上看，这7条列举之后，列宁就写下一段小结，这就是：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由于7条之后直至16条，实际上是这7条的扩展和补充，因此，上述小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0—191页。

② 同上书，第192页。

也可以看作是整個16条的。

写完7条和小結，列寧又补充了两条：

“（8）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

（9）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①

这里的第8条是补充1—7条中的第2条的，第9条是补充第4、5、6条的。在此基础上，列寧又补写三条，即：

“（10）揭露**新的**方面、关系等等的无限过程。

（11）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12）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②

以上三条是补充第7条的，是第7条的进一步展开、扩充。在此基础上，列寧最后又写下了四条，即：

“（13）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且

（14）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否定的否定）。

（15）内容对形式以及形式对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16）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过渡。（15和16是9的**实例**）。”^③

以上四条是对第4、5、6、9条的补充。至此，列寧对辩证法的要素的论述告一段落。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辩证法体系的轮廓，是列寧研究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

① 《列寧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1頁。

②③ 同上書，第191頁。

想所获得的一个丰硕的成果。

从《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一节所列举的辩证法内容的六个特点，到《哲学笔记》的辩证法的要素16条，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中所揭示的辩证法的内容相比，思路一致，但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在《反杜林论》中，由于杜林的“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而恩格斯的批判就必须联系这个“体系”，跟着它进入广阔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是这本书所正面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请读者不要忽视^①。这就是说，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并没有就唯物辩证法体系进行论述，而只是针对杜林所歪曲的辩证法的某些主要论点进行批驳，并展开正面论述。至于《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在列宁生前尚未出版，因而他没有读过，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知道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至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怎样论述，他是不清楚的。事实上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列举了辩证法的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②接着说明他的写作意图，他说“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详细地考察这些规律的相互的内部联系。”^③就是说，它的任务并不是论述辩证法体系。列宁《哲学笔记》关于辩证法的要素的论述，与恩格斯有很大不同，其一，它考察了辩证法各基本原理之间的相互的内部联系，提出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以及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的结论，同时抓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455页。

住这个核心，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的要求，揭示事物及人们对它的认识的一系列的范畴、基本原理的联系、关系和过渡，从而把握发展的辩证规律。其二，它所揭示的辩证法基本原理的丰富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部分：1. 考察的客观性，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前提，最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要素”的第1条）。2. 辩证法的两条基本原则：联系的原则和发展的原则（也就是“要素”的第2、3、8条）。3. 以对立面的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的诸基本范畴，即对立面的同一、斗争、过渡，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和过渡，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和过渡，肯定与否定的对立面的统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的周期性和前进性，即螺旋式的运动（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要素”的第4、5、6、9、13、14、15、16和结论）。4. 认识中的辩证法，即分析与综合、部分与整体、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有限与无限等等的对立面的统一和过渡（也就是“要素”的第7、10、11、12条）。这几个部分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概略说来，就是要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来考察事物本身，而发展的内在动力、实际内容以及联系的基本形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要认识事物，就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对立面，掌握认识过程的对立面的统一。这样涉及辩证法学说的有内在联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的简明扼要的概述，实际上勾画了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蓝图。其三，列宁始终把辩证法同认识论统一起来考察，从“辩证法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到“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列宁把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比较分析后所获得的一大成果。“辩证法的要素”始终贯穿着这个思想，就是要求人们在考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要坚持客观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对立而统一的观点以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应当说是列宁论述辩证法体系中有特色之处，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作的贡献。

但是列宁认为，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是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的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份。因而，列宁上述辩证法学说的蓝图只能说是粗略的，探索性的。第一，从基本原理或学说的组成部分的要求来说，有的部分似乎还可以再概括，例如第11和12条、第13和14条，从内容到行文，似可合并；第二，有些重要原理，例如实践、真理的具体性等等，并未列入学说的组成部分，直至1922年写的《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才作为辩证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概述。其它未列入但又有其特色的原理、范畴，也还有一些，我们将在下面作简略的评介。所有这些无非说明在揭示辩证法体系及其丰富的内容方面，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实有所突破，其所作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

三、对若干重要范畴的论述

在钻研黑格尔哲学著作，批判、总结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揭示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丰富内容方面，列宁除了总结、概述辩证法的要素，勾画辩证法体系的蓝图外，还对若干重要的范畴作了概要的说明。以下挑选一些在理解上有一定新意的范畴加以简略的介绍。

（一）存在和无（非存在）。列宁在谈到黑格尔关于为作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开端）是存在和无（非存在）的统一时，认为黑格尔的学说是倒立的唯物主义，因而要抛弃它的“纯粹观念”、“绝对”等等，正确理解其辩证法的合理思想。

照黑格尔的说法，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开端）的，应当是“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本身不包含任何内容”，并且是“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的范畴。这样，作为逻辑起点的只能是存在和无，或存在和無的统一，或者说，处于开端的东西“还不存在，它只是走向存在”，从非存在到存在，“非

存在同时也就是存在”^①。而“存在”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纯粹的概念。存在，是什么东西存在，如何存在，都没有说明，没有作出规定。因而，存在是在无规定的直接性中，只是与它自身相同，内外都没有差异。假如存在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在自身有了区别，或者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被建立为与一个他物有了区别，那就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了。所以，存在是纯粹的无规定性和虚空，实际上就是无。无也是个纯粹的抽象、纯粹的概念，它也是没有任何规定，没有内容，是与它自身单纯的同一，因而也是完全的虚空、空无。所以，那个无任何规定性的、空无的东西，也就是纯存在。这样，无与纯存在是同一的规定，或者说是同一的无规定，因而，无与纯存在是同一的东西。存在和无两者的同一，并不是无差别的等同，一方面“两者并不同一，两者绝对有区别”；另一方面，两者“绝对不曾分离，不可分离”，有的是“无中有存在”、“存在中有无”，就是说，两者中“每一方都直接消失于它的对立之中”，这个“一方直接消失于另一方之中的运动”，就是变易。因而，在这个一方直接消失于另一方之中的运动中，存在和无（非存在）是两个“消逝着的环节”^②。因而，辩证的过渡，也就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③。这里，黑格尔讲的是概念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的环节，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说教，但这里却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在研读中对此作了肯定。

列宁认为，存在和无（非存在）是最普遍的一对范畴，它们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着，存在中有着非存在（无），而无中也有着存在，同时，它们又是有区别的，因此，把存在和无看作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就不是辩证法而是诡辩^④。他说，“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86页。

②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69—70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32、240页。

③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44、88—89页。

般存在？——就是说，是这样的不规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①他认为，抽象的“存在”，“仅仅作作为‘一切皆流’中的一个环节”^②，从认识运动的总流来看，存在和非存在是“消逝着的环节”^③，而认识向客体的运动只能是辩证地进行的，是直线和曲线的互相交错的运动，而在运动的“某些环节上，存在和非存在这两个消逝着的环节在一瞬间相符合”^④。正因为存在和无是两个“消逝着的环节”，因而在运动、发展、过渡中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列宁认为“辩证的过渡和非辩证的过渡的区别”，“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⑤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正是由于存在和無的统一，才有过渡和发展，才呈现为过程。由于存在和无是最普遍、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由于它们是最无规定性，也可以说潜藏着尔后发展的一切规定性，由于它起着“消逝着的环节”^⑥的作用，因而，它应当成为辩证法的开端，成为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

（二）有限和无限。列宁肯定并发挥了黑格尔著作中关于有限和无限论述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1. 照黑格尔的意见，“规定性就是否定”^⑦，因而给某物以规定，也就是给它以界限，这界限是它的“简单的否定或最初的否定”，任何某物都有自己的界限，而他物则同时是否定的否定。对此列宁指出，“某物，从其内在界限的观点来看，从其自身矛盾——这个矛盾推动着它〔这个某物〕并使它超出自己的界限——的观点来看，是有限。”^⑧因此，当人们说事物是有限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承认：“事

①②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1、290、232、240、244页。

⑥⑦⑧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40、89页。

物的非存在是它们的本性”^①。在这里，“有限的？”也就是“向终极运动着的！”就是说，当规定某物为“极限”时，就已经在“超出这个极限了”。所以，当黑格尔提出“有限自身的本性，就是超越自己，否定自己的否定，并成为无限”，而使有限转化、过渡为无限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有限的本性时，列宁认为，这就是“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②。2. 黑格尔认为，有限和无限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是“统一的”^③，因而，那种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似乎有限是此岸的，而无限则是彼岸的，似乎无限是站在有限之上，是在有限之外的“恶无限性”^④，是根本不存在的。而这个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不是它们的外部的聚合”，也不是把分开的和对立的、彼此不相干的、因而也是不相容的东西联在一起的那种不适当的、与它们的规定相对立的结合，相反地，“每一个在自身之中都是这种统一，每一个只是它自身的扬弃，在扬弃中，无论哪一个对另外一个而言都没有自在的存在和肯定的定在的优越性”。“有限性只不过是对自身的超越；因此，在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即有限性自身的他物。”^⑤这就是说，有限和无限是对立面的统一，因而，人们要“在对立环节的统一中把握对立环节”^⑥。列宁肯定黑格尔的见解，认为把这个原理“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也就是“物质的深邃的无限性”^⑦。3. 总结上述列宁所肯定的并加以发挥的思想，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无限包含着有限，是由有限构成的，有限也包含着无限的存在，包含着深远的无限性，有限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的有限，无限也是无限与有限统一的无限。客观上存在着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转化，思想上也在实现着这种转化。

（三）外观、现象和本质。列宁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从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1、92、95页。

④⑤⑥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5页。

存在论向本质论的过渡，也就是从现象向本质的过渡。这样，存在也就是现象，所以列宁说，“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同一、差别等等规律）”^①。列宁很欣赏黑格尔的这个安排，认为这个过程符合人类认识规律，在唯心主义的迷雾中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②，在本质论中黑格尔具体论述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他把本质论分为三部分，即外观、现象、现实，这三者都是本质的不同程度的表现。外观是本质还没有表现出来的阶段，但也是一种表现，而现象则把本质表现出来了，现实则把本质充分表现出来，这三者的区别是：外观是本质的映现，现象是本质的显现，现实是本质的展现。

黑格尔认为，外观有“两个环节，一个是虚无性，但又是作为持续存在；一个是存在，但又是作为瞬间，换句话说，就是自在存在着的否定性以及反思的直接性”^③，这话的意思是说，外观是没有表现出来的本质的表现，由于它是本质的表现，所以它是存在，是客观的，但由于它没有把本质表现出来，所以它是虚无的、不真实的、易于消失的。列宁对黑格尔的这些观点基本是肯定的，并作了形象的发挥，列宁说，“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④这是一个比喻，泡沫比作外观，深流比作本质，泡沫并没有表现出深流，但它也是深流的一种表现。列宁肯定外观这个概念，因为它更细致地区分了本质的不同层次的表现，有助于对现象的层次性的进一步理解。

列宁赞同黑格尔关于现象、本质和规律论述中的合理思想，并进一步加以发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规律和本质是同一层次、同一序列的概念。他认为，现象是整体，而规律只是现象中作为现象的根据的那一方面，所以，规律是“现象在自身同一中的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89、106、110、107页。

反思”，是“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映”、“现象的静止的内容”，是“本质的现象”，等等。对此，列宁认为：1. 现象是整体、总体，而规律是部分，现象比规律丰富^①；2. “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是人对世界“认识深化的同一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是同等程度的概念”^②；3. “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总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③；4. “规律是现象的静止的反映”，它“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而，任何规律都是“不完全的、近似的”^④。可见，列宁并没有简单地把本质和规律等同起来，而是说它们是同一序列的概念，两者有共同点，但两者又是有差别的，本质是一类事物区别于另一类事物的最根本属性，或者说是决定这类事物的最根本的内在矛盾，而规律则是这种属性或内在矛盾的展开，是本质的联系或本质之间的联系，即事物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

这里黑格尔所说的规律只是力学规律，因而他对规律的意义有贬低之处，比较强调规律的局限性，认为它仅仅是本质的一个环节，只是把握现象的一个方面等等。由此提出一个问题，规律能不能掌握现象的整体呢？列宁认为是可以的，黑格尔也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列宁看来，规律固然是现象的一部分，不能把握现象的细节，但能够把握现象的总体^⑤。

黑格尔还提出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对立和统一。表面看来这似乎是荒谬的，因为本来现象和本质不是两个世界，黑格尔却虚构了两者的对立，虽然他论证了两者的同一。他认为两者都是实存的独立的整体，一个应该只是反思的实存，另一个则是直接的实存，而两者在自身中都是这两个环节的同一，即每一个在本质上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另一个的环节^⑥。就是说，本质与现象是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7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7、126、127页。

⑤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8页。

同一的，但同时又是对立的。一个之中的肯定的东西，就是另一个之中的否定的东西。列宁认为，黑格尔上述言论的合理之处是：“现象世界和自在世界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的各环节、（认识的）阶段、变化或深化。自在世界离现象世界愈来愈远的移动——这在黑格尔那里还没有看到。”^① 这意思是说，黑格尔所说的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对立和转化，清除其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实际上是说人的认识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的阶段和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两者的对立和转化。所谓“自在世界离现象世界愈来愈远的移动”，指的是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认识的深化运动，即列宁说的，“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②，当然不能说黑格尔对认识的深化运动不明确，因为整个逻辑学就是讲的认识的发展、深化过程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他只停留在现象认识和本质认识的相互转化这一点上，而没有看到在这个转化中，人们就在深入本质内部，而且这个转化是要不断回到实践中加以检验、修正，这才是科学的认识过程，这一点黑格尔没有看到。

（四）个别和一般。在吸收黑格尔关于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同一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个别和一般相对立，但它们又是统一的，任何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个别，是从联系中单个地取出来的、分割出来的事实（实存）^③，或者说，事物是各不相同的，即使一类东西中的一个与其余的各个，就有某些区别^④。一般就是这种联系，或者说，就是一类事物中的共同的东西。个别和一般是统一的、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这就是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8、181页。

③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28、237页。

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

“比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等等”。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①。因而，从一定观点看来，在一定条件之下，普遍是个别，个别是普遍^②。

从认识发展的阶段来看，感性认识、感觉、经验所反映的、所认识的是现象、个别、部分，理性认识、概念、规律所反映的是本质、一般、整体。人的认识是从感觉经验的认识上升到理性概念的认识，就是“把个别提升为普遍”，发现本质、规律等等。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③。人的认识又是从抽象到具体，一般的抽象还不能完全把握具体事物，因为“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④这就是说，认识所要把握的一般、普遍，“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就是达到理性具体的认识^⑤。人们的认识、概念总是要用语言、词来表达的。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一般的东西^⑥。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就要正确认识单一、特殊、普遍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第一章谙熟地应用了这个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的原理。

（五）否定的否定。 列宁肯定并发挥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

①②⑤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7、148、83、236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9—150、239页。

中关于否定的否定的合理成分。照黑格尔的说法，正确理解辩证的否定，是“理性认识中的最重要的东西”。他的全部逻辑学就是这种观点的确证。他认为，“第一个一般的东西”就其本身来看，表现为“它自身的他物”，但是这个他物在“本质上不是空洞的否定的”，不是通常结果的“无”，而是“第一个东西的他物”，是直接东西的否定，因而它被规定为中介物，一般说来，在其内部“包含着第一个东西的规定”。所以，“第一个东西本质上也**储藏和保存**在他物之中。”“把肯定保持在它的否定中，把前提的内容保持在它的结果中”^①。列宁揭示了这里面的合理思想，并以自己的明确语言，概述了辩证的否定观，他说，“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要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②这个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这种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是“一切活动的，即生命的和精神的自己运动的最内在的泉源”，是“辩证法的精华”^③。

否定的否定是第二个否定。黑格尔认为：一般说来，辩证法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过渡到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等。因为第一个东西或直接的东西是“自在的概念”，因而也只是自在的“否定的东西”，所以，“它的辩证环节就在于：**自在地包含在它之中的差别**设定在它的内部。相反的，第二个东西本身就是**规定的东西**，是差别或关系；因此，它的辩证环节就在于设定它所包含的**统一**”^④。列宁揭示了这里面的合理思想，他明确指出，“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5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7、198页。

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过渡。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则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和肯定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保存着肯定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①而否定的否定的结果的第三项不是“静止的第三个”，而正是对立面的统一，“这种统一是以自身为中介的运动和活动”，所以，向“第三项”即合题的辩证转化的结果是“新前提”，这个新前提又成为“进一步分析的泉源”^②，于是再向前推进。按照黑格尔的意见，第一项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即肯定中有否定，第二项是对立面的转化，肯定转化为否定，而第三项合题，则是对立面的统一，即否定与肯定的统一、结合，但这个第三项并非发展的终结，而是新的运动的前提，由于内在的新的矛盾而继续着上述的过程。正是由于内在否定性而展开的运动，过程就表现为周期性的发展或“回到出发点”的运动，或叫做“圆圈式”、“螺旋式”的运动。列宁认为，“一般说来，运动和变易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于是**，这个运动也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但是，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头脑。”^③这就是说，否定的否定、“回到出发点的运动”、螺旋式的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的规律。

尽管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由于硬套否定的否定的公式而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但他也反对把否定的否定这个辩证规律简单化为“三分法”、“三位一体”公式，并随心所欲地到处套用这个公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6、19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5页。

式。黑格尔在世时就有人这样干过，对这种形式主义地玩弄辩证法的无聊的把戏，他认为，辩证法“不会由于这种使用上的平淡无奇而丧失其内在价值”^①。列宁赞成黑格尔的这个意见，他指出，“辩证法的‘三分法’是它的外在的表面的方面”^②，应当抓住的是它的实质，这实质就是对立面的统一。

由于历史条件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强调和论证辩证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说明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对于辩证法体系，即诸原理的内在关系，则缺乏具体的考察和论述。列宁对辩证法学说丰富内容的揭示，包括基本原理、学说体系以及一些基本范畴的论述和说明，无论就他本人思想的发展，或者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问题的论述相比较，都有重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第六节 列宁揭示认识的主体 能动性和认识的辩证法

在研究、探索和总结黑格尔的以及古代的辩证法大师的思想的过程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辩证法已经获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列宁从辩证法的高度，以对立面的统一这个辩证法实质的观点为指导，考察了认识的源泉、本质、过程、阶段以及各重要环节的辩证关系，概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认识）与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以及真理的全面性、过程性、真理的实践标准、认识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等认识的辩证法，揭示了认识的主体能动性，把内容极其丰富的无任何片面性弊病的辩证法发展学说进一步推向前进。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9、198页。

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对于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对立，作了辩证的分析 and 概括，认为，“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①。《哲学笔记》在同等的意义上使用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这三对范畴，对它们的辩证关系，即它们对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它们的对立和统一，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个阐述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著作中辩证法的合理思想的过程中作出的。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的辩证同一，有这样几层意思：其一，客观观念是世界的本源，一切存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是观念所派生的，是观念的异在，就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当然是同一的；其二，在上述思想的前提下，观念又分为存在和思维两个方面，或者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们是观念这种本质的两种状态；其三，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是一个过程，是从主观性到客观性到主客统一的过程，整个过程也是思维把握存在、实现主客同一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客观过程，即客观观念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即观念的自我认识过程。对这个唯心主义命题中所包含着的辩证法合理思想，列宁首先明确指出，从黑格尔的观点说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就是“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实质本身”，观念（客观概念）是世界的创造主、世界的本源，而按照唯物主义来说，概念“就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②。就是说，世界的本源是客观实在的物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6页。

质。观念、概念是它所派生的，是对它的认识的抽象形式。在黑格尔看来，意识、思维的运动，“犹如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本质的本性为基础的”，而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就要“倒过来：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①。这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中，首先是本源与派生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坚持的是：物质存在是世界的本源，思维、观念则是存在所派生的，是存在的反映，在这个范围内，思维与存在二者的区别、对立是绝对的，不容含糊的。那么，在这范围之外，思维与存在、“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是存在的，可是差别也有自己的界限”，这就是说，它们的差别、对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因此，辩证地思考问题，就必须坚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②。思维与存在、观念的东西与实在的东西、意识和物质是辩证的同一关系，两者可以相互转化、过渡，这就是：一方面，存在着“从物质到意识的过渡”^③，即物质变精神；另一方面，存在着“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实在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④，即精神变物质。而且，这个过渡、转化是辩证的，即质的变化、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⑤。只有承认并科学地理解这个辩证的同一关系，才能肯定“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⑥；才能理解“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分隔性来说是主观的，可是就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来源来说却是客观的”^⑦；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反对庸俗唯物主义^⑧。列宁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上述基本观点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却不能否认：这个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和在不相同的领域下，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73、83页。

③④⑤⑥⑦⑧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43、97、243—244、215、178、97页。

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之亦然，而且同样的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①，列宁把被黑格尔倒置了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关系再倒转过来，并且科学地展开概述了两者的同一和转化、过渡关系，在理论论述上应该说是有所进展的。

主体与客体是认识论的又一对范畴，它说明的是现实的认识关系，同思维与存在的本源与派生关系有所不同。列宁在研读黑格尔著作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和阐发的见解。在黑格尔那里，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客体同思维与存在，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所谓主体也就是概念自身、观念自身，而客体则是概念的对象化、概念的异在，或者说概念消失在、沉没在客体中，所以，主体把握客体、达到主客的统一的认识过程就是概念的自我认识。黑格尔所讲的认识，除了从根本上说的是概念的自我认识外，也是人的认识、人的思维，但人的认识也不过是观念通过人的认识活动而达到认识自己的目的。因而，在黑格尔那里，“主体”除了指概念自身，还指生命、人、人的思维；客体是指直接的存在，它是“一个本身尚未经规定的整体、整个客观的世界、上帝、绝对客体。但客体自身内也具有差别性，也分裂为无数不确定的杂多性（作为客观世界），而且每一个个体化了的部分也仍是一个客体、一个自身具体的、完整的、独立的定在”^②。如同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那样，在主体与客体问题上，列宁肯定并加以发挥的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思想，而否定了它的唯心主义观点。列宁认为，认识是自觉地存在着的主体（人）对有区别的客体的关系，是主体（人）为了支配和概括客体而深入客体的过程^③。在现实的认识关系中，主体是指自觉存在着的人，是从事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第372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4页。

主体（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面对的对象，其中包括经过主体（人）改造过的现实的实在^①。就是说，客体包括自然客体和人造客体（人化自然）。然而，作为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主体的人，是从自然界、客观世界这个整体中区分出来的，它是自然界、客观世界的部分^②。只有现实认识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同它所支配、所认识的客体相互作用，才产生认识、产生观念的东西。所以，作为本源和派生物的意识与物质同作为认识关系双方的主体与客体，这两对范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它们并不等同。在现实的认识关系中，主体与客体是矛盾的，人的和人类的认识，就是产生和克服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的永恒过程，是主体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③。而认识的要求就是要达到、要实现主体（人）的概念和客体实在的一致，列宁把这一点称作“辩证法的特征”^④。

二、认识与实践，主体在认识中的 能动性 & 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

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即现实的认识过程中，认识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范畴，正确的理解和处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说明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和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是科学地理解认识过程的关键。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坚持并发挥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提出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以及实践标准的客观性和具体历史性的见解^⑤。在研读黑格尔著作吸取其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的过程中，列宁对于实践与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深刻意义的论断。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概念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要达到主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5、171页。

③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5、198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44页。

观与客观统一的真理性的认识，就要在认识过程中，既克服主观性的片面性，又克服客观性的片面性，实现主观和客观的同一，而这个认识运动中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理论的观念，一个是实践的观念。列宁改述了黑格尔关于这两个环节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的言论，他指出，在理论观念中，也就是在理论领域中，主观概念（认识？）是作为普遍的东西和自身没有规定性的东西而和客观世界相对立，它从客观世界中汲取规定的内容并得到充实，从而扬弃了观念的片面的主观性；而在实践观念中，即在实践领域中，这个概念是作为现实的东西（作用着的东西？）而和现实的东西相对立，它扬弃了客观世界的片面性^①。因而，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的结合，就可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统一的真理性的认识。这里，黑格尔讲的是实践观念，和马克思、列宁所讲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实践是根本不同的，但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的环节、作为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的真理性的认识的环节，却是合理的。对此，列宁肯定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在分析认识过程中，实践是一个环节”，是一个“向客观的真理的过渡”的环节^②。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向客体的运动”的“交错点”^③，主体（人）正是通过实践的、合目的性的活动，来获得并证实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真理性的认识的^④。

那么，实践有哪些特点，它由哪些要素构成，因而可以起到“交错点”、“过渡”的环节的作用？列宁在考察中发现，黑格尔所讲的“实践观念”，也就是“行动”。可是“从实践、行动只向‘善’”的观念“过渡”^⑤，而所谓“善”，是一种“包含在概念中、和概念相等并且自身包括着对个别外部现实的要求的规定性”，它是“客观的东西”，然而，“这个客观的东西同时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2页，黑格尔《小逻辑》第410—411页。

②③④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1、239、161、181页。

具有自由统一性和主观性的形式”^①。对此，列宁指出，在黑格尔的论述中，从实践、行动只向“善”过渡，这是狭隘的、片面的，但是，这里却包含着“有益的东西”^②，特别是关于“善”的规定，它所说的“善”是“对个别外部现实性的要求”。实际上，“善”就是指的“人的实践”。实践的规定就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一，目的、要求；二，外部现实^③。就是说，人的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这个目的性的活动，一是价值性的目标；二是将目的、要求过渡、转化为外部现实，这就是实践的规定性，实践的一般特点。如果把实践活动同（理论的）认识活动作比较的话，那么，实践显然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它通过消灭外部世界的规定的方面、特征、现象，来获得具有外部现实形式的实在性，这点则是（理论的）认识所不具有的^④。除了对实践的内容、特点进行概述外，列宁还对黑格尔关于实践的要素的论述作了考察和总结。黑格尔认为，人的目的通过手段和客观性（客体）相结合，并且在客观性中和自身相结合。在这里，目的是“有限的”，它是“一个有限的内容”，因而也是“暂时的”，而手段则是比“有限目的更高的东西”^⑤，它们是“行动的推理”，即行动的目的的实现的一个前提。列宁肯定了这些言论里的合理思想，并且就实践和认识的相互过渡，概述了实践、行动的目的的实现的几个前提，或几个因素，这就是：1. “**善的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2. “**外部的手段**（工具），（客观的东西）”，3. “**结论：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对主观观念的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⑥。这就是说，实践是由目的、手段、客体、行动的结果（目的的实现）这

①②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181、183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页。

⑤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9、186页。

样几个要素构成的整体过程。正因为实践具有上述的内容结构、特点和品格，它才能成为主体认识向客体运动的“交错点”，才成为“向客观的真理的过渡”的环节。

但是，在现实的认识关系中，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又是矛盾的，因而，“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和认识中探寻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样，才能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①。这也就是说，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是在“认识论中的”，因为客观真理的东西是在认识和实践的“总和”中得出来的^②。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所讲的作为认识向客体运动的交错点的实践，是“历史的实践”，因而，列宁所说的在认识论中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应该说也就是具体历史的统一。

在科学地探讨和论述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关系的过程中，列宁还说明了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性与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他在一系列的言论中肯定认识是以主体（人）的能动性、能动作用为前提的，这种能动作用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列宁坚持在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改造与被改造、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里，主体（人）是反映者、改造者，是处在主动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他说，“‘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路’”，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会主动地来满足人的需要，但是“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③，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认识和掌握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里，主体（人）的主观性是消灭认识和客体的区分、不一致的“冲动”^④；在这里，主体（人）“为自己绘制客观世界图景”，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外观，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之成为“客观真实的”现实^⑤。这就是说，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和实践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5、188页。

③④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184、164、167页。

活动,掌握了客体并创造了新的客体。其次,列宁认为,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是持有一定的目的的,活动的目的性是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点。人的“认识的目的最初是主观的”^①,在实践和认识的相互过渡的三个前提当中,“目的(主观的目的)对现实(‘外部现实’)的关系”是首要的前提^②。实践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是“目的的活动不是指向自己”,而是“为了通过消灭外部世界的规定的(方面、特征、现象)来获得外部现实形式的实在性”^③。这里,主体(人)的目的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再次,列宁肯定主体(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是有取舍,即有选择的。因为客体复杂多样且变化多端、并处在整体的联系之中,所以,对于客体的运动的认识,“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陋化,不加以划分,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想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陋化、僵化。不仅思想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④。这就是说,要从自然现象之网中把客体区分出来,挑选出来,否则,就无法进行认识。同时,由于认识的客体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认识是要把握、揭示对象的本质,所以,认识“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⑤,科学的抽象就是抽取本质的东西,而舍弃非本质的东西,形成科学的概念、思想,这里有一个抽取、选择的问题,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抽取到本质的东西。最后,列宁明确指出,主体(人)对客体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⑥,而是复杂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行为。创造性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人)的能动性的集中表现。人对自然界的反映,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是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⑦,“人只能通过创立抽象、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6、186、183页。

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19、152页。

⑥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2页。

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景等等永远地接近”于把握、描绘整个自然界^①。而人的实践、目的性的活动，则改变客观现实的特点、外观，把目的变为真实存在着的现实^②。所以，从“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来看，“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③。这个论断说明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认识和实践反映和创造的统一。因而，在认识论中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观是统一的。这里，主体的能动作用得到充分的肯定，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把它向前推进了。

列宁一方面充分肯定主体（人）在认识和实践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客体、客观世界对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制约性。他认为，主体（人）对客体的能动作用是以承认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因为：首先，“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但是，人却以为他的目的“是在世界之外得来的，是不以世界为转移的”^④，是可以主观地“自由”设想的，那样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客观世界的规律，各种自然规律，如机械规律、化学规律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⑤科学技术，如“**机械的和化学的技术**之所以服务于人的目的”，就在于它为外部的条件（自然规律）所规定^⑥。再次，自然界、客观世界有着自己运动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它“走它自己的路”，人的实践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主观和客观存在着矛盾，因而“‘实现’目的时就会遇到‘困难’，甚至会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⑦。出路就是，要在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它为自己服务，也就是说，要“**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⑧。最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即创造新客体的活动，只是通过消灭、改

①②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3、157、152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9页。

⑤⑥⑦⑧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7、158、164、165页。

变“外部世界的规定的”特征、方面或现象、质等等，而获得“具有外部现实形式的实在性”^①，并非无中生有、凭空创造。所以，结论应当是：“如果考察逻辑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那就应当注意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前提。”^②这里，“客观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作为个体的、具体的主体的人的生命，是从自然界区分、产生出来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界的；作为个体主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产物，是离不开社会的。而这个“一般前提”，是说无论自然、社会都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都对人的生存、活动、认识起着制约的以致可以说决定的作用。就是个体主体的生命，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是不依个体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对这一点不明确，就难以科学地解决认识论中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

三、认识的辩证性，真理的过程性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强调指出，“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③。由于斗争的任务和具体条件的关系，他没有来得及具体考察和论述认识的辩证过程，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在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的过程中，在概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在认识论中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和概述了认识的辩证性和真理的过程性。列宁十分赞赏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和认识的辩证法的合理思想，认为它“**猜测到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101页。

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①。而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列宁则作了尖锐的批评和深刻的总结，认为，它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②。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是“把实践的标准引进认识论”^③；二是把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论，因而，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④。

列宁认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⑤。实际上，自然界是“独特地和辩证地反映在人的概念中”^⑥的，因而可以这样认为，“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就是“辩证认识的本质”^⑦。那末，主体（人）的认识如何独特地和辩证地反映自然界、客体，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如何在认识的过程中展开？列宁在研读黑格尔著作中作了概述。黑格尔在谈论从现象到本质、从主观到客观到主客观统一的真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批评了康德割裂认识过程中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感性直观与抽象思维的辩证关系，批评了“康德贬低理性的力量”，论述了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的关系。他认为，人们通常把感性存在当做更优越的东西来和概念对立，把抽象的东西看作比具体的东西卑微，因为抽象的东西丢掉了很多感性材料。这种见解认为，抽象只是为了主观的用处，才从具体的东西中抽出这种或那种特征，并要求在抛弃对象的某些质和特性时，对象的价值和优点不会有任何损失，它们仍然保存其全部意义。按照这种观点，知性只是由于无能，才不能汲取这全部的丰富性而不得不满足于贫乏的抽象。黑格尔认为要探讨哲理就必须摒弃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抽象思维是扬弃了简单现象的实在性，并把它归结为只在概念中显现的本质的东

①②③⑤⑥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6、311、181、152、245、13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8页。

西^①。列宁肯定了黑格尔言论中的合理思想，指出：“实质上，黑格尔反对康德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从上述言论中进一步总结提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样一条“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②。这里，包含着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这样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对这两个飞跃的具体环节，列宁还作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指出，认识必须从感觉、经验上开始，从感觉、经验上升到理性的一般^③，在这里，感性的表象是较低级的，它“不能把握整个运动”，而理性的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住运动的全部“表象”^④。这也就是说，“一切科学的抽象”，例如物质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⑤，“科学的抽象”就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⑥，因而，“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即使是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形成，已经意味着人在认识世界的日益深刻的客观联系”^⑦。但是，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抽象是离不开感性认识、感觉、表象的，理性思维的概念与感性认识的经验的、感觉的“综合”、总结、总括之间的一致，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这种一致是来自客观世界、自然界，而不是唯心主义所说的来自自我、观念^⑧。从感性认识的感觉、经验、表象到理性认识的抽象、概念、思想的过渡、转化是辩证的，这里，辩证的过渡也就是质变、飞跃^⑨。在考察上述认识的辩证过程中，列宁还提出“思维对兴趣和意欲的关系”^⑩，提出神话之类的幻想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和联系，认为，在古代神话般的幻想的成分多些，而近代仍然有这种成分，但比例不同了^⑪。事实上，在科学思维的过程中，在最简单的概括中，在最基本的一般的观念中，都有一定

①②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41—142、142、175页。

④⑤⑥⑦⑧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7、142、76、149—150、245—246页。

⑨⑩⑪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44、75、211页。

成分的幻想。反之，在最精确的科学中，否认幻想的作用也是荒谬的^①。这就是说，在考察认识过程中，列宁提出了非理性因素与理性思维的关系问题，肯定了非理性因素在科学思维过程中的作用，这对深入探讨辩证认识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列宁不仅论述了从感性的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的过渡、转化，而且概述了抽象的思维、“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认为，实践和理论认识是相互转化的，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就使得逻辑的格式以公理的形式固定下来；而理论的认识具体化为价值性的目标，即行动的目的，并借助外部的手段，达到目的的实现，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证实理论认识的正确性^②。所以，对理论认识的要求来说，它“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即揭示客体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但是，

“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③。就是说，只有当这种理论认识付诸实践，在实践中转化为现实时，这种认识才算得上真正抓住了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算得上客观真理性的认识。列宁这里讲的认识的辩证途径是就现实的具体认识过程来说的。就整个人类认识过程而言，他认为它是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不断产生和不断克服的过程^④。因为理论的认识、概念、规律“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只有这些“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⑤。因而整个认识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无限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⑥。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看，从这些言论包含着的思想含义来看，列宁所说的认识的辩证过程，不仅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而且是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7、18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1页。

④⑤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5、239、311页。

从实践到理论认识、从理论认识到实践，这种形式循环往复、逐步上升，即螺旋曲线发展的无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接近客观真理，“提供完全的具体事物”。

在批判总结黑格尔著作中有关认识辩证法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列宁对认识的深化运动也有精采的论述。其一，列宁认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对立面的同一，“本质在表现出来，现象是本质的”，这两者又都是变化的，不但现象是“运动的、流逝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因此，人的认识是“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①，或者说，是“由所谓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不断深化，以至无穷”^②，这种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确实是“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一般进程”，

“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③。在这个过程中，概念、范畴就是认识的阶段的总结，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and 把握，因为概念、范畴反映、概括不同层次的本质，因而概念、范畴按层次排列起来也就有所不同，有更深层次、更为本质的概念^④。从哲学范畴的形成和演进来看，就有着“从并存到因果性以及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更深刻更一般的形式”^⑤。其二，列宁认为，事物是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现象之网”，“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⑥就是说，这里有着个别和一般、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人的认识揭露事物的新的方面、关系，从而达到一般的认识，这个过程也是无穷的。人的认识总是从感性直观的个别到理性思维的一般，从个别概括出一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向从个别到一般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1、213、289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16页。

⑤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1页。

的推理的过渡”^①，从抽象的一般到“自身体现着特殊的、个体的、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②一般（普遍），也就是从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把握住事物的全部丰富性的共同的、一般的、本质的内容。

在研究和论述认识论、辩证法的方法时，列宁十分重视黑格尔所说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环节，是认识真理的方法，并把它概括为辩证法的一个要素，他认为，

“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③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要素）。这里包含着几层思想：1. 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取得规定的东西，是由对象的本质所决定的，它本身也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④；2. 整体和部分是对立面的同一，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的机械的相加，离开整体的部分，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部分^⑤；3. 只有既分析又综合两者结合的方法，才能把握住这种对立面统一的本质。因为分析的认识只抓住现有的东西，而综合的认识则是力求对现有的东西达到理解，就是在各规定的统一中去掌握各规定的多样性。只有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才能达到把握事物的本质、整体，认识其必然性、规律性的目的^⑥。

在研读黑格尔著作吸取其辩证法合理思想的过程中，对于认识所达到的主客观统一的真理性问题，列宁也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作为主体的人，“经过实践（和技术）”，反映、认识、掌握客观事物、对象及其规律性，也就是“走向客观真理”，但是，人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在技术中检验这些反映的正确性并运用它们”，这样才算“达到客观真理”^⑦。这就是说，要达到客观真理，必须 1. 通过实践反映、认识客体及其规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51、83、191页。

④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89、171—172页。

⑥⑦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9、170页。

律性；2. 在实践中运用这些认识；3. 在实践中检验这些认识。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实践是向客观的真理的过渡的环节的含义。

对黑格尔所揭示的真理的一般特点，列宁肯定其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并且以真理的全面性、真理的过程性来概括。关于真理的全面性，列宁有两段论述：其一，他认为，认识“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认识“现实的其他方面”，要掌握它们的整体，换句话说，真理只是在认识、把握“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①。其二，列宁认为，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②。这就是说，真理是：认识现象的一切方面的总和；进一步把握它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通过它们的“无限复归和自身同一”而包含在真理中的^③。这些关系主要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对立面的转化、过渡的关系^④。因而，上面所说的“总和”、“关系”，主要就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⑤、对立面的过渡，把握住事物的这种关系、总和，也就是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因此，真理的全面性主要在于对立面的同一。关于真理的过程性，从列宁的言论来看，大概有这么两层的意思：第一，所以说真理是过程，是由于真理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通过了三个阶段，

（1）生命，有了生命才有认识，才有真理；（2）认识过程，其中包括人的实践、技术和理论认识；（3）完全的真理^⑥，即认识所获得的概念、规律的“无限总和”。第二，真理是过程，因为思想、认识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这是由于认识向客体的运动要通过“实践”这个过渡的环节，而主体的认识和客体的矛盾、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5—166、166页。

③④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8、166—167、190页。

⑥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70页。

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是不断产生不断克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所以，“人不应当设想真理是僵死的静止，是暗淡的（灰暗的）、没有冲动、没有运动的简单的图画”^①。这就是说，真理本身不是凝固的，它是流动的，人对真理的把握不是一下子的、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随着主体（人）的实践和认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深入、不断向前推进的。在现实的认识关系中，认识向客体运动的交错点、判定认识和客体相符合的标准，是人和人类历史的实践。列宁指出，人以自己的实践、合目的性的活动，证明自己的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②，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坚持实践标准的典范，它在每一步的分析中，都用事实即实践来检验^③。这也就是说，“活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④。但是，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历史的实践是主体认识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的标准。所以，从现实认识关系来说，认识和实践、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应该是具体历史的统一，就是说，真理是具体的。

总之，列宁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人的认识活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的，它从感性直观过渡到抽象的理性思维，理性思维最初是简单的抽象的，然后进入复杂的具体的，所有这些认识的环节、阶段、步骤，都是从主体走向客体，受实践检验，并通过检验而达到客观真理。列宁的这些论述，既继承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又在自己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关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

①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4、188页。

②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61、291页。

四、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在批判总结黑格尔著作中的辩证法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列宁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和认识过程的主体能动性，把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实践观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复杂过程的诸环节及其关系，又进一步考察和总结了哲学斗争、哲学思维的经验教训，把哲学中的不同思潮、不同派别的斗争，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中考察，从而对唯心主义的产生和存在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提出科学的见解。

列宁认为，人的和人类的认识是充满着矛盾的复杂的过程，这里有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感性与理性，理性认识中的概念、判断、推理，认识过程中的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认识过程，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像一串螺旋式圆圈，曲折向前。黑格尔的逻辑学讲的就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自我认识的圆圈式的运动，这实际是总结了人类认识史、科学史以及当时的科学成就，以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形式，揭示了人类认识的辩证法，即使后来的反对黑格尔主义的人，如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保尔·福尔克曼，也不能不承认人的认识的辩证发展，把认识发展看作一串圆圈^①。哲学认识的发展也是如此，在历史上出现的哲学思潮、哲学派别，都是哲学思想发展的环节，它们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呈现出螺旋式的运动，古代有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文艺复兴时代有笛卡尔到伽桑狄（斯宾诺莎？），近代有霍尔巴赫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到黑格尔，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②。列宁勾画的这几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哲学发展，意在说明：其一，哲学的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圆圈式”的过程；其二，哲学的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8页。

“圆圈式”发展，不是封闭的、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复归，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向更高形式发展的新的起点。

在对待哲学理论的发展、哲学派别的斗争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理解和态度根本不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因而，它把唯心主义哲学看成不过是无根据的胡说，而辩证唯物主义则把辩证法、实践观引入认识论，把辩证法看作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是内容极其丰富的无任何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在它看来，人的、人类的认识过程不是直线，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人们对个别事物的反映、摹写，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动；人的认识的复杂过程，还存在着可能使抽象的概念向幻想、最后向神转变，而且是人们意识不到的转变。正因为认识过程的复杂曲折，认识过程的二重化，使唯心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哲学唯心主义正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也就是说，认识的曲折运动中的任何一个片断、小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这条直线能够把人们引向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所以，认识过程中的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就会利用唯心主义，把它巩固起来，这就是唯心主义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

在具体分析唯心主义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后，列宁明确提出，唯心主义绝不是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一种胡说，它的产生和存在是有它的根基，有它的作用的。“它无疑是一朵无实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

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①。这里包含着几层意思：1. 把哲学的斗争、哲学的发展，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中考察。就是说，不论那一派别、那种学说，都是人类哲学认识的总链条中的环节，都是在人类认识这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2. 唯心主义哲学也是人类认识的一朵花，甚至是一朵很精致、很鲜艳的花朵，应该说也是人类认识的结晶。列宁说过，黑格尔辩证法是科学史、认识史的总结、结晶。因此，对它的批判、否定是一种扬弃，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抛弃；3. 唯心主义是一朵无实花，是就这种思想学说的根本观点和总的趋向来说的，它是神秘的错误的，因而不能够成功地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至于它的某些方面，一旦从学说体系中剥离开来，加以改造，是可以成为新成果的。列宁这种对唯心主义的分析、评价，一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出的哲学党性立场，另一方面在对待对立派别的分析上，是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高度上作客观的评价。应当说这既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对认识论的一个新的贡献。

简 短 的 结 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复杂斗争的形势下，列宁趁革命的暂时“沉寂”时机，对时代的迫切课题以及围绕这些课题展开的理论斗争，作出了系统的富有成效的哲学总结。

列宁认为，解决时代的迫切课题的关键在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尤其是它的理论基础和灵魂——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学说。通过对辩证法思想史，特别是对黑格尔著作的系统考察和研究，对《资本论》逻辑和黑格尔逻辑的分析比较和总结，列宁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唯物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1页。

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认识的辩证途径，从认识论中的实践观点来看，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等等，一系列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突破性见解，以及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体系的构想和雏型，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无疑是伟大的贡献。在考察辩证法理论的过程中，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方法论原则的坚持和贯彻，应当说是辩证法在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具体化和实际运用，是一项富有成效的开拓性的工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贡献。

列宁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哲学笔记》中，它是探索过程的记录，是为进一步研究和写作所作的准备，并未形成最终的作品，其中有些问题列宁尚未最终选定表述的语言，有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理解，虽然在同一时期有许多作品是他实际运用研究成果的体现，但并非全部原理都有体现，因而对其中的有些论断，有些问题的表述，要作具体分析。列宁研究工作中的突破性结论固然重要，应当加以充分肯定，并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和掌握，但更为宝贵的是列宁获取突破性结论的方法。在研究中，列宁不为已有的理论框架、观念所束缚，善于挖掘更深层本质的东西，形成新的见解，如将否定的否定与对立面的统一分解开，抓住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更为本质的东西，形成辩证法核心概念；又如他不囿于传统的理解，而提出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统一的哲学科学的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整体；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工作中的方法，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

列宁研究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为了剖析时代，解决当时迫切的重大课题。因而，在此同时及以后，他坚持用辩证的方法，对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有特色的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阶段。

第六章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深入发展

前一章概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全面发展。列宁一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统一的严谨的理论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内容、结构和特殊功能，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联结，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作为哲学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最深刻、最全面的“证明和运用”；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核心”和“根本点”。列宁说：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如果“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①列宁不仅深知这个道理，并且努力按这个见解来进行理论研究和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因而，他不仅对作为哲学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科学体系的构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娴熟地运用于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矛盾的剖析上，从而在正确解决战争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的时代课题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章将着重研究列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科学地总结《资本论》发表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77页。

况，剖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及其内在矛盾，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全面概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学说的历史发展和主要经验，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和策略思想，论述了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这一章所涉及的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及其准备材料《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口号》、《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论文，以及《国家与革命》及其准备材料《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列宁的这些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和阐发，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科学成果，从理论上为丰富和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第一节 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向自己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从1898年到1914年间，已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最终形成了。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可以说是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的战争。而到1912—1913年，以两次巴尔干战争为序幕，终于进一步引发出重新瓜分世界的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说：“这就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①

世界经济政治的这些深刻变化反映到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列宁在1916年指出的：“在最近15—20年中，……新旧两大陆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以及政治学著作，愈来愈多地用‘帝国主义’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70页。

个概念来说明我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了。”^①有的甚至把20世纪直接称作“帝国主义的世纪”^②，“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③。但是，什么是帝国主义？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矛盾和发展趋势？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展开了激烈的论辩。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或者公开为帝国主义进行赤裸裸的辩护，或者对帝国主义作“市侩式”的批评。但也出现了一些有才能的研究者，对帝国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经济、政治特点作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同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这一崭新的时代课题，也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但是，有的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进行了开拓性的、富有成果的分析；有的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作出了错误的论断。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以及有关的书评和论著中，对不同阶级的各类思想理论家们，围绕着“帝国主义”这一时代课题所阐明的理论观点及其方法的差异和论辩，进行了既严肃又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评述，并展现了他自己对“帝国主义”课题的研究历程及其方法论原则。

一、直接为帝国主义辩护或作 “市侩式”批评的理论

列宁指出，当时有一批“‘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④的辩护士，其中包括为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进行辩护的“帝国主义思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1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0、84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1页。

家”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和被称为“帝国创造者”的“英风云人物”塞西尔·罗德斯（1853—1902），以及打着“科学家”的旗号、以“爱国者”面目出现、为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和整个金融资本制度作辩护的雅科布·里塞尔（1853—1932）、舒尔采—格弗尼茨（1864—1943）和罗伯特·利夫曼（1874—1941）等人。对这些帝国主义辩护士的特点，列宁——作了具体的分析。他一方面既肯定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后起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们，曾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事实和原始材料，并作了某些具体的分析和概括，为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过渡和考察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提供了不少很有用的实际资料；同时，又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了他们平庸浅薄的思想和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反动阶级立场。

比如，张伯伦和罗德斯等人赤裸裸地叫嚣“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避免“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①。列宁在评述这些言论时，指出这些辩护虽然“有些笨拙、无耻”，立场又“顽固而反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当时就清楚地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所谓纯粹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联系。”^②还有，对利夫曼写的《参与和投资公司》（1909）、《卡特尔与托拉斯》（1910）、《企业形态论》（1912）等论著，列宁既肯定他收集了大量有关垄断组织产生、发展的很有用的实际材料，而且大部分都是原始材料，并作了很好的概述；同时又严厉批评利夫曼对于垄断统治的内幕及其手段不但没作揭露，反而竭力加以掩盖和粉饰，用一些冠冕堂皇而含糊其辞的话在定义上“打圈子”，以掩饰帝国主义的矛盾。为此，列宁评论说，利夫曼的《卡特尔与托拉斯》和《参与和投资公司》等书，虽然“实际材料很有用”，“取材还不错”，“当然是从辩护士的观点来取舍的”，而他的“观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92、391页。

点却是愚蠢的、自满的、洋洋得意的资产者辩护士的观点”^①。因此，在理论上是毫无价值的，因为他是在“玩弄无谓的理论游戏”^②。

再比如，对舒尔采·格弗尼茨，列宁既称赞他于1906年将他先后到英国各地旅行收集到的“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关于英国帝国主义的事实”，写成一本文笔流畅、不枯燥的《不列颠帝国》。1915年，他还写了一本《德国信用银行》，虽然其中废话很多，并且“帝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全书”，但“也有可取之处”^③，即他揭露了不列颠帝国在资本输出和殖民扩张方面，表现出来的贪得无厌的野心和安心地过食利者生活的寄生性。虽然其中一些重要材料和结论，是从霍布森那里剽窃来的，但它对研究和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特点，还是很有用的。同时，列宁又尖锐揭露了格弗尼茨的立场是完全站在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一边的。格弗尼茨露骨地宣称：英国先生们，你们抢劫了很多，让我们也来抢劫一些吧！他还公开吹捧德国帝国主义将领导人类，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他“把掠夺‘奉为’康德、‘奉为’神、‘奉为’爱国主义、‘奉为’科学=这就是这位‘学者’的立场的实质！！”^④并严肃指出，格弗尼茨是“一个披着康德主义者外衣的抄袭者，一个宗教坏蛋、一个帝国主义分子”^⑤，是“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⑥。

列宁之所以把这些帝国主义辩护士们称为是一些“把掠夺‘奉为’康德”的“康德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在研究帝国主义时，正是使用和体现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他们只崇拜明显存在的事物和现象，而极力贬低理论思维结果的客观真理性。在他们看来，科学的任务只在于描述明显存在的事物的现象，超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414、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82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7、498、509页。

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8页。

出这一范围的任何东西，都是无意义的，可以随便确定和阐述。对于这种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及其严重缺陷，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曾作了生动深刻的揭露。他指出，这些辩护士们从新康德主义的这种思维方式出发，“只抓住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上，煞有介事地分析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用一些言之无物的空话来回避无可否认的事实。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只是“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从而“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①这样，他们在为帝国主义辩护时，便只看到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这些“偶然交织在一起的”表面现象，而根本无法理解“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②。因此，他们对于金融寡头形成的“内幕”寡头所采用的手段、寡头所获得的“正当和不正当”收入的数量、寡头和议会的联系等等本质性的“棘手的问题”，不但不能也无法去揭露，反而只是讲一些堂皇而含糊的词句，“力图掩饰事情的本质，让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③。这充分表明这些人是直接以新康德主义作为其哲学方法论基础的。而列宁在批判他们时，没有停留在对其辩护词的驳斥上，而是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深刻揭露他们的新康德主义实质。而且列宁正是在对新康德主义方法论进行深刻批判的过程中，完成其创建帝国主义理论的工作的。

20世纪初期，除了上述这些帝国主义辩护士外，几乎在所有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用小资产阶级“市侩”观点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的批评家。如“资产阶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8页。

③ 同上书，第351页。

级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者”约·阿·霍布森(1858—1940)、“民粹主义者”叶·阿加德、带着“小资产阶级感伤”的阿·兰斯堡(1872—1940)、“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典型”路·埃施韦格,以及法国作家维克多·贝拉尔、经济学家保尔·路易和德国历史学家埃格耳哈夫等人。列宁认为,他们跟公开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不同,不是去掩盖金融资本统治的内幕,而是揭露帝国主义的矛盾,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批评金融寡头垄断和支配一切。但是,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幻想回到垄断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企图用社会改良主义来代替帝国主义。所以列宁称他们是一些“市侩式”的批评家。不过,他们中也有些人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时代特征作了相当精确的描述,引起了列宁的特别关注。比如,法国经济学家保尔·路易在1904年写的《帝国主义概论》中,把帝国主义看作“20世纪初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①,并得出结论说:“目前世界正经历着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②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对该书作了详细摘要,并在这些精辟论断旁划了两道杠杠,以示重要和赞同。再比如德国历史学家埃格耳哈夫1903年著《现代史·从法兰克福和约到现在》一书,“以学究式的精确性”记载了从1870年以后列强的国际政策中最主要的危机,从而“提供了作为时代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和民主运动的图景。”列宁认为他的“这本书作为事实的综合材料和参考资料,这是很有用的。”并强调要特别“注意”他提出的时代“这个概念非常重要!!”^③列宁详细摘录了他这本书所提供的重要历史资料及其他资料,编制了题为《1870年以来世界历史主要资料综合试作》^④,即1870—1915年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的大事年表,它为列宁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769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778—800页。

研究和写作《帝国主义论》一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霍布森。他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1894）、特别是在《帝国主义》（1902）一书中，收集了大量材料，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特别是对世纪转换时代出现的争夺殖民地浪潮、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奴役和掠夺殖民地附属国的血腥手段的揭露，提供了大量史实和统计资料。列宁早在1899年写的对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一书的“书评”中，就说过：“霍布森最擅长把最新的统计材料和经济材料分门别类并且加以叙述”，并能“很成功地利用图表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作出“接近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些结论”，“不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①。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又指出：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出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②。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这一课题和写作《帝国主义论》时，对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这本书“给了它应得的重视”^③，并作了详尽的摘录、引用和评论。不过，霍布森对帝国主义虽然作了一定的批评，但道义上的谴责、抨击多于对经济发展客观必然性的揭示。而且他寄幻想于帝国主义者改变它的政策，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通过改良措施来医治帝国主义的各种弊病。特别是他提出只要改变帝国主义的国际政策，采取联合的原则，形成所谓“国际帝国主义”，就能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实现国际持久和平。列宁指出其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无视帝国主义的本质，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来替代帝国主义的现实。因而，在客观实践中还是起着帮助帝国主义，更隐蔽地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作用。因此，列宁称霍布森为“社会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者”，认为他的整个帝国主义理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35—137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1、323页。

体系是不科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帝国主义的典型。

列宁在批判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时曾尖锐指出：“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① 霍布森就是这样一个企图缓和帝国主义矛盾，使帝国主义后退到垄断前时期去的，“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②。他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小市民式的批评”，在历史上曾起了很坏的作用，至今仍有影响。它曾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考茨基接了过去，作为他掩盖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主要思想渊源。所以，列宁明确指出：在霍布森那里，“几乎可以找到考茨基的一切和平主义的和‘调和主义的’庸俗论调。”^③ 认真研究和剖析霍布森论帝国主义的书，“特别有益的是它有助于揭露考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虚伪之处。”^④

二、第二国际各国党的理论家对 “帝国主义”的理论探索和论辩

社会各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不同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无产阶级阵营内部来。随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到来，资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必然使第二国际各国党中出现不同的派别。他们围绕“帝国主义”这一时代课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彼此展开了非常激烈的长期论战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7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105页。

和争辩^①。

在各个派别中，希法亭和考茨基的文章和小册子最早发表。希法亭早在1910年就写了《金融资本》一书，对“帝国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了较有价值的理论分析。考茨基1914年发表了《帝国主义》一文，既批评了左派、也驳斥了右派把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历史新阶段的看法，他主张把帝国主义看作一种政策。1915年2月他又发表了《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以后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对帝国主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论述，特别是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论争。1915年，库诺和连施先后发表了《党破产了吗？》、《德国社会民主党与世界大战》等小册子，进一步论证了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的观点。针对库诺和连施的文章，考茨基又在他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一文，进行评论。阿德勒也写了《什么是发展的必然性》一文，支持考茨基的观点。而库诺又写了《幻想崇拜》一文进行反驳。接着，考茨基又写了《再论我们的幻想》答复库诺，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争论中也涉及了左派的观点。当时，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亦称“国际派”）也针锋相对地写文章参加论战，驳斥了右派和考茨基派的观点。这场辩论主要围绕着下述问题展开：帝国主义是否有必然性，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还是一个历史时代，帝国主义的定义、起源，是否有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帝国主义和战争、革命的联系，应当对帝国主义持什么态度等。这场论辩对于人们了解各派对帝国主义的观点，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后来，

^① 20世纪初，第二国际中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左派以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为代表；右派以伯恩斯坦、库诺和连施为代表；而与机会主义右派相配合的中派，则以考茨基和鲍威尔为代表。跟考茨基站在一起的，还有阿德勒以及后来改变了自己观点的希法亭等人，他们逐渐形成了影响很广、危害极大的“考茨基主义”的国际思潮。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及其他论著中，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对这场辩论及有关著作做了深刻的总结和评述。

希法亭在1910年写的《金融资本》一书，提出要“用马克思的方法”，来研究和阐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一些新现象、新特点，发展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研究”。希法亭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且收集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充分论证了金融资本就是这个新阶段最重要的现象和特征。他强调说，不了解金融资本，就不可能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趋势。他提出的“金融资本理论”，在当时曾得到广泛传播，有很大社会影响。列宁非常重视希法亭的这部著作，在有关帝国主义的笔记和论著中，曾数十次提到希法亭的思想，并引用他的观点和材料，在《帝国主义论》中还充分肯定其价值和意义，说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①。并断定“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都没有超出”霍布森和希法亭“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②。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当时论述帝国主义理论的最好著作之一。它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材料和理论上的准备。

但是，希法亭并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由于他把流通放在首位，而把生产看作是由流通过程所决定的，这一根本颠倒使得他不可能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出正确剖析。他片面强调了银行资本的统治，没有充分重视垄断的意义，看不到帝国主义寄生腐朽的趋势；他在货币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危机理论上否定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性质，割裂了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联系。后来他还提出了所谓“有组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1页。

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掩盖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跟考茨基完全走到一块去了。列宁对希法亭理论上的错误和根本缺陷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评。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明确指出希法亭“在货币理论问题上有错误”，并且“有某种把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调和起来的倾向”^①。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还具体归纳了《金融资本》一书的四点错误：“（1）关于货币的理论错误。（2）忽视（几乎）世界瓜分。（3）忽视金融资本与寄生性的关系。（4）忽视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②并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尖锐指出，他是康德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劝说者。就是说，希法亭之所以未能在理论上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以至于后来走上考茨基主义道路，是由于他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错误。

希法亭跟当时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样，都妄图用新康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他在认识 and 观察问题的方法上，接受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把诸如马赫主义、新康德主义这一类时髦哲学悄悄混在自己的体系中，用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比如，他在《金融资本》中写道：“根据恩·马赫的观点”，“‘自我’仅仅是无穷的感觉线比较密集的焦点”，而这些感觉就组成了世界画面上的点。“同样地，货币也是社会联系网的枢纽”。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只有我们的直观赋予事物以空间的形式”，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在这句话旁边特地标上“康德主义者”五个字^③。由于希法亭在哲学世界观上企图用马赫和康德来替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后退。他的金融资本理论中所包含的严重方法论错误，使他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常常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深入研究其本质，不能全面地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0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370页。

析问题，从而不能把着眼点放在生产上，而是放到流通领域去。虽然希法亭在主观愿望上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但他在研究过程中又常常背离马克思主义；虽然他试图使自己的著作成为《资本论》的继续，但却又提供不出一个科学的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他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到来，但却不能正确指明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这就是他前期虽然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后来却成了“考茨基主义者”的深刻理论根源。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右派的首领伯恩斯坦，不仅公开打出“新康德主义”的旗帜，而且抓住世纪转换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借口帝国主义初期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和银行的新作用，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膨胀所出现的一时繁荣景象等所谓“经济发展新材料”，竭力宣扬“资本的民主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适应性”等论调，把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看作是“防止”经济危机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适应手段”，并以此断定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注定要走向“崩溃”。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生产集中走向垄断、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已经过时”，从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应该指出的是，伯恩斯坦虽然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结论，但他并没有把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来加以探讨。进行这一探讨的是库诺。

库诺在《党破产了吗？》的小册子和《幻想崇拜》等文章中，集中代表了右派社会党人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他虽然不反对把帝国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提法，但竭力歪曲其本质和基本特征，否定其历史地位。他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并称之为“金融资本时代”。但由于库诺根本不了解垄断的意义，不了解金融资本和垄断之间的内在联系，不知道金融资本必须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之上，反而

把垄断说成是金融资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他从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出发，竭力否定帝国主义以垄断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朽的趋势，认为帝国主义是“前进的、加强了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时期”，竭力鼓吹帝国主义是“前进了的资本主义”，断然拒绝任何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库诺便公开倒向本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并讥讽战争造成革命形势的预测，是“没有希望的幻想”^①。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对库诺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概括：“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并指出库诺的这种推论看既“笨拙而又无耻”^②。

以第二国际另一个机会主义首领考茨基为代表而逐渐形成的“考茨基主义派别”，是一个打着“中派”的旗号，一面表示反对“右派”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但又竭力庇护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的更隐蔽的机会主义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茨基在《帝国主义》《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中，炮制了一整套歪曲帝国主义本质的谬论。他竭力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硬说它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他还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根本要不得的”定义，即所谓“纯洁的、平静的、温和谨慎的资本主义”^③。力图以此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垄断和金融资本统治是帝国主义的基础和本质特征，割裂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垄断基础的联系。他还认为“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④，即以“实行国际联合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

① 库诺：《党破产了吗？》，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106页。

④ 考茨基：《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7—18页。

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所谓“超帝国主义阶段”，并声称“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①。他还幻想“超帝国主义”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会出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列宁曾尖锐批评考茨基这种主张是“市侩的改良主义”，是“新基础上，新形式下的旧蒲鲁东主义”^②，实质上是一种缓和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理论”，并严肃指出：“这种回避已经到来的帝国主义，幻想遁入不知道能否实现的‘超帝国主义’的企图，是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气味的。”^③

列宁还着重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揭露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否认矛盾辩证法的实质，指出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是极其错误的。列宁说，它“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④。“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⑤“超帝国主义论”的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即不去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竭力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列宁明确指出，这种不是去“充分暴露矛盾的深刻性，而是回避存在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⑥。

在研究“帝国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上，作为第二国际时期左派的代表，被德国工人誉为“革命之鹰”的罗莎·卢森堡，在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右派和考茨基派的论战过程中，先后于1899年写

① 转引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16—1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10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3—144页。

④⑤⑥ 同上书，第388、430、405—406页。

了《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1912年写了《资本积累论》，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对帝国主义理论作了探索性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但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看法和理论缺陷。列宁曾指出卢森堡的“辩证法是折中主义的”，从而“歪曲了马克思”^①的思想，这表明他虽然是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还不能成为理论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俄国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布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4年冬天开始就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上，他广泛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看法，特别是认真研究和汲取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有用成果，于1915—1916年写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布哈林在这本小册子中，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大量最新材料，从分析世界经济的形成及其在广度和深度的发展入手，深入考察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与资本输出，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和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结构的变化等基本事实和发展趋势。并从分析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上，批评了第二国际右派的观点和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论点。布哈林很强调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必须牢牢抓住时代的根本特征。他指出：“应当找出我们时代特征的明确因素，并加以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方法。”^②根据这个方法，他分析说，过去有过一个比较“和平的”资本主义时期；现在已经被“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难和冲突的时代”^③所代替。特别是到了世纪转换之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已经完全由垄断取而代之了。从此世界经济进入了“金融资本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④。布哈林这本书内容丰富，对帝国

① 转引自库尔萨诺夫主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列宁主义阶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08页注。

②③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马丁·劳伦斯出版公司，第114—115页。

④ 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马丁·劳伦斯出版公司，第124、168页。

主义这一迫切课题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和研究，有很大的科学意义。列宁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布哈林所谈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及这本书的科学价值。列宁说，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形式变化的这一经济科学的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就在于他把帝国主义看成一个整体，看成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阶段。^①

但应指出的是，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理论概括，大多沿袭希法亭，没有很大的突破，对一些新的重要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和概括，还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因此还未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他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阐述上，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错误。比如他在论述“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时，忽视了资本主义垄断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竞争，没有看到垄断不能完全排除竞争，认为“金融资本消灭了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灭了各国内部的竞争”，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设想成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同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寄生、腐朽性质及与工人运动的联系没有给予应有注意，还不能深刻揭示当时机会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因此，列宁说，布哈林犯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的错误。究其根源，从世界观上看，就是由于布哈林“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在他的理论观点里有一些“烦琐哲学的东西”^②，这导致他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全面地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切本质特征。总之，布哈林的理论探索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毕竟还未能创立科学的资本主义理论。

然而，跟当时第二国际时期最大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比较，布哈林的理论探索毕竟为列宁的科学创造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价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0—1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8页。

值的東西。而普列漢諾夫在對待“帝國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上，跟布哈林相比卻大為遜色了，他對此課題完全採取漠然的態度。由於普列漢諾夫犯了嚴重的“學究主義盲目症”，思想僵化，理論嚴重脫離實際，認識仍然停留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他根本無視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他不願意也不能夠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科學地分析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和發展趨勢，即現代高度發達的、成熟的和衰敗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的體系，而只能收集幾件為帝國主義分子普利什凱維奇和米留柯夫之流所喜歡的事實，從而把帝國主義概念的科學意義給貶低了。因此，列寧在高度評價布哈林《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的“科學意義”的同時，尖銳地批評了普列漢諾夫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①，嘲笑普列漢諾夫過去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性可以拋棄，世界觀可以扔到一邊”，甚至“丟到九霄雲外”，而“同自己的對手和敵手完全是站在同一個階級基礎上的！”^②從而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在第二國際時期的理論鬥爭中，只有列寧是真正堅持和繼承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和方法，批判地吸取了前人的一切成果，圍繞着“帝國主義”這一嶄新的時代課題，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創立了科學的資本帝國主義的理論。

三、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及其方法

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世界資本主義正走向壟斷階段，帝國主義刚开始形成的時候，列寧就已着手廣泛收集材料，注意探討和研究“帝國主義”這一時代課題。列寧創立科學的資本帝國主義理論，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世紀轉換時期，列寧在有關書評和研究資本

①② 《列寧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0、141頁。

主义经济与民族问题中，就敏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并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垄断的一些重要表现。

早在1899年，列宁就写了《书评·霍布森“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和《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900年写了《对华战争》，1903年写了《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列宁就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和帝国主义时代问题，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实质和某些特征。他指出：美国是一个卡特尔国家，“卡特尔限制了为国内市场的生产，却扩大了为国外市场的生产，在国外市场出售商品赔钱，在国内则以垄断价格把商品售给消费者。”^①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1908）《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1908或1909）《资产阶级财政的增长》《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1913）中，列宁又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垄断组织的形成，如“铁路和托拉斯”、“金融资本”^②，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同金融资本家之间的联盟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强调指出“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清楚、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③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人民革命时代，等等。但在1914年以前，列宁还没有对帝国主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还未能对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各种矛盾作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因而也还没有提出完整系统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爆发了世界大战，使列宁更迫切感到必须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和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剖析。

从1914年8月大战爆发至1915年上半年，列宁在继续深入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8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31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5页。

系统地研究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同时，还直接运用辩证法揭露机会主义的诡辩论，分析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先后写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国际的状况和任务》《第二国际的破产》和《打着别人的旗号》等政论文章。在这些论文中，列宁深刻论述了研究时代问题的意义，划分时代的根据，明确提出了当前“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①明确指出了“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自由竞争已让位于资本家的垄断同盟，整个地球已被瓜分完毕。”^②在此基础上，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垄断和自由竞争、和平扩张和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势，指明当前“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当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这时“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③。这些论述比以前的提法更具体化了，对帝国主义的基础和某些特征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大体上具有了后来提出帝国主义的实质和基本特征的某些雏形，初步包含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思想，但是还不够完整和明确。

第三个阶段是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正当世界大战进行得正酣的时候，列宁集中精力研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为创立科学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进行艰苦卓绝的理论创造活动。

这时，列宁深知“如果不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弄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如果不以此为基础，那就谈不上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当前这场战争。”^④同时也就无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去战胜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为粉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叛卖行径进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242页。

③ 同上书，第16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140页。

行战斗。为了对帝国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从1915年中到1916年10月，列宁先后来到瑞士的伯尔尼和苏黎世，广泛收集并仔细研究了当时他所能得到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重要材料和前人研究的有用成果，包括各国的经济、技术的统计资料，政治、外交、历史、地理以及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文献，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金融家和商人、政治家和议会议员，以及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据统计，列宁从148本书、49种期刊上用英、法、德、俄等国文字写的232篇文章中，作了大量的摘录、札记和评注，先后写下了20本笔记，共约65万字左右（这就是现在收编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正是从对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整理、分析和研究，对这些客观的全面的材料的综合、归纳和总结中，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和经济实质，阐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规律，从而为创立科学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奠定了有大量精确材料（事实和数字）的可靠基础。

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完成的。这一时期他还运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材料，先后写下了《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论著，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实质及其发展规律，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补充，从而创立了科学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

从列宁在大战期间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和关于帝国主义理论而写下的《哲学笔记》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及其科学成果《帝国主义论》等论著中，可以看出列宁研究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一）以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为指针，遵循马克思、

恩格斯开创的研究途径，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讨和研究

早在1899年，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我们深信它只是“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并为我们“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①。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研究，正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研究途径，来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讨和研究。从《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列宁不仅摘引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学者的材料和观点，而且也节录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重要论述。在《笔记》中，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论著列为“参考书目”，这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坚持以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证明。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直接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作了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科学分析，研究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集中会引起垄断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后来，恩格斯又对当时出现的各种垄断的形式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这一发展趋势，直接成了列宁创立科学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列宁说：“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②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事实证明，生产集中产生垄断，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0—161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94页。

马克思跟资产阶级学者的根本不同点就在于，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时，总是从生产集中的发展中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要走向垄断，并在《资本论》这一不朽著作中，科学地论证了这一必然趋势。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从生产过程出发，始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由此引起的垄断的发展上。这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直接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研究方向，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资本论》的思想。但是，列宁并不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结论出发，进行单纯的逻辑推理得出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列宁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为指针，对堆积如山的大量实际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深刻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内在规律，从而创立了完整系统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阶段和新领域，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作为考察和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方法

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这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特点，也是他优胜于前人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为了从方法论上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用新康德主义来替代哲学唯物主义、以诡辩论偷换辩证法，也为了给探索帝国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奠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列宁在大战正酣的紧张日子里，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毅力，沉下心来研究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

列宁通过对辩证法发展史、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认为必须把辩证法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所归纳的“辩证法要素”的头两条，强调的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以及“这

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①在研究帝国主义时，列宁自觉地贯彻了这些原则。他指出，把辩证法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时，就必须“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②

列宁根据这一“辩证地进行考察”的客观性原则，来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时，强调要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大量的、丰富的客观事实和材料基础上。他说：“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③列宁反复说明研究资本主义，必须使用“十分确凿的事实”和“不容争辩的”资料，来说明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和现状。他在总结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分析后，特意说明“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充分根据的了解，我们故意尽量多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④后来，列宁又一次强调指出：为了科学地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就必须引用“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⑤。从客观存在着的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基础材料的“全部总和”出发，来研究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问题，这是列宁把辩证法运用来观察分析社会生活现象首要的方法论原则。

从客观现实的材料总和出发，当然不是满足于现象的罗列，或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现象上，而必须从大量的事实材料中选择出那些基本的典型的材料，才能说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经济实质，弄清楚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这也就是说，要坚持考察的客观性，就必须一方面坚持尽可能搜集比较丰富、全面的事实和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9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78页。

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90、402、326页。

料；另一方面对这些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筛选、核实，力求找出可靠的基本事实和典型的基本材料。同时，还要把一些零散的资料综合起来。列宁经常亲自编制各种统计图表，进行严格的核对、比较和整理，把握住其总的联系，使之成为“不容争辩”的“确凿”的综合材料，从而使自己对资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有坚实的基础，富有说服力。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各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①他在该书的许多章节中所引证的材料，也都是“这样一些驳不倒的综合材料”^②。

列宁研究辩证法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通过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反复钻研、思索和理解，抓住了对立面的统一这一辩证法的“核心”，并把“矛盾辩证法”作为观察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又一重要的科学方法论原则。“矛盾辩证法”强调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内在矛盾的倾向，要注意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相互转化，促进事物的发展。但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都不理解矛盾辩证法及其实质，因而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或者公开颂扬，或者简单否定。例如，库诺把帝国主义作为前进了的资本主义而不许人们反对；而考茨基则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资产阶级政策而要求以自由贸易来代替它。这表明他们都不懂得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不可能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在垄断与竞争的关系上也是这样。伯恩斯坦鼓吹“资本民主化”和“小生产稳固化”，从而否定垄断的统治，但同时他又宣称“卡特尔消灭危机”的谬论；而希法亭等人则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认为垄断能消除竞争；就是布哈林在理论探索过程中，由于他“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也存在着把垄断和竞争绝对对立起来的倾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25、326页。

向，所以也不可能提供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总结汲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坚持运用矛盾辩证法来分析资本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各个方面。比如，自由竞争与垄断、生产力的发展和腐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垂死等等。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估计其发展趋势。既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但又具有垂死的性质；资本主义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面，但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特别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抗争；垄断使资本帝国主义具有腐朽的趋势，但又不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生产力仍有迅速发展的可能。列宁还运用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原理，科学地说明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化和帝国主义的过渡性质。总之，正是由于列宁运用“矛盾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考察资本主义的变化，因而能够超过前人的水准，创立了科学的资本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还把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方法，作为研究和叙述资本帝国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列宁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每个矛盾的方面在事物中都占有特定的地位，并且与其他矛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对矛盾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的各种矛盾进行了解，把事物分解成各个有关部分，这就是分析。通过分析，使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生动的直观和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现象到本质。但是要认识事物的整体，要把认识进一步具体化，又必须进行综合。综合就是把原先分解开来的各个抽象部分，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它是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而这种在思维中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跟现实的历史进程在本质上又是相一致的。只有通过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才能正确地反映和了解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规律。以前的一切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要

求。而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理论时，正是运用这一辩证逻辑的方法来深刻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实质及其基本特征，确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地位，从而创立了科学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往后，我们将具体展示列宁对这一科学方法的运用及其成果。

第二节 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的 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着重研究和探讨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问题，并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关于“《资本论》的逻辑”这一命题，并强调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①。列宁不仅在《哲学笔记》中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关于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卓越思想，而且把它直接运用于对帝国主义的科学研究，写下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通称《帝国主义论》）等论著，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一、揭示帝国主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把辩证法运用于《资本论》，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同样地把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当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进行唯物辩证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时，作过许多有关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必然发展、过渡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90页。

垄断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和精辟论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继而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分析入手，不但对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而且还科学地预见到了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垄断的必然趋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不仅深刻阐明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形式的出现及其意义，而且全面论述了从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过渡的趋势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指出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的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①。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精辟论述和科学预见成了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指针。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活到全世界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世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还没有完成。到了列宁生活的时代，即20世纪初，这个过渡已经完成。因此，列宁能够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见为指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垄断组织及其形成的自然发生史。

列宁通过现代工业调查资料，论述了由于生产集中使竞争变为垄断的历史过程，论证了垄断是生产社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并且它已成为资本运动的新阶段。列宁具体考察了德国、美国 and 英、法等国企业生产集中和垄断组织形成的情况，指出：在德国还“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②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只是推行某种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6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2—333页。

策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的德国，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都发生了这种现象。列宁认为，虽然垄断组织的形式和产生的时间，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有所差别，但它们都具有如下共同的本质特征：它们都是由于生产集中所产生的垄断组织，都是资本家之间的联合，都通过控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熟练的劳动力、限制生产规模、瓜分市场、制定垄断价格等种种手段，攫取“超额和高额垄断利润”，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治；同时，各个垄断组织形式上的差别，也随着康采恩、持股公司的发展而逐渐消失。因而，“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①它是生产集中和社会化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列宁注意到了个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承认垄断的产生，“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生产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②。而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以大量的著作，来叙述垄断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列宁根据当时出版的有关“垄断组织形成史”的综合性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自己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将垄断组织的“自然发生史”大体上划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时期：

1.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甚明显的萌芽；
2. 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它还不稳固，还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3. 19世纪末的经济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时期，卡特尔已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③。

列宁正是按照这一垄断组织“自然发生史”的分期，来判明帝国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深刻论证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3页。

② 同上书，第335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337—338页。

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列宁说，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集中表现了“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①，并指出现在垄断已经是事实，垄断是资本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后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在20世纪初”^②。列宁强调说，这种历史分期的更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偏见为转移的。

列宁还深入分析了各种垄断组织，如卡特尔、康采恩、托拉斯等等，都是生产集中和生产力社会化的高级形式。垄断的“自然发生史”，证明了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具有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在列宁看来，社会历史领域如不把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看作是不依社会意识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就将会抛弃“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发展去考察事物本身”^③的辩证法。同时，列宁还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他紧紧抓住由资本主义生产力社会化的巨大发展所产生的垄断，来考察帝国主义的形成史。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垄断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他便成功地把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融为一体。而考茨基离开帝国主义的“自然历史过程”，仅从社会政治意识方面去考察垄断现象，把垄断看成是“工业资本的一种政策的结果”，因而便不能科学地揭示垄断的本质。希法亭虽然看到了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但他却离开生产力的发展，错误地把流通领域的集中和垄断现象提到首位，并用错误的货币理论来论证流通领域的决定作用，试图从货币流通中来说明资本的垄断现象。因此，也不能够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00页。

真正揭示垄断的本质，无法科学地说明帝国主义形成的“自然历史过程”。

二、运用辩证法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不仅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这一重要命题，同时，还特别强调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①。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正是应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同一的思想，即应用辩证逻辑的思想和方法，来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

首先，关于《帝国主义论》逻辑起点的形成和确立。

大家知道，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质是从商品的矛盾开始的。他把商品作为规定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起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②，作为《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复杂整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从资本主义矛盾总体中，抽象出资本和雇佣劳动，再从资本和雇佣劳动中抽象出分工、交换、价值、货币和商品这些“抽象的规定”，然后，又反过来，从商品开始，把它当作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并通过这个分析来“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③，从而阐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同样地，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也是应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种逻辑方法，通过对帝国主义矛盾总体的分析，抽象出如银行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和瓜分殖民地、积聚和大生产、卡特尔和托拉斯以及垄断等“抽象的规定”，即从以上这些作为“垄断”的普遍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280页。

②③ 同上书，第307页。

在的现象形态先进行考察，经过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以形成“垄断”范畴；然后反过来，从“垄断”开始，以垄断作为逻辑起点，运用从理性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的方法，通过对垄断范畴的矛盾运动及其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系和过渡，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帝国主义论》的逻辑体系。

我们从《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里先后写下的有关《帝国主义论》的几个提纲和最后目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是怎样经过一番反复探索、琢磨和研讨的过程，才最后形成和确立以“垄断”作为《帝国主义论》的逻辑起点的。在“笔记”（即《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的第106页，列宁草拟第一个提纲时写道：“大体上，**帝国主义** = (1) 银行资本，(2) 垄断组织（托拉斯等），(3) 瓜分世界。〔殖民地〕，(4) 银行（金融）资本同国家机器的同盟（联系、**融合**），(5) 集中的最高程度。”在这里，列宁显然地把银行资本放到了首位。随后，经过深入考察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英、法、德等国银行资本的形成史、以及“泰罗制”和“一般金融资本”的评述后，列宁在“笔记”的第200页上草拟了“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19个题目。我们从其前9个题目前头所冠的目次可以看出先后有所调整。列宁写道：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

题目：（大体上）

5. 1. 金融资本。
4. 2. 银行。
2. 3. 卡特尔和托拉斯。
3. 垄断。
1. 4. 集中和大生产。
6. 5. 资本输出。
7. 6. 殖民地。它们的意义。
8. 7. 殖民地的历史。
9. 8. 瓜分世界。

……。”

在这里，列宁起先还是把“金融资本”放在第一位，经过思索调整后，把原先放在第四位的“集中和大生产”调到首位上来，把原先第三位的“卡特尔和托拉斯”提到第二位，紧接着提出“垄断”这个范畴放在第三位，而把原先放在第一位的“金融资本”调到“银行”之后，列为第四、五位。在写完这19个题目之后，列宁又逐一地作了比较、琢磨和探索。紧接着，在“笔记”的第201页进一步作了如下的归纳：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内容。大体上，

- | | | |
|---|--------|---------------------------------|
| { | 1. I | 作为集中结果的垄断 |
| | 2. II | 资本输出（成为主要的） |
| | 4. III | { 瓜分世界 { (α) 国际资本的协议
(β) 殖民地 |
| | 5. IV | |
| { | 3. V | 银行资本及其“联系”， |
| | 6. VI | 暴力政策（关税；侵占等等） |

代替自由贸易及和平流通。”

在这里，列宁已经比较明确地认为，首先应把大生产、集中和垄断联系在一起考察，提出了“作为集中结果的垄断”这一经济范畴，来作为整个帝国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后来，在“笔记”的第239—255页详细拟定了关于《帝国主义论》一书的写作提纲。并在255—257页最后确定该书的“总纲和目录”时，列宁又先后写下了五种不同的纲目来进行比较研究。在这些不同纲目中，大体上都是比较明确地把生产的集中、垄断或托拉斯与卡特尔等，放在首位来考察。在其最后确定的第五个总纲和全书十章的目录中，列宁不仅明确地把“生产集中和垄断”联在一起列为第一章，作为《帝国主义论》的逻辑起点，而且在随后的几章中，列宁通过对垄断范畴的矛盾运动及其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系和过渡，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五个本质特征

及其历史地位，从而大体上勾画出整部《帝国主义论》的体系结构。

从上可以看出，列宁之所以确立以“垄断”作为《帝国主义论》的逻辑起点，这是他在对大量的经济事实和统计材料进行科学的抽象，并经过反复的探索、琢磨和比较研究之后所形成的最初的规定。《帝国主义论》中的“垄断”范畴同《资本论》中的“商品”范畴一样，二者具有同等的逻辑地位。它们都是作为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上最普遍、最常见、最基本的关系和“细胞”；所不同的是，在《资本论》中，“垄断”是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运动的一种必然趋势而出现的；而在《帝国主义论》中，“垄断”已成为现阶段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基础。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最一般的本质关系，包含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一系列特殊矛盾。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由低级向高级阶段转化的标志，而且决定着整个帝国主义的矛盾运动。也就是说，在《资本论》中作为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和逻辑体系的最高范畴的“垄断”，在《帝国主义论》中却成了新的逻辑起点和本质特征。它既反映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内在必然联系，说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或最高阶段；同时又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垄断”范畴成为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从而区分了以“商品竞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以“垄断”为本质特征的帝国主义，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因此，可以说，“垄断”范畴既是极度又是适度的抽象的规定，从而成为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也是构成《帝国主义论》的逻辑起点。

其次，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思维的具体中再现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及其矛盾运动的总体。

马克思指出，科学上正确认识事物的方法，可以概括为这样“两个阶段”或“两条道路”，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

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并指出其实质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②。而这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又必须是和现实的历史过程相符合。就是说，在抽象的逻辑进程中看起来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历史与现实，其逻辑内容是对客观的现实和历史过程的概括和反映，是现实历史过程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的再现。而现实历史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逻辑结构了。《资本论》就是以这种将历史在逻辑中反映出来的辩证思维方法所建构的一个“艺术整体”的典范。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正是继承和运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这一辩证逻辑方法，从“垄断”这个逻辑起点出发，继续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途径，在思维的具体中形成和再现了关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和瓜分世界等帝国主义的各种本质特征及其矛盾运动的基本范畴体系。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决定了垄断的产生；而垄断的产生，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垄断寡头又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发展到极端程度，使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在垄断的基础上更加尖锐化了。接着，列宁在资本主义矛盾的总体中，对垄断的不同的本质矛盾运动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从而逐一揭示和展现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本质特征。

第一，在工业生产中由于高度集中，特别是出现了联合制，就形成了垄断；而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又促进了银行业的集中。列宁具体分析了银行的结算业务、存放款活动、发行有价证券和参与制后，指出银行日益成为具有“万能性质”的垄断者。垄断带来的资本和货币的集中，加强了垄断巨头的作用和实力。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银行对工业生产的干预，使工业依赖于它，进而使银行与工业之间的普遍联系变成银行的真正垄断。于是，资本的统治形式，也就从一般的资本统治变为金融资本的统治。这个过程 的直接环节，就是从银行资本垄断生成为金融资本的过程。

第二，工业中的垄断和银行中的垄断相互融合和混合，便形成了金融资本。在这过程中，一小撮兼占银行和工业的垄断者成了金融寡头。列宁在概括这一过程时说：“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①在金融资本统治下，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生产资本相分离、靠货币资本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其它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特别是“参与制”的出现，通过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进行土地投机等手段，使金融资本的统治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渗透，以至直接控制了社会舆论工具和国家政权。因此，列宁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②。

第三，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要出现“过剩资本”，从而导致向国外进行资本输出。列宁指出，在20世纪初，资本输出急速增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通过争夺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攫取高额利润，干涉、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垄断资本的国外联系的扩大，各国大垄断组织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导致国际卡特尔的形成，从而使国内垄断发展为国际垄断，而国际卡特尔的形成，则是全世界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的一个新的更高发展阶段的标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82页。

② 同上书，第432—433页。

第四，随着资本输出而来的，就是对世界的瓜分，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进行重新瓜分。列宁认为，从金融资本的密网布满了世界各国的意义上说，资本输出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完了”。这种经济上的瓜分，随着彼此力量对比的变化，往往使各国垄断资本及各主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冲突更加激烈，从而导致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其结果，一是列强的角逐，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斗争发展到瓜分世界领土的激烈斗争；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开始了帝国主义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世界大战的历史时代。就是说，按实力对比瓜分世界是垄断资本必然要走的道路，是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基本国策。

第五，从垄断资本按实力对比瓜分世界的事实出发，列宁进一步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结论。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的生产方式本身就包括着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的实际内容。准备战争和从战争中发财，成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经济特征。列宁指出，金融资本瓜分世界，总是“由和平瓜分转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转为和平瓜分的”^①。而在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②

总之，在确立以“垄断”范畴为逻辑起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工业生产的集中和银行垄断的融合形成金融资本的统治、资本输出和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列强之间对世界的瓜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辩证分析，使“垄断”这个最初的抽象规定上升为内容丰富的具体概念。在《帝国主义论》的第七章，列宁把这一逻辑分析进一步总结归纳为关于“垄断”的五个基本内容：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造成的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8页。

② 同上书，第410页。

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的统治；（3）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它形成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矛盾运动的范畴体系。为了更全面、深刻地揭示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列宁紧接着又深入一步作了这样的概括：“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①在这个既是分析又是综合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中，列宁进一步引申出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②。这样，列宁便娴熟地应用本质总是通过现象向自己内部不断回复和深入的辩证方法，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

三、揭露时代“本质自身的矛盾”，确定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现象的矛盾只是事物内在本质矛盾的表现。辩证法在具体运用中，就是要不断深入地揭示事物本质自身的矛盾。列宁在从经济上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之后，继续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并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垄断基础上的深化。列宁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但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①列宁认为，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冲突和抗争，是“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②。垄断既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特征，也是帝国主义政治上腐朽的经济根源。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而且用历史辩证法剖析了新时代的经济同政治的关系，指出“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即指‘垄断’这个最本质的经济特征——引者注）……，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③，那就要进一步考察帝国主义的本质自身的矛盾的社会历史地位，和在社会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寄生的、腐朽的特殊现象，以及作为这种本质和现象之统一的现实。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及其以后的著作中，不仅概括了垄断的五个基本特征，从不同的侧面全面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各种矛盾，而且根据对帝国主义经济实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进而确定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时代基本特征。他指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

（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④就是说，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垄断引起了寄生性和腐朽性，导致垂死性，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这就决定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特征。

为了具体阐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揭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列宁深刻剖析了垄断必然引起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趋向。他说：“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

①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0—401、401—402页。

② 同上书，第4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69页。

的资本主义。”^①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等方面。首先，垄断使生产和技术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垄断价格使资产阶级获得高额利润，从而使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动因在某些程度上消失了；同时，垄断组织还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其次，出现了专门以“剪股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而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从而形成“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寄生、腐朽趋势已不仅影响了资本输出国的政治生活，而且在工人中间造成了一些“日益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阶层；第三，金融资本的垄断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其结果就是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腐败。对于垄断“必然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就连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如霍布森、格弗尼茨等人也都看到了，并做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等论著中，对他们的揭露作了大量的引证和评述。列宁当时把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上的腐朽趋势和政治上的全面反动，看作是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矛盾的特殊性表现来加以考察，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

列宁还深入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实质决定着帝国主义是过渡的，或者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开始”。他分析说：“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②，“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③。这就是说，在垄断阶段，由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由于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的作

①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5—436、4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71页。

用，社会生产的发展从总的方面来说，比以往任何历史时代都要迅速，生产社会化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同时，由于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都日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这就导致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日趋尖锐化。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越来越显示出其社会性质，另一方面是资本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小撮金融寡头手里。这个事实说明：“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①。列宁说：“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②最后列宁得出结论说：“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③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过渡性和垂死性的论断，直接为论证“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④提供了理论前提。当然，仅仅指出帝国主义的垂死性，还不能完全得出这个结论。为此，列宁认为还必须进一步从政治上、经济上深入分析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矛盾”所产生的两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即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他指出，帝国主义把战争作为恢复和实现垄断资本统治的一种手段包含在自己的政策中，而造成这一历史特点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就是垄断。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的根本经济属性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即从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下的竞争，从而在政治上也由“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变为“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军国主义”，而这并不是某个人的罪过，而是整个金融资本统治的必然的政治表现。所以，“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8页。

③④ 同上书，第437、330页。

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①。列宁正是从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矛盾”的发展，使自己的每个规定、质、特性不断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这一必然趋势，深刻认识到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会加速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到来。而帝国主义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垄断组织与国家力量的结合，这就是国家垄断组织的形成。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占有制的新形式。它扬弃了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的形式，但又以“总资本家”、“集体资本家”的身份，直接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生产资料为垄断集团服务。国家作为经济主体参与社会资本运动，使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更直接地暴露出来。列宁指出，国家的经济干预“并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相反地，资本家将更‘有计划地’攫取利润”^②。另一方面，它发展了工业国有化；发挥了对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分配、消费进行“社会调节”的作用；实行“计划化”，进行“最严格的统计和监督”等等。这一切都进一步造成了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列宁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③而帝国主义的“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④因此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总之，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垄断基础上的继续和展开，并从方法论上将矛盾的展开作为克服和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进行科学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经济形式的矛盾发展，就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历史道路。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36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8—219、218页。

此，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矛盾的分析，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及其每个质、特性向对立面转化的特点的辩证考察，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从而全面论证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这一科学结论。

四、科学评价《帝国主义论》的 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

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成功地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揭示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问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提出了新的结论并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从而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一著作问世七十多年来，世界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帝国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列宁的这一著作，它是否经住了实践的检验，今天还有没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应如何认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或腐朽性、帝国主义的过渡性或垂死性的论断？这些问题今天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我们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及其哲学方法论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已为后来历史发展所证实，因而不仅得到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赞许，也为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所肯定，至今仍然是多数学者分析资本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某些特点的分析、对帝国主义命运的某些具体论断，则应当用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作具体的科学的分析。

首先，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必须肯定列宁在世时和从列宁逝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使列宁的基本论断得到了验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帝国主义崩溃了，德国帝国主义也部分地崩溃了，法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也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几乎导致它的全面崩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既有

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同时也表现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发展的尖锐程度。大战的结果，使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使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起来说，20世纪前半叶中，社会主义已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出现在世界上，这就不仅打破了资本帝国主义的缺口，而且大大地缩小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地盘，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和面貌，使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得到了应验。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中期以来这40年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逐渐发生了一些马克思和列宁所没料到的变化。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总结汲取了本世纪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陷于危机和战争、从而触发了两次革命高潮的教训，开始注意调整自己的内部政策和对外关系，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其生产关系，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同时，资产阶级在福利政策、经济计划、意识形态斗争等方面，“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验，也起了较大的作用。这样，资本主义世界不但从战争灾难的废墟上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随着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较强的活力和继续发展的潜力，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出现了矛盾暂时缓解和相对稳定发展的状态。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曲折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第三世界的形成，使得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与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呈现出一些新的复杂情况，并导致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的较长时间的稳定局面的出现。这些都是列宁生前所没见到的。任何理论都有历史局限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当然也不会例外。显然不能要求列宁的每一个观点都适用于当前的世界。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把列宁的每一个论断都变成

永恒真理，而不去深入考察现代世界各方面巨大变化的教条主义的僵化态度，而主张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同时，我们也不应把现代世界变化的新现象绝对化，而不去分析当代过程与其历史成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一般发展规律，从而全盘否认列宁的基本论断的现实意义。那种认为列宁的结论只适用于帝国主义的开始阶段，甚至认为它从来就不是正确结论的观点，是一种轻率的、非科学的错误观点。

其次，对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的分析和论断，应从过去那种简单、片面和僵化的理解中解脱出来，用辩证的全面的观点来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我们认为，列宁在论证帝国主义腐朽性时，并不是像往常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指经济的停滞和下降这一种趋势，而是很辩证地考察和分析了“经济停滞”与“迅速发展”的两种趋势的交替出现。列宁坚决反对那种不加分析地抽象否定帝国主义的论点，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①列宁还针对那种认为资本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还可能迅速发展的僵化观点，辩证地分析说：“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②，甚至在某个时期还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③。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寄生、腐朽的趋势还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工业部门、某些国家中，这种趋势还会占上风。因此，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呈现为两种相互矛盾的发展趋势，即“增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70页。

的迅速和过度成熟”，“腐朽和新生”兼而有之^①。正是这种十分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既造成了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持续繁荣，也带来了它的停滞和周期频繁的经济危机。列宁的这一卓越分析，是科学认识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入到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的矛盾的重要成果。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从列宁学说的本质出发，战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而且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在战后有高速的增长，资本主义垄断所固有的腐朽趋势仍然是存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带有深刻的社会对抗痕迹，资本主义采用科技革命成果的反人道性质，及其有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后果，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现代条件下，资本帝国主义的寄生性的表现也日益强烈，而且产生了一些新的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外债，当代的“食利国”仅仅通过利息付款就可吸走发展中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资本家阶级越来越脱离直接的生产过程，而把管理生产的职能推给技术专家，从而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无用和寄生性。总之，现代资本帝国主义的腐朽停滞与迅速增长这两种趋势的交替出现，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规律性反映。只要深刻领会列宁关于两种趋势并存的论述，坚持用辩证观点看问题，就不会只看到资本主义经济还在迅速发展的一面，而无视甚至否定其腐朽和停滞的发展趋势。当然，也应指出，在列宁生活的时代，腐朽和停滞的趋势十分突出，而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趋势就不是那么突出了。

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论断，也不能像往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快死了的意思，而应从更全面、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和把握。在列宁生活的时代，甚至在列宁逝世后30年内，帝国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51页。

主义的确呈现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垂死状态，当时说它垂死，并不过分；今天的情况与当时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别，但即使在当时，列宁所谓“垂死”也不是很快就要死亡的意思。列宁曾多次说到“垂死”的真实含义是指“过渡”的意思。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草拟的《帝国主义论》纲目第十章第三点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或垂死的资本主义”^①。在《帝国主义论》第十章中，列宁明确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②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中，列宁更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③。显然，从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来看，“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包含着过渡性、长期性与曲折性这三层含义。就是说，从发展趋势上看，资本帝国主义必然要走向死亡，但这一“垂死状态”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迂回曲折的复杂发展过程。列宁后来在《修改党纲的材料》中，辩证地指出：“帝国主义是衰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④这也就是说，资本帝国主义必然要衰朽、死亡，但不会立即衰朽和自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自生”，但不能“自灭”，在一定情况下，它还会在“垂死”和“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延缓资本主义的崩溃”^⑤。

在列宁看来，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的。而指出这些矛盾，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7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9页。

⑤ 同上书，第480页。

短暂性，看到它要求过渡到更高级的形式的条件和原因。帝国主义之所以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就因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矛盾达到了极端和顶点，使旧的“繁荣的”资本主义变成走向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的开始。现代资本帝国主义的变化发展，不是违背而是遵循着马克思和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走向灭亡的规律进行的。战后垄断关系的形态在变化发展着，从个人垄断到国家垄断，并进而走向国际垄断，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资本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因此，尽管资本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必然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帝国主义必然要走向死亡的历史命运，是不可扭转的。

第三节 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诡辩论， 阐发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

列宁在运用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同时，还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批判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已“熟透了的机会主义”^①——社会沙文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种种谬论，深刻揭露了他们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党内左派的某些“过激偏向”，深刻阐发了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把战争问题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世界无产阶级制定了正确对待战争与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解决了现实斗争所提出的如何进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迫切课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61页。

一、在战争性质问题上，辩证法与诡辩论的根本对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列宁就先后在《社会主义和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论著中说，现在战争已经进行一年了，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特别要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并断定“目前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①。后来，在《帝国主义论》的德文版和法文版序言中，列宁进一步明确作出结论：

“1914—1918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②他还从辩证法高度提出了判定战争性质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只有引用“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分析“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而不是只看“战争的外交史”和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材料”），才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特别是其“真实的阶级性质”^③。

但是，那些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并已“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者，如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这些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却极力否认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不仅打着“保卫祖国”旗号，公然站到参战的这个或那个“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而且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的种种手法，炮制了诸如所谓战争“祸首”论，借口所谓“战争转化”论，或者文不对题地引证一些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合的个别历史材料，甚至歪曲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为他们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进行辩解。列宁痛斥了他们背叛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2、324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25、326页。

产阶级革命利益，竭力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种种谬论，及其玩弄折中主义诡辩术的反动实质，阐明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原则区别，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首先，列宁指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①因此，如果不把战争同有关国家、有关的国家体系、和有关阶级在战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难道能够说明战争吗？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大强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又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植的。因此，我们要了解现代战争，首先就必须对欧洲列强的全部政治作一个总的观察，从欧洲各国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中抓住整个欧洲国家体系的全部政治，才能了解这个体系是怎样不可避免地造成这场战争的。如果不揭示这场战争同战前政治的联系，就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战争。据此，列宁认为这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战前所实行的掠夺殖民地、压迫弱小民族、镇压工人运动等反动政治的继续。通俗点说，这次战争就是两伙强盗分赃抢劫和掠夺的继续。因此，“很清楚，这两个强盗中究竟哪一个先拔出刀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②这也就是说，决不能用追究“谁先挑起战争”的责任问题，去抹煞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用战争的“民族性”和所谓“保卫祖国”的口号，去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说：“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85页。

发展和阶级斗争。”^①但是，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却任意抽取“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句话作为“论据”，说什么为了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他们借口追究所谓战争“祸首”，而拒绝对各交战国的经济、政治及各种因素的总和作全面的分析。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许多民族的压迫，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为分赃而进行的竞争，资本分裂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意图——这一切都一下子从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视野中消失了。虽然他们自己在战前数十年中所描写的正是这种‘政治’。”^②这样，他们便公开站到“投靠”本国资本家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鼓吹“大家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还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护国主义”和“真正的国际主义”^③。

列宁痛斥了这种“极端庸俗的”绝妙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所谓“革命的护国主义”和“真正的国际主义”，说穿了就是为这种行为作辩护：为了“保卫祖国”而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④其罪恶目的就是掩盖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实质上是为捍卫这些或那些帝国主义“大国”掠夺殖民地或压迫异族人民的“权利”。列宁尖锐指出，这种战争“祸首”论和所谓“保卫祖国”的论调，可以说是“最鄙陋的理论”和“陈腐庸俗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然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们却“也要狡猾地引用‘辩证法’来粉饰一番”。因此，列宁愤怒地抨击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⑤

其次，列宁指出，“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①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4页。

②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6页。

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①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我们要善于区别各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既有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又有反侵略反压迫的民族解放战争，还有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要懂得战争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必然联系；同时还要看到各种不同的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而且能够相互转化的。在这里，关键在于条件，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谈战争的转化问题，就会走向荒谬。

社会沙文主义者接过战争能够转化的口号，离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历史条件，抓住交战国都有“民族性”这一表面相似之处，抹煞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本质差别。考茨基虽然没敢干脆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但却宣称什么战争既有帝国主义的性质，也具有民族性质。即对各国资产阶级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对各国劳动人民来说则是民族性质的。他还居然训斥说什么，把战争性质说成是纯粹帝国主义的是非常荒谬的，并吹嘘说他这个结论是辩证地援引了“纷繁复杂的现实”而得出来的。

列宁在批判考茨基冒充辩证法的诡辩手法时，首先揭穿了考茨基在所谓“纯粹的”概念上冒充辩证法的骗局。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②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以欺骗人民时，考茨基却大肆喧嚷什么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63页。

这只能表明他“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①。其次，辩证法在观察现实问题时，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而必须从整个时代的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全局出发，从决定事物性质的最主要之点着眼。列宁分析说，在这次大战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奥塞战争的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因为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即对于目前战争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政治的继续”；而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为此，列宁说：“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②

社会沙文主义者还有一种辩解，说什么战争最初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开始以后就转化成为民族性质的了。他们离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谈战争的转化，认为帝国主义战争能够而且已经转化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这完全是一种诡辩术。对此，列宁尖锐指出：“辩证法变成了最卑鄙最下贱的诡辩术！”^③

“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作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办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53页。

③ 同上书，第252页。

体分析。”^①但是，列宁也并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绝对不可能转化为民族战争。他列举了在如下条件下，比如说欧洲无产阶级若还要软弱二十年之久；或者说这次战争的结果，是拿破仑那样的人获得胜利，并且奴役许多有生命力的民族和国家；如果再加上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和美国）也能维持二十年之久（例如美日战争），而没有转入社会主义，那么，在整个欧洲发生伟大的民族战争，就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②

再次，列宁在揭露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运用诡辩论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错误时，还着重指出，他们往往只抓住事物的表面相似之处，否认事物内在的有机联系。辩证法要求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要求深入抓住事物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反对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随意性；而诡辩论者则往往离开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联系，只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随意地抽取事物的某些表面相似的片断，人为地把它们硬凑在一起，来证明自己“需要的”结论。因此，列宁说，“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甚至“歪曲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作为自己的‘王牌’论据”^③。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援引马克思对1870年战争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连施、大卫之流，援引1891年恩格斯关于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时德国社会党人应当保卫祖国的声明；而那些想调和国际沙文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考茨基类型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援引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斥责战争，可是在1854—1855年、1870—1871年和1876—1877年，每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等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37页。

列宁尖锐指出，援引这些与当前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的历史事例来作证，这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歪曲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最卑贱的诡辩手法。他们上述所指的以前这些战争，都是资产阶级多年来的民族运动即反抗异族压迫和专制制度的运动的“政治的继续”。把这种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同当前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义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一样^①，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事。列宁极其愤慨地说，社会沙文主义者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态度，把对资产阶级进步的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评价，搬来评价现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忘记了马克思恰恰针对资产阶级反动垂死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令人愤慨的歪曲”，而且是“对真理的嘲弄”，是“为了讨好资产阶级”^②而替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最后，列宁在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所玩弄的种种诡辩手法时，不仅从政治理论上痛斥了他们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反动实质，而且从哲学世界观上深刻剖析了诡辩论的本质特征及其认识根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时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科学实践和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验证，逼得社会沙文主义者不得不采用貌似辩证法的折中主义诡辩手法，把诡辩论变成一种虚伪、圆滑、狡诈的、似是而非的诡辩术，使人们在不易觉察的形式下，接受社会沙文主义的谬论。

列宁通过剖析在战争问题上折中主义诡辩术的种种表现形式之后，进一步戳穿诡辩论实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8页。

② 同上书，第332页。

方法的另一变种，其基本特征有三：一是离开观察的客观性和全面性，主观随意地运用辩证法，使辩证法与唯物论相脱离，把客观的辩证法变成了主观主义的诡辩手法。列宁指出，他们用诡辩的方法东抽一条、西凑一条，“到处在玩弄‘辩证法’这个名词，对它的了解却非常庸俗。没有丝毫的全面性。”这“不是辩证法，而是诡辩术”^①；二是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他们把两种“色彩”、两个极端毫无原则地“调和”起来，搞“中庸”之道，“缺乏清楚、肯定、明确的结论”，因而，就像“泥潭派”的“回转器”和“风向仪”那样“摇摆不定、毫无原则”^②；三是主观地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即把反映客观矛盾的概念的对立统一的灵活性，当作主观技艺，随心所欲地加以玩弄。正如列宁在谈到对概念的灵活性的两种运用的根本区别时所指出的，“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③列宁这段话，不仅对诡辩论的实质及其认识论根源作了深刻剖析，而且阐明了辩证法和诡辩论的本质区别，划清了两种方法论的原则界限。

列宁认为，用折中主义的诡辩论来冒充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形而上学的新变种”。它比公开的形而上学以及庸俗进化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彻底揭露和批判这种貌似辩证法的诡辩论，是新时代给列宁提出的新的战斗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时，主要地是跟公开露骨地反对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只在个别场合揭露过诡辩论。而列宁在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先是批判了伯恩斯坦以直接公开形式来对抗辩证法的庸俗进化论；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便着重揭露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所玩弄的折中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877、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91页。

主义诡辩术，对诡辩论这种貌似辩证法、玩弄辩证法、极力歪曲辩证法革命实质的形而上学的恶劣形态，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批判。这不仅是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经验的总结，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同时，也是对辩证法思想史的总结，是列宁对辩证法科学的一个新的理论贡献。

二、深刻阐明战争与革命的辩证转化

在战争“转化”问题上，列宁不仅痛斥和批判了打着“转化”的幌子，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的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时，也严肃批评和纠正了否认战争转化可能性的社会民主党内左派的“过激偏向”，正确地分析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形势。当时，第二国际中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左派领导人（主要有蔡特金、梅林和卢森堡等人），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中，为了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的叛卖行为，曾发表了一本署名“尤尼乌斯”的论述战争问题的小册子。这本书与其说是阐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

（该书书名——引者注），不如说是分析战争，驳斥那些关于这次战争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奇谈怪论，证明这一场战争无论从德国或其他列强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就这个意义上，列宁肯定这是一本“写得非常生动的小册子”，“总的说来，是一部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①但它在一些重大理论原则和策略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错误。他们不仅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否认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列宁于1916年7—9月专门写了《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及时批评和纠正了他们这两个过激的错误偏向，并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2页。

代民族解放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革命性，进一步提出和论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阐发了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

首先，列宁剖析了尤尼乌斯的第一个错误论点，即认为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了。列宁指出，这是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因此当他们因看到有人胡说这次战争是民族战争，便错误地否认任何民族战争。就是说，他们在强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而发生了“偶然偏激”，“说了过头话”，错误地把对这次战争的估计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

列宁在纠正尤尼乌斯这个错误观点时，着重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进行的民族战争不仅很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①在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这种政治的继续。列宁还分析说，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虽然“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的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但这个“时代”丝毫不排斥小国反对帝国主义强国的民族战争，正如它不排斥东欧大规模的民族运动一样。因此，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一切可能，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②。

列宁在充分肯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同时，也预计到这种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 “需要被压迫国家众多居民（我们举例提到的印度和中国就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6页。

② 同上书，第87页。

有几亿人口)的共同努力”;2.“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特别有利的配合(例如,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大伤元气,由于彼此打仗和对抗而无力进行干涉,如此等等)”;3.“需要某一 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并强调指出最后这一个条件,“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最理想和最有利的”^①。列宁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条件和所作的预计,为后来的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在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下,在德、匈、意、美、英和东方各国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所证实。

接着,列宁着重分析了尤尼乌斯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即否认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对付入侵的最好手段,这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半,他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步之后,马上又偏离了这条道路。”^②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应该说,阶级斗争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最好手段,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不是一个国家)避免入侵的危险。”^③列宁说,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这个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只是他们由于“害怕分裂”而“害怕彻底说出”这个革命的口号的全部的真理。

其实,早在1914年9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列宁就在《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中明确指出:“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④现在既然战争已经成为事实,那就不管这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页。

②③ 同上书,第1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8页。

转变会遇到多大困难，也决不能放弃为实现转变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准备工作。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列宁进一步分析说：“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①。而如果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会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背弃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尤尼乌斯却不理解在残酷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条件下，资产阶级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但却又以“民族”观念来极力掩饰其掠夺目的和战争的反动性质，因此尤尼乌斯不懂得战时的一切彻底的革命斗争，一切认真执行的“群众行动”的策略，都必然要引向这一步，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无疑，革命是不能“制造”的，而必须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列宁认为这是说得完全对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革命已经提上了日程，“革命潜伏在战争中，并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因此，“在战争时代，没有反对反动透顶的、罪恶的、使人民遭受无法形容的灾难的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②，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说，当前这场反动的掠夺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挑起的。战争不是儿戏，它带来了最尖锐的危机，战争使千百万人遭受牺牲，它空前地加剧了群众的灾难。正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合理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因此，列宁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鼓吹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强调说，要结束这场战争，只有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战争必将导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①。如果“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②。这就是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

最后，列宁还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辩证法的高度，阐发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的辩证关系。他说：“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③这样，列宁便不仅深刻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革命性，而且进一步阐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发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内革命战争，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社会主义而战”的根本途径。

列宁对尤尼乌斯在战争转化问题上所犯的两个错误进行严肃批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彻底冲破“考茨基的虚伪、学究气、对机会主义者的‘友好’这些卑鄙东西”的“包围”，坚定不移地起来“同考茨基主义作战”，并且“能够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同时，列宁还郑重声明：“在对尤尼乌斯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以前，我们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评”^④。因为普列汉诺夫这班先生正在对尤尼乌斯的错误“幸灾乐祸”，并利用他们由于“偶然偏激”而犯的错误，来诽谤“整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所以严肃批评和纠正尤尼乌斯的错误，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正是为了“直接的反击”社会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98、100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94、89页。

④ 同上书，第2页。

文主义者的“诽谤”，以便彻底戳穿这一伙“为了向资产阶级献媚”而背叛无产阶级的丑恶嘴脸。为此，列宁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严肃批评和纠正左派同志的缺点错误；与此同时，主要锋芒还是放在揭露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

列宁批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存在的一个“主要缺点”，就在于对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只字未提”。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第二国际首领中出现了“公开的”机会主义派（普列汉诺夫、列金、大卫等）和“暗藏的”机会主义派（考茨基之流）。列宁批评尤尼乌斯不去阐明这两个派别的意义和作用，那就“既不能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也不能克服它”^①。并反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②

进而列宁深刻剖析了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两种机会主义态度及其共同特点。他指出，现在，在所有的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一个是普列汉诺夫、列金、大卫、谢德曼为代表的露骨的机会主义派别，他们“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打着“保卫祖国”和“革命护国主义”旗号，同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另一个“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的隐蔽的机会主义派别，即考茨基主义者，“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的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③。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发展，这种隐蔽的机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秘密联盟逐渐变成公开的联盟。于是，他们几乎全都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变成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还概述了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页。

②③ 同上书，第93、94页。

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①。他们极力“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②。因此，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③，以至于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他们居然可以“既是在原则上为主张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辩护，又是嘲笑——在战时书报检查官的允许下——宣传和准备革命的行动。”^④列宁说，这就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针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些机会主义喧嚣，列宁强调不仅要同“回避革命”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机会主义（考茨基主义）进行总的、全线的斗争”^⑤，而且必须到更下层和更低层的真正群众中间去，“向群众说明必然而且必须同机会主义分裂，通过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来教育他们进行革命”，教育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休战交替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⑥列宁在总结批评尤尼乌斯否认战争转化的错误和痛斥社会沙文主义者用“保卫祖国”来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过程中，进一步概括出一个基本结论：“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无产阶级反对保卫祖国，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掠夺、奴役和反动的性质，是因为有可能和有必要用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并竭力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⑦。列宁说，我们对帝国主义时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94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34、335、362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54卷，第264页。

⑥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4、第9页。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作出的“提法是唯一正确的”^①。

总之，列宁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局势，在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和纠正左派同志“过激偏向”的错误过程中，运用革命辩证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论证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为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利用战争造成的革命危机，发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指明了具体的途径和根本方向，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同时，列宁对诡辩论的揭露和批判，不仅从理论上划清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原则界限，而且揭示了如何在正确运用辩证法过程中，来丰富和发展辩证法的理论。

第四节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与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

列宁从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出发，不仅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具体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口号，从而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途径。然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究竟将从哪里开始？资本主义战线首先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应该如何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这些问题自然被提到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来。列宁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有关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资料及对这些资料所作的科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这一“必然的结论”。就是说，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9页。

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基础上的。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考察这一规律的由来及其内容；同时，还要揭示这一理论所蕴涵的革命辩证法思想，并阐明它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就已经发现，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各部门以至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企业兴旺发达，另一些则破产倒闭；一些部门迅速扩展，另一些则停滞衰落。在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得更为明显。一般说来，后起的资本力量（不论是企业、部门或国家）可以避免在原有生产内部积压大量投资，直接利用最新科学成就和先进的生产设备，采取新技术、新工艺，推动固定资本更新和扩大，增强扩大再生产能力，经济发展迅速增长，并往往超过原来领先的资本力量。而原先占优势的资本力量，往往由于在原先规模庞大的工业部门积压着大量资本投资，阻碍了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经济发展速度便相对缓慢，甚至经不起周期性危机的冲击。不过，在自由竞争阶段，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比较平稳，一些工业部门要赶上另一些工业部门，一些工业国要赶超另一些工业国，需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自从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大大加快，大垄断组织在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在垄断基础上的竞争更为激烈，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这种情况到了帝国主义普遍发展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为尖锐。一些原来相对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是跳跃式的，它们在经济上迅速接近，赶上甚至

超过原来先进的国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中，曾详细考察了当时电力工业和煤油工业集团以及商船航运业、国家钢轨卡特尔等企业发展情况，认为列强分割世界并重新分割世界是由于实力对比变化和实力发展的结果。“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他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①，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②。

列宁还通过研究世界殖民史著作的大量材料，特别是深入研究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英、俄、法、德、美、日等六国的殖民地领土扩张“非常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在上述6个国家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年轻的进步非常快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德、日）；另一方面有近来进步比前面几国慢得多的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另外还有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著中，也都估计到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指出19世纪建立起来的各个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与建立这些帝国的民族在欧洲所占的地位不相称的。它们要使自己的世界政治地位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相适应，便要进行殊死的斗争，以至大动干戈，发动战争。正如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所总结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④

从上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1、376、39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6页。

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固有的现象，是商品生产的资本本质的表现。因此，在写《帝国主义论》之前，列宁就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①在写此书之后，列宁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②

根据以上列宁对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规律的历史作用，及在这种历史作用下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深刻分析，可以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本内容，大体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在帝国主义阶段，一些国家的发展相对缓慢以至停滞，另一些国家则发生“跳跃式、剧变式”的发展，超过了原来先进的国家；

第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相互变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要使自己的世界政治地位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协调起来，于是便竭力诉诸于经济实力政策，谋求强权政治，造成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谋求世界霸权和强权政治是垄断的本质，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作用下，可能使原先不很强盛但发展迅速的后起国家易于排斥比较强盛的老牌帝国，从而引起按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的军事冲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6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6页。

第四，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军事冲突，把全世界卷进战争灾难。而由于垄断下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则使资本帝国主义战线遭到削弱，使帝国主义国家陷于分裂，并会造成某些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从而使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比任何时候都更无力地暴露在革命攻势面前；

第五，这样，无产阶级便有可能在一个或几个薄弱环节，相继冲破帝国主义链条而发动革命。这个革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和第二国际的分裂，不可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统一行动，而只能是在某一个或少数国家先后相继行动，逐一地在个别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二、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蕴涵 着丰富的革命辩证法思想

列宁非常欣赏并经常引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一句名言：“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以表明他对辩证法的社会意义的深刻理解。列宁把辩证法运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研究，其最重要、最新的成果就是，从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阐明了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在帝国主义时代为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和道路。“一国首先胜利”新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而且蕴涵着极其丰富的革命辩证法思想。

首先，关于历史必然趋势中可能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的分析。

“一国首先胜利”理论的提出，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依据“链条的强度决定于最弱一环的强度”^①这一辩证法思想。列宁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00页。

应用这一辩证的方法来剖析帝国主义“本质自身的矛盾”，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不严密的整体”，它内部的竞争、冲突和危机恰好不断地给自己造成易于被冲破的薄弱环节，从而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相继突破这些环节，逐一地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就是说，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帝国主义的历史本身就包含着资本“向自己的对立面发展”的趋势。它孕育着未来，但它还不是现实，而是以一种可能的形式向他们展示未来的方向。在这里，列宁把“可能”这一范畴包括到“规律”中，来阐明历史的必然趋势。这是列宁的一个独特贡献。

列宁非常重视历史必然趋势中可能与现实辩证关系的考察与研究。黑格尔曾说过，可能取决于“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现实在自己的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并肯定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指出：“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 = 辩证认识的本质。”^①这就是说，按照辩证的认识，只有实在的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并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列宁把它运用于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研究，指出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的灭亡是一种必然，而这种灭亡又可能以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形式开始，这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或实在的可能性。列宁的功绩就在于他成功地发现了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而历史的必然性就正是在变现实的可能性为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同任何社会政治经济规律一样，都是作为历史发展趋势起作用的。趋势包含着必然与可能，即包括为必然开拓道路而又与必然相互交错的那种实在的可能。在实践中指出这种实在的可能，比一般地认识必然更为重要。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就是这样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在列宁看来，当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32页。

“绝对规律”被揭示出来之后，只有靠不断地揭示这种实在的可能性，才能在现实的社会实际生活中坚定地为历史必然开辟道路，走历史必由之路。这就是活生生的实际运用的辩证法。

列宁不但通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现了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的实在可能性，而且联系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现实可能性。1917年春，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具体阐发了俄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问题。接着，在“四月代表会议”和“关于修改党纲的决议”等材料中，强调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估计，要联系日益迫近的社会主义革命。并着重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沙俄帝国主义“根本不是严密的整体”^①，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占统治地位，但“还有许多地区和劳动部门在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②状态，这是它落后、软弱的表现；同时又由于它在历史上的发展较晚，跟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相比，它虽远远落后了一个世纪，但它又很快进入了垄断阶段，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和银行，等等。因此，同样具有一般帝国主义把竞争和垄断结合起来所造成的崩溃的情势。就是说，俄国社会机体的这种不严密性，已构成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加上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沙俄帝国主义进一步加深了它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使其“薄弱环节”的脆弱性更日趋明显地暴露出来。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反映革命中出现了一个动荡的过渡时期，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关键时刻。这一切，使得俄国不仅集中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而且也集中了它自身历史的最大矛盾。在这种情势下，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来说，它在“大难临头”中是“没有出路”的，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其出路就是必须果敢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0页。

在十月革命前夕发生的俄国“七月事变”，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造成了俄国最深刻的“政权危机”。它不仅更加坚定了觉悟工人为革命牺牲的决心，而且迫使最落后的群众也卷入了反现存政权的总冲击运动之中。这就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环节又重重地加了一锤。列宁说，现在，在俄国“‘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①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这种情况是当时欧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没有的。

列宁这种紧密联系俄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的现实可能性的研究和发现，充满着对历史矛盾集合的偶然性向历史必然性的辩证转化的深刻分析。它为正确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有科学依据的社会预见。

其次，关于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的分析。

前面谈到，在《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中，列宁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怎样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准备了物质前提，同时又预见到随着帝国主义阶段所特有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必然会发生各种危机和战争，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但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究竟在哪些国家、在什么时候爆发，这还取决于各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情势，取决于革命的形势和革命阶级本身的力量。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深刻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64页。

加剧。(3) 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去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①列宁说,以上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做革命形势,如果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②

但是,并不是说具备了革命形势,革命就会立即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辩证地分析说,“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发生革命”③。就是说,革命要爆发并取得胜利,还取决于革命阶级本身的主观力量的强大。这包括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他们能不能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有组织的大军向反动阶级进攻,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路线,并实行对本阶级和其他群众的领导,等等。这些革命的主观因素集中到一点,就是“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④列宁认为当时俄国已经具备了这些西欧各国所没有的特殊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

列宁对于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辩证关系所作的深刻分析,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客观变化和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状况的科学概括。在当时,列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恰好跟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状况是成反比的。他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问题,马克思说过,“法国工人开始,德国工人完成。”而现在“开始革命的巨大光荣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头上”⑤。就是说,俄国已经形成了对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的决定性打击力量。这就是以布尔什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30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39页。

维克为领导的俄国革命无产阶级，它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总结了俄国 20 世纪三次革命的教训，在政治上锻炼得更加成熟，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了高度统一，因此它有决心和能力来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样，便形成了强大的决定性打击力量，来突破帝国主义整个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沙俄帝国主义。俄国之所以是“最薄弱”的环节，既决定于这一“环节”本身的客观脆弱性；同时也取决于这个“环节”的主观力量的强大。列宁正是基于这种革命辩证法的深刻认识，坚信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定会战胜世界资产阶级。

第三，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同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水平关系的辩证分析。

对于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最终的理论论证，必然要提出和回答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列宁不但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运用历史的辩证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论证。

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都一再断言俄国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俄国没有具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认为社会主义动力应来自西方，否认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获得胜利的可能性。他们的主要论据就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

“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了。”他们“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这个所谓“有决定意义的论点”。苏汉诺夫是俄国的政论家，早期参加民粹派，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作。他在 1918—1921 年写了七卷本的《革命札记》。在《札记》中，他继续重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背得烂熟”的那一条“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指责列宁提出的“一国首先胜利”论，没有对俄

国客观条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坚持认为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①。

列宁认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们和俄国党内的反对派，包括苏汉诺夫等人的这些论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他在驳斥这些论调的过程中，运用历史的辩证法，对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同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作了完备的科学论证。

首先，列宁强调必须以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水平作为出发点，而不能仅仅囿于一国而论。在《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中，列宁正是遵循辩证法关于“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②的原则，根据“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引用“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③及“驳不倒的综合材料”^④，来说明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帝国主义根本不是严密的整体”^⑤。就是说，资本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它在各国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各不相同”。比如，在俄国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统治地位，但它还保存着“资本主义以前的旧制度的许多残余”^⑥。这是它落后、软弱的表现，而这又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整个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因此，列宁认为，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就某一落后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当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否则就不可能发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恰好可能在这些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首先被突破，这正是革命发展的辩证法。当然，在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325—326页。

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480—483、485页。

个总进程中，一个国家的革命形势能否转变为革命的直接行动，如前所述，还取决于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和先进阶级及其革命政党主观上有无决心和能力来领导革命。列宁认为，俄国当时已经具备了西欧各国所没有的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特别是因为“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①。他问道：“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吗？^②

其次，列宁指出应当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条件区别开来。针对考茨基和苏汉诺夫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明”和“一定的文化水平”的论点，列宁反驳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③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反而以此为前提。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在于把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和文化条件，放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来创造。革命者不能取消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客观要求，但可以改变个别历史发展阶段的顺序，并以这种改变来为创造上述条件提供前提。列宁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就是“此岸世界的真理”。然而，那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先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这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却一窍不通。他们“迂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根本不了解马克思说的“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④这一重要指示的深刻意义。

①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0、371、372、369页。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新贡献

在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还没有也不可能发现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某个国家内胜利。他们当时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以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从“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的估计，作出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①结论。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呢？”这一问题时，进一步明确指出：

“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②接着，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进一步强调说，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③直至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虽然也曾提出过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少数国家首先进行的思想，他寄希望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指日可待”，可以“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但他仍然强调：

“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作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单独在一国内发生并取得胜利的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同上书，第221页。

③ 同上书，第27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论，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还没有出现垄断和腐朽的趋向，那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还不那么显著。因此，他们的论断是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客观情况和历史特点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后来建立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都是以各国共同发动革命、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或少数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观念。

但是，当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被发现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的分裂，给各国同时发动革命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伟大的辩证论者，列宁并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结论和当时流行的观念，而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历史特点，大胆地做出新的结论。他一方面考虑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但是，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垄断的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加重，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遭到巨大困难”。这样，革命将从哪里开始？资本主义战线首先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究竟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发动并取得胜利？列宁根据他所掌握的大量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资料及对这些资料的辩证分析，敏锐而果敢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首先开始，而可能在资本主义“比较弱的”国家开始，并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①。这是列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所作出的一个划时代的新贡献。

列宁提出的这一新结论，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8页。

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个重大贡献，而且也是对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因为这一新结论使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了。它指明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道路。当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固守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陈旧观点，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陷于分裂的情势下，便只有放弃革命，坐待将来同时发动时机的到来。而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没有被这种陈旧的观点捆住手脚，毅然果断地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新观点，极大地解放了革命人民的思想，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并直接为后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了列宁的这一新结论是正确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宁还根据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指明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方向。他说：“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①。他还预见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来更多的特殊性”^②。列宁这里所阐发的观点，以后不仅为世界各国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证明。根据列宁的思想，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无疑将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我们难以预测其时间的漫长和曲折的程度，但可以断定它将经历一条一个·个国家接着另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而开辟这条道路的功绩，无疑是属于列宁的。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0、372页。

第五节 对国家与革命理论的 辩证考察和系统阐发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促使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使各交战国内部的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正在显著发展。在俄国，1917年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认为，这次革命“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①。但二月革命胜利后，政权却逐步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临时政府加紧对群众的镇压，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日趋成熟。这样，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如何对待国家的问题，便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又极力歪曲、篡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因此，列宁指出：这个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②

为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写了《哲学笔记》、《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并完成《帝国主义论》一书写作之后，紧接着，于1916年秋冬至1917年初，又转而潜心研究关于革命与国家的关系这一更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写下了“关于国家问题的蓝皮笔记本”（即列宁自己题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1917年8—9月间，列宁又充分利用这个“蓝皮笔记本”的材料，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代表作。在这些论著、笔记中，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历史地考察了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驳斥了当时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误解和歪曲，恢复了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页。

② 同上书，第1页。

它的本来面目，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从而，不仅为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科学体系和指导革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为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列宁系统研究国家问题和写作

《国家与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列宁“关于国家问题的蓝皮笔记本”，写于1917年1—2月。当时，列宁在苏黎世精心研读并摘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他与此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论述，并且作了许多重要的批语和评注，还从中发掘、引申出一些重要结论。列宁还摘录了考茨基的两本著作，特别是他跟潘涅库克论战的一些材料。列宁对所摘记的这些文章、书信和著作（共有30多件），反复进行了研究、琢磨和探讨，并将这些笔记整理、装订成册，自编了目录，还在笔记的封面上题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在此之前，在1916年秋冬，列宁还阅读并摘录和批注了布哈林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等两篇文章，并打算针对布哈林的某些错误观点，写一篇《关于国家作用问题》的文章，还初拟了论文提纲。但后来在广泛收集材料，特别是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后，列宁的想法有了改变。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谈到他得出的结论，与其说是和布哈林的见解不同，不如说是跟考茨基的观点针锋相对。在列宁看来，尽管布哈林“不但没有揭露考茨基主义者，反而以自己的错误帮助他们！”^①不过，列宁还是认为“从实质上看，布哈林比考茨基更接近真理。”^①后来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便反映了列宁这一思想的改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57页。

列宁的这部笔记非常重要，实际上是为后来写作《国家与革命》准备了材料，奠定了基础。他自己也十分重视这部笔记的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在1917年7月5日前，列宁在致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谈到：“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关于《马克思主义论国家》”^①。他说：“这个笔记本封面是蓝色的，装订过。我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摘录，以及考茨基反驳潘涅库克的著作的摘录都收在里面，并且还作了批语、评注，下了定义。”列宁强调，“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连考茨基也搞得混乱不堪。”^②列宁的这部笔记中蕴含着的许多深刻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直接继承、捍卫和发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生动运用和发挥。它连同列宁写的《哲学笔记》及《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通称“三大笔记”，可以说是构成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库，对于我们研究列宁是怎样运用和发展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就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写完之时，即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但革命胜利后，却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1917年4月，列宁途经德国回到国内。他先后在著名的《四月提纲》《远方来信》《论两个政权》和《论策略书》等论文中，冷静地科学分析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③。并根据当时临时政府暂时还“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认为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他反对用“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冒险行动来取得单一政权”，而主张“用启发无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④，通过和平途径，有组织有步骤地“使一切政权归苏维

①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6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133—134页。

埃”，从而逐步地去夺取全国政权。但到“七月事变”之后，资产阶级独占了政权，并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群众，他们还下令缉捕列宁。这时，列宁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他及时指出，现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消失了，并号召和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一般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了最迫切的意义。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于1917年8—9月间，秘密转移到俄国与芬兰交界的边境地区拉兹利夫湖畔的一个草棚里，在十分艰险秘密的境况下，开始着手撰写《国家与革命》。为此，列宁还特地请人把年初写的留存在斯德哥尔摩的那本“关于国家问题的蓝皮笔记本”以及马、恩的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俄文版）等，送到拉兹利夫来。我们从列宁当时草拟的有关《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几份提纲和纲要，划分章次的几种方案，特别是最后确立的全书结构和目录，跟“笔记”中有关材料的页码编目间的联系^①，可以看出列宁是充分利用了年初所写的那本“蓝皮笔记”中的材料，说明这本《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正是为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所提供的材料准备工作。

从列宁研究国家问题的“笔记”和《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可以看出列宁研究革命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采取了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体现出以下一些极其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第一，强调要从时代的特征和革命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国家与革命这一最现实、最迫切的时代课题。当时正在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帝国主义战争，不仅造成空前的惨祸和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各帝国主义的国家正在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密切地溶合在一起，从而日趋走向反动。因此，帝国主义战争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23—246页。

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方面和政治实践方面的意义，而且具有了最紧迫的现实意义。列宁正是从这一迫切意义上，严肃提出并着手研究革命对国家的态度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第二，为了揭露考茨基机会主义者“忘记、抹杀和歪曲”马克思国家学说“革命灵魂”的卑劣行径，以“恢复”马克思学说的本来面目，列宁强调必须采取“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并按照历史的顺序来考察他们的全部观点及其发展的科学方法。列宁说，虽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①。因此，列宁在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是他在“笔记”中所摘录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②，并强调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不仅“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③，而且能够独立地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④。

第三，贯穿在“笔记”和《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列宁在阐发和概述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发展过程时，一再指出：马克思是始终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进程来做出客观的科学结论，并且严格依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修改过时的结论，提出新的论断。列宁自己也正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来研究考察时代的发展，总结国际和本国的革命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作

①②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了多方面的发挥和新的理论概括。

二、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及国家消亡 与暴力革命的相互关系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把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考察，阐明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国家，是怎样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存在、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指出，人类社会最初并没有国家，而是在阶级出现之后，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才出现了国家。恩格斯在阐述国家的起源时说过，“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面”^①情况下才产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内，肆意篡改恩格斯的这一著名原理，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列宁揭露了这种“市剑的庸俗的调和论”，强调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②列宁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 and 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深刻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了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③因此，尽管国家在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采取了超阶级的姿态，起着抑制和缓解阶级矛盾的作用，但它在本质上不是中立的阶级调和的机关，而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④。国家通过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和缓解阶级冲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4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6页。

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从而使这种阶级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因此，国家必须是有阶级性的，它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强大的阶级的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而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特殊的武装队伍”，即常备军和警察，以及法庭、监狱等主要强力工具。列宁说，“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①这就从实质上说明了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列宁考察了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制度日益完备和严密，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日益强大，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本质并没有变。无产阶级面临着的是历史上最完备、最强大的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列宁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迷信”和粉饰，根据大量历史事实，进一步阐发了恩格斯的思想，强调指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②。列宁痛斥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机会主义者散播的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东西”等“荒谬想法”的“全部荒谬性”。他指出：“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③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本质，特别是彻底戳穿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阶级实质。

列宁还进一步捍卫和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与暴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3、12—13页。

③ 同上书，第18页。

力革命相互关系的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论著中，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了国家的产生和消灭问题，详细地分析了国家最后消亡的历史条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被废除”，而是“自行消亡”的重要论断。考茨基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这一原理“粗暴地歪曲”为资产阶级国家也会“自行消亡”，以便极力否认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

列宁在揭露和批驳这种“粗暴的歪曲”的斗争中，从以下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和暴力革命相互关系的原理，进行了精辟的阐发。第一，恩格斯所讲的国家“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或“半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第二，从恩格斯关于“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这一出色而又深刻的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即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第三，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就是说，民主也是国家，因此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作为最完全的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则只能“自行消亡”；第四，恩格斯提出的“国家自行消亡”的原理，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而且首先是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口号是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第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作用的原理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列宁说，根据一般规律，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代替，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这就是马克思恩格

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①列宁的这些论述，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打碎反动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自行消亡”的辩证关系的原理。

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的机会主义者肆意歪曲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他们从超阶级的国家观出发，把资产阶级的议会看成是国家的主要成分，是“纯粹民主”的机关，鼓吹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伯恩施坦声称：“普遍的平等选举权”是“工人解放的必要先决条件”。考茨基鼓吹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余地”，应当“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他讥讽“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在他们看来，似乎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资产阶级的国家就会“缓慢地、平稳地、逐渐地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就会“自行消亡”了。他们把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得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这一著名论断，无耻地歪曲成“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其实，马克思这段论述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去夺取政权。它强调绝不能把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奴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工具，当成解放他们的现成武器。因此，列宁痛斥他们对马克思的论断做了“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③，从而使“伟大的革命学说竟然这样被人不知不觉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观念。”^④

列宁还从哲学方法论高度，深刻揭露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削剪”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的根源和实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17页。

质，指出他们是“借助折中主义”，来把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起来。他们随心所欲地、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时而抽出这个论述，时而抽出那个论述，而且“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到首位。”^①就是说，他们从歪曲、抬高国家“自行消亡”理论入手，达到反对、否定暴力革命的目的。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篡改成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②

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

由于考茨基主义一味崇拜“议会过渡”的道路，反对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歪曲篡改马克思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因此，为了全面清算考茨基主义的国家观，列宁系统地考察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提出、形成和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二、三、四章中，列宁历史地考察、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到《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论著中，特别是对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作了极其精辟的概括和发挥。

首先，列宁考察了在“1848年革命的前夜”写成的头两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还是在《国家与革命》里，列宁特别注意摘引了关于“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原来意义上的政权”和“国家即组织成为统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9页。

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等精辟论断。在“笔记”中，列宁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似乎还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又指出：“很明显，‘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进一步精确评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表述。”^②并强调指出这个思想的提出，不仅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正是“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③。同时列宁也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还只是“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在这里，对“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④

列宁说，这个问题马克思是到1852年才提出并加以解决的。在“以1848—1851年伟大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而写成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深刻分析和总结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⑤，作出了一个“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列宁认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⑥。但是，“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⑦紧接着，列宁详细阐发和论述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列宁直接援引了马克思关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70页。

②③④ 同上书，第22、24、27页。

⑤⑥⑦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0、26、29页。

目的’”这句名言，以及关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一重要论断，并强调指出马克思正是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①在列宁看来，巴黎公社经验不仅证明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而且提供了巴黎公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但是，当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他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②直到《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从1906—1907年第31期《新时代》杂志上刊登梅林所披露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新材料”中，首次得知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信里谈他对阶级斗争学说“新贡献”时，不仅已经有了精确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任务也有了明确的表述。当时，列宁曾在自己的一本《国家与革命》（第一版）最后一页上，摘录了这封信的内容，并于1918年12月《国家与革命》再版时，特地为该书第二章增写了题为《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的第3节。他根据马克思这封信的“精采论述”，不仅深刻批判了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国家学说“市剑式的歪曲”和“背弃”，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新的发挥。

第一，指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列宁强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三点新贡献”，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严密整体，它“极其鲜明地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①。因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②，“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③因此，列宁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又把阶级斗争的领域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就是“限制”、“阉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列宁强调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

第二，强调只有懂得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列宁根据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的精神，尖锐指出：机会主义者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而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列宁进而强调说：“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⑤

第三，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多样性的原理。列宁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样地，由

①②③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1、23、24、32、33页。

于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先后和情况不尽相同，因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①他认为这种“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②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引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论述，指明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第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而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是在“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③，它所创造的“苏维埃政权”则是另一种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新形式。列宁认为，俄国人民创造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适合于俄国情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适当的形式。但他并不要求其他无产阶级国家都采用这一模式，而是应按各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条件选择合适的政治形式。比如他在后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就谈到，“匈牙利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与俄国截然不同”，它“比我国容易得多，和平得多”^④。并高度评价说，匈牙利工人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给世界树立了比苏维埃俄国更好的榜样”^⑤。而早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列宁就对这一多样性原理作了明确的表述：“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⑥列

①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3、5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9页。

④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4—375、377页。

⑥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63页。

宁在这里所阐明的这一原理，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实践上为各国进入社会主义，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指明了方向，具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还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他说，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把“无产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是辩证的统一。在列宁看来，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和专政一样，都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民主的阶级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同资产阶级民主是根本对立的。它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最广泛最实际的民主制度。列宁说：“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①我们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化为被压迫者的民主，即由国家（= 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而这种高度的民主制度，又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5页。

列宁进而深刻阐明了资本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及其发展的辩证法。他说，民主的另一层含义指的就是：“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①。列宁认为，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迅猛发展，从客观上为“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国家管理提出了要求和可能，这包括“达到人人都识字”的民主政治的文化前提和“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等，以致使得“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②从而使国家管理职能中的“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但是，这种客观要求和可能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下，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管理国家、掌握国家命运的，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私事，他们在本质上和原则上是不允许也不可能达到“所有的人”都来管理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的矛盾运动最终必然导致突破少数人独有的狭隘界限，实现“所有的人”都能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制度。而无产阶级的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愈发展，愈完全，全体社会成员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参加国家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并清除了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恶习的影响的时候，当对任何人的监督和管理都不需要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国家的“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那时作为“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就愈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消亡”下去。到那时候，“民主是完全的，它成为习惯，并且因此而消亡”^③。因此，列宁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

①②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6、97、102页。

亡。”^①在列宁看来，这种真正“完全的民主等于没有任何民主。这不是怪论，而是真理！”^②所以，“**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③列宁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辩证的联系。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同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存在”，它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影响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的改造、等等。列宁说：“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④

四、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辩证考察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及“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进行了唯物辩证的考察。他首先从方法论上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⑤就是说，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在资本主义内部成熟的新社会形态的前提，使他有可能以科学的准确性预见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他关于未来社会形态性质、特点的预见，是建立在全面研究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未来发展，所依据的确实肯定的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③ 同上书，第75页。

④ 同上书，第75页。

⑤ 同上书，第80页。

学材料，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① 据此，马克思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将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本身）。并指出这两个阶段不是两个独立的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类型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同时，马克思在谈到要“科学地回答”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这一问题时，还明确提出了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的科学论断。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理论和方法，强调指出这是“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的首要的一点”^②，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论证，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

第一，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思想。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③ 列宁认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革命转变时期”和“政治上的过渡时期”，指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通常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作出结论说：国家的存在将“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④。他根据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8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9页。

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论断，进一步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实质上就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的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才能够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因此，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只是扩大民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为了保障大多数人享受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②。

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强调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实行“革命专政”的“特殊国家机器”。这种“国家”虽然“还是必要的”，但“已经是过渡性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国家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对此作了更详尽具体的阐发。他概述了国家发展的三阶段：1.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需要的国家，“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2. 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需要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型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3. 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就是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已经没有需要加以镇压的阶级存在了，作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国家”，也就成为完全不需要的东西而“自行消亡”下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4、85页。

去。列宁说：这“完全合乎逻辑，并且十分清楚！！”^①

第二，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和辩证过程。

列宁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科学预见，对“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马克思在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问题时，是“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②。就是说，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凭空去臆造“乌托邦”，而只是认为经过“长久阵痛”而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按照其“经济上的成熟程度”，可以“明显地、清楚地、准确地”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③。列宁在说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即“通常称为社会主义”时，强调了它的两个过渡性特点：一是它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二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国家。马克思把前者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或译“资产阶级法权”）。列宁赞成马克思的观点，并把后者称作“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或称之为“半国家”。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除了为镇压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而外，就是为了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列宁说，由于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④列宁对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往往“谴责”这是所谓“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的浅陋见解，郑重指出：“这好像是奇谈怪论，……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163—164页。

④ 同上书，第95页。

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①

列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把按劳分配称作“资产阶级权利”，决不是要否认它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的根本区别，而只是为了说明它的过渡性，即它只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即“归全社会公有”），而在产品“按劳动”分配上还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还没有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这是由于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还没有完全超出像威尼斯商人夏洛克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个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②。因此，出现这种过渡性的“弊病”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的，列宁之所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称作“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不是要否认它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而只是为了说明它的过渡性。就是说，国家或专政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形式，是来自资产阶级国家；而且这种国家或专政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消亡，正是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③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中指出，由于“分配的不平等还很严重，‘狭隘的资产阶级的权利眼界’还没有完全被超出”，因此，跟这种“（半资产阶级）权利一起，（半资产阶级）国家也还不能完全消失。”^④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当社会内部不仅完全消灭了阶级的对立和差别；而且“资产阶级权利”没有了，即“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实现了“各尽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③ 同上书，第91—92页。

④ 同上书，第164页。

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提高，以致人们都能够自愿地各尽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到来时，国家便将成为没有必要而完全消亡。因此，列宁说，“国家消亡”这个说法选得非常恰当，因为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将会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列宁认为，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这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做到的，而需要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他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①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个根源，在列宁看来有三个条件，这就是：“（1）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了；（2）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注意：劳动的习惯成了常规，不用强制！！）；（3）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等等”^②。列宁认为，剥夺资本家之后，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如何，在当时是不可能具体知道的。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列宁坚持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出发，阐明了国家既然有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当然也有它逐渐消亡的过程。国家消亡的迟早，取决于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速度，归根到底要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这是一个相当长期而又逐渐接近的过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1—92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及其准备材料《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是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名著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的一本最重要的代表作。它的贡献不仅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更加系统化、理论化；而且根据新的革命实践经验，对这一学说作出了新的发展。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直接导言。列宁原拟专章总结“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但因忙于领导十月革命实践而没有来得及写成。后来列宁在该书“第一版跋”中，曾风趣地说：“看来，……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①《国家与革命》成书于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但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十月革命后的紧张局势，列宁未能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俄国这两次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及其后的革命经验作出理论上的总结概括。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同时，还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和著作，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简短的结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以极大的理论毅力，紧密结合时代发展和革命实践提出的迫切课题，以唯物辩证法的系统研究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各个领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论断和深邃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16页。

列宁不仅在《哲学笔记》等论著中，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历史及其丰富内容，提出了建立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构想，而且成功地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运用于科学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及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关系，系统地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做出了新的结论和深刻的论证，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新课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敢于突破旧说，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新结论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伟大战略口号，辩证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为无产阶级指明了争取社会革命胜利的道路。他还系统考察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作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和新的发挥：系统阐发了关于国家消亡与暴力革命相互关系的原理；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原理；阐明资本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创造性地分析了“国家自行消亡”的经济基础和辩证过程；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和“过渡时期”的理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不仅从理论上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进一步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具体化和系统化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的哲学思想理论上有着十分鲜明的深刻性和创造性特征。在20世纪第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列宁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敏锐地积极地从时代发展和现实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吸取新力量，不断地来完善自己，努力做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既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作僵化的教条式理解的“左”的积

习，又立场鲜明地跟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充分体现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他的论著具有着科学的严密性和战斗性风格。虽然处在当时十分艰难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列宁的许多哲学思想还没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完善的表述，许多新出现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的丰富多采而又富有活力的哲学创造活动，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而且直接引导着俄国无产阶级迎来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四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作者 =

页数 = 5 8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